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



前 言

北京是中国七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安阳）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至今仍保存比较完整的古老都市。北京作为全中国的统一政治中心虽然只有 700 余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古老城市，以及区域性的方国都邑来说，则至少有 3000 余年的历史了。北京在古代称蓟城，先秦时期曾是燕国都城；秦为广阳郡治所；西汉先后为燕国、幽州燕郡、广阳国、广阳郡治所；王莽时改广阳国为广有郡、蓟县为伐戎，蓟城仍为治所。东汉建武十三年（37 年）省广阳国并于上谷郡，和帝永元八年（96 年）复置广阳郡，蓟城又恢复为广阳郡治所。自曹魏以下，蓟城或为幽州燕郡治所，或为燕国治所。十六国时期，前燕鲜卑慕容儁还曾一度在此建都 6 年（352—357 年）。隋大业三年（607 年）废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618 年）复改为幽州，治所均仍在蓟城。唐代，蓟城又称幽州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 年）废幽州为范阳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 年）复改范阳郡为幽州，蓟城仍先后为郡、州治所。辽会同元年（938 年）升幽州为南京，建为陪都，又称燕京，蓟城则称南京城或燕京城。金朝灭辽以后，海陵王天德三年（1151 年）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展其东、西、南三面，次年竣工。贞元元年（1153 年），改燕京为中都，迁都于中都城。元朝灭金以后，元世祖至元三年（1266 年）十二月决定以金中都城东北的原辽、金离宫为中心，修筑新城，次年（1267 年）正月兴工。至元九年（1272 年）命名为大都，定为京师。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大都城基本竣工，历时 18 年。明初改元大都为北平。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 年）正月改北平名北京，为陪都。永乐十八年（1420 年）以北京为京师，宣布迁都。永乐十九年（1421 年）正式从南京迁都北京。明朝占据元大都之初，即洪武元年（1368 年），将北城垣南缩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后，永乐十七年（1419 年）又将南城垣向南拓展二里至今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边警日急，于是增筑北京南部外城，全城形势遂成“凸”字形。清代相沿不改。

据史籍记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蓟城的城郭、宫殿曾屡遭破坏。例如，公元前 215 年，秦始皇为防止六国旧贵族据城叛乱，下令“坏城郭，决通堤防”。当时秦始皇正东巡碣石，近在身边的燕都蓟城城郭当然难以幸免。十六国时期，公元 314 年羯族首领石勒攻陷蓟城，杀西晋幽州刺史王浚，“焚烧城邑，害万余人”。城中宫殿，付之一炬。事隔 70 余年，公元 385 年，后秦幽州刺史王永频为后燕将军平规所败，临逃跑前，“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今辽宁朝阳）、蓟城宫室”，蓟城再次遭到破坏。辽金之际，公元 1122 年金人陷辽南京，（即蓟城），临撤离前亦“大毁诸州及燕山（即蓟城，宋称燕山府）城壁楼橹”。但是，随着政治权力的转移，根据新统治者的需要，蓟城在战火之后，又往往能得到修复和发展。

在秦末农民战争中，公元前 209 年韩广受燕国旧贵族推举，据蓟城自立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晋书》卷五《孝愍帝纪》。

《晋书》卷一百十五《苻丕载记》。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引《北征纪实》。

为燕王，在位4年。为据地自固，韩广当修复被秦始皇平毁的蓟城城郭。公元350年前燕慕容儁攻取蓟城，公元352年并以蓟城为前燕国都，铸铜马、建碣石宫，多有营造，消除了曾被石勒焚毁的痕迹。公元389年后燕以长乐公慕容盛镇守蓟城。慕容盛又修复了被前秦幽州刺史王永焚毁的蓟城旧宫。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城市的设置，特别是早期城市的设置，往往主要受政治、军事因素的影响。但是，当决定在某一地区设置城市以后，其在该地区内的具体位置却是由周围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就明确提出了选择城址的标准。其“乘马篇”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度地篇”云：“盖天子圣人也。故圣人之处国都，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水之泻，因大川而注焉。”质言之，合理的城址应是既能保有充足的水源，又能有效地避免洪涝之害的傍山临水高敞之地。

城市的生存和水源有密切关系。历史上曾有很多著名城市，或因河流改道而废毁，或因水源枯竭而衰落。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大古都，无不依傍大河、大江而持有丰富的水源，如安阳殷墟之有洹河，洛阳之有洛水、瀍水、涧水，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有渭水，大梁（今河南开封）之有汴水，南京之有长江，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有钱塘江，北京之有永定河（古称水）、高粱河、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北京古代城址的变化和河流水系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位于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的西周燕国都城之所以被放弃，主要原因是其距圣水（今大石河）出山口不远，城南端常遭水患的缘故。元朝之所以放弃金中都城（位于北京广安门一带）而于其东北别筑大都城，固然有中都城过于残破等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原金中都城所依赖的莲花池水系水量严重匮乏，不能满足作为全中国统一政治中心的元朝京师的城市、宫苑用水，更不能满足每年供应三四百万石粮食的漕运需要。因此，金中都城东北的高粱河（水故道之一）水系上的辽、金离宫旧址就成为建筑新都城的最好位置。

历明、清两代，北京城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规模宏大、壮丽的都市。雄厚高大的城墙，整齐街道，气势恢宏的宫殿群，遍植奇花异卉、设计绝巧的宫苑，星罗棋布的民居，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力。

《晋书》卷一百十《慕容儁载记》。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晋纪二十九，孝武帝太元十四年。

一、周初的燕都

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商，西周王朝建立。据史书记载，周初分封诸侯，在今北京地区除封有燕国外还封有蓟国，但关于受封者的身份及其与燕国的关系，由于年代久远，备有歧说。《礼记·乐记》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所谓黄帝之后、帝尧之后，具体所指均不可确知，所可知者惟有召公。召公姬姓，名奭，是与周王室同姓的宗室贵族。武王死后，召公与周公共同辅佐幼主成王，为大保，“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陕，《史记集解》引何休曰：“盖今弘农陕县是也。”弘农陕县即今河南陕县。可见周初召公是与周公地位相埒的宗室重臣。召公之治西方，甚得民和，死后，百姓以其曾决狱于棠树之下，而不伐棠树，作《甘棠》诗歌颂其德。但是，周初召公受封的燕国是否就在今北京地区？燕都是否就是蓟城？由于史文简略，史家始终没有一致的结论。总计起来，主要有四种意见：一说认为黄帝姬姓，所谓黄帝之后即为召公，周初燕国就在蓟地（今北京）。司马贞《史记索隐》云：“召者，畿内菜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后武王封之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今北京广安门一带）是也。亦以元子（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陆德明《经典释文》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十九》云：“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云：“召公所出，众说纷纭，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一说黄帝之后或帝尧之后初封于蓟，嗣绝，成王复封召公奭于蓟为燕国。毛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云：“《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一说周武王封召公奭的燕国乃在今天津蓟县一带，后燕国吞并蓟国而迁都于蓟。《史记正义》云：“《括地志》：燕山在幽州渔阳县（治今天津蓟县）东南六十里。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周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一说周初燕国在今河北涞水县境。《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七“易州”：“废涞水县在州北十二里，……按县地即周公封召公于此也。”

归纳以上四说，可分二类：一类认为周初燕国与蓟国同为—事。燕与蓟，—为国名，—为地名，燕国都蓟。一类认为周初帝尧之后或黄帝之后的蓟国都蓟（今北京前身），蓟国绝灭之后，燕国始据其地，并以蓟为都。

以上诸说究竟谁是谁非，数百年来难以判断。后世学者也只是以古代学者的推测为依据，各执—端，聚讼纷纭。但是从本世纪 60 年代，这个问题开始有了解决的线索。近年来的考古学成果可以肯定西周初封的燕国就在今北京地区，其都城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

琉璃河西周燕国遗址在今北京西南郊的房山区东南，今河北涿州市北，其范围包括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和涸城等村，东西长约 3.5 公里，南北宽约 1 公里。大石河流经遗址西侧和南侧，京广铁路从遗址东部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穿过。大石河古称圣水。《水经·圣水注》载：“（圣）水出（上谷）郡之西南圣水谷，东南流，迳大防岭之东首。……又东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余，潜源东出，又东，颓波泻涧一丈有余，屈而南流也。圣水南流，历（良乡）县西转，又南，迳良乡县故城西，王莽之广阳也，有防水注之。（防）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而东南流迳羊头阜下，俗谓之羊头溪。其水又东南流，至县东入圣水。圣水又南与乐水合。（乐）水出县西北大防山南，东南流历县西，而东南流注圣水。（圣水）又东迳其县故城南，又东迳圣聚南，盖藉水而怀称也。又东南与侠河合……世谓之侠活河，又名之曰非理之沟也。”今大石河发源于大房山，东流南转，自坨里以下一段为伏流河，在今房山县城东南复出为地面河，与众水相汇而下。在大石河伏流上源有地名“口头”，再上源有“白石口沟”，与《水经·圣水注》所述圣水“东至玉石山，谓之玉石口。其水伏流里许，潜源东出”，大致相符。防水是圣水支流，即今丁家洼河。今丁家洼河与大石河伏流之间有地名“羊头岗”，当即古防水所流经的羊头阜。乐水即今周口店河，这是一条十分古老的河流，也发源自大防山。圣水与防水、乐水相汇后，东南流，“东迳圣聚南”，复东南流与侠河相会。侠河即今夹括河，其上源为牯牛河。今大石河（古圣水）与夹括河（古侠河）相会处正在董家林南，故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当即酈道元所谓“圣聚”。《说文解字注》云：“聚，积也。积以物言，聚以人言，其义通也。”当时人虽知道这里是先民祖居之地，但详情已不能明白，故因圣水流经其地而名之曰“圣聚”，即所谓“藉水而怀称也”。1962年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就发现了这处遗址，并在刘李店、董家林等地做过小型试掘，以后又进行大规模发掘。

根据目前发表的考古报告，我们可以了解到：1962年在刘李店遗址中发现8件骨器，分别为笄、锥、镞等。石器3件，其中2件为长方形的石刀，另一件为石杵。出土物中，陶器占绝大多数，分别为鬲、甗、盆、簋、罐、缸、纺轮等。陶器的制法分泥条盘筑、模制、轮制三种。陶鬲的器形可分为三式，其中第3式鬲的形制与河南安阳大司空村殷商墓葬中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陶簋为泥质灰陶，其形制与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同类器相同。根据这些器物的形制，可以判断刘李店遗址的年代，最早可到商代。

1973年在刘李店村南又发现两座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夏家店文化是中国古代早期的一种北方文化类型，因较早发现于辽宁省赤峰市夏家店村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大致北起今内蒙古自治区的西拉木伦河，南至河北省东北部，遍于燕山南北。夏家店文化初步可分为燕南型和燕北型。近年来，有学者认为燕南型仍可分为不同类型。今北京地区正处于夏家店文化圈的南缘。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一般认为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商时代，最晚不超过西周早期。在刘李店的这两座古代墓葬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筒腹鬲”、“圆腹鬲”、“敛口罐”和铜耳环等物。“筒腹鬲”，敞口直腹，矮裆实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药王庙和夏家店村的文化遗址。“圆腹鬲”，敞口短颈，圆腹袋足，同类器物曾见于辽宁赤峰、河北大厂、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等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敛口罐”，敛口，边唇稍微外侈，短颈，肩腹无明显分界，同类器物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夏家店下

此承教于尹钧科先生。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63年第3期。

层文化墓葬。铜耳环也曾见于唐山小官屯和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等地。根据出土器物比较，可以判断这两座墓葬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但年代较晚，或相当于商代晚期。

在琉璃河刘李店村发现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代文化遗物，表明在殷人势力向北发展到燕山地区时，这里曾一度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质言之，这里同时存在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土著民族和殷人的活动。1977 年在北京平谷县刘家河村发现的一座商代墓葬中，除出土具有典型中原商文化风格的铜鼎、鬲、甗、爵、卣、斝、三羊罍、盃、盘等礼器外，还出土了具有典型夏家店下层文化风格的金耳环和臂钏。这更说明今北京地区在当时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商文化互相融合的情况。

刘李店遗址的东南是黄土坡村。在黄土坡村附近有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墓葬遗址。京广铁路从中穿过，将遗址分为东、西二区。从 1973—1979 年，共在铁路以西的 区发掘了 33 座墓葬和 3 座车马坑，其中 7 座墓葬有奴隶殉葬；在铁路以东的 区发掘了 27 座墓葬和 2 座车马坑。以上这些墓葬可分为四期：第一期属商代晚期，第二期属周成王时期，第三期属周康王时期前后，第四期属西周中期或晚期的墓葬。值得注意的是， 区墓葬和 区墓葬在文化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例如，7 座有奴隶殉葬的墓都发现在 区，且该区均为中小型墓葬，普遍有殉狗现象，随葬陶器多由鬲、簋、罐构成，这和河南安阳殷商墓基本相同。而在 区发掘的墓葬，无论规模大小，都没有发现奴隶殉葬的情形，且极少殉狗，随葬器物由鬲、罐构成，表现出与 区墓葬不同的另一种文化形态。在黄土坡遗址 区发现的奴隶殉葬墓当是在燕地的殷商遗民的墓葬，而 区的墓葬当是西周燕国贵族和平民的墓葬。

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对于确定周初燕都有重要意义。据考古报告介绍，其情况如下。

黄土坡遗址 区发现的 7 座奴隶殉葬墓中，殉葬的奴隶 7—17 岁不等，多为男性少年，间有女性青年。这 7 座墓葬共出土铜礼器 19 件、铜兵器 12 件、铜工具 6 件、陶器 101 件、釉陶器 4 件，以及用玉石、蚌、蛤蜊、象牙等制作的饰物。在出土物中，特别有意义的是带有铭文的铜器。如 52 号墓出土的一件盾饰，背面铸有阳文“匱（燕）侯”二字，明显地说明了该遗址与西周燕国的关系。该墓出土的“复鼎”，铭文为“侯赏复贝三朋，复用乍（作）父乙宝彝。”；“复尊”，铭文为“匱侯赏复冂衣、臣妾、贝，用乍父乙宝彝。”。根据与同型器比较，可以判断是西周早期康王时代器物。53 号墓出土的“攸簋”，器内铭文为“侯赏攸贝三朋，攸用乍父戊宝彝，肇乍纪”。根据纹饰判断，其年代应在西周康王、昭王之际。54 号墓出土的铜盘，其年代可早至商末周初时代。

在 52 号墓的南面有 3 座车马坑，均为整车埋放。陪葬的车置于坑的中部，輿北辕南。车辕两侧，各有埋放马的长方形土坑。车为木制，马身均有各种饰物。

过去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过西周铜器，最著名者就是清代传说出土于卢沟桥的“亚盃”。据《攀古楼彝器款识》载录，有盃 1 件、卣 1 件、爵 2 件、觚 1 件，俱同一人所作器。铜盃铭文为“ 侯，亚 。匱侯易（赐）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考古》1976 年第 1 期。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 年第 11 期。

亚贝，用作父乙宝彝”。解放初，在北京西郊也曾出土铜甗，据认为也是西周早期遗物。北京地区历年来西周燕国铜器的发现和琉璃河黄土坡西周燕国墓葬遗址的发现，有力地说明今北京地区和西周燕国有密切关系。

黄土坡遗址区的发现最有意义。至1979年为止，共发掘了27座墓葬和2座车马坑。251号墓出土“伯矩鬲”、“单子尊”、“单子卣”、“伯矩盘”和“庶觶”等铜器，其中“伯矩鬲”造型庄重、华丽，铭文为“在戊辰，匱侯易（赐）伯矩贝，用乍（作）父戊彝。”253号墓出土“董鼎”、“圉卣”、“圉卣”、“圉方鼎”等器，其中“董鼎”最为珍贵。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件高62厘米、重41.5公斤的重器，而且在于该器内壁铭文内容十分重要。铭文为“匱侯令董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董贝，用作太子癸宝……”“大”“太”相通，大保即太保。《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位为三公之一的太保，是召公在成王时的官职。铭文中所说的太保就是召公奭，也就是周初“封召公于北燕”的召公。“董鼎”是周初时器物，而铭载燕侯命“董”谒见太保召公奭于宗周，这说明周初召公虽受封于燕，但由于他长期供职于宗周，其后实际统治燕地的乃是他的子辈。《史记索隐》即曾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周初封周公旦为鲁公，“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后又“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的史实而推测“（召公）亦以元子（即长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253号墓出土的其他几件铜器的铭文则分别记载“圉”受燕侯赏赐和受周王赏赐等事。

1981—1983年，考古学者在黄土坡遗址区又发掘西周初期墓葬121座，车马坑21座。墓葬可分大中小三种类型，其中有3座是带有斜坡墓道的燕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般大中型墓葬均有车马陪葬，只是在数量上有所差别，最多者达马14匹、车5辆。陪葬的车辆大多是拆开后的埋放，这与区车马坑中的整车埋放不同，显示着周人与殷人在风俗习惯上的不同。

这121座西周燕国墓葬的随葬品有陶器、铜器、漆器和玉、石、玛瑙制作的装饰品。陶器绝大部分不是实用器，而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明器，分鬲、簋、罐三种器形，表面多饰绳纹。铜礼器有鼎、簋、罍、爵、尊、卣、甗等，且部分带有铭文。如1029号墓出土的一件铜戈，铭文为“匱侯”，分铸在穿木柄处两侧。同墓出土的铜钩戟，铭文为“匱侯舞戈”。又有一件铜泡（估计是盾的中心饰件），背面铭文为“匱侯舞易”。这些铜器铭文与以前发现的铜器铭文相比较，虽然没有突破性的内容，但为说明这处遗址的西周燕国文化性质又增添了不少新的资料。

在琉璃河刘李店既然发现了商周墓葬和相当于商晚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而在距刘李店不远的黄土坡遗址又发现了西周燕国的大规模墓葬，“个别较大的墓有南北两个墓道，总长达30米，这种墓与河南浚县发现的卫侯墓

参见琉璃河考古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北京市文物局考古队：《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4页。

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

相同，推测有可能是燕侯的陵墓”。那么，由这一切判断，周初燕国的都城应即在此不远。这个问题随着黄土坡遗址西北的董家林村古城遗址的发现，终于得到解答。

董家林村在刘李店和黄土坡村之间稍北。古城遗址在村西北隅，大石河（古圣水）流经古城西、南两侧。该地古代遗存十分丰富，在村道两旁的黄土断层中常可发现灰坑遗迹，其中混杂着早期绳纹灰陶碎片。在古城遗址的地表，也散落着很多古代遗物，有被农民耕地时翻出地面的陶纺轮等物。古城规模，东西长约 829 米，其南端因遭大石河泛滥冲毁无存，所以南北长度不详。但从其东、西城墙北部仅残存约 300 米这一点来看，笔者认为其平面似应呈横长方形。城墙外有城壕，深约 2 米。城壕横断面呈梯形，上宽下窄，壕底有 10 厘米左右的淤土层。这说明当时也是利用护城河作为城市的防卫设施的。城墙结构有主墙体和内外护坡。主墙体下挖有浅基槽，直达生土层，填土与基槽相平后，墙体再向两侧展宽。这种为加固城墙而在构筑时挖基槽的工程技术在中国起源甚早，根据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早在距今 4000 余年以前的龙山文化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采用这种方法。如今已发现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和山东龙山城子崖古城址，墙体下就都挖有基础槽。至于基槽填土与槽口相平后不是内缩而是向两侧展宽，这种现象见于商代城墙。例如商早期的河南偃师县尸乡沟商城，其基槽填平后墙身分别向两侧展宽 0.2—0.35 米；商代中期的郑州商城，其基槽在主城墙内侧，填平后墙体向外侧展宽。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筑城技术的发展。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段夯筑技术，并有内外护坡，这种情况见于商前期的山西夏县东下冯商城和商中期的郑州商城。所谓分段夯筑，就是将主城墙两壁和一端用木板相堵后填土夯实，完成一段后再向前延伸。主城墙内外侧的护坡实际只对木板起支撑作用，这从董家林古城的护坡中仅仅是土质紧密但不见夯层和夯窝的现象中可得到证明。由于采用这种技术，夹在主城墙和护坡之间的筑板朽坏后就会在两者之间出现缝隙。郑州商城的主城墙和护坡之间就有一条垂直壁面，董家林古城的城墙也应存在这种现象。董家林古城主城墙采用分层夯筑技术，夯层厚 5 厘米左右，夯窝直径约 3 厘米，非常密集。夯窝大小和龙山文化古城、商代早中期古城相差不大。当然，夯土技术的进步还是有的，例如王城岗龙山文化古城是用河卵石作为夯土工具；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就已经采用了 4 根木棍捆成一把的夯土工具；郑州商城，根据夯窝的密集程度，考古学者认为是采用成捆的圆棍绑在一起作为夯具的。董家林古城使用的夯具恐怕和郑州商城的相似。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期古城的夯土层一般较厚，龙山文化古城通常在 10~20 厘米左右，郑州商城也在 8~10 厘米左右，而董家林古城却在 5 厘米左右。在夯具落后的情况下，减薄夯土层，从而使墙土夯打得更加坚实，使城墙更加牢固，这是董家林古城在建造技术方面的先进之处。古城内还发现有居住、窖穴基址和生产、生活用具。由于该城内侧护坡被商末周初墓葬和西周时期灰坑、房基打破，因此这座古城建造年代不会晚于西周初期，大约是商朝末期或更稍早一些。根据董家林古城东南不远存在着黄土坡村西周燕国贵族墓葬群，以及这座古城本身的年代和规模，可以肯定它就是西周燕国都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第 1 版，第 260 页。

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第 40 页，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出版。并参见河南省

1986年在黄土坡遗址区发掘的1193号墓有了重大发现。该大墓为长方形土坑葬，有4条墓道分布在大墓四角。在椁室东南部出土的铜鬲、铜盃上有4篇内容相同的铭文，据考古报告释读为：“王曰太保：‘佳乃明，乃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匱。、羌、马、、、驭、微、克、、匱入土眾厥。’用作宝彝”。据殷玮璋先生考证，这两件铜器是西周成王早期遗物，铭文内容当译读为：“周王说：‘太保，你明德贤能，于周有功。你常以香酒奉献给君主。为了报答你的忠诚和对君王的尊奉，封你侯于燕。将、羌、马、、、驭、微、克、等九族连同燕国纳入周土，由你治辖。’”这两件铜器就是太保召公为纪念周王册封他燕侯爵位并授土授民而铸造的，即所谓“用作宝彝”。据此，可以判断1193号墓就是召公奭的陵墓。西周初召公被封于燕，其后因供职宗周而爵位由子辈承袭，所以他死后仍归葬于燕国封地内。目前，学术界关于这条铭文的解释方面尽管存在一些不同意见，例如有学者认为该墓的墓主当为燕侯克，是召公奭的子辈或孙辈，属第一代或第二代燕侯，但是在董家林古城就是西周初期燕国都城且是“封召公于燕”的始封地这一点上，大家的意见基本是一致的。至此，判断董家林古城不但是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而且是“封召公于燕”的西周燕国最初都城遗址，已经没有问题。

董家林周初燕都古城遗址的年代早在商末周初，可见在周初封召公于燕以前这个城就已经存在了。《左传·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责晋，曰：“及武王克商……燕、亳，吾北土也。”这虽然是追述，但据此可以推测，可能在周武王灭商以前，燕国作为商朝北方的一个属国就已经存在。这个燕国是周初燕国的前身，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召公奭于此，别立新邦，仍沿用燕国旧称。召公与周室同姓，原以封于召而称召公，至此改称燕召公。董家林古城很可能不但是周初燕国的都城，而且也是商朝末期的北方属国燕国的都城。郭沫若先生认为：燕国决不始于周初，而是早已有之，“系自然生长的国家”。侯仁之先生也认为：“北京最初居民点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和燕国的兴起分不开的。燕乃是随着地方生产的发展而自然生长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并不是从周初的分封所开始的。”董家林周初燕国都城遗址中的内护城坡被商末周初墓葬打破的事实，可以证明以上推测和判断是正确的。

琉璃河董家林古城为周初燕都遗址是可以肯定的了。现在仍存在的问题就是今北京城古代称蓟，而《史记·周本纪》又记载西周初年时周武王“追

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河南省博物馆等：《郑州商代城遗址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第1辑，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

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第1期

《北京琉璃河出土西周有铭铜器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0期。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第237页。

侯仁之：《步芳集》，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光明日报》1997年1月28日载文，近据在该处早期遗址灰坑中发现有“成周”二字卜甲，故又有古城上限为成王时代之说。笔者认为，该问题尚需综合各方面情况，进一步深入研究。

思先圣王，乃褒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这样看来，今北京城的本源当是周初帝尧之后的蓟都而不是周初的燕都了。关于周初的蓟国、蓟侯，文献中除前述外没有更多的记载，考古学方面迄今为止也没有任何发现，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妨碍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作为今北京城前身的地位。因为，文献明确记载，至迟在东周的春秋时期燕国即以蓟城为都，终至战国末期被秦朝所灭。所以，从古燕国的发展过程来看，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和东周蓟城（今北京前身）也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先后延续关系的。质言之，无论周初蓟都存在何处，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都可以说是今北京城的最早的本源之一。因此，笔者认为根据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的发现而把今北京城的历史上溯至距今 3000 余年以前的商末周初时期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另一方面，如果《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可靠，而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黄帝姬姓，君奭盖其后也”的解释又可信的话，那么《史记·周本纪》关于封帝尧之后于蓟的记载则有误，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也有可能同时就是周初的蓟城。

二、东周——汉代的蓟城

西周初燕国都城在今北京西南部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古城。在其以后，据《世本》记载，春秋早期燕桓侯（前 697—前 691 年）为避山戎之患曾徙都临易（今河北容城县古贤村）。但是，至迟在燕襄公时期（前 657—前 618 年）燕国已改以蓟城为都。《韩非子·有度篇》云：“燕襄王以河为界，以蓟为国。”史载燕室谱系无襄王，只有襄公，学者或疑襄王为战国时期的燕昭王之误。常征先生《古燕国史探微》根据先秦时期国都制度和有关史事对此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襄王当为襄公之误，其说可信。如果说董家林周初燕都遗址还不能肯定就是蓟城的话，那么根据《韩非子》的记载，可以明确至迟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燕国的都城已是蓟城。至于燕国之所以不从临易重新迁回董家林燕都旧址，其原因恐怕主要是为了避开经常暴涨的圣水（今大石河）泛滥之害，因而向董家林东北迁至地势更高的水（今永定河）岸边。

人们原来一直认为东周以来的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白云观一带，即今北京城区的西南部，但后来发现这里的古城遗址的年代晚于东汉，所以东周蓟城遗址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从目前获得的考古资料来看，只能说是得到一些线索。1956 年在北京市的一项水利工程中，自城西会城门村东经白云观、象来街至和平门一线，发现 151 座战国和汉代时期的古瓦井，其中属战国时期的 36 座，汉代的 115 座。战国时期的古瓦井是由多节瓦制井圈叠砌而成，每节高 27~54.5 厘米、直径 60.5~63.5 厘米，一般外壁印有席纹和绳纹，内壁没有花纹。由于年代久远，井口都被破坏，最多的保留有 11 节瓦圈。汉代的瓦井结构与战国时期的相同，但井圈每节高 20.5~38.5 厘米、直径 68~91 厘米，比战国时期井圈矮而直径加大，显示出加工技术的进步。井圈内外壁一般都印有花纹。井口同样被破坏，最多的保留 16 节。

以上瓦井群分布密集的地段是在象来街（即宣武门西豁口）两侧东至和平门一带，其中有的地方 6 平方米之内就有 4 处古瓦井遗址，这恐怕是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的现象。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或许就在这一带地区。

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发现，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深入。1965 年以来，在宣武门外东西一线、广安门内外，以及宣武区法源寺东北，又陆续发现了 65 座东周和汉代的古瓦井，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段仍在北京宣武门东至和平门一带，计有 50 余座。

构筑这些瓦井的井圈依形制可分为四类：一类井圈呈高筒形，圈壁垂直，上下均为平口，口部稍厚。井圈外壁饰有绳纹，内壁没有花纹。井圈高 51~57 厘米、直径 64~81 厘米、壁厚 1~1.2 厘米左右。二类井圈呈矮筒形，圈壁比一类井圈为薄，圈身中部微向外鼓，口沿稍宽，有的微卷。绳纹普遍较浅，有的为细绳纹，个别的没有花纹。井圈高 37 厘米、直径 76~78 厘米、壁厚 1 厘米左右。三类井圈呈圆圈形，外壁垂直，绳纹粗且浅，内壁中部内

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90 页。

常征：《古燕国史探微》，聊城地区新闻出版局 1992 年版，第 244 页。

苏天钧：《北京西郊的白云观遗址》，《考古》1963 年第 3 期。

收成弧形，印有圆点纹。井圈高 34~36 厘米、直径 82~92 厘米，中部薄，口部厚。一般口部为 3 厘米，中部为 1.5~2 厘米。类井圈又可细分为两式：一式与类井圈基本相同，只是内外壁花纹不同。井

圈高 25 厘米、直径 80~96 厘米左右。二式是以三块 $\frac{1}{3}$ 圆的瓦壁拼合成

的井圈，高 48~64 厘米、直径 92~99 厘米、壁厚 3.4~4 厘米。不过二式井圈发现很少，只有 4 座。根据井圈所处的文化地层和井圈的叠压关系，以及井底遗存物的性质，可以判断类井年代最早，以下依次类推，类井年代最晚。、类井属东周时期，类井属西汉早期。

1965 年的发现，使人们更有理由相信今北京城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可能是东周至汉代的蓟城遗址。同时，在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的永定门火车站、陶然亭、天坛、蒲黄榆等地也相继发现很多战国至汉代的小型墓葬。尤其是 1973 年和 1974 年先后在宣武区法源寺（位于宣武门外西南）附近和其以西的地图出版社院内发现两处战国墓葬群。1977 年在西单的长安街北侧商业部后院发现西汉墓。考古学者据此推测，东周至汉代的蓟城南垣可能在地图出版社、法源寺以北一线，北垣可能在西长安街以南一线，而东垣笔者认为当在和平门以东不远之南北一线，西垣则无从推测。

1972 年在今北京和平门外韩家潭发现两面战国时期燕国宫殿建筑特有的饕餮纹半瓦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战国时期的燕明刀货币和细绳纹陶片。这些古代遗物的发现，为以上判断增加了新的依据。另外，建国后在陶然亭公园挖湖时发现过大面积的战国中期居住址。陶然亭公园距推测中的东周蓟城南垣不远，笔者认为这也是判断东周蓟城方位的一条重要线索。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57 年也曾在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外以南 700 米处的护城河西岸发现战国时期燕宫饕餮纹半瓦当，古文化层厚达 1 米，出土的陶片中有些年代接近西周。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据此便推测东周蓟城西垣在今广安门以西，那么蓟城未免东西过于狭长，又不符合一般城市规制。根据近年地质勘察资料和《水经》记载，东汉以前今永定河（古称水）河道在蓟城以北，即今积水潭、北海、中海、人大会堂西南、龙潭湖西、贾家花园之西北——东南一线。东汉以后，永定河才改经今北京城南的凉水河、凤河一线。由于在广安门外地区没有丰富的战国时期遗迹，而所仅见的这个古文化层中虽有年代接近西周及战国时期陶制品，但发现时是否存在着清楚的叠压关系却未见说明。如果这些年代不同的陶片是和战国燕饕餮纹半瓦当无序地混杂在一起的，那么就也有可能是永定河改道时被冲积到此处，而并非是当地的古代遗物。总之，关于东周至汉代蓟城的确切位置，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和探索。

关于战国时期蓟城的情况，史书中略有记载，兹介绍如下：

战国时的蓟城内有燕王宫、太子的东宫、国相的公府等宏大建筑。燕王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古瓦井》，《文物》1972 年第 2 期。

北京市文物局：《建国以来北京市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文物考古三年》（1949—1979 年），文物出版社 1981 年版。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又发现燕饕餮纹半瓦当》，《考古》1980 年第 2 期。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 年第 8 期。

赵正之等：《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文物》1957 年第 7 期。

咍六年（前 315 年），燕国发生国相子之篡权事件，燕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铲平子之之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恟恐，百姓离志”。事件发生在城内，从“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一语可以得知当时蓟城人口繁盛，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城市。蓟城还有宁台、元英、历室三座著名建筑。燕将乐毅《报燕惠王书》追述自己的功绩时云：破齐都临淄，“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于燕。齐器设于宁台，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乎历室，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来，功未有及先王（燕昭王）者也”。宁台即燕之郊台，祭天之处。元英、历室，燕蓟城燕王宫殿名。齐器，系指齐国宗庙内的神器。大吕，系指齐钟名，也是齐国宗庙所设。故鼎，系指前齐国破燕时从燕宗庙中掠走的大鼎，是象征燕王神权的神器，至此复被燕军夺回，置于燕历石宫。《括地志辑校》称宁台在唐幽州蓟县西四十里，元英、历石二宫在宁台之下。唐幽州蓟县治幽州城（即蓟城），在今北京广安门内外，由此向西 30 里（唐里约四十里），则达今北京石景山区，这里虽有一地称“古城”，但既不见于文献记载，也未发现战国遗址。从目前来看，似乎难以确定这里就是宁台和元英、历室的处址。燕国蓟城又有碣石宫，是燕昭王为师事齐国贤士邹衍所筑。《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邹衍）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碣石宫，身亲往师之。”燕昭王既然师事邹衍，则碣石宫当距燕王宫不会太远。《括地志》述称“碣石宫在宁台之东”，当属合理。

汉代蓟城乃因战国蓟城之旧，地址未变。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封诸功臣、王室贵族为诸侯王，分镇各地。汉五年（前 202 年）封亲信卢绾为燕王，治蓟城。后复行诛罚，逐步铲除异姓诸王。十一年（前 196 年）卢绾反。十二年（前 195 年）刘邦复封子刘建为燕王，是为燕灵王。吕后执政，刘建死，吕后杀其庶子，封吕通为燕王。吕后死，汉诛吕通，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复封宗室刘泽为燕王，是为燕敬王。刘泽死，汉文帝三年（前 177 年）其子刘嘉承袭王位为燕康王。刘嘉死，汉景帝六年（前 151 年）其子刘定国承袭为燕王。汉武帝元朔元年（前 128 年），燕王定国以肆行非法，淫乱败伦，自杀，国除。燕国改为燕郡。元狩五年（前 118 年）复置燕国，六年（前 117 年）以汉武帝子刘旦为燕王。昭帝元凤元年（前 80 年），刘旦以谋反赐死，国除。燕国改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前 73 年）更立广阳国，以刘旦子刘建为广阳王，其子孙绍封不绝，至王莽时始废。

《汉书·诸侯年表总叙》云：“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藩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燕国是西汉初年在北方的大封国，其燕王宫室规模当亦十分宏大。虽然，其后文、景二世行强干弱枝政策，削弱诸宗室藩国势力；汉武帝又行推恩之法，使诸侯王将封邑分封子弟，藩国自析，但是，却未见有削减诸侯王国都规模和宫室制度的记载。据《汉书·燕刺王刘旦传》记载，汉武帝时蓟城燕王宫中有万载宫，燕王刘旦经常在这里与群臣、宾客、妃妾置酒高会。万载宫两侧有清溪潺潺流过，宫前有池沼，碧水荡漾。庭院中古木参天，绿阴匝地，景色优美。燕王宫中还有明光殿，是燕王举行各种大典和迎奉天子诏书的宫殿。

《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

明光殿因是燕王宫中的正殿，所以殿前有一道朝门称端门，犹如今日故宫太和殿前的太和门。端门即正门之意。燕王宫有宫城，城门上有城楼。《汉书·五行志》载：“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燕王都蓟大风雨，拔宫中树七围以上十六枚，坏城楼。”即指此城楼而言。宫中还有水井数口，供生活起居用水。在宫的后部有永巷（即长巷），按制度是宫女居住或幽闭触犯禁律者之所，其中有厕、猪廄。

《考工记·匠人》记王城制度为“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燕国既为周初封国之一，都城内地也当有进行商品交易的“市”。战国时期，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燕国的商业活动也很频繁。这从燕国货币“燕明刀”分布在东至日本、朝鲜，南至我国河南、山东的广泛范围，可得证明。《史记·刺客列传》载：“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这里所谓的“燕市”虽然大约指的是燕下都（在今河北易县）的市，但也可以想见，同是燕都的蓟城，其市一定也很繁华。王莽灭亡，刘秀奉更始帝之命抚定河北，北巡幽蓟，在蓟城遣部下王霸“至市中募人”。这是因为“市”是城市中人群往来不息，消息传播最快的地方，故官府张贴告示或募兵也大都选择在“市”中。东汉末年，公孙瓒割据幽州，“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缦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富皆巨亿”。可见，自春秋、战国至西汉、东汉，蓟城的商市始终不衰。

《后汉书》卷二十《王霸传》。

《三国志》卷八《魏书·公孙瓒传》注引《汉末英雄记》。

三、东汉以后蓟城的迁移

古蓟城的一个显著地理标志就是蓟丘。《史记·乐毅列传》载乐毅《报燕惠王书》云：“蓟丘之植，植于汶篁。”这是最早提到蓟丘的文献资料。北魏酈道元《水经·水注》进一步说明：“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依酈道元所记，蓟丘即在蓟城内西北角，且蓟城之名便得自此丘。过去有学者认为今北京城区西南部的白云观西墙外的一处高丘即是蓟丘，从而推测战国时的蓟城也就在此一带。但1974年发掘结果，发现此丘乃是一处古城残垣遗址。由于城基夯土下面压着两座东汉墓，显然古城年代要晚于东汉。如果东汉以前的蓟城遗址确在今北京宣武门、和平门一带的话，白云观西古城址的发现说明东汉以后蓟城城址曾向西移动。其移动原因，可能与原蓟城所依附的水（今永定河）改道有关。据成书于东汉桓、灵之际的《水经》记载：“水过广阳蓟县北。”酈道元《水经·水注》云：“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酈道元虽然发现《水经》关于水的记载与曹魏时《魏土地记》的记载不同，但是没有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反而认为《水经》的作者失误。实际上，两种记载的差异，正说明水在东汉末至曹魏中的几十年间，发生了从蓟城北到蓟城南的大改道。近年已经发现在北京自德胜门以西进入积水潭，经什刹海、北海、中海、石碑胡同、人大会堂西南，而后穿过正阳门、鲜鱼口、芦草园、红桥，经尼潭湖西部，在贾家花园流出城外的水故道。这就是《水经》所说的“过广阳蓟县北”的水，当时从蓟城北部自西北向东南流。曹魏时期，据《魏土地记》的记载，水则已改道，自今卢沟桥以北转向东南流，经今凉水河一线向东南流注。《魏土地记》所谓的城南七里的清泉河，即今凉水河。在水改道过程中，估计原蓟城的东部可能被冲毁，所以城址向西移动，西城垣移到今白云观西的古城遗址，东城垣也相应西缩。从此，蓟城由水水系复迁移到今广安门外莲花池水系，一直到元代才又重新依附其东北的原水故道的高梁河水系。

白云观古城遗址在原白云观西侧京包铁路西100米左右。该处古城残垣为南北走向，北端向东转，因此这里应是古城的西北角。1965年在北京西郊八宝山以西1里左右发现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幽州刺史王浚妻华芳墓，墓志铭文记述其方位在蓟城西二十里。按同墓出土的晋尺计算，每晋尺合今24.2厘米，晋二十里约合今17.4里左右。从该墓向东16余里正在今宣武区会城门村以东、小马厂一带，此距白云观铁路西的土城台遗址非常接近。因此，可以判断白云观西古城遗址即西晋幽州蓟城的西北角。《晋书·王浚传》称蓟城南有清泉水。《魏土地记》也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据此，西晋蓟城实际应始于曹魏时期，亦即东汉以后的蓟城新址。这座城池自魏晋以后，一直相沿千余年之久。

酈道元《水经·水注》对这座蓟城有较详细的记述，文云：“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

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其演变》，载《北京史苑》第2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赵其昌：《蓟城的探索》，载《北京史研究》第1辑。

丘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城有万载宫、明光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儁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294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水又东与洗马沟（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河）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澹，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铍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水。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500—503年），造浮图建刹穷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水又东南，高粱之水（今积水潭、北海、龙潭湖一线）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今北京紫竹院公园），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城）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水。”（见图一）

根据郦道元以上记述，蓟城西北有一座燕王陵，城东南有两座燕王陵。关于城东南的这两座燕王陵，其他史籍中也有记载。《魏书·地形志》称这两座燕王陵是战国时期燕昭王、惠王陵。《北齐书·范阳王绍义传》载：亡命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率军南围蓟城，“登燕昭王冢，乘高期远，部分兵众”。五代时，公元913年河东节度使、晋王李存勖（后唐庄宗）攻刘守光于蓟城，“登燕丹冢以观之”。以上所述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燕丹冢（燕太子墓），实际上都是指的蓟城东南的两座燕王陵。金代，海陵王展筑燕京城（即蓟城）时，将这两座燕王陵括入城内。《金史·蔡珪传》载：“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即蓟城，金代称中都）东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1169年）诏改葬于城外。俗传六国时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实际上，一座是西汉高祖子燕灵王刘建之墓，一座是燕康王刘嘉（刘邦族弟刘泽之子）之墓。

由于曹魏至西晋，乃至北魏，蓟城与清泉河的相对位置未变；北魏至辽末金初蓟城与其东南的燕王陵的相对位置也未变，因此可以肯定自曹魏至元朝建大都以前的1000余年间蓟城的城址没有迁徙，就在今北京城区西南的广安门一带。关于这一阶段蓟城的规模、布局、设施的资料以唐、辽时期最为丰富。因此，讨论东汉以后的蓟城，即以上述二个时期为例。

《旧五代史》卷二十八《庄宗纪》。

《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五《刘守光传》：“四面毕攻，庄宗（李存勖）登燕太子墓观之。”是知燕丹冢又称燕太子墓，以六国时燕太子丹之故。

四、唐代的幽州城

《旧唐书·地理志二》幽州蓟县条下称：“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实际上，自东汉即如此，东汉初年朱浮为幽州刺史治蓟城，东汉末年刘虞为幽州牧亦治蓟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分割幽州东部的渔阳、玉田、三河等三县另置蓟州（治今天津蓟县），后世蓟的名称逐渐用来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来的幽州蓟城大多称幽州城，一般不再专称蓟。

（一）唐幽州城郭

唐代幽州城的规模，《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云：“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据此，唐幽州城周长三十二里，约合今23里（每唐里约合今0.72里），是一座南北略长，东西略窄的长方形城市。根据已发现的唐人墓志铭和鲁琪先生的研究，兹考述唐幽州城郭四至如下。

东垣。1951年在北京东交民巷御河桥发现唐元和三年（808年）任紫宸墓志，记述其墓的方位在幽州城东北七里（约合今5.04里）有余。1956年在北京永定门外安乐林又发现唐建中二年（781年）姚子昂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东南六里（约合今4.32里）。这两块墓志铭文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记述唐幽州城的方位，距离接近。从御河桥和安乐林分别向西南、西北方向推进大约6里和5里，正是今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一带。菜市口偏西路南有烂缦胡同，旧称烂面胡同，深受研究北京地方史学者注意。清人赵吉士《寄园寄所寄》云：“京师二月淘沟，秽气触人，烂面胡同尤甚，深广各二丈，开时不通车马。此地在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东，唐碑称寺在燕城东南隅，疑为幽州节度使城之故壕也。”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认为：“此地有唐时故壕，说宜近是，”同意赵吉士的看法。烂缦胡同以西是今北京法源寺，亦即唐悯忠寺。《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城市·外城西城二》载唐景福元年（892年）《重藏舍利记》云：“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据同书所记，悯忠寺之东原有智泉寺，后改称延寿寺，今已无存。烂缦胡同既是唐幽州城东城壕，今法源寺又位处唐幽州城东南隅，那么唐幽州城的东垣当在今烂缦胡同和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

又，《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五·水道》“横桥沟”条载：“横桥沟，在西直门内东里半，俗呼臭沟。又南迳马市桥，又南迳宣武门西里许，入于护城河……明时呼西河。”清代又称西沟。大明壕这条西河（沟）经今新文化街、受水河胡同、头发胡同西口南流，入于城壕。周肇祥《辽金京城考》称此大明壕（西河）与烂缦胡同南北相直，“唐时当同为东面之壕也”，然按之实地，西河（沟）与烂缦胡同东西相距甚远，并非一线。周氏所论，似属不当。

西垣。前节已述白云观以西土城台即西晋幽州蓟城亦即唐幽州城的西北隅，故由此土城遗址向南经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即为唐幽州城的西垣。1974年在广安门外甘石桥北的北京钢厂院内发现唐大中九年（855年）侯氏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西三里。北京钢厂东西广3.5里，侯氏墓志出土于院西南隅，据此唐幽州城西垣当在院内东侧，此亦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与小红

庙村之南北一线上。故此，唐幽州城西垣在今白云观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确定无疑。又，由广安门外莲花池（古西湖）东流的莲花河（古洗马沟）在甘石桥突然折而南流，且河道顺直，正在前述西垣西侧一线，此应即唐幽州城的西城壕。

南垣。1952 年在北京城南陶然亭公园以西的姚家井发现唐信州刺史薛氏墓，其方位虽无铭文记载，但根据墓葬应在城外的原则推测，唐幽州城的南城垣应在姚家井以北的东西一线。在姚家井西北三里白纸坊西以北有崇效胡同，原有崇孝寺，据明《顺天府志》卷七引《元一统志》载：“崇孝寺……按《幽州土地记》则有唐初年置。里俗相沿，则谓德宗贞元五年（789 年）幽帅彭城太师刘公济舍宅为寺。传说各异。以前殿梁板及后殿左幢文考之，则刘庄武公济贞元五年（789 年）舍宅作寺为是。”崇孝寺既然原为唐幽州节度使刘济私宅，则必在城内。故此，唐幽州城的南城垣当在姚家井与崇效胡同之间寻之。有学者认为今白纸坊东西大街一线当是唐幽州城南垣。但是，若以白纸坊大街当之，则复原后的城址东西宽、南北窄，殊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记载不符。依笔者之见，唐幽州城南垣应在白纸坊东大街以南、姚家井以北的里人街一线。如此，则复原的幽州城南北 6 里（约合唐 8.3 里）、东西 5.5 里（约合唐 7.6 里），且城周长 23 里（约合唐 32 里），比较接近史籍记载。

北垣。唐幽州城北城垣的情况比较复杂。

1972 年在北京西四羊肉胡同出土唐贞元六年（790 年）任希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北五里。这一发现对判断唐幽州城北城垣的位置十分重要。唐五里约合今 3.6 里，由此可以推测唐幽州城的北城垣在羊肉胡同以南 3.6 里左右的東西一线。从西四羊肉胡同向南 4.5 里（约合唐 6.2 里）是宣武门内大街头发胡同一线。头发胡同是一条东西方向街道，地势比周围显然凸起，当即旧城垣遗址。头发胡同以北数十米有受水河胡同与之平行，原称臭水河，本是一条明沟，早已成平地。受水河当即城壕遗址。从头发胡同向西，经白云观北，正可与土城台古城垣北端相接。故此，唐幽州城的北城垣当即在头发胡同、白云观西土城台之东西一线。受水河胡同即唐幽州城之北城壕。

但是，这还不是问题的最后的答案。

1929 年在位于今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的教育部院内发现过唐咸亨元年（670 年）仵钦墓志，记述其墓方位在幽州城东北五里。《光绪顺天府志·金石志二·历代上》又载：“康熙辛酉（1681 年），西安门内有中官治宅掘地，误发古墓……志题曰：大唐故濮阳卞氏墓志。志文曰：贞元十（五）年，岁次己卯（799 年）……卒于幽州蓟县蓟北坊。以其年权窆于幽州幽都东北五里礼贤乡之平原。”《旧唐书·地理志》载：“幽州幽都县，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781 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同书“燕州”条又载，燕州乃原隋辽西郡，寄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武德六年（623 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移治于幽州北桃谷山。据此，贞元中幽都县即在幽州城内，所谓幽都县东北五里，亦即幽州城东北五里。

鲁琪：《唐幽州城考》，载《北京史论文集》第 2 辑，第 114 页。

陈宗蕃：《燕都丛考》，林志钧序。

这两块墓志给判断唐幽州城的北城垣方位带来困难。因为它们记载的方位，里数相同，但实际出土地点却相距很远。对此，我们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才能彻底解决唐幽州城北城垣的方位问题。

今北京宣武区下斜街东有老墙根胡同，为东西走向。三十年代时，此处尚有古城遗址。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宣武门外老墙根有半截废城一段，长一丈八尺，高九尺。城砖坚固，石基如新，平嵌一石……上刻隶书‘通天’二大横字，左刻‘辽开泰元年’五字，右刻‘北门’二字，均隶书。考此处为辽时内城东北隅也。”震钧《天咫偶闻》则推测这里是辽南京的北垣。其实，将老墙根作为辽南京通天门遗址，肯定是后世好事者的伪作。这从“城砖坚固，石基如新”的描述和对门额的描述中都可看出明显的伪造痕迹。但是，老墙根虽非辽南京通天门，其是一处古城址却真实无疑。今老墙根胡同仍地势突出，街南地势明显低下，显示出其历史上曾是城垣基址的遗貌。从老墙根向北推4.2里（约合唐5.8里），正是西城区二龙路一带，与仵钦墓志记载基本相符。

据此推测，唐幽州城的北城垣可能曾有改动。咸亨元年（675年）时北城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老墙根，成一西北至东南的斜线，故在二龙路教育部院内发现的仵氏墓志称在幽州城东北五里。至迟在贞元六年（790年），幽州城北城垣已改为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头发胡同一线。故在西安门发现的贞元十五年（799年）卞氏墓志和在西四羊肉胡同发现的贞元六年（790年）任氏墓志，亦称在幽州城东北五里或北五里。这次改筑，北城垣的西端没有变化，只是东端向北移动，东西取直，原来北城垣的东段就作为老墙而遗留在幽州城中。其改筑的时间，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推测，当在咸亨元年（670年）至贞元六年（790年）的120年间。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唐幽州城的东城垣在今北京宣武区烂缦胡同与法源寺之间的南北一线，西城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线，南城垣在今北京宣武区姚家井以北的里人街东西一线，北城垣原在白云观西土城台至老墙根一线，后改至土城台至头发胡同一线。（见图二）

（二）唐幽州城内子城和建筑

《日下旧闻考》卷六十《城市·外城西城二》载唐会昌六年（846年）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云：“智泉寺……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智泉寺在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之东，后改称延寿寺，今已不存。凭藉悯忠寺的方位，可知此子城当在今北京法源寺以西。前已述之，唐碑云悯忠寺处幽州城东南隅，故子城位置当是幽州城内西南隅。中国古代城市中有子城之称，据史籍记载，始于南北朝时期。唐代各州军府于城内筑子城，成为常制。此子城位幽州城内西南隅，其东、北两面城垣在城内，南、西两面城垣即傍幽州城。采师伦《重藏舍利记》碑称子城有东门，估计北面也有一门。

《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幽州蓟城“开十门”。如果除去其中子城二门，则唐幽州城应有八门，即每面城垣开两门，这和《辽史·地理志》中记载的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城门数目也正一致。中国古代城市的一般规划布局，对应的两座城门之间应有直道相通，全城街道呈棋盘状。唐幽州城既有八门，理应至少有四条东西和南北交错的主要街道。此外，相邻的两座城门

之间也应有所谓“顺城街”，以便防守运兵。《晋书·王浚传》载，西晋幽州城内有两西行大道。其实，南北方向也至少应有两条大道。在子城筑起以后，西行大道中偏南的一条和南北大道中偏西的一条即不复能直通城外，而分别与子城东门、北门相对。其中西行偏南的大道也就是悯忠寺、智泉寺南临的大衢，即今北京宣武区南横街一线。

安史之乱以前，唐幽州（范阳）都督或节度使的府衙就在幽州城子城。

《旧唐书·庐江王瑗传》载，唐初玄武门之变，太子李建成等被杀。幽州大都督、庐江王李瑗系故太子李建成一党，欲据幽州反，“（王）君廓领其麾下登城西面，瑗未之觉”，兵败被杀。正因为当时大都督府在子城，而子城西、南二面即幽州城城垣，所以王君廓登城西垣即可俯控子城，杀李瑗。

安史之乱中，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改幽州（时称范阳）城为燕京，以子城为皇城。《安禄山事迹》载：史思明在子城“置日华等门，署衙门楼为听政楼，节度厅为紫微殿”。日华门是出入皇城的主要城门，《蓟门纪乱》、《河洛春秋》记述安史乱事屡屡述及。如《蓟门纪乱》载，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后，蓟城内乱，“（张）通儒与（高）鞠仁领兵十余人入其日华门”。向润客奉史朝义之命返幽州，“鞠仁严兵不出……待之于日华门”，等等。此门从命名来看，应在东侧。唐西京长安宫城的东门即称日华门，史思明僭即帝位，为自尊崇，必然一切仿照唐朝制度。据此，所谓日华门当即原子城东门。子城上又有逍遥楼。

唐幽州城内的建筑，史籍中亦有零星记载。《安禄山事迹》卷下载，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安禄山称帝，以幽州城为东都，“署其城东隅私第为潜龙宫”。注云：“其第本造为同罗馆，前后十余院，门观宏壮，闾阖幽深，土水之瑰丽，黝垩之彫饰，僭拟宫室”。依此，幽州城东应有同罗馆，后改为安禄山私宅，其后又改称潜龙宫。《蓟门纪乱》云：“史思明留骏马百余匹在其厩中……每日则于桑干河饮之。通儒将入，潜令康孝忠以数十人持兵诣饮处，驰取其马，闭于城南毗沙门神之院。”毗沙门神又称多闻天，是佛教护法四天王之一。古代北方以毗沙门神为随军护法、乞胜利之神，其像十分威武，右手持戟稍，左手托腰上，脚踏二夜叉鬼，面作甚可畏形。唐幽州城是北方军事重镇，其置毗沙门神寺是理所当然之事。该寺在幽州城南，既然可藏匿百余匹马，规模当亦十分宏大。幽州城内有宴设楼，即原蓟丘楼，其址在幽州城内西北隅。陈子昂《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诗云：“东山宿昔意，北征非我心。孤负平生愿，感涕下沾襟。暮登蓟楼上，永望燕山岭。……”陈子昂又有诗题为《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序云：“蓟丘故事，可以赠言赋诗，登蓟楼，送崔子云尔。”以诗题和序文对照，更可证明蓟丘楼即在幽州城西北隅。唐幽州文武官员常在蓟丘楼设宴赋诗，故后又改名宴设楼。

唐幽州城又有临朔宫遗址，是隋炀帝发动辽东之役时的行宫。据《隋书》记载，临朔宫宏伟壮丽，多积珍宝，内有怀荒殿等建筑，常屯兵数万。关于临朔宫的处址，学者历来意见不一，或指幽州城内，或认为在幽州城外。依笔者分析，似应在蓟城南与清泉河（今凉水河）之间。这里风景优美，且接近大河北段永济渠码头，应可充作临朔宫址。主持修筑临朔宫的阎毗，当时以有罪之身以奉炀帝，亦必竭力营构以邀上宠。因此，临朔宫址在蓟城南与清泉河之间的可能性极大。《隋书·阎毗传》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即蓟城，隋在此设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

(609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临朔宫兴工是在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北幸蓟城临朔宫是在大业七年(611年)，其间有二年时间，足可以平地筑起一座行宫。临朔宫在唐初尚存，其后败毁，宋辽之际已无遗迹可寻，这从使辽归来的宋使臣语录中绝无临朔宫其名，即可得知。

唐代，幽州是北方佛教胜地之一，今北京西南郊房山区云居寺即创于隋唐之际，藏有大量石刻经板。唐幽州城内也有多座佛寺，或创自前朝而沿袭不衰，或唐代新建。据郦道元《水经·水注》载，北魏时在蓟城东南隅曾建寺院佛塔，从其挖地基时穷及于泉，可见佛塔之高大。唐代时，蓟城内东南隅有智泉寺，其西是悯忠寺。智泉寺相传是东魏幽州刺史尉长命创建，俗称尉使君寺，后改名智泉寺。隋仁寿四年(604年)，幽州总管窦抗曾在此建木浮图(即木佛塔)五级，其下安放佛舍利。唐武则天之世，智泉寺改称大云寺，开元中又改称龙兴寺。唐大和八年(834年)，该寺被雷火所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诏削毁佛寺，此寺遂遭废毁。会昌六年(846年)，武宗死，宣宗再崇佛教，幽州士庶遂于智泉寺遗址建胜果寺，后改称延寿寺。悯忠寺是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为悼征辽阵亡将士而建，即今北京法源寺。悯忠寺是唐代幽州第一名寺，占地甚广，规模壮丽，其中有楼、阁、台。唐武宗诏命天下削毁佛寺时，悯忠寺以太宗创建之故，得以幸存。会昌六年(846年)复藏原智泉寺舍利于寺内多宝佛塔下。中和二年(882年)悯忠寺遭火灾，楼台俱烬。景福元年(892年)复兴建观音阁，横壮妙丽，逾于往日，并迁多宝佛塔下佛舍利于观音阁内。悯忠寺自唐以下，历辽金元明清而不衰，直至今日。这座寺院不但是著名古迹，而且是今日得以确认唐幽州蓟城的重要依据。

(三) 唐幽州城的坊和市

唐代城市内的基层单位称“坊”。坊是由街道分割成的一块块的封闭结构的居民区，其名定于隋，其制乃沿袭先秦至秦汉时的里(又称闾、闾里)。《史记·陈涉世家》载：“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三辅黄图》卷二记汉长安闾里云：“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有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汉书》：万石君石奋徙家长安戚里。宣帝在民间时，常在尚冠里。刘向《列女传》：“节女，长安大昌里人也。”以上所谓闾、闾里，都是居民区的称呼。

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五称魏都洛阳城“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详细介绍了“里”的规制。“里”不但设于城内，而且设于近城郊外。当时“里”是居民区的正称，“坊”是俗称。《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城西门(西阳门)外四五里有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卷二载：洛阳城南门(宣阳门)外永桥南近伊、洛二水处有“归正里，民间号为吴人坊，南来投化者多居其内”。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均可为证。隋代，“坊”逐渐由俗称演变为正称。《大业杂记》记隋东都洛阳云：“坊各周四里，开四门临大街，门普为重楼，饰以丹粉”。坊的格局为田字形，四面有坊墙，各开一门；相对的两门之间有巷相通，呈十字交叉形。这和北魏“里”的格局相同。唐代坊的形制也一仍其旧，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二引韦述《两京

记》注云：“每坊皆开四门，有十字街四出趣门。”这是唐长安城内坊的形制，其与北魏、隋代的洛阳相同。

在宋代以前，坊和市是有严格界限的。《洛阳伽蓝记》卷四载：洛阳西阳门外四里有洛阳大市，大市周围居住工商艺人。“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觞二里。里内之人多酿酒为业”。“市北慈孝、奉终二里。里内之人以卖棺槨为业，赁輶车为事”。“里”是工商艺人居住的地方，“市”是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场所，两者是严格分开的。

唐幽州城的坊和市，史无明文，无从详知。宋使路振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出使辽国，至辽南京（即唐幽州城），其《乘轺录》云：“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门楼，大署其额，有鬻宾、肃慎、卢龙等坊，并唐时旧名也。”辽南京乃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城市布局未尝改制。辽南京既为26坊，且坊名多仍唐旧称，推测唐幽州城内也分26坊，理应大致不误。唐幽州城26坊之名，除路振所述三坊外，鲁琪先生《唐幽州城考》据唐、辽墓志又有列举，兹据《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略加订正，列举如下：鬻宾坊、卢龙坊、肃慎坊、花严坊、辽西坊、铜马坊、蓟北坊、燕都坊、军都坊、招圣里、归仁里、东通闾里、劝利坊、时和坊、遵化里、平朔里、归化里、隗台坊、永平坊、北罗坊、齐礼坊、显忠坊、棠阴坊、归厚坊、玉田坊。鲁文引《房山石经述略》称幽州城还有骏坊。笔者以为骏坊恐即铜马坊之别称，与铜马坊实为一地。今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唐）载：“会昌元年（841年）四月八日，幽州蓟县西角开阳坊邑主僧克存邑人等同建造。”据此，唐幽州城应有开阳坊。以上坊区，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以城市布局变化，已难以一一复原。但根据文献记载，个别坊区的方位仍可大致推测不误。如铜马坊，清人朱一新《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引《元一统志》、《析津志》称在旧城东南隅。但朱氏因不明唐幽州城方位，误指铜马坊在今广安门、右安门之间。前已述之，悯忠寺（北京法源寺）在唐幽州城东南隅，其东又有智泉寺。《水经·水注》云：“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铜马坊即由铜马像得名，其地应在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一带。蓟北坊和显忠坊，据考证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前街和范家胡同一带。棠阴坊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一带。时和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善果寺一带。开阳坊在今北京宣武区右安门内大街白纸坊一带。

唐中宗神龙中（705—707年），很多少数民族羁縻州县置于幽州，计有奚、契丹、突厥、靺鞨等族，此外还有同罗、回纥等族人口也在幽州居住。唐天宝之世，安禄山为范阳节度使时，幽州城内居住的有羯、胡、蕃、汉等族，身份多为军人或军人家属。安史之乱中，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史朝义杀其父史思明，幽州城内被汉将高鞠仁等控制，“城中蕃军家口尽踰城相继而去。鞠仁令城中，杀胡者皆重赏。于是羯、胡俱殪……高鼻类胡而滥死者甚众”。“自暮春至夏中，两月间，城中相攻杀凡四五，死者数千，战斗皆在坊市间巷间。但两敌相向，不入人家剽劫一物，盖家家自有军人之故，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七《安边御寇·契丹》。

赵其昌：《辽代燕京之显忠坊、檀州街与市》，载《首都博物馆丛刊》1982年第1期。

又百姓至于妇人小童，皆閒习弓矢”。从以上记述，我们可以了解唐天宝年间幽州城内人口的结构。

隋炀帝令阎毗凿“北通涿郡（蓟城，今北京），南达于河”的永济渠，最终完成了南起余杭（今浙江杭州），北至涿郡的大运河工程。但是，其后隋炀帝连年发动征辽之役，结果身死国亡，大运河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唐代，大运河真正发挥了沟通南北经济的作用。正所谓“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大运河将唐幽州城与江淮、关东富庶之区联系起来，商市比往日更加繁荣。从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唐代石经题记中，我们可知当时幽州城内有米行、白米行、大米行、粳米行、屠行、肉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椒笋行、炭行、生铁行、磨行、染行、布行、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丝棉行、丝帛行、幞头行、杂行、杂货行、新货行等等。从捐经题记的数量中，可以看出米行、肉行经济力量比较雄厚，对市场应有较大影响力。

上述 20 余行的商业活动，都集中在“市”中进行。唐幽州城的“市”，位置在城北，是北方著名的市场，又称幽州市、三市、互市。《辽史·食货志》载：“太宗得燕，置南京（938 年），城北有市，百物山侔，命有司治其征。”其时辽国得幽州不久，所谓城北的“市”亦即唐、五代时的幽州市。

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中的“坊”和“市”本是严格分开的，除了便于管理外，也是封建地主阶级“抑商”观念的反映。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坊市制度开始动摇，一些商铺突破旧市限制，进入坊内。《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收有唐大中年间（847—860 年）“幽州蓟县界蓟北坊檀州街西店”题记，说明唐后期幽州城蓟北坊（在今北京宣武区三庙街附近）内已有商铺。同书还收有唐“幽州蓟县界市东门外两店”题记，这表明当时商铺已扩展到幽州市门之外。幽州城内西北隅有宴设楼（原蓟丘楼），该处也是一商业区。《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收有唐天宝十一年（752 年）“宴设楼南长店”题记，又简称楼南头长店、楼南长店、长店。唐幽州城蓟北坊在东北隅，宴设楼在西北隅，这和《辽史·食货志》中“城北有市”的记载正相符。同时，这也说明辽南京城的“市”正是承袭了唐幽州城的旧布局。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十二唐纪三十八肃宗上元二年，注引《蓟门纪乱》。

《皮子文藪》卷四《汴河铭》。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载《世界宗教研究》1981 年第 2 辑。

五、辽南京（燕京）城

（一）辽南京（燕京）城郭和城门

五代末，后唐清泰三年（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叛，引契丹为援。契丹主耶律德光（即辽太宗）率契丹军助石敬瑭灭后唐，俘卢龙节度使赵德钧，幽州入于契丹之手。石敬瑭建立后晋。

辽会同元年（938年），后晋石敬瑭为了取得契丹国（后改国号辽）的支持，遣使奉燕云十六州图籍，正式割十六州地给契丹。同年，耶律德光诏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作为契丹（辽）国的陪都之一。

《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衡广一丈五尺。敌楼、战橧具”。关于辽南京城周长的里数，路振《乘轺录》云：“幽州（宋人贬抑契丹，故用旧称）幅员二十五里。”辽亡以后，宣和七年（1125年）宋人许亢宗出使金国，途经宋燕山府（即辽南京，宋改燕山府），记云：“城周围二十七里。”同一座城池，竟有如此不同的记载，未免令人疑惑不解。

《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称唐幽州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周长为三十二里。契丹据有幽州，其南京城池规模沿袭唐、五代之旧，不曾扩展或缩小，而《辽史·地理志》“城方三十六里”的记载与《郡国志》最为接近，应属可靠。路振、许亢宗均为宋朝出使辽国、金国的使臣，其于幽州城池不可能亲自踏勘，所记多为耳闻，其中讹误自在所难免。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记述辽末南京城规制：“楼壁共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地堑三重。”楼即城上敌楼，壁即城墙，楼壁共四十尺，此与《辽史·地理志》辽南京城“崇三丈”的记载基本相符。地堑即城壕。所谓“地堑三重”，颇值得考虑。若辽南京城和城内皇城各有城壕，犹如今日所见的明清北京护城河和故宫筒子河，则总共只有两道，地堑三重之说从何而来？《房山石经题汇编》“诸经题记”中有“大辽燕京右北西罗内”居址。古代以西为右，右北即西北。罗城可指在城外展筑之大城，犹如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北京城南展筑的包括今宣武区和崇文区各一部的城外城。然而，罗城与子城亦可相对而言，例如唐幽州城内有子城，幽州城即可称为罗城。《旧唐书·地理志二》载：“幽州幽都县……建中二年（781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罗城即幽州城。此题记既称“燕京右北西罗内”，似辽南京城西北又有西罗城。若辽南京皇城、外城、罗城各有一道城壕，则适符“地堑三重”之说。但文献中并无辽南京城外另有罗城的记载，如《辽史·圣宗纪八》载：“太平九年（1029年）十月，诏燕城将士，若敌至，总管备城之东南，统军守其西北，马步军备其野战，统军副使缮壁垒，课士卒，各练其事。”其中并无罗城迹象。依笔者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在辽南京皇城之内、宫城之外又有城壕，如此亦符“地堑三重”之说。然而，究竟实际如何，史无明文，无从详考，惟做一二推测而已。

辽南京外城诸门，皆在城壕上架有木吊桥，以为防守之备。

辽南京的城门，《辽史·地理志》载：南京城有“八门，东曰安东（东面偏北之门，简称东北门，下同）、迎春（东南门），南曰开阳（南东门）、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郭药师攻入辽南京，旋败，欲自东门出城，“燕城汉人皆曰：‘……今已断了诸门吊桥，幸无遽出，以决死耳。’”

丹凤（南西门），西曰显西（西南门）、清晋（西北门），北曰通天（北西门）、拱辰（北东门）。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亦云：“城开八门”，正与《辽史·地理志》相符。路振《乘轺录》不云城门数目，所举城门名称每与《辽史·地理志》相左，如称东南曰水窗门，西曰青音门，北曰北安门等。其中，有些属于后世传写所讹，如青音当为清晋之讹；有些或属当地民间俗称，犹如今日北京人称正阳门为前门一样，北安门当即通天门，水窗门当即迎春门。所谓水窗，是指装置在城墙下部既可任水流出又可防止人们阴潜出入城的水栅。北京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辽南京迎春门之所以又称水窗门，应是该门附近有引水出城的水窗的缘故。

《辽史·太宗纪下》载：会同三年（940年）四月，辽太宗耶律德光“至燕，备法驾，入自拱辰门”。拱辰门即辽南京（燕京）北东门。耶律德光自塞外西行，入古北口，经牛栏山，渡白河而西南行，正宜入此门。辽南京不但城池沿袭唐、五代之旧，其城门名称也多承袭旧号。例如辽南京东北门称安东，辽上京东门亦称安东，或以为辽南京安东门名称系契丹所立，其实不然。辽上京安东门，意即镇抚其东之渤海国人；幽州之东即为契丹地，契丹主不可能在此立安东门。在幽州，安东只能是镇抚包括契丹在内的东夷之意，反映汉族政权的意识，故辽南京安东门当为旧号。又，前已言之，唐幽州城有开阳坊，地在蓟县西角。唐建中二年（781年）以后，幽州城内由幽都县、蓟县分治，蓟县管辖东半部，故所谓蓟县西角仍在城内东侧。辽南京开阳门为南东门，当得自开阳坊，故亦为唐幽州城旧称。辽南京西北门称清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凡洁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清晋即除晋之意。奉宽《燕京故城考》认为，石晋初立，纳土结欢，契丹与之结为父子之国，不会立清晋门以示敌意。清晋门当为五代时刘守光针对河东晋王李存勖而立。其说极是。不但安东、开阳、清晋为唐、五代幽州城旧号，就是迎春、丹凤等门大约也是刘守光自称大燕皇帝时仿唐长安、洛阳宫苑名称而立。例如，唐长安大明宫的正门称丹凤门，辽南京丹凤门的位置正与之相同（下详）。又如，唐洛阳外郭城的东中门称建春门，神都苑的东南门称望春门，与望春相对的称迎春门。辽南京迎春门与唐洛阳建春门、望春门，命名意义一致，且都在东南隅，表现明显的移袭痕迹。

（二）辽南京（燕京）皇城

契丹以幽州为南京，城内置皇宫，契丹主巡幸南京时即居于此。《辽史·地理志》载：“大内（皇宫）在西南隅。”前已述之，唐幽州城子城在城内西南隅。据此，辽南京皇城当即原子城。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王曾出使辽国，其《上契丹事》云：“度卢沟河，六十里至幽州，伪号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辽南京皇城亦即原子城，于此可获明证。宋使贬抑契丹政权，故不称大内、皇城，而称子城、内城。

水窗系以铁铸造，置于城墙底部，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八载：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八月辛卯，“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言：‘……高阳关铸城下九铁水窗，工料以数十万。缘今窗上下城堞坚固，本州最处极边，若置铁窗须开掘城身面三十尺、底十尺……欲渐计工料，候有水窗城随损处修换。’从之。”

见《燕京学报》第50期。

路振《乘轺录》述云：“内城（即皇城）幅员五里，东曰宣和门，南曰丹凤门，西曰显西门，北曰衙北门。”《辽史·地理志》载：“皇城东曰宣和，南曰大内。”皇城西门“曰显西，设而不开；北曰子北。”其中，两书关于辽南京皇城东门、西门的记载一致。至于北门，子北即衙北，似一为正称，一为俗称。因为该门是原子城北门，故称子北；又因为此处唐代是幽州卢龙节度使的衙署，故又可称衙北。同地异称，不足为怪。至于《辽史·地理志》所谓“南曰大内”，则错讹无疑。自古未有以皇帝所居大内为门号者，当以《乘轺录》所记为是。辽南京皇城四门即为：东曰宣和，南曰丹凤，西曰显西，北曰子北（衙北）。值得注意的是，辽南京城的西南门亦称显西，南西门亦称丹凤，正与皇城西门、南门称号相同。这再次证明，辽南京皇城既傍大城西南隅而建，其南墙和西墙自即南京城垣，皇城的南门和西门与辽南京的南西门、西南门同为一门。自皇城中，经丹凤门或显西门可直通郊外。因这几座城门设而不开，故又称暗门。北宋末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南北夹击辽朝。宋宣和四年（1122年）十月二十四日，宋军与归宋的原辽常胜军将领郭药师攻入辽南京。《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载：“郭药师遣甄五臣领常胜军五十人杂郊民夺迎春门（东南门）以入”，“大军继至，阵于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分遣七将官把燕城七门”。“（辽）萧后登宣和门（皇城东门）亲施箭镞，以拒王师”，“密遣人召萧幹等回”。“（辽）四军人马自南暗门入，内诸门皆启，铁骑突出，战于三市”。宋军措手不及，被迫退出城外。关于这次战役，蔡肇《北征纪实》述云：“萧后乃呼四军自其内后暗门而入，忽大启内门，生兵出击，我师为退败。”所谓内后暗门即南暗门，亦即丹凤门。（见图三）由于宋军只占领了辽南京七门，所以丹凤门还在契丹控制之下，辽四军大王萧幹才得以率军从这里进入皇城，复乘宋军不备，从皇城设在南京城内的宣和门（皇城东门）、子北门（皇城北门）突然出击，击溃正在纵酒狂欢、攘夺财物、漫无纪律的宋军。从这一战例中，我们可以认识到辽南京皇城与南京城亦即唐幽州子城与幽州城的位置关系，以及丹凤、显西二门与辽南京城和皇城的关系。

但是，入丹凤门后，其北还有两道门。《辽史·地理志》载：“内门（殿门）曰宣教”，“外三门（宫门）曰南端、左掖、右掖”。辽圣宗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南京宫宣教门为元和门”，“左掖门为万春，右掖门为千秋”，南端门改称启夏门。由此观之，丹凤门之北，还有以启夏门为正门的启夏、万春、迎秋并排的三座宫门。过启夏门后，才是真正进入皇宫。启夏门之北是外朝门元和门（原名宣教），犹如今日北京故宫内的太和门。元和门内即是辽南京皇宫正殿元和殿。以元和门原称宣教门观之，元和殿可能也原称宣教殿。

辽南京皇城城门的设置和使用方式，表现出契丹族文化和汉文化的融

萧幹，奚人，因统帅契丹、渤海、奚、汉四军，故号四军大王。

《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

《辽史》卷十四《圣宗纪五》在述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改宣教门为元和、左掖门为万春、右掖门为千秋时，又云“外三门为南端”，实误。南端为旧称，此时改为启夏。《契丹国志》卷二十四“王沂公（曾）行程录”云：“正南曰启夏。”王曾使辽事在大中祥符五年，即辽统和三十年，适在圣宗改南京宫门之后，足可证统和二十四年南端亦改名启夏。

和。一方面，契丹族限于唐、五代幽州城子城的旧格局，同时，也是受汉族“天子南面而立”的文化观念影响，宫殿皆南向，并以南门（元和门、启夏门）为正门。但是在皇城四门的实际功能方面，《乘轺录》云：“内城三门不开，止从宣和门出入”。宣和门是辽南京皇城东门，即唐代的子城东门、史思明称燕帝时的日华门。唐代时经常利用子城东门，主要出于防守方面的考虑。并且，其他三门也不是闭而不开。辽南京皇城只从宣和门出入，除便于防守外，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契丹族以东为尚的风俗和观念。契丹族有拜日之俗，故以东为尚。《辽史·礼志》载：“拜日仪：皇帝升露台，设褥，向日再拜，上香。瑟瑟仪：皇帝、皇后祭东方毕，子弟射柳。柴册仪“拜日毕，乘马，选外戚之老者御。腊仪：其日（十二月辰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毕，设围，命猎夫张左右翼”。崇日之俗，也影响到契丹族的建筑格式。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薛映出使辽国，至辽上京临潢府（治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记云：“子城（即辽上京皇城）东门曰顺阳，入门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皆东向，其毡庐亦皆东向。”辽上京创自辽太祖阿保机，以后虽有增广，但一切均依契丹之俗，故宫殿皆东向，且以皇城东门为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辽南京皇城虽有四门却只从东门宣和门出入。也正因为如此，郭药师攻辽南京时才选择首先袭取迎春门（东南门）的方略。因为迎春门距宣和门最近，其间即今北京宣武区南横街一线。攻占迎春门，便于直接向西攻占宣和门，打进宫去。只是由于萧后据宣和门坚守，四军大王萧干及时回援，宋军才未能得志。

辽南京皇城虽然在形式上以元和门、启夏门为正门，但实际是东门宣和门起着正门的作用，故门上建有五凤楼，契丹主常于正月十五在楼上观赏街上花灯。并且，宣和门前还建有门楼，俗称双门楼。《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载：郭药师败于城北三市，“遂（退）至双门楼下，令骑皆下马，且战且行，至悯忠寺前”。悯忠寺在宣和门以东，双门楼在悯忠寺西，正当是宣和门前的门楼。

《辽史·地理志》载：辽南京“西城巔有凉殿，东北隅有燕角楼”。西城巔的凉殿是在契丹占领幽州城之初的会同三年（940年）建筑的，具体位置在皇城的西南角上。《辽史·太宗纪下》载：“会同三年（940年）十二月丁巳，诏南京皇城西南堞建凉殿。”所谓凉殿，据考证正与后世建于宫城四角的角楼相似，因可登高纳凉，所以称凉殿。前已言之，辽南京皇城西、南两面即辽南京城垣，因此所谓皇城西南堞亦即辽南京城西南堞。这座凉殿实际是建筑在南京城的西南角上。燕角楼也是皇城上的建筑物。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以东不远有一南北街道，中被广安门内大街分为两段，称南线阁，北线阁。明人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今南线阁明代时尚名“燕角儿”。线阁是燕角的转音。因此，燕角儿（南线阁）附近可能就是燕角楼的遗址。南线阁稍东的老君台，地势较高，极可能原即为燕角楼的基址。由燕角楼的方位，我们可以推测辽南京皇城的东界即在今北京宣武区菜园街至南线阁偏东的南北一线。震钧《天咫偶闻》“辽金元明都城合图”中把燕角儿误以为辽南京城的东北隅，实为不当。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八大中祥符九年。

卢杰：《凉殿广绎》，《中和月刊》第2卷第10期。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丹凤门外是契丹皇室的毬场。契丹族是游牧民族，习于骑射，俗以马上击鞠为戏。统和四年（986年）十月，辽圣宗幸南京，“甲子，上与大臣分朋击鞠”即在丹凤门外毬场。由于这里迫近皇城，所以辽南京的几件重大政治事件皆发生在这里。辽末，保大二年（1122年），金军迫近南京，天祚帝出居庸关西奔，辽南京诸臣立秦晋国王耶律淳为帝。同年六月，耶律淳死，太尉李处温欲挟持萧后降宋，四军大王萧干“先集辽骑三千，阵于毬场，会百官，议立燕王（淳）妻萧氏为皇太后，权主军国事”，萧后遂即位。同年十二月，金军陷辽南京。金主阿骨打遣使“催促（辽南京）宰相文武官僚僧道父老出丹凤门毬场内投拜”，“皆拜服罪”。

丹凤门外毬场之东有永平馆，是辽朝接待宋使的驿馆。王曾《上契丹事》云：“南门外永平馆，旧名碣石馆，请和后易之。”是知永平馆原名碣石馆，宋辽澶渊之盟（1004年）以后始改称永平馆，取太平之意。路振《乘轺录》又记述云：“至幽州城南亭……时燕京留守、兵马大元帅秦王隆庆遣副留守、秘书大监张萧迎国信。置宴亭中。”“是夕，宿于永和馆，馆在城南。”永和馆即永平馆，或一地异称，或传闻、传刻所误。

（三）辽南京（燕京）宫室

辽南京皇城内为数座宫殿，为契丹主巡幸南京时驻蹕之所。契丹主经常在这些宫殿中举行朝贺、议政和欢宴等活动。《辽史·太宗纪下》载：会同三年（940年）四月庚子，辽太宗至南京，“入自拱辰门。御元和殿，行入阁礼。壬子，御便殿，宴晋及诸国使。壬戌，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清代学者赵翼认为：“石晋才以地来归，太宗驾至，即有拱辰、元和、昭庆等名，则非辽所建之宫殿可知也。是年冬，诏燕京建凉殿于西南堞。建一凉殿尚特书于本纪，更可知太宗初入时，并未别有改筑，盖幽州自安史叛乱已称大燕，后历为强藩所据，唐末刘仁恭僭大号于此，必久有宫殿名，辽但仍其旧耳”。其说未尝没有道理。然而，契丹据有幽州城后，对其中宫室确实曾有修缮。所以，确切地说，元和殿、昭庆殿等建筑应是旧物的完善和恢复。亦正为此，所以不见于史载。《辽史·太宗纪下》载，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诏立幽州为南京。会同二年（939年）闰七月，后晋石敬瑭遣使“奏输戌、亥（会同元年、二年）二岁金币于燕京”。但是，在此前后，后晋每年岁贡例输辽上京或行在所。其中缘由，笔者认为正是燕京当时兴起大役，故命后晋输岁币于燕京以为工费。从另一方面来说，契丹于天显十一年（936年）已陷幽州城，辽太宗何以迟迟到会同三年（940年）才巡幸此地？笔者认为，这正可从侧面说明辽南京工程肇始于会同元年（938年），至会同三年（940年）竣工，其间工期近三年之久。在契丹统治的180余年中，作为辽朝南控中原的重要都城，辽南京宫室又陆续有所修建。《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五年（1036年）五月壬戌，诏修南京宫阙府署”，即为其中一例。当时主持其事的是辽南院使兼检校太尉韩榘，其墓志铭云：“重熙五年（1036

《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二》。

《契丹国志》卷十一《天祚帝中》。

《亡辽录》，引自《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二。

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七“辽燕京”条。

年），在燕京也。备清蹕之来临，奚翠华之降幸。葺修宫掖，仰期饮饔。崇饰祠寺，企望问峒。举扬百司，支遣万计。”这次工程不但修缮了辽南京宫阙府署，还修缮了著名寺院。韩氏为此日夜操劳，犯凌寒暑，竟于同年九月病卒于南京宣徽衙之正室。

据史籍记载，辽南京皇城内元和殿、昭庆殿、便殿、内殿、嘉宁殿、弘政殿、紫宸殿。还有供奉辽景宗耶律贤、圣宗耶律隆绪二帝御像的二座御容殿。其他或许还有，史文简略，无从悉知。朱彝尊《日下旧闻》纂引元人王士点《禁扁》云：“辽以幽州为南京，宫之扁（匾）曰永兴、曰积庆、曰延昌、曰彰愍、曰长宁、曰崇德、曰兴圣、曰敦睦、曰永昌、曰延庆、曰长春、曰太和、曰延和。殿之扁（匾）曰清凉、曰元和、曰嘉宁。堂之扁（匾）曰天膳。楼之扁（匾）曰五花、曰五凤、曰迎月。阁之扁（匾）曰乾文。门之扁（匾）曰元和、曰南端、曰万春、曰千秋、曰凤凰。园曰柳园。”认为辽南京有以上诸宫、殿、楼、阁、门，此实为一种误解。朱氏之说之所以错误，缘于其不了解契丹王帐制度，故误改《禁扁》。《辽史·营卫志上·宫卫》载：“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是知每一契丹新主即位，都置一宫卫，由宫使管辖配属的契丹部落（称斡鲁朵）和以汉、渤海俘户设置的若干州县。宫卫统辖一定范围的属地，作用在于征收赋税为契丹主提供消费，并为辽廷提供军队。自辽太祖阿保机以下直至辽亡，共置十三宫卫：太祖弘义宫、应天皇后长宁宫、太宗永兴宫、世宗积庆宫、穆宗延昌宫、景宗彰愍宫、承天太后崇德宫、圣宗兴圣宫、兴宗延庆宫、道宗太和宫、天祚帝永昌宫、孝文皇太弟敦睦宫、丞相耶律隆运（即韩德让）文忠王府。《辽史·兵卫志中·宫卫骑军》又载：“十二宫一府，自上京至南京总要之地，各置提辖司。重地每宫皆置，内地（指契丹祖居地附近）一二而已。”南京则诸宫皆置提辖司。《日下旧闻》仅据此即称南京有永兴、积庆等10余宫，实属误会，因为诸宫南京提辖司是诸宫设在南京的分支军事机构，并非诸宫本身。前引《宫卫骑军总叙》云：“（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守陵。有兵事，则五京二州各提辖司传檄而集，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其于诸宫分设在五京二州提辖司的性质已言之甚明。契丹主诸宫各有其地，并不在南京。如《辽史·营卫志上》载：“耶鲁盃斡鲁朵，世宗置。其斡鲁朵在土河（今老哈河）东，陵寝在长宁宫北。”辽世宗葬于显州（治今辽宁北镇）西山，则应天皇后之长宁宫应在其南，显然与南京无关。至于彰愍、崇德等诸宫，亦皆如此。

辽南京诸殿中，元和殿为正殿。其证据有二：首先，从布局来看，王曾《上契丹事》云：燕京“子城就罗郭西南为之。正南曰启夏，内有元和殿。”其实王曾所述还有忽略，启夏门与元和殿之间还有元和门。从宫门（启夏）、朝门（元和）到元和殿的这种布局格式来看，元和殿当即是皇宫内的正殿。其次，从元和殿的功能来看，也应是正殿。《辽史·仪卫志四·仪仗》载：“会同三年（940年），上（辽太宗）在蓟州（今天津蓟县）观导驾仪卫图，遂备法驾幸燕，御元和殿，行入阁礼。”此事，《辽史·太宗纪下》的记载

陈述：《全辽文》卷六《韩椅墓志铭》。

《文献通考》卷三百四十六《四裔考二十三·契丹中》引王曾《上契丹事》记弘政殿为洪政殿。洪、弘音同，应是传写所误。今从《辽史》。

与之相同。《辽史拾遗》卷三引《五代史》云：唐制，前殿谓之衙，有仪仗。便殿谓之閤，无仪仗。“乾符以后，因乱礼阙，天子不能日见群臣，而见于朔望（初一、十五），故正衙常日废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后习见，遂以入閤为重，至出御前殿，犹谓之入閤。”契丹乃承衰唐礼制，太宗既入元和殿而行入閤礼，其处为正殿当无疑问。《辽史·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年）辽圣宗在南京“御正殿，大劳南征将校”。其所谓的正殿即元和殿。《辽史·仪卫志》又载：会同六年（943年），辽太宗“备法驾幸燕，迎导御元和殿”。统和四年（986年），“燕京留守具仪卫导驾入京，上御元和殿，百僚朝贺”。辽帝不但在元和殿举行朝贺，而且在此犒赏从军有功将士。统和四年（986年），宋军伐辽。《辽史·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年）五月壬午，还次南京，丙戌，御元和殿，大宴从军将校；五年（987年）正月戊寅，上还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赉将士。”统和七年（989年），辽军击退宋军，“正月辛亥，还次南京，六军解严。二月壬子朔，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辽帝还在元和殿举行殿试，选拔士子。《辽史·兴宗纪一》载：“重熙五年（1036年）十月丁未，幸南京。壬子，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赋’、‘幸燕诗’试进士于廷；赐冯立、赵徽四十九人进士第。”

在南京元和殿举行的最隆重的仪式，是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册上圣宗及其母承天萧太后尊号的盛典。《辽史·圣宗纪五》载：“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九月，幸南京。十月庚午朔，帝率群臣上皇太后尊号曰睿智神略应运启化承天皇太后，群臣上皇帝尊号曰至德广孝昭圣天辅皇帝。大赦。”关于册上尊号的仪式过程，《辽史·礼志五·册皇太后仪》备有详载，以其繁缛，兹节要而述之：前期，陈设于元和殿如皇帝受册之仪，至日，皇帝御弘政殿。皇太后御紫宸殿，乘平头辇，童子、女童队乐引。至金銮门，閤使奏内诸司起居讫，赞引驾，自下先行至元和殿。皇太后入西北隅閤内更衣。奏乐，太乐令、太常卿引皇太后升坐。东上閤门副使引丞相东门入，西上閤门副使引亲王西门入，通事舍人引文武班入。东、西上閤门使、宣徽使自弘政殿引皇帝御肩舆至西便门下，引至殿前位。皇帝捧册行，置太后座前。舍人引丞相当殿再拜，三呼万岁，至读册位，俯伏跪读册讫，复班位。宣徽使引皇帝下殿，至殿前位，复引自西阶上殿，俯跪，致词讫，复自西阶回殿前位。侍中临轩，宣太后答称“有制”，皇帝、丞相、亲王、文武百官赞拜，三呼万岁如仪。丞相以下出。侍中奏“礼毕”，皇太后起，文武官出门外分班侍从。閤使奏放仗，皆如皇帝受册之仪。从以上所述宫殿的名称和仪式进行的过程，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辽南京皇城元和门以内的情形。册尊号之日，萧太后御紫宸殿，圣宗御弘政殿，然后先后至元和殿举行大典，元和殿作为正殿相当今故宫之太和殿。紫宸殿，据命名判断，当在元和殿之北。古代称天为紫虚，又称北斗星座东北之十五星为紫宫（又称紫微宫、紫宫垣、紫垣），依“天人合一”学说，视为“大帝之座也，天子之常居也”。因此，帝王宫禁又称紫宫、紫禁城，帝京之道路又称紫陌；唐代史思明以幽州城为燕京称帝时，改子城内原节度使厅为紫微殿。唐代西京长安大明宫内有紫宸殿，在正殿宣政殿之北。依惯例，紫宸只能用来命名天子所御宫殿，但契丹族来自塞外，本不必严格遵守中原礼制，且圣宗幼年即位，承天萧太后权重，其宫殿以紫宸命名亦无可。弘政殿，似应在元和殿与紫宸殿之间。金代，中都

(将辽南京展筑而成)正殿大安殿后有仁政殿,是辽南京旧殿,仁政殿或即弘政殿。紫宸殿、弘政殿当分别是承天萧太后和圣宗的便殿,即召见百官之地。金銮门即元和门之别称。元和殿除有南门元和门外,还有东、西两便门。殿内西北隅有阁,供典礼时更衣之用。辽朝末年,改元和殿为德胜殿。《金史·太祖纪》载:天辅六年(1122年)十二月,陷辽南京,“上(阿骨打)至燕京。壬辰,上御德胜殿,群臣称贺。”《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二引《亡辽录》称为万胜殿,盖一物异名,传写所讹。

其他各殿也都各有专用。昭庆殿是辽帝与南京群臣欢宴之地。如辽太宗会同三年(940年)“四月壬戌,御昭庆殿,宴南京群臣;”。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闰九月癸未,宋岁增银、绢十万两匹,文书称‘贡’,送至白沟;帝喜宴群臣于昭庆殿”。《辽史》中有关昭庆殿的记载,其内容都是辽帝与南京群臣于此欢宴。便殿是辽帝为藩属各国使臣设宴的宫殿,泛指正殿以外的宫殿,并非专称。《辽史·太宗纪下》载:“会同三年(940年)四月壬子,御便殿,宴(后)晋及诸国使。”内殿是泛指大内之殿,有时辽帝也在此与亲近臣属欢饮。辽统和四年(986年)南京留守、于越耶律休哥击溃宋军对辽南京的威胁后,萧太后与辽圣宗“诏休哥以下入内殿,赐酒劳之”,以示优宠。嘉宁殿,据《辽史·礼志四》载,是辽帝平日上朝的宫殿。当辽帝巡幸南京时,每日晨晓时分南北二府官和南京臣僚便着朝服入朝,于嘉宁殿丹墀内面殿立,举行常朝仪后,分别奏事。但是《辽史》中也有辽帝在此举行祭奠活动的记载。清宁五年(1059年)十月壬子朔,辽道宗(兴宗长子)至南京,“祭兴宗于嘉宁殿”。辽景宗、圣宗二御容殿在皇城内,是契丹皇室供奉景、圣二先帝御像以为祭奠的宫殿。辽诸先帝御容殿,不独设置在南京。《辽史·地理志》载:辽上京宫室有开皇、安德、五鸾三大殿,中有历代帝王御容。辽东京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名倍,太祖阿保机长子)御容殿。中京皇城中有祖庙,景宗、承天皇后(景宗后)御容殿,等等。每逢朔望、节辰、忌日,在京文武官属并赴御容殿致祭。《辽史·圣宗纪二》载:“统和四年(986年)十月乙卯,幸南京。十一月戊寅,日南至,上率从臣祭酒景宗御容。”这是在冬至日时圣宗率南京文武官属至景宗御容殿致祭。

辽南京大内宫殿高崇壮丽,殿前有丹墀,殿门有高大的户限,殿顶饰有帝王才可使用的兽吻。各殿之间有甬道相通。主要宫殿除前有朝门外,庭院两侧还有便门以供出入。辽亡以后,宋廷仍以之为子城,作为宋燕山府的衙署。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称赞曰:“契丹旧内,壮丽夔绝。”足见其辉煌极致,可与北宋东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宫殿媲美。

(四) 辽南京(燕京)苑囿、离宫

辽南京既然是辽朝五京之一,除宫室之外必然还要有皇家苑囿、离宫等设置。何况契丹族是游牧民族,辽帝统治其土的方式是以春、夏、秋、冬四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辽史》卷十九《兴宗纪二》。

《辽史》十一《圣宗纪二》。

《辽史》卷二十一《道宗纪一》。

时捺钵巡视各地，其于辽南京当然也不能满足于深宫楼台，而要求有避暑、狩猎的苑囿和离宫。辽南京当时有长春宫、延芳淀、华林和天柱二庄、瑶池殿等处，其中最著名的是延芳淀。

延芳淀在今北京通县东南的漕县一带，辽代置漕阴县。《辽史·地理志四》载：“漕阴县。本汉泉州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漕阴镇，后改为县。”辽漕阴县的设置，与延芳淀有密切关系。辽代，延芳淀有广阔的水面，芦苇丛生，方数百里。据考证，辽延芳淀的范围，北至今北京通县张家湾、台湖一带，西至马驹桥，西南至今北京大兴县采育，南至今北京通县南界。每至春季，辽帝在此狩猎，“卫士皆衣墨绿（与芦苇同色，便于隐蔽），各持链鎚、鹰食、刺鹅锥，列水次，相去五七步。上风击鼓，惊鹅稍离水面。国主亲放海东青鹞擒之。鹅坠，恐鹞力不胜，在列者以佩锥刺鹅，急取其脑饲鹞。得头鹅者，例赏银绢”。辽帝与皇族、群臣在延芳淀各有分土，所以统和四年（986年）承天萧太后与圣宗至南京指挥军事时，令皇族庐帐驻于南京延芳淀。《辽史》诸帝王本纪中关于延芳淀的记载，多在辽圣宗之世，这时正是延芳淀水草最为茂盛、飞禽群栖的兴旺时期。延芳淀既是辽帝游猎之地便当也有宫殿建筑，神潜宫（今神仙村处）便是一例，犹如清代北京的南苑一样。不仅如此，辽帝还在此设先帝石像。辽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凿景宗（圣宗之父）石像成，次年（995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太后石像于延芳淀”。开泰元年（1012年）十二月，始“奉运南京诸帝石像于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西南）观德殿，景宗及宣献皇后（即承天萧太后）于上京五鸾殿”。

长春宫与延芳淀关系最为密切，《辽史》中有关长春宫的记载，大多与延芳淀同时出现。《辽拾遗》卷七引《北平古今记》称：“辽有二长春宫，一在南京，一在长春州（治今吉林白城市东）。若统和五年（987年）三月朔，幸长春宫赏花、钓鱼。十二年（994年）三月如长春宫观牡丹。十七年（999年）正月朔，如长春宫。则非南京之长春宫也。”谓辽有二长春宫，此言虽不错，但所举例证并不准确。《辽史·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二年（994年）三月戊午（初六日）幸南京。壬申（二十日），如长春宫观牡丹。四月辛卯（初十日），幸南京。”三月戊午至壬申，其间不过13天；三月壬申至四月辛卯，其间不过18天。如果在南京和长春宫稍事盘留几日，那么用在路途上只有10—15天时间。若上述之长春宫果是远在上京道的长春宫，圣宗为观牡丹而不顾劳顿，20余日匆匆往返千里之遥，殊难理解。且辽南京亦有牡丹，《辽史·游幸表》载：“乾亨二年（980年）闰三月，‘如南京赏牡丹’。因此，此处所谓的长春宫应即为南京之长春宫。又，《辽史·圣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的地理特点和历史成因的初步分析》，打印稿。

《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

《辽史》卷十一《圣宗纪二》载称东京延芳淀。《日下旧闻考》卷一百十《京畿·通县三》引孙承泽《北平古今记》据此称辽东京也有延芳淀。实误。时萧太后一行自居庸关至南京，未有令皇族驻帐东京（治今辽阳）之理。且《辽史·地理志二》记东京水道甚详，并不见延芳淀之名。笔者认为，辽东京在会同元年（938年）以前称南京，编史者或因此而误。

《辽史》卷十三《圣宗纪四》。

《辽史》卷十五《圣宗纪六》。

长春州属上京道，辽兴宗重熙八年（1039年）置，隶属于兴宗之延庆宫圣宗时，尚无长春州。

宗纪三》载：“统和七年（989年）二月壬子朔（初一日），上御元和殿受百官贺。乙卯（初四日），大飨军士，爵赏有差。是日，幸长春宫。”二月壬子至乙卯，其间不过二日，圣宗决无可能自南京远至上京，此长春宫更当为南京长春宫无疑。辽南京长春宫遗址，今已无从考知。然而，《辽史》中记载辽帝幸长春宫、延芳淀大多同时，据此可以推测辽南京长春宫当在南京城、延芳淀附近。

华林、天柱二庄也是辽帝在南京经常巡幸的地方。《辽史》中屡见辽帝幸华林、天柱之事，如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年）“正月己亥，如华林、天柱”。圣宗之世，更是频频临幸，且均在正月。《辽史·地理志四》“南京道顺州”条载：顺州领怀柔县（治今北京顺义县），南有北齐长城，“城东北有华林、天柱二庄，辽建凉殿，春赏花，夏纳凉”。北齐长城在温榆河南岸，而华林、天柱二庄在齐长城东北，亦即顺州怀柔县西南。顾炎武《昌平山水记》卷下云：“顺义县西南二十里有天柱村，三十里有苇沟村，村东临温榆河渡，渡南有长城遗迹。”此天柱村即今北京东郊天竺镇，当为辽天柱庄遗址。华林又书华黎，《光绪顺天府志·金石二》载：“《燕京析津县华黎庄兴建木塔记》。存。……乾统五年五月。在东直门外花黎坎。”花黎坎今其名仍旧，在天竺西北3里有余，当即辽华林庄遗址。另外，今天竺镇与前后苇沟村之间有楼台庄，或亦为辽凉殿楼阁遗址。

此外，辽南京还有瑶池殿、临水殿。《三朝北盟会编》卷九载：宋宣和四年（1122年）六月，辽燕王淳“病卧于城南瑶池殿。李奭（李处温之子）父子与陈泌等阴使奚、契丹诸贵人出宿侍疾。燕王危笃，处温托故归私第，欲闭契丹于门外，然后乞王师（宋军）为声援。契丹知，遂不果”。由以上记述，可知瑶池殿在辽南京南城外，故李处温诱奚、契丹诸大臣出城侍疾，然后托故归城内家中，欲闭南京城门而拒奚、契丹诸大臣于城外。《辽史·游幸表》又载：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年）闰九月，幸南京，“宴于（南京留守）皇太弟重元第，泛舟于临水殿宴饮”。是以知辽南京又有临水殿。辽南京附近虽多有河流湖泊，但从辽帝至临水殿需“泛舟”情节考虑，临水殿最有可能的地址应为以下二处：一在南京城东北方，即今北海公园附近，一在今北京广安门外青年湖西岸。《辽史·地理志四》载辽南京有“瑶屿”。岛之小者称屿。明代以前，今北海公园团城四面皆水，其后才掘南海，取其土填平团城以东水面，使其与东边的大内陆路相通。金、元时在今团城均有建筑，此或即辽代之瑶屿。如临水殿果然在瑶屿上，辽帝自南京至瑶屿临水殿势必需要泛舟而行。然而，今北京广安门外青年湖，金代时为中都皇城内同乐园鱼藻池（又称西华潭、太液池），其位置在金宫城内大安殿西。池西北有蓬莱阁。张师颜《南迁录》载：金宣宗“诣蓬莱院观音寺烧香，过浮碧池”。此碧池即鱼藻池。金中都城系扩建辽南京外郭而成，其皇城位置大致一仍辽旧。因此，金中都皇城内鱼藻池，辽代时也应在皇城内。辽南京临水殿更可能在此池之西。辽帝自元和殿至临水殿亦需西浮此池。

（五）辽南京（燕京）坊市和街道

辽南京坊和市的布局，基本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无所改易，前节述

《辽史》卷九《景宗纪下》。

唐幽州城时已经涉及，兹略做补充。辽南京城内有 26 坊，每坊四门，各有门楼。门楼上有匾额，署其坊名。辽南京各坊虽系承唐、五代幽州城之旧，但个别坊名也有更改，如辽南京之宣化坊、北罗坊、南肃慎里等坊名，即不见于唐代。虽然唐中期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幽州城的封闭格局已被动摇，个别商铺已越出市门，甚至深入坊里，但在辽统治的 180 余年间仍基本保持着坊里旧制形式。路振《乘轺录》称辽南京城内“居民棋布，巷端直”。所谓“巷”，即坊内相对的坊门之间的道路，在坊中心成十字交叉。就全国情况来说，坊里制度的彻底破坏是宋仁宗庆历（1041—1048 年）以后的事情。路振出使辽国是在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 年），正当辽圣宗统和之世。当时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仍保持着古典坊制形式，辽南京的情况或与之相仿。

辽南京城的“市”也是承唐、五代之旧，仍在城北。辽末，宋军郭药师部攻入辽南京，与辽军“战于三市”，即为其地。辽南京是辽国境内经济最为发达地区，所以辽廷在这里设置的管理财赋的官员也比其他地区多。《辽史·百官志四·序》云：“西京（治今山西大同）多边防官，南京、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西）多财赋官。”在辽南京专掌征榷之事的有燕京管内商税都点检、燕京管内都商税判官等职官，专掌财政的有南京三司使。辽太宗之世，幽州安次人韩延徽曾任南京三司使。辽道宗之世，马人望任南京三司度支判官，治理有方，公私兼裕。辽天祚帝之世，崇信奸臣，群下离心，朝政腐败，积弊益重，“时钱粟出纳之弊，惟燕为甚”。马人望复出为南京三司使，“以缣帛为通历，凡库物出入，皆使别籍，名曰‘临库’。奸人黠吏莫得轩轻”。金陷辽南京后，依约将其地归宋朝。宣和七年（1125 年）许亢宗途经那里时，称赞其地物产丰富，“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膏腴蔬蓂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商业自然发展，“城北有互市，陆海百货萃于其中”。金人北去时曾将城市劫掠一空，许亢宗至此仅战乱后三年，当地商市就已经恢复到如此盛况。由此可以推测，辽南京时期的商市，其繁华程度当数倍于此。路振《乘轺录》称辽南京城内“列肆者百室”，那是辽朝前期的情况，其后当远远不止于此。

辽南京城内街道布局井井有条，宽阔端直。辽南京城有八门，按古代城市一般规制，相对的两门之间均应有直道相通，故城内至少应有四条东西、南北交叉的直道，这是城市的主要干道。只是迎春门与显西门之间，丹凤门与通天门之间，因中间隔着皇城而不能直接相通，这也是承袭唐、五代幽州城的旧格局。此外，相邻的两座城门之间也应有道路相通，犹如今日的顺城街，以便战时运兵防守。辽南京繁华的街道似有 6 条。《辽史·圣宗纪八》

分见陈述：《全辽文》卷八《卖地券》、《韩资道墓志铭》；卷十《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实录》。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

陈述：《全辽文》卷五《王说墓志铭》；卷八《张绩墓志铭》。

《辽史》卷一百五《马人望传》。

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

唐宋时京师皆有六街之制。《资治通鉴》卷二百九睿宗景云元年（710 年）：“中书舍人韦元微巡六街。”胡注：“长安城中左、右六街，金吾街使主之；左、右金吾将军，掌昼夜巡警之法，以执御非违。”《宋史》卷二百七十《魏丕传》：“淳化四年（993 年）……判金吾街仗。初，六街巡警皆用禁卒，至是，诏左右街各募卒千人，优以廩给，使传呼备盗。”辽南京六街当仿唐宋之制，分布在东、西城中。

载：太平五年（1025年）辽圣宗幸南京，“燕民以年谷丰熟，车驾临幸，争以土物来献。……至夕，六街灯火如昼，士庶嬉游，上亦微行观之”。

述辽南京城内街道，时有不明当时制度而误者。如辽代题名、碑记中常见燕京左街名称，或以为辽南京城内当有左（东）街地名，其实全属误会。早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以后，幽州城内即由幽都、蓟县二县分治。幽都县管郭下西界，蓟县管东界。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宛平县管郭下西界，析津县管东界。其辖境自城内两分，延及东、西郊外。辽又以沙门高师设僧录一职，分管南京寺院。凡析津县内寺院均归左街僧录管理，宛平县寺院归右街僧录管理。《全辽文》卷八《慧峰寺供塔记》云：“法师讳从杰，燕京崇孝寺左街僧录通文理大师之门人也。”此指通文理大师系崇孝寺僧而任左街僧录之职，并非崇孝寺附近有左街一地。同书卷十《僧奉航塔记》又云：“访道寻师，就至燕京左街驻蹕寺。”驻蹕寺，明《顺天府志》引《元一统志》称其址在“大都丽正门（今北京正阳门北）外西南三里旧城施仁关”。施仁关在施仁门外。施仁门系金中都东垣偏北城门，地在辽南京东垣外三里。辽代，驻蹕寺在辽南京郊外，何得称燕京左街？盖其地属析津县，驻蹕寺归左街僧录管辖，故得称燕京左街驻蹕寺。辽清宁八年（1062年）《非浊禅师实行幢记》云：“重熙十八年（1049年），敕授上京管内都僧录。秩满，授燕京管内左街僧录”。由此，上述“左街”一辞，其意可明。左街之外，还有右街。辽乾统七年（1107年）《普济寺严慧大德塔记铭》云：“乾统七年（1107年），燕京三学寺殿主严慧大德赐紫沙门等伟，痼疾作。始夏，疾有加，徙居右街福田寺。”福田寺即因在宛平县境内而称右街福田寺。辽南京僧侣分左、右街僧录管理的这种制度，直至金代仍一如其旧。《满洲金石录·别录》载，金代所撰《昊天寺妙行大师碑铭并序》中仍有“提点前管内左街都僧录”、“提点管内右街都僧录判官”等僧职。所谓左街、右街云云，其实即犹如今日东城、西城之谓，并非街道名称。

（六）辽南京（燕京）佛寺

幽州地区佛教始于魏晋，兴于北朝、隋唐。辽人佞佛，南京地区佛寺屡有兴建，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称其“僧居佛宇冠于北方”，并非夸张。

辽南京城外风景秀丽之处，多有名刹，或就前代寺院加以修葺增广，或择址新建。今北京西郊的香山，辽代即有其称，《辽史·天祚皇帝纪附耶律淳传》载：耶律淳死后，“葬燕西香山永安陵”。辽代，香山有香山寺。《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七《国朝苑囿·静宜园二》载：“香山寺址，辽中丞阿勒弥（旧译阿里吉）所舍。殿前二碑载舍宅始末。”阿里吉，《辽史》无载，但既有碑为证，其舍香山别墅建寺之事当为不虚。今北京门头沟区马鞍山戒台寺，创自隋唐之际，辽代称慧聚寺。《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郊坰·西十五》称：“辽咸雍间（1065—1074年）僧法均始辟戒坛。坛前有辽碑一，

《辽史》卷十五《圣宗纪六》。

陈述：《全辽文》卷八。

陈述：《全辽文》卷八。

乾文阁直学士王鼎撰。戒坛以石为之，在殿内，中有高座，每年法会，高僧于此说戒。”今北京房山区云居寺，僧静琬创自隋大业中（605—618年），凿石室以藏石经，为隋唐时幽州名刹。辽代，云居寺屡有兴修，辉煌一时。

《金石萃编》卷一百五十三《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云：“至辽，刘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勳、梁公颖奏道宗皇帝，赐钱造经四十七帙。”辽穆宗之世，十五年间云居寺即兴建讲堂、佛殿、碑楼、库堂、暖厅、廊房计数十座，“加朱施粉，周而复始，不可殫论”。辽南京南城外有宝光寺，东城外有驻蹕寺。此外，又如清水院，兜率寺、栖隐寺，等等，举不胜举。

辽南京城内佛寺更多，且建筑华丽，规模宏敞。据《元一统志》记载：辽大昊天寺，占地百顷，清宁五年（1059年）辽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府第为寺。据考，其址在今北京西便门大街以西。秦越大长公主是辽圣宗之女、兴宗之姊，道宗懿德皇后之母，身份非同一般；主持建寺的妙行大师又系契丹人，属国舅大丞相楚国王之族，这就决定了昊天寺在辽南京城中不同一般寺院的特殊地位。据《妙行大师行状碑》记载，秦越大长公主许愿舍宅建寺之后，未及实行即病逝。道宗与懿德皇后为酬其愿，计施钱数十万贯。寺成之日，道宗御书其额，以大昊天为名。咸雍三年（1067年），昊天寺遭火灾焚毁，但在皇室捐助下，“不二三年，营缮悉就”，恢复原状。大安九年（1093年），妙行法师又在寺内庭中崇建佛塔，六簷八角，高二百余尺。竹林寺，清宁八年（1062年）辽宋楚国大长公主舍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寺，赐名竹林。据考，其址在今北京宣武区下斜街以西。又据《析津志》载：仰山寺在竹林寺西，辽穆宗应历十一年（961年）建。大延寿寺在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之东，其初为东魏幽州刺史尉长命所建，俗称尉使君寺，后改称智泉寺，唐宣宗之际赐名延寿，是幽州名刹。辽景宗保宁中（969—979年）重加修葺，建殿九间，穷极伟丽。辽兴宗重熙中（1032—1055年），延寿寺被焚，复加重修。悯忠寺系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为悼辽东之役阵亡将士而建，亦为幽州名刹。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诏令毁削佛寺，惟诏许幽州存悯忠寺。辽代，悯忠寺佛事更盛，辽圣宗统和八年（990年）在寺中建释迦太子之殿。至今寺中还建存有辽代碑和经幢。悯忠寺原有唐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所建崇阁，辽世宗天禄四年（950年）灾。穆宗应历五年（955年）复建。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该阁又毁于地震，随即修复。悯忠寺、延寿寺和三学寺同为辽南京城内三大佛寺，辽帝常在此举行佛事。《辽史·圣宗纪四》载：“统和十二年（994年）四月戊戌。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寿寺饭僧。”《辽史·兴宗纪二》又载：“重熙十一年（1042年）十二月己酉，以宣献皇后忌日，上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仙露寺，后世湮没无闻，《元一统志》称该寺为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创建，辽圣宗太平十年（1030年）重加修建。《日下旧闻考》卷五十九《城市·外城·西城一》云：“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五月，宣武门西南居民掘得石匣，匣旁

《辽拾遗》卷二十一王正：《燕山云居寺碑》。

《宋史》卷四《太宗纪一》。

陈述：《全辽文》卷十《妙行大师行状碑》。

《辽史》卷六十八《游幸表》：“辽道宗清宁十年（1064年）九月幸七金山三学寺。”七金山在辽中京（治今内蒙古宁城西），此三学寺与南京三学寺为异寺重名。辽南京别有三学寺。

有记，乃辽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瘞舍利佛牙于此。”石匣记文即《葬舍利佛牙石匣记略》，文云：辽僧志愿会同八年（945年）逝前将舍利佛牙付仙露寺比丘尼定徽。定徽具表上闻，天禄三年（949年）在辽皇室捐助下将舍利佛牙瘞于仙露寺。据此，仙露寺当在发现石匣的今北京宣武区菜市口以西。金朝初年，金军俘北宋徽、钦二帝归至燕京，即囚徽宗于延寿寺，“宗室嗣濮王仲理以下别居仙露僧舍”。钦宗于徽宗之后亦被押至燕京，“驻蹕燕山悯忠寺，”“二圣（即宋徽宗、钦宗）两寺居处，七月上旬于昊天寺相见……礼毕而归”。辽南京的诸大寺院，这时竟成为金人羁押北宋皇室宗亲的囚所。《辽史·游幸表》载：“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年）四月，幸延寿、延洪二寺。”明《顺天府志》引寺中唐碑称其创建于唐贞元初年（785年），时号天城院。大中末（860年）改称延洪寺。其重修碑记称延洪寺为辽南京甲刹，可见当时规模不小。《析津志》载：“延洪寺在崇智门内，有阁。”崇智门是金中都北面偏东城门，亦即辽南京之拱辰门，据此推测延洪寺当在今北京西城区象来街以南一带。辽代，其地属析津县。《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辽金）载有“燕京左街延洪寺”题记，与此相符。归义寺在今北京宣武区善果寺西北，创自唐代，辽代寺名不改，并立经幢、建佛殿。奉福寺在今北京白云观西南，《元一统志》称创于北魏孝文帝之世，“为院百有二十区，后罹兵烬”。唐贞观十年（636年）乃于旧基重建。辽代此寺仍存，文殊殿前原有辽会同九年（946年）经幢。《辽史·道宗纪四》载：“大康十年（1084年）正月丙午，复建南京奉福寺浮图。”辽末，奉福寺已成颓垣残壁，乾统中（1101—1110年）僧法珍在此结茅而居。法宝寺在大延寿寺之南，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年）杜永祚舍宅而建。开泰寺在大昊天寺西北。王曾《上契丹事》述云：辽南京城内“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开泰寺是辽南京规模最为壮丽的佛寺，原为辽南京统军使邺王宅，后魏王耶律汉宁在此造寺，赐名至寿，开泰六年（1017年）改名开泰寺。《元一统志》称开泰寺“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辽史·兴宗纪三》载：“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崇孝寺在今北京宣武区崇效胡同，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舍宅而建，辽代仍存。

辽南京寺院林立，不胜枚举，以上仅择其要者而述之。金初，南宋使者洪皓出使金国，被羁押十五年，后徙燕京，绍兴十三年（1143年）归国。其《松漠纪闻》云：“燕京蓝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自南僧至，始立四禅院，曰大觉（在开阳门外）、招提、竹林、瑞像。延寿院主有质坊（即当铺）二十八所。僧职有正、副判录，或呼司空。”当时金朝尚未迁都燕京，故其所述当视为辽南京佛寺的概况。

（七）辽南京（燕京）衙署

辽朝在南京城内置有众多机构，仅据《辽史·百官志》所载，即有：南京兵马都总管府（重熙四年改称南京都元帅府），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司、侍卫控鹤都指挥使司、燕京禁军详隐司、南京都统军司（统和十二年复置南京统军都监）、南京宰相府、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南京留守司、

蔡肇《北狩行录》。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八引赵子砥：《燕云录》。

南京都总管府、南京都虞候司、南京警巡院、南京处置司、南京宣徽院、南京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司、南京栗园司。此外，还有南京太学。辽历朝帝王宫卫在南京也都设有提辖司。这些机构在南京城内都置有衙署，以为处理政务之所。

辽初，以幽州为南京，并置幽都府处理当地政务。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明《顺天府志》载：“崇孝寺，辽乾统二年（1102年）沙门了铎作碑铭谓析津府都总管之公署之左有佛寺，厥号崇孝。”是以知崇孝寺西有析津府都总管衙署。宛平县衙在城西侧，析津县衙在城东侧。

辽南京还有不少契丹贵族府第。如王曾《上契丹事》云：南京“城南门内有于越王廨，为宴集之所”。于越是契丹官号，其位相当于汉制的三公。南京城内的于越王廨即圣宗之世总南面军务的于越耶律休哥的衙署。因耶律休哥后封宋国王，故又称于越王。辽南京还有耶律休哥祠，是其死后圣宗诏命所建。此外，又如舍为昊天寺的辽秦越大长公主府第。辽圣宗之世，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大约也是舍其府第而建。

幽州城在辽代成为五京之一，且时间长达近200年，城市的性质逐渐发生变化，从军事重镇逐渐演变成区域政治中心。辽南京城内众多的军、政、财政衙署和专为皇室服务的各种职司的衙署，以及诸亲王、公主的府第，构成了城市建筑中与秦汉以来不同的特色，从而初步具备了京师的功能。幽州城从军事重镇向政治中心城市的演变过程，始于辽代，及金中都时期始具雏形，至元大都时期才最终完成。

六、金中都城

(一) 金初对辽南京城的改造

宋宣和二年(1120年),北宋与女真族的金朝订立海上之盟,相约南北夹击辽朝。宣和四年(1122年),金朝在陷辽上京、中京、西京之后,同年十二月又陷辽南京。宣和五年(1123年)四月,经过反复交涉,金朝以北宋每年交岁币四十万,年输燕山代税钱一百万缗为条件,将辽南京(燕京)及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二十四县之地归还宋朝。金人撤出辽南京时,“尽毁诸州及燕山城壁楼橹,要害皆平之。又尽括燕山(即辽南京)金银钱物,民庶寺院一扫皆空。以辽人旧大臣及仪仗车马玉帛辎重尽由松亭关去”。四月十七日,童贯、蔡攸率宋军进入辽南京城,“入燕山大内(即辽南京皇宫),毁一小殿(兽)吻,受诸将贺”。兽吻、鸱尾是帝王宫殿专用的装饰物,故童贯等为避免越制,才下令毁一小殿顶上的兽吻,在此举行贺礼。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云:宋燕山府“州宅用契丹旧内”。依理推测,宋燕山府时期,原辽南京皇城内的建筑,部分当遭毁损,至少诸殿的兽吻、鸱尾一类饰物已尽行销毁。

宋宣和五年(1123年),金太祖阿骨打死,其弟吴乞买继位,改元天会,是为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金太宗诏诸将伐北宋。金军兵分二路,东路由宗望率闍母、刘彦宗陷宋燕山府,随即南下;西路由宗翰率领金军围宋太原府,破宋信德府。十二月丙午,原叛辽归宋的常胜军将领郭药师降金,宗望率金军进入燕山,从此开始金朝在幽燕地区90余年的统治。燕山仍改称燕京。金朝初立中书省、枢密院于广宁(今辽宁北镇),后移平州(今河北卢龙),至此复移置燕京,以刘彦宗为枢密院使,掌管汉地的官员选授、调发租赋等民政事务。刘彦宗又召易州人张通古为枢密院主奏,涿州人赵元为枢密院令史。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直至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年)欲以燕京为京师时始罢,这距金人占领燕京已有25年。金初的燕京,一度失去其国都的地位,成为金朝南面的一个重镇。

金初既以燕京为军事重镇,其于城市布局亦出于军事目的而相应改动。张师颜《南迁录》云:“忠献王粘罕(即宗翰),有志都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小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廩甲仗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宇文懋昭《大金国志》记此事与《南迁录》相同,可能互为转录。宗翰系金朝国相撒改之子,开国元勋,官至太保领三省事,封爵晋国王。宗望陷宋燕山府在天会三年(1125年)十二月,宗翰卒于天会十五年(1137年),故筑四子城的时间当在此10余年之间。这4座子城在《金史》中不见记载,其他著述中不见提及,当代考古亦无发现,其形制、方位乃至存在与否,遂成疑案。但《南迁录》、《大金国志》言之凿凿,述之甚详,亦不容轻易否定。宋周麟之《海陵集》称“燕京城内地大半入宫禁,百姓绝少。其宫阙壮丽,延亘阡陌,上切霄汉,虽秦阿房、汉建章不过如是。”周麟之语使金国事,“多附会夸诞之词”,但其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引《北征纪实》。

《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引《北征纪实》。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六《集部四·别集类三》。

“燕京城内地大半入宫禁”的印象，或许与内城四隅的子城有关。据《南迁录》和《大金国志》记载，4座子城位于原辽南京皇城四隅。子城和内城并不直接相依，中间有复道相通。所谓复道，即上下各有道路相通的甬道。《汉书·高帝纪》载：“上（刘邦）已封功臣二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注引如淳曰：“上下有道，故谓之复。”据此可知，宗翰所筑复道，当是在内城和子城之间筑起两道夹墙，城上可行走，地面夹道中亦可通行，故《南迁录》又称此为“甬道城”。子城开二门，一门临子城外，以便出击或退守；一门在夹城内，以通内城。这4座于内城四隅突出的子城，犹如动物的四足，消灭了守城的死角，可以从各个角度歼灭攻城之敌，其形制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似乎前所未有的。海陵王在此营建金中都城时，曾欲平毁这4座子城，后被翟天祺谏止，保存如故。

金末，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十二月蒙古伐金，破居庸关，直抵中都城下，中都戒严。卫绍王“命京城富室迁入东子城，百官家属入南子城，宗室保西城，戚里保北城，各分守兵二万”。这场战斗空前惨烈，最终以蒙古军失利退走告终。在战斗中，内城的子城充分发挥了作用。其初，金大兴府尹（治燕京）乌陵用章命“凡城市有储蓄，纵其搬运入子城内，门不许闭”。“十七日，（蒙古军）攻内南城甬道，上国（金）兵击之。”此甬道即南子城与内城之间的复道。次年（1212年）正月，金河东总管统军完颜及等入援，蒙古退兵。“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门开，完颜及等见上（卫绍王）大哭。上亦泣曰：“‘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寺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室屋华盛，至是焚毁无遗。向非忠献王（宗翰）有先见宏观，国不立矣。’”同年十月，蒙古军复至中都城下，破外城，金军皆溃，乌陵用章“命开苑城洞门纳之。初二日午，攻内城南甬道，左三衙统军李思安令发擗木、牛鼻炮击之，死者众。初六日，大军（蒙古军）发民间所叠木植、竹芦等积甬道城下，务与城平，欲前博战。李思安自龙游池凿地道，以干秭涂硫黄，破絮醮油，间塞于所叠竹木之下。初八日，大军登木堆，用冲车大铁椎打城，灯火下发，众皆惊走。大元帅遣将于夹口，用大刀不许其众退，焚死者臭不可闻。……十七日，攻内城，张琼、范臻率国兵（金兵）自子城用强弩射之，死者甚众。”十二月，蒙古军退。夹口，《南迁录》称“夹城口”，是以知复道称甬道城，又称夹城，当因其两城壁之间夹有甬道，亦即今日所谓的夹道。这次战斗，其惨烈状况又有甚于前次。十四世纪初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史集》载：“塔乞忽亦勒即鸡年（1213年）春三月，成吉思汗驻扎在上述中都城境内。阿勒坛汗（金帝）就在这座城里。”此事，《金史》不载，《元史·太祖纪》载：成吉思汗“八年（1213年）七月，帝进至怀来。九年（1214年）春三月，驻蹕中都北郊”。其间，金至宁元年（1213年）八月，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本名胡沙虎）弑卫绍王而立丰王完颜珣，改元贞佑，是为金宣宗。蒙古军因久围中都城不下，乃分兵三路略山东诸州。贞佑二年（1214年），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复围中都，最终接受和议。金朝“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仍遣其丞相完颜福兴送帝（成

《大金国志》卷二十二《东海郡侯上》。又，《南迁录》云：“各分守兵四千人，内城二万人。”

《大金国志》卷二十三《东海郡侯下》。

《大金国志》卷二十三《东海郡侯下》。

《大金国志》卷二十三《东海郡侯下》。

吉思汗)出居庸”。关于此事,《史集》称“成吉思汗对他们的俯首听命很满意,便回去了。”《元史·太祖纪》载:“诸将请乘胜破燕,帝不从。”观此,读史者不禁要问,成吉思汗自起兵以来,攻城陷阵,所向披靡,何独对金中都城宽怀如此呢?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样。据《史集》记载:“当时蒙古军不习惯于天气热,全都病倒了。”《大金国志·宣宗皇帝纪上》称“大军(蒙古军)即围燕京,不能下。”因此,缺乏粮饷、兵老人疲、士卒疾疫,才是成吉思汗接受和议而退兵的真正原因。以成吉思汗当世之雄尚不能攻克金中都,可见其城池坚固。特别是内城的子城,确实发挥了作用,致使蒙古军几次攻入城内,又不得不被迫撤出。

(二) 海陵王展筑燕京城,立中都

金熙宗皇统九年(1149年)十二月,平章政事完颜亮(宗幹之子)与驸马唐括辩、左丞相秉德等弑熙宗于寝殿。完颜亮篡取帝位,改元天德,是为海陵炀王。海陵王弑熙宗而自立为帝,为镇压宗室贵族的反抗,大杀宗室诸王,其中包括太宗子孙70余人、宗翰子孙30余人、诸宗室50余人。虽然如此,他在上京仍不能高枕无忧,时时要提防宗室贵族发动宫廷政变;加之,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偏在一隅,“供馈困于转输,使命苦于驿顿”,于是不顾女真旧贵族按答海(宗雄次子)等人反对,决意迁都燕京。关于海陵王迁都事,还有一个插曲:一日宴会间,海陵王问右丞相梁汉臣:“朕栽莲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梁汉臣答曰:“自古江南为桔,江北为枳,非种者不能,盖地势然也。上都地寒,惟燕京地暖,可栽莲。”于是海陵王诏曰:“依卿所请,择日而迁。”当然,迁都事决非如此简单,但以海陵王之智辩和专断,其藏深谋于胸而借题发挥,亦有可能。

在海陵王迁都前,原在燕京的辽宫室仍基本保存。如《金史·礼志九》载:皇统元年(1141年)正月,金熙宗受尊号于燕京,“十日,帝服袞冕御元和殿,宗幹率百僚恭奉册礼。……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丽、夏国使。十二日,恭谢(太)祖庙,还御宣和门,大赦,改元”。元和殿即原辽南京皇宫内正殿,宣和门即原辽南京皇城东门,皆辽代旧物。

《金史·熙宗纪》又载:皇统元年(1141年)三月,金熙宗在燕京“宴群臣于瑶池殿”。此亦即原辽南京城南的瑶池殿。《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金中都“皇统元年(1141年)有元和殿、宣和门”。此并非说殿、门是熙宗皇统元年(1141年)所建,而是反映金初继承辽南京宫室的情况。《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世宗谓宰臣曰:“宫殿制度,苟务华饰,必不坚固。今仁政殿辽时所建,全无华饰,但见它处岁岁修完,惟此殿如旧,以此见虚华无实者,不能经久也。”据此可知,即使在海陵王营建中都城以后,原辽南京宫殿也有部分得以保留。

天德三年(1151年)三月壬辰,海陵王“诏广燕城,建宫室”。四月丙午,海陵王“诏迁都燕京”。数日之后,有司呈上燕城宫室制度图样。其先,

《元史》卷一《太祖纪》。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

《大金国志》卷十三《海陵炀王纪上》。

《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海陵王曾遣画工至原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绘其“宫室制度，至于阔狭修短，曲画其数”。燕城宫室制度实即仿原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制度。同年闰四月，海陵王将尚书右丞张浩调选燕京，主持营建新都事宜。参与其事的还有燕京留守刘箐、大名尹卢彦伦、工部员外郎韩锡，以及苏保衡、翟永固、李石等，由张浩总其事。张浩取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潭园材木，营建宫室。其间，秘书少监张仲轲为中伤张浩，奏言潭园材木低劣不可用。海陵王揣度仲轲受真定人士请托，遂免其官。营建新都工程自天德三年（1151年）至贞元元年（1153年），历时三年。因工程浩大，工期又急，从役的百余万工匠、民夫挣扎劳作，倒毙者不计其数。《金史·张浩传》载：“既而暑月，工役多疾疫。诏发燕京五百里内医者，使治疗，官给药物，全活多者与官，其次给赏。”这是由于役夫疾疫、倒毙严重影响工程进展，故海陵王以赏官的办法募医者给民夫治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营造新都的工匠、民夫的悲惨命运。贞元元年（1153年）三月辛亥，海陵王至燕京。乙卯，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府曰大兴，汴京为南京，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为北京。为防止留居上京的女真贵族作乱，正隆二年（1157年）海陵王“命吏部郎中萧彦良尽毁上京宫殿、宗庙、诸大族邸第及储庆寺，夷其址，耕垦之”。由此，更加巩固了金中都作为金朝政治中心的地位。

金朝营建中都的工程比较仓促，工程质量势必难保，在竣工后的第7年，中都城垣即出现崩坏，“正隆四年（1159年）二月丁未，修中都城”。中都城的维修由京师防城军中的牢城军承担，充当牢城军的都是犯过盗窃罪的人，处罚后使其为牢城军“以充防筑之役”。

中都城地处今华北平原北端，据此可分控南北，对于统治黄河以北大部的金朝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正隆六年（1161年），金东京留守、曹国公完颜雍乘海陵王南伐南宋之机，据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改元大定，是为金世宗。当时，其属下对于首先占领上京，还是首先占领中都，曾有歧议。李石奏曰：“正隆（海陵王）远在江淮，寇盗蜂起，万姓引领东向，宜因此时直赴中都，据腹心以号令天下，万世之业也。”张玄素亦力主其议。金世宗遂纳李石、张玄素之议，“十一月辛巳，以如中都期日诏群臣”，天下风从，海陵王陷入进退失据的困境。同月乙未，金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弑海陵王于帐中。十二月，金世宗至中都，牢牢控制了金朝政权。金中都的地位远非辽南京可比。辽南京之于辽朝，只不过是五京之一，且辽帝以四时捺钵的方式统治全土，政治中心本无定处。而金中都“有宫阙井邑之繁丽，仓府武库之充实，百官家属皆处其内，非同昔日之陪京也”。因此，如果说辽南京时期是古代北京向都城的过渡，那么金中都时期它已成为中国北部的政治中心，从城市的职能上来看，已具有都城的特征。

《金虏图经》。

《金史》卷二十四《地理志上》。

《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金史》卷四十四《兵志》。

《金史》卷八十六《李石传》。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金史》卷九十六《梁襄传》。

（三）金中都城郭和城门

海陵营建中都，主要是扩展燕京旧城和建造宫室。关于扩展的规模，史文简略，后世多有歧说。清缪荃孙《艺风堂文集》“金中都考”据《金史·蔡珪传》和《刘頔传》认为只扩展了旧城东、南两面。日本学者那波利贞认为只扩展了东、北两面，奉宽认为“海陵广燕城而都之，仅展东面约三里，其南、西、北三面悉仍旧贯”，周肇祥则认为必不止扩展东、南二面，而是四面皆有扩展，惟北面所展无多。近年学者据海陵王迁都诏书和《金史·蔡珪传》的记载，可以肯定海陵王营建中都城是将旧城城郭向东、西、南三方向扩展约三里，并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海陵王迁都诏曰：“广阡陌以展西、南之城”，是展其西、南两面城郭。《金史·蔡珪传》又载：“初，两燕王墓旧在中都城外，海陵广京城围，墓在东城内。前尝有盗发其墓，大定九年（1169年）诏改葬于城外。”此二墓笔者在述魏晋蓟城时已经提及，即酈道元《水经·水注》中所云蓟城东南的两座燕王陵。据此，海陵王营建中都城系扩展旧燕京城东、西、南三面城郭，当无疑问。迁都诏之所以只云“展西、南之城”，大约当初是如此规划。扩展东面城垣，可能是施工中根据实际情况所做的更动。海陵王营建中都城之所以着重要“展西、南之城”，还别有一层深意。辽南京（燕京）城以西是发源于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的洗马沟水（今莲花河）。洗马沟水发源于西湖，东流注于辽南京西城壕，沿城壕南流东转，复自辽南京南门外东南流，注入水（今北京凉水河）。中国古代有引水贯穿都城以象征天汉之说，例如秦始皇“筑咸阳宫，端门四达，以象紫宫；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又如，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金水河，都是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城市。拓展辽南京西、南城后，适将洗马沟入原西城壕并由南门外流注水的这一段河道括入城内，而成河水贯都之天汉之象，在皇城南门外架龙津桥又成牵牛之象，从而更加突出皇帝贵为天子的神权地位。括入城内的这段河道成为金中都的金水河，该河自龙津桥向东南流，在中都城东南隅经水关穿城而出。1990年9月在今北京右安门外以西的玉林小区园林局宿舍楼工程基地发现了这处水关遗址。该水关处于中都景风门（南东门）之西侧城墙下，呈南北长方形，城内入水口处呈喇叭口。水关以石板铺底，石板下衬有粗大方横木，方横木下又有成排地钉和横方木用榫卯相接。入水口处石板用大铁钉和方横木固定，石板之间则用银锭铁固定，因此整体结构非常坚固。

关于金中都城垣的位置，前人虽然据文献多有考证，但由于史文简略，最终还要依靠实地考察方能解决。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人注意到北京郊野的旧城遗迹。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云：“京城外土壟周遭，上多茂树，下有沟流，或断或连，延亘不绝，此即金、元故城之遗迹也。”后人著作中也

那波利贞：《辽金南京燕京故城疆域考》，《中和月刊》第3卷第1期。

奉宽：《燕京故城考》，《燕京学报》第5期。

周肇祥：《辽金京城考》，《中和月刊》第2卷第11期。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六十二。

《三辅黄图》卷一“咸阳故城”。

牵牛，星宿名，又称河鼓，在天汉之南，象天军之鼓。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信息》，1991年第1期。

一再提及今北京丰台区凤凰咀土城遗址和白云观西土城台，惜均未能做深入考察。

1958年，北京大学阎文儒先生对金中都遗址进行了考察。1965年至196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又对金中都城的四至进行发掘和勘测。兹简述其发现如下：

金中都的西垣。金中都的西城墙目前还有很多遗迹，分布在今北京广安门外的马连道仓库、蝎子门、高楼村、凤凰咀村一带。城墙的北端在军事博物馆南的黄亭子，南端在凤凰咀村。北京右安门外的凤凰咀村，因有古代遗留的土城遗址，历来被研究辽金燕京城故址的学者所重视。奉宽先生因持金中都仅扩展了辽南京（燕京）旧城东面，其他西、南、北三面仍其旧址的观点，而认为此处即金中都和辽南京城的西南角，且认为凤凰咀村即由辽南京大城南西门丹凤门而得名。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持金中都仅扩展了辽南京旧城东、北两面，其他西、南两面仍其旧址的观点，也认为凤凰咀村是金中都和辽南京城的西南角。经过考察，证明以上判断均属失误。凤凰咀村土城遗址是将辽南京城西、南两面城墙向外扩展以后的金中都城的西南角，辽南京旧城西南角在凤凰咀村东北数里之外，与此并无关系。1927年，那波利贞曾至凤凰咀古城遗址踏察。凤凰咀村在北京右安门外西南，当时古城遗址在一片农田之中，为西、南两面城墙的直角形交点，向北延伸5里左右，向东延伸1.5里左右。土城全部用粘土夯筑，高处有2丈左右，低处也不少于1.5丈。1958年，经过详细勘察，发现土城夯土每层为5~10厘米不等，夯土中含有唐代青、白瓷片，宋代钧瓷、定瓷片，黑釉缸残片，辽金时代的沟纹残砖等。自凤凰咀向北，有蝎子门一地，其处有高近6米，基底宽近18.5米，门口宽近30米的城门遗址。这个贯通东西的土城口，东对白纸坊大街。金中都西城墙经实测约有4530米。

金中都的南垣。在凤凰咀村以南不远，有一道自西东流的灌田渠水，应是金中都南护城河的遗迹，而金中都的南城墙则应在这道渠水之北。从凤凰咀土城遗址向东延伸，所经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地，也有连续不断的土丘形城墙遗迹。但从右安门大街以东，就没有遗迹可见了。然而，虽然金中都的东南角没有遗迹可寻，但只要从凤凰咀经万泉寺、石门村、霍道口、祖家庄、菜户营等地的土城遗址向东延伸，其与金中都东城墙（待下面详述）会合之点，必定是金中都城的东南角无疑。这一会合点就是今永定门火车站以南的四路通村。金中都南城墙经实测约有4750米。

金中都的东垣。四路通村以北是今永定门火车站，过去这里曾有一道南北方向的土岭，称窑岗子，至今火车站北也还有一道百余米长的土岭。建火车站时，曾在窑岗子内外发掘出几百座汉代及辽代墓葬。自窑岗子向北是陶然亭公园，再北的地方称窑台，从地名可知这里过去曾有高出周围平地的土丘。以上土岭、土丘，都应是金中都东城墙的遗迹。由窑台向北是黑窑厂胡同，街道西边还存在着较高的台地。由此再北，则为位于今北京宣武区虎坊桥以北的梁家花园。梁家花园也是被研究辽金燕京城故址的学者普遍注意的地方。据明人刘定之《呆斋集》记载：梁氏园外有废城，称萧太后城。当地人常在这里取土，或掘作墓地。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也记载：梁家花园在废城边，城东有渠。《光绪顺天府志》也记载：虎坊桥下旧有枯沟。这条梁家花园废城东的渠和枯沟应当是金中都的东护城河。金中都东城墙的南端在四路通村，北端则在依此一线向北延伸与金中都北城墙会合的宣武门内翠花

街。金中都东城墙经实测约有 4510 米。

金中都的北垣。金中都的北城墙也就是唐幽州城和辽南京旧城的北城墙旧址，没有什么改变。原在白云观北有一段古土城遗迹，1958 年踏勘时已经无存。从白云观向西约 1 公里，有会城门村。会城门是金中都北城偏西的城门，今城门虽早已不存，但名称还保留下来，是确定金中都北城墙位置的重要依据。自会城门村再向西，至黄亭子，金中都北城墙向西延伸到这里和西城墙北端相接。黄亭子是金中都城的西北角。金中都北城墙经实测约 4900 米。

将以上测量所得的四面城墙长度相加，共 18690 米，合今 37 里有余。元朝初年，在金中都城东北另筑元大都城（即今北京城），而称金中都旧城为南城。明灭元朝以后，据《明太祖实录》洪武元年（1368 年）命叶国珍测量大都南城（即金中都旧城）周围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合 35.5 里），亦近今 37 里之数，与以上测量的数字基本相符。由此可见，上述推断的金中都城墙位置，大致是正确的。关于扩建后的金中都城的四周长度，《金史·地理志》不见记载。《大金国志》中说金中都城周围七十五里，后世学者认为可能“七”为“三”字之讹，或系传闻不确之辞。但也有人认为，七十五里之数是将金中都大城、皇城和金初宗翰在辽内城四角增筑的四座小城加在一起的总长度。这种推测颇有道理。按《大金国志》的记载，金中都皇城周围九里有余，而宗望所筑四小城各为三里，依此共为二十一里。辽南京旧城周围三十六里，每面九里，金代展筑其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推三里，则南、北两面各为十五里，东、西两面各为十二里，合计五十四里。如将大城五十四里之数与皇城、四小城之二十一里相加，则正是七十五里。由此又可知，扩建后的金中都城，按当时的长度单位应是周围五十四里，约合今 37 里。

金中都的城门，史籍记载亦有不同。《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中都“城门十三，东曰施仁、曰宣曜、曰阳春，南曰景风、曰丰宜（又称宜照）、曰端礼，西曰丽泽、曰颢华、曰彰义，北曰会城、曰通玄（后又称清夷，以厌胜蒙古）、曰崇智、曰光泰。”《大金国志·燕京制度》载：中都“城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其正门两傍又设两门。正东曰宣曜、阳春、施仁，正西曰颢华、丽泽，彰义，正南曰丰宜、景风、端礼，正北曰通玄，会城、崇智，此四城十二门也。”以上记载，一为十三门，一为十二门，其中十二门名称相同，惟《金史·地理志上》比《大金国志·燕京制度》多记一光泰门。对此，历来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金中都有光泰门当无疑义，金元诗人多言及之。如元房祺所编《河汾诸老诗集》卷八金曹之谦《北宫》诗云：“光泰门边避暑宫，翠华南去几年中。干戈浩荡人情变，池岛荒芜树影空。鱼藻有基埋宿草，广寒无殿貯清风。登临欲问前朝事，红日西沉碧水东。”又如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二十四《游琼华岛诗》之八云：“光泰门东日月躔，五云仙杖记当年。不烦细读江南赋，老树遗台倍黯然。”曹之谦是金朝遗老，与元好问为友，其诗所记是金亡以后中都的情景。王恽是元初人（1227—1304 年），其《游琼华岛诗》作于正统元年（1260 年），

见《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八月戊子，大将军徐达……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北平南城，周围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时旧基也。”又，据现在发表的数字，金中都北城墙约 4486 米，南城墙约 4065 米，东城墙约 4325 米，西城墙约 4087 米，总计约 33.9 里。此与上述数字亦相差不多。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160 页。

其时元朝尚未建都于燕，所记实为金亡以后中都情景。二诗中所谓的“北宫”“避暑宫”，即金中都太宁宫，其址在今北海公园一带。光泰门既与太宁宫相近，自当是在中都城的东北隅，即崇智门之东。虽然如此，《大金国志》记金中都有十二门也并无错误。《大金国志》是附宋之金人宇文懋昭所著，书成于宋端平元年（1234年），此年适及金亡。据考，《大金国志》原书纪、传、志皆止于海陵王之世。据此推断，海陵王之世金中都即十二门，无光泰门。光泰门当辟于海陵王以后，极可能是在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前后。因为此年位于中都城东北的太宁宫建成，可能为自中都前往太宁宫的便捷，故辟光泰门，金中都遂成十三门。但是，金末仍有称金中都十二门的记载。《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载：“崇庆元年（1212年），执中乞移屯南口（今北京昌平南口），或屯新庄，移文尚书省曰：‘大兵（蒙古军）来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为可忧。十二关、建春、万宁宫且不保。’”建春、万宁宫（即太宁宫）均为金中都郊外的离宫。所谓十二关，即喻指金中都而言，亦即金中都之十二城门。纥石烈执中此言，距金宣宗此后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只有三年，当反映金末金中都的情况。笔者认为，这并不足以否定金中都有十三城门。十二关之说，其原因或许有二：一、光泰门与一般城门不同，它位于自中都城至太宁宫的御道上，故平时不开，或即因此而习惯上仍称金中都十二门。二、卫绍王和宣宗初年，蒙古军屡次围困中都，金朝对中都城曾有修葺。《金史·张大节传》载：“大安三年（1211年），朝廷欲塞诸城门以为兵备，集三品官议于尚书省，岩叟（张大节之子）曰：‘塞门所以受兵，是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遣兵择将，背城疾战。’时议多之。”此塞门死守之议虽未实行，但金廷曾兴作工役却是事实。《金史·李英传》载：“大安三年（1211年），集三品以上官议兵事，英上疏曰：‘比来增筑城郭，修完楼橹，事势可知。’”可见在议事于尚书省前，中都城郭已有增筑。当时蒙古军兵临城下，郊外已成危地，金帝不可能再幸太宁宫；而在攻守之际，多一城门即是多一城防薄弱之处。笔者推度，所谓“比来增筑城郭”大概即包括塞光泰门，其后的“塞诸门以为兵备”之议或即受此启发而出。纥石烈执中乞移南口事在此后一年，故只言“十二关”。

金中都初有十二门，金世宗之世增辟为十三门，金末卫绍王之世复塞光泰门而为十二门。依《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中都城北有四门。今北京海淀区有会城门村一地，即金中都会城门遗址。据考，中都城北的四座城门，自西往东顺次为会城门、通玄门（原辽南京通天门）、崇智门（原辽南京拱辰门）、光泰门。会城门为北西门，光泰门为北东门，通玄门居中，崇智门居中偏东。城南有三门，顺次为端礼门（南西门）、丰宜门（正南门）、景风门（南东门）。城东有三门，顺次为施仁门（东北门）、宣曜门（正东门）、阳春门（东南门）。金中都西面三座城门，一般认为顺次为彰义门（西北门）颢华门（正西门）、丽泽门（西南门）。明《顺天府志·宛平县·山川》载：“百泉溪在宛平县西南十里，旧城丽泽关南，平地有泉三十余穴，东南流入大兴县境，通柳河村。”奉宽《燕京故城考》云：“百泉溪、丽泽关，现在名俱不彰，或即此地之莲花池也。”周肇祥《辽金京城考》则云：“丽泽关即丽泽门外之关厢，今之水头庄北，地多泉穴，疑即百泉溪。”莲花池在今北京广安门外，水头庄在今北京丰台区凤凰咀村西北，亦名东管头。

依奉宽所考，丽泽门当在北，为金中都西北门；若依周肇祥所考，丽泽门当在南，为金中都西南门。百泉溪，今人亦指为水头庄，故认为丽泽门当在南。然而，《金史·礼志一》载：“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西地，掘地汙之，为坛其中。”西位在正西，夕月坛既然在中都城正西而又位于彰义门西北，则彰义门当在夕月坛东南，亦即中都城西南。简而言之，若依《金史·礼志一》的记载，彰义门当在南，丽泽门当相应在北。同《志》又云：“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前已言之，施仁门为金中都东北门，其东南则正当阙之卯位（正东）。然而，明《顺天府志·大兴县·山川》引《北平图经志书》云：“洗马沟在旧城（即金中都城）南门外。其源有二：曰百泉溪、曰丽泽门泉，俱出城西平地，至南门外循旧湖而东流为洗马沟，下与新河水合。”注云：“以上并见《图经志书》、《元一统志》。在旧城南门外大兴县地。按本路所上图册引酈道元《水经》云：蓟南有大湖，其源二，俱出县西北平地。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燕旧池也。东流为洗马沟。”洗马沟即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河，其水自莲花池（古西湖）东流，注入燕京城西城壕，复侧城南门东注于水（今北京凉水河）。海陵王营建中都城时将洗马沟原注入西城壕的一段括入城内为金水河，故后世称其流出中都南门外的河道为洗马沟而有洗马沟出南门外之说。酈道元《水经·水注》原文云：“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流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即蓟城）西北平地，导源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两相对照。可以发现，北魏时以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为洗马沟正源，金中都将其北段括入城内而为金水河后，其出中都南门外的水道仍称洗马沟，但改以城西的百泉溪、丽泽门泉为正源。元、明人不解于此，竟强解中都南门外之湖为西湖以附会《水经注》。既然古西湖已成为金中都金水河的上源，那么至中都南门外而为洗马沟正源的百泉溪、丽泽门泉自当非今凤凰咀西北的水头庄而莫属。丽泽关在百泉溪北，丽泽门自当是金中都西南门。《金史·礼志一》记“夕月坛在彰义门西北”，当有误，“西北”当为“西南”之讹。因为，朝日坛与夕月坛互为东西，按史书惯例，其记东面朝日坛既然以中都东北门为参照，称朝日坛在中都“施仁门（东北门）外之东南”，其记西面夕月坛亦应以中都西北门为参照，而不应换以西南门，反称在西南门之西北。以《金史·礼制一》记朝日坛与夕月坛文字对照，“西北”显然为“西南”之讹。此外，史籍中有关彰义门、丽泽门的记载，亦可证其方位。《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载，纥石烈执中作乱，自通玄门外“分其军为三军，由彰义门入，自将一军由通玄门入”。通玄门为金中都正北门，彰义门当与其相近，为西北门。又，《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二月，丘处机初至燕，“二十二日至卢沟，京官士庶僧道郊迎。是日，由丽泽门入。”丘处机自西南来，丽泽门首当其途，自当入丽泽门。《元史·王磐传》又载，元世祖至元中，太常少卿王磐致仕，“皇太子赐宴圣安寺，公卿百官出送丽泽门外，缙绅以为荣”。圣安寺，《析津志》云：“在旧城（即金中都城），金皇统初赐名大延圣寺。大定三年（1163年）新堂成，崇五仞，广十筵，轮奂之美，为都城冠。七年（1167年）诏改寺之额为大圣安。”同书又云：“兴禅寺，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阁之西。”悯忠阁即悯忠寺（今北京宣武区法源寺）内之崇阁，是以知圣安寺当在悯忠寺之又西，即今北京宣武区南横街西口。王磐家于东平（治今山东东平），其自大都归家，当自广利桥（今北京卢沟

桥)渡卢沟河,至良乡,转涿州南去。其既赐宴圣安寺,自无北出城门复南趋广利桥之理,故所出丽泽门当即中都西南门无疑。

金中都的城门有瓮城。张棣《金虏图经》载:金中都“城之门十二,每一面分三门,一正两偏焉。其正门四旁皆又设两门,正门常不开,惟车驾出入,余悉由旁两门焉”。范成大出使金国,其《揽辔录》云:“过卢沟河三十五里至燕山城外燕宾馆(承安三年即公元1198年,更名恩华馆)。自馆行,柳堤缘城。过新石桥,中以杈子隔驰道。从左边过桥,入丰宜门,即外城门也。两边皆短墙,有两门东西出,通大路。有兵寨在墙外。”范成大所谓“两边皆短墙,有两门东西出”的建筑,即金中都丰宜门(正南门,在右安门外菜户营南)的瓮城。瓮城门有三座,一正两侧。正门与丰宜门相对,供帝王郊祀时出入,两侧门供百姓出入。金中都并非每面城垣正门都有瓮城,实际见于记载的只有丰宜门。但是,通玄门(正北门,在今真武庙南、白云观东北)与丰宜门南北相对,正在金中都城中轴线上,又是金帝往北郊遥祀岳镇海渎出入的城门,依理也应设有瓮城。因此,瓮城之设可能实际只限于丰宜、通玄二门。如此计算,金中都南北两面计有城门十二座(含六座瓮城门),东西两面计有六座,总计外郭有十八座城门。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进逼中都,城内外乱甚,老弱奔号,大兴府少尹张天和“奏请京城一十八门,仰随方隅,因其便道,自门以出”,纵百姓逃生。所谓一十八门,当即指外城门和瓮城门而言。金中都城门皆有门额,粉底墨书,系金礼部尚书王克所书。

前已言之,辽南京城壕上桥梁为木吊桥。金代,中都城壕上已架石桥。范成大《揽辔录》述其先过新石桥,然后入丰宜门,新石桥即丰宜门外城壕上的石桥。中都其他诸门外是否也是石桥,史籍不载,无从详知,但似乎并不止于丰宜一门。《南迁录》载:蒙古军迫近中都,“大兴尹乌陵用章分命京畿诸将毁在城桥梁,瓦石悉运入四城,往来以船渡,运不及者沉之于水”。金人运瓦石入城,是以之作为炮石。1956年在今北京白云观以西的护城河北岸(即金中都西北部)曾发现一堆石雷,均用青石打成,直径11.3厘米至18.5厘米,最小的重2.5公斤左右,大的超过10公斤,此即当时用炮(抛石机)发射的弹丸。这种石雷,过去在陶然亭(即金中都东南部)、凤凰咀(即金中都西南部)均有发现,当是金末与蒙古军作战时的遗存物。在战争中,毁建筑物以作炮石,并不始于金人。《三朝北盟会编》卷六十六载: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人围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十一月九日,诏毁艮岳(宋徽宗所建假山,在开封城内东北隅)为炮石”,即属此类。金人毁诸城门桥梁,一来便于防守,二来可补充炮石不足。

《大金国志·东海郡侯纪下》又载:崇庆元年(1212年)十一月初一日,蒙古军复围困中都,“攻顺阳门、南顺门、四会门”。南顺门当即丰宜门。

《大金国志·宣宗皇帝纪上》载:贞佑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二十八日,驾兴,(大兴尹兼留守完颜)昌送于南顺门外十里”。宣宗自中都南经涿州、易州,其所出南顺门自当丰宜门无疑。顺阳门、四会门当亦属中都外城门的俗称或别称,然史文简略,皆不知所指。

张师颜:《南迁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16页。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白云观遗址》,《文物》1963年第3期。

（四）金中都皇城和宫城

金中都皇城大致即辽南京皇城，亦即唐幽州子城旧址。辽代，南京皇城傍大城西南隅。金朝营建中都，将外城郭东、西、南三面各向外扩展约3里，故皇城近乎位于全城中部，突出天子居天下之中的地位，基本符合封建礼制。路振《乘轺录》云：“内城（即辽南京皇城）幅员五里”。《大金国志·燕京制度》称“（皇）城之四围凡九里三十步。”是以知金中都皇城规模较辽南京皇城略有扩展，主要是南部略有延伸。

《大金国志·燕京制度》、《金史·地理志上》、范成大《揽辔录》、张棣《金虏图经》、周焯《北辕录》对金中都皇城、宫城均有记述，兹综合诸书内容，略述如下。

金中都皇城开四门，正南曰宣阳门，阎文儒先生考定其址在菜户营以北的鸭子桥之南。在宣阳门与中都南门丰宜门之间，横跨金水河（原洗马沟括入城内段）有一座石桥，色白如玉，雕刻极精，即龙津桥。《北辕录》云：龙津桥“通用夺玉石扶栏，上琢为婴儿状，极工巧”。桥上分三道，正中是专供皇帝出入的御道，用栏楯与两侧的便道隔开。宣阳门因系皇城正门，故上建重楼，并设三门。中门绘龙，专供皇帝出入，两旁门绘凤，分双、单日只开一门，供大臣、官员和一般人出入。三座门上皆饰有镀金铜钉。这些都是仿自北宋东京汴梁大内的规制，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载：“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门皆金钉朱漆，壁皆砖石间甃，镌镂龙凤飞云之状。”中都皇城宣阳门正与此相仿。宣阳门内，东侧有文楼，西侧有武楼。自文楼东转是来宁馆，自武楼西转是会同馆。宋使出使金国，多居会同馆。宣阳门内正北，有两长廊庑东西相对，即千步廊。《北辕录》云：“御廊东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间。”东、西千步廊上又都开有偏门。范成大《揽辔录》和《金史·地理志上》称“廊分三节，每节一门”，计有三偏门。《金虏图经》和《大金国志》称“廊之半各有偏门”，只有一偏门。不知孰是。自东廊偏门东出为太庙，自西廊偏门西出为尚书省。千步廊之脊覆以青琉璃瓦，宣阳门则纯以青琉璃瓦覆之，望去葱然翠色，极为华丽。宣阳门内正北，亦即东、西千步廊之间是御道（又称驰道）。御道两旁有沟，沟上种植绿柳。御道的北端接端门，系李石监造的。端门阔十一间，其北即宫门应天门（又称应天楼、承天门），亦十一间。应天门原称通天门，金世宗大定五年（1165年）改，其址约在今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西街与滨河西路交叉处稍南。应天门有五门，除正门外，两旁各有两偏门，皆漆朱色，上饰金钉。《金史·海陵诸子传》载：“贞元元年（1153年），诏朝官、京官五品以下奉引（太子光英）自通天门入，居于东宫。”此通天门即应天门。应天门上两侧各有楼观，高八丈，如左右升龙之制。应天五门东西两侧，相距里许，又各设一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左、右掖门上各有一楼，重檐三层，与应天门上东、西夹楼相接，飞檐钩连，金碧辉煌。应天门大约即相当清北京故宫的午门。金世宗大定六年（1166年）定制，外国使臣初见、朝辞于左（东）掖门出入，朝贺、赐宴则由应天门东偏门出入。东偏门比左掖门更接近皇帝专用的应天门正门，赐自东偏门出入盖以示格外恩宠之意。金朝颁布大赦亦在应天门。大定七年（1167年）正月十四日，金世宗以受尊号大庆而御应天门颁赦。先一

日，有司设御座于应天门上，少府监设鸡竿于楼下之左，竿上置大盘，盘中置一金鸡，口衔金书“大赦天下”四字绛幡。盘四面各安一大铁环，下系四根朱红绳索，以备四伎人攀登。又于应天门上御座前栏干处置一木偶，即捧制书的木鹤仙人，以红绳牵引，另一端系于轳轳上。又设承鹤画台于楼下正中。届日，世宗由左翔龙门踏道登应天门。在鼓声中，鸡竿立起，四伎人争缘绳上竿，取下卷放在金鸡口中的绛幡向四周展示，三呼万岁。应天门上乘鹤仙人捧制书循绳下至画台，閤使取下制书置于案，然后宣读，犯人脱枷。范成大《揽辔录》云：应天门“端门（即正门）之内有左、右翔龙门，日华、月华门”，其北即前殿大安殿。日华、月华门当辟在殿廷东、西两面，惟左、右翔龙门的位置需加以研究。前已言之，金中都宫室规制乃袭自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宋史·地理志一》载：东京宫城正南门曰乾元门（相当于金中都之应天门），“乾元门内，正南门曰大庆，东、西横门（即侧门）曰左、右升龙”，正南门（大庆门）内正殿曰大庆”。据此推理，金中都宫城内之左、右翔龙门当是外朝侧门，在外朝门前，且左、右翔龙门之间应当夹有大安门。考之《金史·礼志五》，其记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上睿宗（世宗之父）尊谥大典过程云：“……中书门下侍郎各导于册宝之前，太尉居其后，至大安门外，太尉以次跪奉册宝于玉辂中，……俟册宝出大安门，太常即跪奏称：‘太常卿臣某言，礼毕。’……前导皇帝升自东阶，登歌乐作，还大安殿后幄次。”是以知大安殿前果有大安门。范成大身为使臣，入觐金帝，走马观花，偶有记载不实，亦不足怪。大安门系宫城内外朝门，犹如清北京故宫之太和门，其门内以北即大内正殿大安殿。左、右翔龙门在大安门外两侧，东西相对。

金中都皇城东门，亦即宫城东门曰宣华，又称东华门。《金史·纥石烈执中传》载：至宁元年（1213年），金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谋弑卫绍王，率军，“至东华门，使呼门者亲军百户冬儿、五十户蒲察六斤，皆不应……命积薪焚东华门，立梯登城。”其所攻之东华门即宣华门。宣华门之东即悯忠寺，每逢举行佛事都要从宣华门下经过。《金史》记载，海陵王和章宗皆曾御宣华门观看迎佛法会。

金中都皇城西门曰玉华门。由于皇城内宫城西侧有同乐园（又称西园），故关于玉华门特需一辨。《金虏图经》载：“西出玉华门，同乐园、瑶池、蓬瀛庄、杏林尽在于是。”阎文儒先生考证，同乐园遗址在今北京宣武区小红庙村一带，其位置在金中都皇城内西侧，宫城西墙外。据此，《金虏图经》所谓玉华门，当为宫城西门。但《大金国志·燕京制度》又载：“内城（即皇城）正西曰玉华。”据此，金中都皇城西门亦曰玉华。是以知金中都皇城、宫城各有一玉华门，皇城玉华门在宫城玉华门之西。此二玉华门又皆可称西华门，故同乐园中太液池又称西华潭。

金中都皇城北门曰拱辰门，又称后朝门，亦即辽南京皇城之子北门。《金史·五行志》载：“崇庆元年（1212年）七月辛未未时，有风从东来，吹帛一段高数十丈，宛转如龙，坠于拱辰门内。”即坠于皇城北门内。（见图四）

据阎文儒先生考定，金中都皇城四至：东垣在今北京宣武区南线阁稍东老君地之南北一线，亦即辽南京皇城东垣。其东门宣华门即辽南京东门宣和门，亦即唐幽州城子城东门。西垣在白云观西土城台南至小红庙村之南北一

线，亦即辽南京外城西垣。南垣在鸭子桥稍南之东西一线。北垣在白菜籽村稍北之东西一线，老君地为其东北角。以上四面长度总计约 5000 米，与“九里三十步”之数大致相符。

（五）金中都宫室

金中都皇宫内宫殿林立，“瓦悉覆以琉璃，日色辉映，楼观翬飞，图画莫克摹写”，其盛况远非昔日辽南京宫殿可比。《大金国志·燕京制度》称金中都皇宫中“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居之。”

金中都皇宫内的正殿是大安殿，在大安门内，即所谓皇帝正位，其地位相当于清北京故宫中的太和殿。金帝在此举行各种盛典。如金中都建成后，海陵王遣大宗正事京及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京奉迁太祖、太宗等祖宗梓宫，“贞元三年（1155年）十月己卯，梓宫至中都，以大安殿为丕承殿，安置”。金帝行郊祀前的斋戒亦在大安殿，“前致斋一日，尚舍设御座于大安殿，当中南向。设东西房于御座之侧，设御幄于室内，施帘于楹下”。至日，“皇帝即御座，东向坐”。仪礼毕，“皇帝降座，入室，群臣皆退。诸执事官皆宿于正寝，治事如故”。金朝皇位之争屡见不鲜，很少父子相及，往往从兄弟、叔侄相代。例如，海陵王与熙宗是从兄弟，世宗与海陵王是从兄弟，章宗乃世宗之孙，卫绍王乃章宗叔父，等等。因此，金帝即位，往往追封其父、母为帝、后，并追谥尊号。如大定三年（1163年），世宗追册其父宗尧曰简肃皇帝，庙号睿宗，其嫡母蒲察氏为钦慈皇后，其生母李氏为贞懿皇后，“九月二十二日，奏告太庙。二十八日，大安殿置大乐，阅习。前一日，自衍庆宫奉迎册宝，于大安殿安置”。至日，仪式便在大安殿进行。大定十八年（1178年）增上熙宗谥号曰弘基纘武庄靖孝成皇帝，加谥其后悼皇后曰悼平皇后，仪式也是在大安殿举行。至于皇帝受尊号册宝及皇太子受册仪，更是要在大安殿举行。例如，大定七年（1167年）世宗受尊号册宝，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庙、社稷。前二日，百官习仪于大安殿庭（即现代所谓排练）。兵部率部属设仪仗于大安门内外。前一日，宣徽院率仪鸾司设册宝坛于大安殿中间，设御榻于坛上，又设册宝幄次于大安殿门外，设皇太子幕次于殿东廊，设群官次于大安门外。至日，仪式便在大安殿举行。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册其子允恭为皇太子，其仪式亦在大安殿举行，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庙。前一日，宣徽院率仪鸾司设御座于大安殿当中，设皇太子次于门外之东，又设册宝幄次于殿后东厢，又设受册位于殿庭横阶之南。自制造所导引册宝床由宣华门（皇城东门）入，赴册宝幄次安置。至日，捧舁册宝官自殿后东厢奉册宝出幄次，自大安殿东阶下，置于殿庭皇太子受册位。皇太子和东宫官员立于大安门外。然后，皇帝至大安

周輝：《北轅錄》，載陶宗儀：《說郛》卷五十六。

《金史》卷五《海陵王紀》。

《金史》卷二十八《禮志一》。

《金史》卷三十二《禮志五》。

《金史》卷三十六《禮志九》。

殿即御座。典赞仪引皇太子入大安门，至受册位，仪式从始至终亦在大安殿进行。不同的是，皇帝受尊号仪是在大安殿内，皇太子受册仪却是在大安殿庭院中，反映着严格的等级观念。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皇太子允恭卒。“二十七年（1187年）三月，世宗御大安殿，授皇太孙（即章宗，允恭之子）册，赦中外”，其仪式过程如册皇太子仪。此外，金帝元日、圣诞上寿仪式亦在大安殿举行。大定六年（1166年）正月，世宗“御大安殿，受皇太子以下百官及外国使贺，赐宴，文武五品以上侍坐者有定员，为常制”。这是贺正旦上寿仪。另外，女真族本不知纪年，皆以草一青为一岁。宋金往来以后，女真族渐受汉文化影响，金宗室贵族和诸大臣皆择佳日为生辰，“粘罕（宗翰）以正旦，悟室（完颜希尹）以元夕，乌拽马以上巳，其他如重五、七夕、重九、中秋、中下元、四月八日（佛诞），皆然”。金熙宗“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宗峻）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并定为万寿节。海陵王定生辰为正月十六，世宗定生辰为三月初一（万春节）。金章宗生于大定八年（1168年）七月丙戌（二十七日），又定生辰为九月初一（天寿节），一年庆二次圣诞，皆如此类。自海陵王以下，贺生辰仪式亦在大安殿。如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九月甲子朔，天寿节，御大安殿，受亲王百官及宋、高丽、夏使朝贺”。金朝自太宗以下，除在宗室斗争中篡位如海陵王、金世宗外，其余诸帝大都是即位于先帝柩前，故少有在大安殿举行即位大典的。唯一例外的是金宣宗，因纥石烈执中弑卫绍王而立宣宗，故宣宗自不便即位于卫绍王柩前，而是“即皇帝位于大安殿”。大安殿遗址在今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西街与滨河西路交叉点处以西不远的大土台，这里残存着兽头形瓦当和各种直纹残砖，是金中都城范围内最大的一处遗址。（见图五）

大安殿之北是常朝便殿仁政殿，乃辽南京旧殿。金帝平日在此上朝，召见群臣和外国使臣。大定八年（1168年）正月，世宗“册皇太子于大安殿，奉表于仁政殿”。在金中都大内中，仁政殿的地位仅次于大安殿。仁政殿正南有仁政门，犹如大安殿前有大安门。仁政门之南又有宣明门，犹如大安门外之应天门。应天门和宣明门把大安殿、仁政殿分为二个宫殿区。宣明门正对大安殿后门，二门之间的东、西两面有左（东）嘉会门、右（西）嘉会门，犹如清北京故宫保和殿后门与内廷乾清门之间有景运门（在东）、隆宗门（在西）一样。左、右嘉会门东西对峙，上皆有楼。金帝常在仁政殿会见宋、高丽、西夏使臣。范成大《揽辔录》记其出使金国，即谒见世宗于仁政殿，文云：“顷入宣明门，即常朝便殿门也。门内庭中，列卫士二百许人。……入仁政门，盖隔门也。至仁政殿下，大花毡可半庭，中团双凤。殿两旁各有朵殿，朵殿之上两高楼曰东、西上阁门，两旁悉有帘幕，中有甲士。东、西御

《金史》卷三十七《礼志十》。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金史》卷三十六《礼志九》。

洪皓：《松漠纪闻》上，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9页。

《金史》卷四《熙宗纪》。

《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金史》卷十四《宣宗纪》。

《金史》卷四十一《仪卫志上》。

廊循檐各列甲士。……（仁政殿内），遍地铺礼佛毯，可满一殿。”《北辕录》记宋淳熙四年（1177年，金大定十七年）宋使张子政等贺世宗生辰来到中都，亦朝贺于仁政殿，文云：“入左嘉会门……顷之，……先入宣明门，次仁政门隔门上，面北序立，门之里即殿庭。……殿九楹，前设露台，柱以文绣，两廊各三十间，中有钟鼓楼。”据以上所述，可知仁政殿规模九楹，殿庭铺双凤图案毛毡，可容数百人，外邦使臣及金国臣属朝见时即拜于此，左右两侧有朵殿，有钟鼓楼。仁政殿内遍地铺礼佛毯，殿柱饰以文绣。海陵王之世，宫殿地毯竟有绘龙纹图案的。把龙绘在地毯上任人践踏，这在封建帝王看来实属不能容忍，所以世宗大定七年（1167年）“命地衣用龙纹者罢之”，宫殿内外地毯皆用双凤或其他图案。仁政殿前露台是金帝拜日的处所。女真族与契丹族同样有拜日之俗。《金史·礼志二》载：“大定十五年（1175年），言事者谓今正旦并万春节，宜令有司定拜日之礼”，于是“先引臣僚于殿门外立，陪位立殿前班露台左右，皇帝于露台香案拜如上仪”。按金俗应东向拜，世宗“诏始从南向”。大定十八年（1178年）“世宗拜日于仁政殿，始行东向之礼。”拜日是女真族风俗，东向拜是女真族旧礼，南向拜则显示出这一风俗汉化的迹象。金世宗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但又深深留恋女真风俗，故有此改动。

东宫在大安殿东北，是皇太子居所，内有承华殿。金世宗之世，皇太子允恭居于此，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卒。东宫曾一度改为皇太后宫。金章宗（允恭之子）即位，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正月戊午，名皇太后宫曰仁寿”。同年“二月戊辰，更仁寿宫名隆庆”。皇太子允恭卒于世宗之先，不曾即皇帝位。章宗即位后始追尊其父允恭为皇帝，尊母徒单氏为皇后。因此，章宗所谓皇太后宫，实即其父母原所居之东宫。简而言之，章宗即位之初，东宫曾更名仁寿宫，复更名隆庆宫，成为皇太后的居所。金世宗对皇太子允恭宠爱异常；允恭卒后，又舍诸子而不立，独立允恭之子完颜璟为皇太孙，此皆缘于允恭母乌林答氏昭德（后改明德）皇后之故。乌林答氏聪慧过人，治家有方，甚有妇道。其献策世宗献珍宝于熙宗、海陵王，使全家避免迫害。熙宗后期酗酒滥杀，“独于世宗无间然”。海陵王以弑帝立，诛灭宗室，然“以世宗恭顺畏己，由是忌刻之心颇解”。海陵王淫乱，虽宗室骨肉不能免。世宗为济南尹，海陵王召乌林答氏赴中都。乌林答氏私度，如身死济南，海陵王必杀世宗，惟有奉诏，离开济南而死，才能免去世宗嫌疑。于是奉诏而行，至良乡寻隙自杀。世宗感念乌林答氏恩情，即帝位后，除追谥为昭德皇后、追赠其家三代官号、爵号外，终生不再立皇后。乌林答氏初葬宛平县土鲁原，大定十九年（1179年）改葬于大房山坤厚陵。二十九年（1189年）世宗卒后，祔葬于世宗兴陵。皇太子允恭是昭德皇后所生，故世宗视为掌上明珠。大定七年（1167年）十月辛酉，世宗命有司在东宫凉楼前增建殿位。参政孟浩谏曰：“皇太子义兼臣子，若所居与至尊宫室相侔，恐制度未宜，固宜示以俭德。”增建东宫宫殿之议虽未实行，但世宗对允恭宠爱之心已于此可见。《金史·世宗纪》中幸东宫的记载屡见不鲜（有时竟一月两幸），且大多在十一月，这是由于皇太子允恭生辰在十一月初八日的缘故。《金史·世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金史》卷八十九《孟浩传》。

纪补·显宗（允恭）纪》载：“大定二年（1162年）十一月庚子（初八），生辰，百官贺于承华殿。世宗赐以袞衣良马，赐宴于仁政殿，皇族、百官皆与。自后生辰，世宗或幸东宫，或宴内殿，岁以为常。”金章宗之世，东宫改为皇太后宫历时六年。明昌二年（1191年）孝懿皇太后（章宗母）卒于隆庆宫，五年（1194年）二月，尚书省奏曰：“礼官言孝懿皇后祥除已久，宜易隆庆宫为东宫，慈训殿为承华殿。”至此，东宫、承华殿才恢复旧称。范成大《揽辔录》载：“入左掖门，直左（东），循大安殿东廊后壁行，入敷德门，自侧门入，又东北行，直东有殿宇，门曰东宫，墙内亭观甚多。”范成大出使金国是金大定十年（1170年），当时皇太子允恭尚在世。范成大见到的东宫即允恭居所，“墙内亭观甚多”，想亦十分华丽。

承华殿是东宫正殿，皇太子生辰日在此受百官拜贺，平日则在此受业。

《金史·世纪补·显宗纪》载，皇太子允恭“专心学问，与诸儒臣讲议于承华殿”；又如，“大定十年（1170年）八月，帝（允恭）在承华殿经筵，皆此类。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六月庚申，允恭在受命守国期间崩于承华殿。承华殿又是皇太子寝殿。承华殿西侧有便殿，《金史·完颜匡传》载，大定十九年（1179年）皇太子允恭择完颜匡为其子授业，“召见于承华殿西便殿”。宫殿建筑多讲对称，承华殿既然有西便殿，亦应有东便殿。

大安殿、仁政殿为金中都宫城内的中路，均在自南而北的宣阳门、端门、应天门、宣明门、拱辰门之中轴线上。东宫在大安殿东北，属宫城内东路。在中路与东路之间有一南北长巷，自南而北有敷德门、会通门、承明门、昭庆门。敷德门在左掖门北。《北辕录》述云：“至（左）掖门下马，自敷德门，由会通、承明二门（西）入左嘉会门。”诸门位置可明了无疑。东路东宫之北是寿康宫，系皇太后居所。东宫与寿康宫之间东西亦有巷道，西端即会通门，东端为集禧门。自集禧门东出即内尚书省，又称内省。寿康宫正南并列三座宫门，正中曰集英（《金史·地理志上》为粹英）。寿康宫竣工似乎在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以后。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时携生母大氏同行，留嫡母徒单氏于上京。大氏虽为宗幹次室，但天德二年（1150年）海陵王俱尊大氏和徒单氏为皇太后。如果当时寿康宫已经建成，大氏当居寿康宫。大氏至中都数月即病卒，遗命海陵王迎嫡母徒单氏居中都。《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三年（1155年）十月丙子，皇太后至中都，居寿康宫。”可以确知此时寿康宫已经竣工。又，《金史·后妃传上》载，海陵王被弑，其后徒单氏归“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而不言寿康宫，明显可见大氏故宫决非寿康宫。据此可以推断，寿康宫竣工当在贞元元年（1153年）至贞元三年（1155年）之间。金世宗嫡母钦慈皇后蒲察氏卒于太宗天会十三年（1135年），生母贞懿皇后卒于海陵王正隆六年（1161年）。因此，世宗在位时寿康宫空虚，故范成大《揽辔录》称其为“故寿康殿（宫）”。

《金虏图经》载：“正中位曰皇帝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所居之地也。”正中位即宫城内的中路，故正位之西的十六位当在西路隔仁政殿与内省东西遥对的位置。所谓十六位，即十六殿位的省称，内居众多妃嫔。十六殿位可能大多是一幢幢小楼。《金史·后妃传上》载海陵王贵妃定哥事云：“贞元元年（1153年），封贵妃，大爱幸，许

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步从之。海陵嬖宠愈多，定哥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哥望见，号呼求去，诅骂海陵，海陵佯为不闻而去。”时定哥身为贵妃，所居楼当即十六殿位之一。十六殿位之侧又有神龙殿，正隆元年（1156年）三月二十七日皇太子光英生辰，海陵王“宴百官于神龙殿”，即在此处。因神龙殿与十六位同在一处，故史书中往往连称。《金史·五行志》载：“大定二年（1162年）闰二月辛卯，神龙殿、十六位焚，延及太和、厚德殿。”此事，《金史·世宗纪上》载：“辛卯，太和、厚德殿火。”放火焚烧宫殿的正是对金统治者不满的宫女称心等人。其初，世宗自东京至中都，诏放宫女还家。称心等人例在放遣之列，而竟不得还家，便乘夜“于十六位放火，延烧太和、神龙殿”。十六位宫女袁六娘告发，称心等人皆遇害。这场大火将十六位、神龙殿、太和殿、厚德殿几乎焚为废墟。大火起自十六位，从延烧情况来看，神龙殿距之最近，其次太和殿，又其次厚德殿。笔者推测，太和殿、厚德殿当在神龙殿、十六位西北。因为，十六位大火发生在大定二年（1162年）闰二月辛卯（二十四日），即公历4月12日，正当春末夏初的东南风季节。《金史·章宗纪四》载：“泰和四年（1204年）三月丁卯，日昏无光，大风毁宣阳门鸱尾。”泰和四年（1204年）三月丁卯（初四日），即公历4月5日。宣阳门是中都皇城南门，毁宣阳门鸱尾正应是东南季风。称心等纵火于十六位，火势遂乘风势向西北延及太和、厚德殿。十六位等宫殿被焚后，世宗本欲当即重建。但其时已入暑，方兴农作，且金宋间战事未停，御史中丞乙刺、左谏议大夫完颜守道谏乞权缓修葺，世宗始罢。大定四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和议，世宗诏曾参加营建中都的尚书右丞苏保衡监护完葺被焚诸殿。苏保衡遣少府监张仲愈取南京（今河南开封）宫殿图本以便参照，世宗谓苏保衡曰：“追仲愈还。民间将谓朕效正隆（指海陵王）华侈也。”诸宫殿修复后是否仍复旧称，史书无载。然而，据史文前后参校，仍可约略考知。《金虏图经》至少成于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以后，其记金中都大内“西曰十六位，乃妃嫔所居之地也”。又，《金史·后妃传下》载，章宗泰和二年（1202年）八月丁酉，以皇子生，“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据此可知，十六位、神龙殿在重建以后仍用旧称。关于太和殿，需作辨析。《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三年（1155年）十一月丙辰，燕百官于泰和殿。”《金史·世宗纪上》载：“大定二年（1162年）正月辛未，御太和殿。”时在被焚毁前二个月。《金史·章宗纪三》载：“承安四年（1199年）五月壬辰朔，命奏事于泰和殿。”泰和殿之名见于海陵王和章宗之世，太和殿则见于世宗之世。“泰和”与“太和”同音，不可能是中都大内的两座不同宫殿。世宗之太和殿当即海陵王之泰和殿的改名。因此，章宗时的泰和殿当即在旧太和殿废墟上重建起来的新殿，并恢复海陵王时的旧称。旧太和殿是世宗与臣下议事之所，重建后虽改名泰和殿，但职能仍旧，章宗仍命臣僚在此奏事。《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泰和殿，泰和二年（1202年）更名庆宁殿。”考《金史·章宗纪三》：“泰和二年（1202年）五月戊申，如泰和宫。壬戌，谕有司曰：‘金井捺钵不过二三日留，朕之所此，一凉厦足矣。……’甲子，更泰和宫曰庆宁，长乐川曰

《金史》卷八十二《海陵诸子传》。

《金史》卷八十四《孛忽温敦思忠传》附子乙迭传。

《金史》卷八十九《苏保衡传》。

云龙。”《金史·地理志上》西京路条载：“西京路德兴府龙门县（今河北赤城县西南龙关）有庆宁宫，行宫也，泰和五年（1205年）以提举兼龙门令。”是以知泰和宫并非中都泰和殿，《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记中都泰和殿更名庆宁殿一事实误。事实上，中都泰和殿在章宗泰和年间不曾改名，《金史·张行信传》载：“泰和四年（1204年）四月，召见于泰和殿，行信因言二事。”《金史·食货志三》载：“泰和七年（1207年）七月，上召（户部尚书高汝砺）议于“泰和殿。”皆可为证。厚德殿焚毁以后即不再见于记载。但是，《金史·礼志四》“皇后恭谢仪”载：皇后既受册，前一日，斋戒于别殿。至日，皇后御肩舆至车所，复降舆升车，车出元德东偏门，由左掖门出至太庙。仪礼毕，还内如来仪，车至元德东偏门，复降车升舆，取便路还内。元德殿（宫）是皇后居所，或即旧厚德殿重建之改名。世宗之世，元妃李氏居兴德宫，世宗以追思昭德皇后之故，不立中宫，只封李氏为元妃，位在众妃之上，下皇后一等，并且，大定未曾一度欲立李氏为皇后，只因恐动摇皇太子允恭（昭德皇后之子）的地位而罢。元妃李氏虽无皇后之名，实享皇后之荣。《金史·后妃传下》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上（世宗）如春水，次长春宫（在今河北开平）。戊子，元妃李氏以疾卒，还殡中都。“乙未，入自崇智门（中都北中偏东门）……殡于兴德宫西位别室。庚子，上至京师，幸兴德宫致奠。比葬，三致奠焉”。《金史·世宗纪下》又载：“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二月乙巳，以元妃李氏之丧，致祭兴德宫，过市肆不闻乐声，谓宰臣曰：‘岂以妃故禁之耶。细民日作而食，若禁之是废其生计也，其勿禁。朕前将诣兴德宫，有司请由蓊门，朕恐妨市民生业，特从他道。’”有人或因此而认为兴德宫不在皇城内，其实误解。世宗致祭兴德宫之所以会经过市肆，是因为其当时驻蹕于中都城外太宁宫（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的缘故。自太宁宫西南行，入光泰门，正是在唐幽州市基础上形成的中都城北市场，故世宗有恐妨百姓生计而改行他道入城之举。世宗未立皇后，兴德宫应即皇后居所，故李氏以元妃身份只能殡于兴德宫西位别宅。兴德宫与元德殿（宫）既然同为皇后居所，或即同为一地而前后异名。笔者推测，兴德宫或即元德殿（宫），亦即旧厚德殿。

大安殿之西有一泓池水，池西北岸高阁耸立称蓬莱阁，此处即蓬莱院。蓬莱阁下有观音寺，金帝常于此游娱或焚香拜佛。《南迁录》载：“上（章宗）幸蓬莱院，见所陈玉器及诸珍玩，视其篆识，多为宋朝宣和时物，惻然动色。”同书又载：宣宗自中都迁往南京之前，“诣蓬莱院观音寺烧香，过浮碧池”。即为此处。碧池即今北京广安门外青年湖，金代名鱼藻池，有鱼藻殿。《金史·张浩传》载：张浩营建中都有功，海陵王进其为平章政事，“赐宴于鱼藻池”。《金史·章宗纪三》载：“泰和三年（1203年）五月壬申，以重五，拜天，射柳，上三发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鱼藻殿。”即为其地。鱼藻殿建于海陵王贞元元年（1153年）。《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鱼藻池、瑶池殿位，贞元元年（1153年）建。”瑶池殿在宫城西门外同乐园（下详），有人据此便以为鱼藻池即同乐园，实为误解。鱼藻殿在宫城内，属中都大内的一部分，瑶池殿在大内之西的同乐园内，属苑囿中的建筑，《金史·海陵王纪》只载“贞元元年（1153年）瑶池殿成”，而不载鱼藻殿，即此之故。鱼藻池非同乐园，鱼藻殿与瑶池殿更非一殿。

张棣《金虏图经》称金中都大内“内殿凡九重，殿三十有六”。今可推考而得者只是极少部分，尚有大部分宫殿史籍阙载，或只知其名而不知方位。

宋使出使金国，只能循一定路线出入金中都大内，记载甚多阙略，更不足怪。遍览《金史》和有关史籍，金中都大内宫室可知者还有薰风殿，《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二载：“戊寅（正隆三年，公元1158年）夏五月，（海陵王）亮御薰风殿宣吏部尚书李通、翰林承旨翟永固、宣徽使敬嗣晖、翰林学士韩汝嘉四子”，问伐宋事。该殿在《金史·翟永固传》中称内殿，其为中都大内宫室无疑。又有贞元殿，大定元年（1161年）世宗初至中都，“十二月己未，御贞元殿，受群臣朝”。“大定二年（1162年）四月辛巳，宴夏使贞元殿。”但在此后贞元殿遂不见记载，或许世宗恶“贞元”曾为海陵王年号而将该殿改命他名。又有睿思殿，“大定十三年（1173年）四月乙亥，上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时诸皇子皆在侍，世宗欲使子弟不忘女真旧俗，故有是举。又有垂拱殿，“大定十四年（1174年）四月乙亥，上御垂拱殿，顾谓皇太子及亲王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弟……汝等当以朕言常铭于心。’”又有广仁殿，“大定十六年（1176年）三月戊午，上御广仁殿，皇太子、亲王皆侍膳”。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正月壬午，诏百官及御史大夫崇肃等十四人“同对于广仁殿”。又有香阁，“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十二月甲申，上退朝，御香阁，左谏议大夫黄久约言递送荔支非是。”香阁又称御阁、后阁，可能是仁政殿内的暖阁。又有庆和殿，“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三月丁酉朔，万春节（世宗生辰），御庆和殿受群臣朝，复宴于神龙殿。”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立完颜璟（允恭之子）为皇太孙，完颜璟“称谢于庆和殿”。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正月辛巳，召御史大夫崇肃等十四人“同对于庆和殿”。庆和殿可能与仁政殿、广仁殿同属便殿一类。金帝还常在此设宴，皇太子允恭长女邺国公主下嫁乌古论谊，“赐宴庆和殿”；世宗第十四女下嫁纥石烈克宁之子诸神奴，“宴百官于庆和殿”。皇太孙完颜璟之子洪裕生，世宗喜甚，“满三月，宴于庆和殿”。泰和二年（1202年）八月，章宗子忒邻生，“十二月癸酉，生满百日，宴于庆和殿”⁽¹¹⁾。由以上观之，庆和殿又是金朝皇室喜庆之日宴饮之所。当然，偶尔也有例外，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宰臣完颜守道恳求致仕，“优诏许之，特赐宴于庆和殿”。泰和六年（1206年）金朝击退南宋北伐之师，章宗召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金史》卷三十九《乐志上》。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金史》卷十二《章宗纪四》。

《金史》卷六十九《太祖诸子传》。

《金史》卷八十七《纥石烈克宁传》。

《金史》卷九十三《章宗诸子传》。

《金史》卷八十八《完颜守道传》。

左副元帅仆散揆赴中都，“戒以师期，宴于庆和殿”。一为亲信重臣，一为金朝名将，其赐宴庆和殿，皆为礼外宠遇。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十二月世宗病危之际，“乙酉，诏皇太孙璟（章宗）摄政，居庆和殿东庑”。据《金史·徒单克宁传》载，世宗初诏皇太孙与诸王大臣俱宿于禁中，徒单克宁奏曰：“皇太孙与诸王宜别嫌疑，正名分，宿于同处，礼有未安。”故复诏完颜璟以皇位继承人身份居庆和殿东庑。庆和殿当在世宗寝殿附近，且其地位高于一般便殿。又有福安殿，世宗、章宗皆卒于福安殿，福安殿当即金帝寝殿。又有集贤殿，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金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允恭留中都守国，“每三日一次于集贤殿受尚书省启事。”又有清辉殿，“大定十三年（1173年）六月丁，世宗召皇太子、诸王，侍食于清辉殿。”又有凝和殿，《金史·夹谷清臣传》载：“明昌五年（1194年）二月，上御凝和殿，清臣省覲还，谒上。”又有天香殿，《金史·完颜匡传》载，泰和七年（1207年）二月左副元帅仆散揆卒于军中，完颜匡自军中赴中都，“转左副元帅，赐宴天香殿，还军许州”。又有崇政殿，《金史·路铎传》载，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召对于崇政殿。”《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有福寿殿，大定七年（1167年）改称寿安宫。”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所建之太宁宫（今北京北海公园一带）后改寿宁，至迟二十一年（1181年）复改为寿安宫。因此，大内福寿殿所改之寿安宫后当改名，疑即世宗、章宗卒时所居之福安殿。同《志》又称有崇庆殿、安仁殿、隆德殿，皆不知处址。又有宝昌门，门上有楼。《金史·后妃传上》载，耶律察八被海陵王霸占为妃，仍与夫通，事被发觉。“海陵登宝昌门楼，以察八徇诸后妃，手刃击之，堕门下死”。据此，宝昌门当在十六位附近。海陵王常登宝昌门楼观角抵（摔跤）之戏。

（六）金中都坛庙、山陵

金中都的宗庙主要是太庙和衍庆宫，其位置在皇城南部东侧。《金虏图经》载：“（千步）廊之半各有偏门，向东曰太庙。”《揽辔录》载：“（千步廊）几二百间，廊分三节，每节一门，路东出第一门通街市，第二门通毬场，第三门通太庙。”记述虽略有不同，但太庙在东千步廊之东却无疑问。金中都太庙是皇室宗庙，内供奉金帝列祖列宗神主。在海陵王迁都以前，太庙原是金太祖阿骨打庙。天熙三年（1140年）九月，金熙宗幸燕京，“己酉，亲飨太祖庙”，即为此处。太祖庙所在亦即原辽南京辽帝御容殿旧址。海陵王营建中都之际，乃增广旧太祖庙，奉迁祖宗神主于此，改为太庙。并且，另于太庙之旁新建太祖原庙（先已有庙，再立则称原庙）。天德四年（1152年），有司言：“燕京兴建太庙，复立原庙……今两都（上京、中都）告享宜止于燕京所建原庙行事。”于是名其宫曰衍庆，殿曰圣武，门曰崇圣。

金中都太庙围垣二重，外垣有庙门，内垣四面各有一神门，每一神门两

《金史》卷九十三《仆散揆传》。

《金史》卷八《世宗纪下》。

《金史》卷十九《世纪补·显宗纪》。

《金史》卷六十九《太祖诸子传》。

《金史》卷三十三《礼志六》。

侧各有偏门。神门之内有一东西向长殿，数十楹，面南，分为数室，供奉金先帝神主。殿前有廊，东西通直。至金宣宗迁南京以前，金中都太庙计有十二室，供奉始祖以下至章宗诸先帝神位。此外，还有配享功臣神主，每逢祭祀，则以配享功臣神主各配所事金帝之庙。除大祭外，金帝即位或受尊号在此举行奏告仪，皇帝受尊号和皇后、太子受册后又在此举行恭谢仪。国有大事，也要遣使告庙。金世宗之世，太庙格局略有变动。大定二年（1162年），有司以金熙宗无嗣，奏请于太庙东墙外别立庙，以时祭享。大定十四年（1174年）庙成，以武灵为庙号。后又因金熙宗谥孝成，故又称孝成庙。大定十九年（1179年）将熙宗升祔太庙，原十一室扩为十二室，格局始定。旧孝成庙遂毁。大定二年（1162年）在奏请建熙宗别庙时，于太庙内垣东北起建昭德皇后（世宗后）庙。大定十二年（1172年）以庙制狭小，又于太庙之东别建昭德皇后庙，正殿三间，并辟便门与太庙相通，仍以太庙内之旧昭德皇后庙为册宝殿。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世宗命别建昭德皇后影庙（即御容殿）于太庙内，复因有司奏言：“礼无庙中别建影庙之例。”乃改于皇后庙西隙地兴建，并于皇后庙正南辟一正门，名曰坤仪，仍保留旧便门；又于庙外兴建斋廊房二十三间。太庙内外垣之间又有宣孝太子（即皇太子允恭）庙，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建于法物库东（即衍庆宫后），南垣及外垣皆三门，东西各一门。又于太子庙西建影殿三间，惟辟南门三座，殿前左右两侧各建庑廊二十间。同年十月庙成，十一日奉安神主于庙，十四日奉迁画像于影殿。世宗卒后，宣孝太子与昭德（后改明德）皇后同升祔太庙，原太子庙亦撤。

衍庆宫即金太祖原庙。《金史·礼志六》称宣孝太子（允恭）庙建于太庙法物库东，《金史·世纪补·显宗纪》又称允恭卒后“乃建庙于衍庆宫后”。按规制，法物库当在太庙内垣外东部。宣孝太子庙既在太庙法物库东，又在衍庆宫后，是以知衍庆宫亦当在太庙内垣外东部。正因衍庆宫在太庙内外垣之间，故《金虏图经》云：“千步廊之东，曰太庙，标名曰衍庆之宫。”将二者合而为一。金太祖御容原分藏燕京、上京。御容像五：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红者二，旧在中都原辽南京御容殿安置。御容像七：法服一、立容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旧在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太祖庙中。海陵营建中都，建衍庆宫，正隆二年（1157年）又遣使毁上京宗庙、宫殿，原燕京、上京两处之太祖御容十二幅皆藏于中都衍庆宫。贞元二年（1154年）四月，海陵遣使“荐含桃于衍庆宫”，即荐于太祖庙。世宗即位后，大定二年（1162年）奉迁睿宗（世宗之父）御容于衍庆宫。十六年（1176年）奉安世祖御容于衍庆宫。二十一年（1181年）又奉安昭祖、景祖、肃宗、穆宗、康宗、明肃皇帝（宗幹）御容于衍庆宫。衍庆宫有庙门灵星门（即崇圣门）和东西偏门，内有圣武门、圣武殿，殿内供奉太祖御容。大定十六年（1176年）奉安世祖御容于衍庆宫，乃于圣武殿之东、西两侧分建世祖、太宗、睿宗殿位，每殿七间，閤五间，门一座。世祖御容殿曰广德、閤曰燕昌，太宗御容殿曰丕承、閤曰光昭，睿宗御容殿曰天兴、閤曰景福。昭祖、景祖御容安置于燕昌閤上，肃宗、穆宗、康宗御容安置于閤下。明肃皇帝御容安置于太祖之崇圣閤下。金世宗又感念太祖、太宗创业艰难，大定十四年（1174年）十月仿汉图功臣于云台、唐图功臣于凌烟阁之举，“诏图

原庙号闵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改庙号熙宗。

画功臣二十人衍庆宫圣武殿之左右庑”。此后，又续补太祖以前功臣 22 名。大定十五年（1175 年）又图纥石烈志宁、纥石烈良弼于衍庆宫，章宗明昌五年（1194 年）又图徒单克宁于衍庆宫，泰和元年（1201 年）又图石琚、仆散忠义于衍庆宫，皆见于《金史》本传。

除宗庙外，金朝还于中都城内建宣圣庙（相当后世孔庙）供奉孔子。章宗泰和六年（1206 年）又建武成王庙于皇城之西、丽泽门内，并以宗翰、宗雄、宗望、宗弼、斜也等配祀。中都光泰门街有报德寺，清夷门（即通玄门）街有报恩寺，皆设世宗御容。

中都为金朝帝京，故郊坛之设必不可少。南郊坛（天坛）在金中都南门丰宜门外，今北京丰台即得名于此。围垣三重，四面各有三门（一正二偏），中有圆坛，坛、垣皆以赤土圻之，是金帝祭天之所。北郊方丘（地坛）在中都北门通玄门外，围垣三重，四面亦各三门。朝日坛（日坛）曰大明，在中都东北门施仁门东南，其制如地坛。夕月坛（月坛）曰夜明，在中都西北门彰义门之西南。金帝以冬至日祭于南郊坛，夏至日祭于北郊方丘，春分日祭于朝日坛，秋分日祭于夕月坛。祭前，金帝先于大安殿斋戒一日，郊祀大典十分隆重。

海陵王迁都燕京，并建社稷坛于中都（燕京），金世宗大定七年（1167 年）又曾有改建增修，其址不详。太社坛围垣二重，外垣只南向辟一神门，内垣四面各辟一门。四隅连饰罍罍，无屋。太社坛在正中稍南，广五丈，高五尺，以五色土各饰其方，中间以黄土，大致与清北京社稷坛相仿。石主形如钟，埋其半。太稷坛在太社坛之近西，如社坛之制，但无石主。四隅各有角楼，依方位饰以不同颜色。除例祭外，每逢大旱不雨或国有大事，皆祭社稷。如“泰和四年（1204 年）四月癸丑，祈雨于社稷”。又如章宗末年，南宋韩侂胄秉权，发动北伐，先胜后败。宋杀韩侂胄及其心腹苏师旦，函其首送金朝乞和。泰和八年（1208 年）“五月丁未，遣户部尚书高汝砺、礼部尚书张行简奏告天地，武卫将军都指挥使徒单镛奏告太庙，御史中丞孟铸告社稷。……献馘庙社，以露布颁中外”。

对于封建农业国家来说，气候环境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甚至于国运都有重大影响，凡属帝京无不设坛以祭之。金中都风师坛在景风门（南东门）外，雨师坛在其西的端礼门（南西门）外。雷师与雨师同祭一处。

金朝皇室山陵原在上京，海陵王营建中都以后，始迁至今北京西南房山区大房山脉的云峰山。《金虏图经》载：“海陵王“徙燕，始有置陵寝意，遂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四围。年余，方得良乡县西五十余里大洪山，曰大洪谷，曰龙喊峰。”大洪山为大房山之讹，龙喊峰即云峰山。《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三年（1155 年）三月乙卯，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建行宫其麓。”又先后命判大宗正事京、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拔鲁往上京迁太祖、太宗、熙宗和其父宗幹梓宫。十月，梓宫至中都，祭于大安殿。同月，建于云峰山麓的行宫竣工，名曰磐宁宫。海陵王毁山上之原云峰寺，在原佛像处凿穴安置太祖、太宗和其父宗幹遗骨。次年（1156 年），又奉迁始祖以下十帝梓宫，亦葬于大房山山陵。以后，海陵王、世宗、章宗亦皆葬

《金史》卷七《世宗纪中》。又，《金史》卷七十《习室传》列二十一人。

《金史》卷十《章宗纪四》。

《金史》卷九十八《完颜匡传》。

于此。海陵王在中都建山陵，迁祖宗梓宫于此，一方面是接受汉族的尊祖观念。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巩固自己的神权地位，使中都不但成为金朝的政治中心，而且真正成为女真族精神中心。金世宗即位后，先葬海陵王于大房山鹿门谷诸王兆域中，大定二十年（1180年）诏降海陵王为海陵庶人，改葬于山陵西南四十里。

1986年，在云峰山龙门口村发现睿宗（世宗之父）石碑，上刻“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十字，进而发现帝陵地宫神道，两旁石栏板刻有精美的龙纹和牡丹纹，石阶上满刻卷草纹，此即睿宗之景陵。金太祖之睿陵和世宗之兴陵当即在此附近。

因金朝皇陵在大房山，故世宗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封大房山神为保陵公，二十九年（1189年）并在此置万宁县，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复改为奉先县。诸山陵由诸陵署负责管理，以其地在涿州界内，故提点山陵一职由涿州刺史兼任。

除皇室山陵外，金中都又有安葬妃嫔的园陵，初在宛平县界，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迁入大兴县界，遂以大兴县令、县丞兼园陵署令。

（七）金中都苑囿、离宫

金中都宫城西，出玉华门有同乐园。《大金国志·燕京制度》载云：“西出玉华门曰同乐园，若瑶池、蓬瀛、柳庄、杏村，尽在于是。”《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元年（1153年）十一月己丑，瑶池殿成。”瑶池殿即在同乐园瑶池旁，海陵王常与众妃在此游娱。同乐园因是皇家园囿，故又称琼林苑。《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琼林苑有横翠殿、宁德宫”，实即指同乐园而言。琼林苑和同乐园，当一为正称，一为俗称。《金史·地理志上》称琼林苑而不称同乐园，《金虏图经》、《大金国志》称同乐园而不称琼林苑，盖为一崇一贬之故。《金史·世纪补·显宗纪》又载：皇太子允恭留守中都，“初，帝（允恭，章宗追尊为帝）在东宫，或携中侍步于芳苑。中侍出入禁中，未尝艰阻。此辈见帝守国，各为得意。帝知之，谓诸中侍曰：‘我向在东宫不亲国政，日与汝辈话语。今既守国，汝等有召命然后得入。’”芳苑既在禁中，自然非同乐园莫属，是以知同乐园又称芳苑。同《纪》又载：大定七年（1167年）皇太子允恭疾病，世宗命“左丞守道侍汤药，徙居琼林苑临芳殿”。临芳殿当在芳苑中，由此更可见琼林苑、芳苑、同乐园不过是一地之异名。同乐园以在宫城之西，故又称西苑、西园。如《金史·章宗纪一》载：“明昌元年（1190年）三月己巳，击毬于西苑，百僚会观。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击毬，纵百姓观。”同书《章宗纪二》又载：“承安二年（1197年）三月庚寅，幸西园阅军器。”即皆在同乐园。但西苑、西园并非同乐园的专称，凡皇家园囿在宫室之西者皆可称西苑（园）。因此，同书《章宗纪四》载：“泰和七年（1207年）三月壬寅，如万宁宫。甲辰，幸西园。”当即万宁宫（在今北京北海公园附近）的西园，并非同乐园。

金中都南城外有广乐园，又称熙春园、南园。《金史·五行志》载：“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正月辛巳（上元节），广乐园灯山焚，延及熙春殿”，是以知广乐园内有山，有熙春殿。《金史·世纪补·显宗纪》载：大定二十

五年（1185年）皇太子允恭卒，“九月庚寅，殁于南园熙春殿。己酉，世宗至自上京，未入国门，先至熙春殿致奠，恸哭久之”。是以知广乐园又称南园，其址在中都南门外。《金史·世宗纪下》又载：“九月己酉，上临奠宣孝皇太子（允恭）于熙春园。”是以知广乐园因有熙春殿，故又称熙春园。

《金史·刘頔传》载：“初，南苑有唐旧碑，书‘贞元十年御史大夫刘怱葬’。”因刘頔是刘怱后裔，章宗赐钱令其改葬苑外，刘怱曾任唐幽州节度使，墓当在城外。金营中都，其墓虽未括入城内却被括进南苑。从广乐园又称南园来看，此南苑当亦即广乐园。《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二年（1154年）九月己未，常武殿击鞠，令百姓纵观。”《金史·世宗纪上》又载：“大定三年（1163年）五月乙未，以重五，幸广乐园射柳，命皇太子、亲王、百官皆射，胜者赐物有差。上复御常武殿，赐宴击毬。”是以知广乐园又有常武殿、毬场。金人击毬是一种马上运动，目的在于习武。《金史·马贵中传》载：“大定八年（1168年），世宗击毬于常武殿，贵中上疏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守宗庙社稷之重，围猎、击毬皆危事也。前日皇太子坠马，可以为戒，臣愿一切罢之。’上曰：‘祖宗以武定天下，岂以承平遽忘之邪。……故示天下以习武耳。’”既然击毬是为习武，推测常武殿当与毬场同在一处。

《金史·章宗纪》中不再见常武殿，只见临武殿。如“泰和元年（1201年）五月甲寅，击毬于临武殿。八年（1208年）十一月丁酉朔，御临武殿试护卫。”临武殿或即常武殿之改名。《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又载：金中都有“常武殿、广武殿，为击毬飞射之所”。常武殿已如前述，广武殿不知其址。范成大《揽辔录》云：“宣阳门内千步廊“分三节，每节一门。路东出，第一门通街市，第二门通毬场，第三门通太庙”。是以知皇城内东侧还有皇家毬场，广武殿或在其次。

金中都南郊有建春宫，大约是金章宗时所建。《金史·章宗纪二》载：“明昌五年（1194年）正月丁亥，幸城南别宫。”即指建春宫而言，当时以初建尚未命名。章宗常于此春猎。承安三年（1198年）正月，章宗如城南春水（春猎），“己未，以都南行宫名建春宫”。《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中都路大兴府大兴县有建春宫。金朝大兴府大兴县管辖中都城内外东部，故建春宫应在中都城南偏东，大约即今北京南苑附近。建春宫是金中都规模较大的离宫，章宗巡幸建春宫的记载仅在《金史·章宗本纪》中就有10余次之多。建春宫中有宫殿。《金史·赵质传》载：“赵质字景道，辽相（赵）思温之裔。大定末，举进士不第，隐居燕城（中都）南，教授为业。明昌间（1190—1196年），章宗游春水过焉，……赏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赵质固辞，遂赐田千亩，终身免役。赵质既然居于中都城南，所谓行殿当即“都城南行宫”之殿，以当时尚未命名建春宫，故只称行宫、行殿。

前已言之，今北京西郊的香山，辽代已见其名，并建有香山寺。金代，香山、玉泉山一带更成为游览胜地。《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中都路大兴府宛平县有玉泉山行宫。除玉泉山有行宫外，其西的香山也有行宫。

《金史·巨构传》载：“大定中，诏（巨构）与近臣同经营香山行宫及佛舍。”这里所谓的佛舍，即香山寺。《金史·世宗纪下》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三月癸巳，香山寺成，幸其寺，赐名大永安，给田二千亩，粟七千株，钱二万贯”。金世宗之世，每逢正旦、万春节（世宗生辰），通常由皇太子

允恭率百官上寿。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皇太子允恭卒。同年“十月庚戌朔，宰相以下朝见于庆和殿，太尉完颜守道上寿”，世宗睹景思人，“凄怆者久之”。金世宗以63岁高龄遭丧子之痛，其心情哀楚可想而知。史称世宗好道术，香山大永安寺建成于皇太子允恭卒后不到一年，显然与允恭之死有关。此外，既然巨构受命同时经营香山行宫与佛舍，那么从香山大永安寺建成年代，可以推测香山行宫当亦营建于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左右。香山行宫兴建于世宗之世，玉泉山行宫当建于章宗之世。除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以外，《金史·世宗纪》中不再有幸香山的记载，这大概是由于当时香山行宫尚未建成，或世宗在此后三年即去世的缘故。金章宗游幸玉泉山、香山最为频繁，仅《金史·章宗本纪》中记载即各有7次。明蒋一葵《长安客话》云：“玉泉山顶有金行宫芙蓉殿故址，相传章宗尝避暑于此。”口碑相传，当有所据。

金中都规模最为宏丽、对后世北京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建筑，就是中都城东北的离宫太宁宫。元大都城即建于此，明清北京城，乃至今日北京城亦皆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太宁宫建成于金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年）。《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京城北离宫有太宁宫，大定十九年（1179年）建，后更为寿宁，又更为寿安，明昌二年（1191年）更为万宁宫。”这座离宫初建时称太宁宫，《金史·世宗纪中》载：“大定十九年（1179年）五月戊寅，幸太宁宫。七月庚辰，至自太宁宫。”但是，太宁宫何时改为寿宁宫，《金史》不载。《金史·世宗纪》载：“大定二十年（1180年）四月己亥，太宁宫火。二十一年（1181年）四月壬申，幸寿安宫。”太宁宫经过火灾，次年修复后即改名寿安宫。督掌修复工程的是左光庆（左企弓之孙）。《金史·左光庆传》载：左光庆“典领寿安宫工役，不为苛峻，使劳逸相均”。由此看来，即使太宁宫曾改名寿宁宫，也只是数月之事。寿安宫改称万宁宫，则在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四月庚子。太宁宫竣工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而其整体建筑系毕工于大定十五年（1175年）左右。《金史·张仅言传》载：少府监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十七年（1177年），复提点内藏，典领昭德皇后山陵，迁劝农使，领诸职如故。”张仅言以少府监官职督太宁宫之役，十七年（1177年）改提点内藏，据此推测太宁宫整体建筑当毕工于大定十七年（1177年）以前。《金史·世宗纪中》载：“大定十五年（1175年）九月丙申，幸新宫。”《金史·曹望之传》又载：“大定十五年（1175年），新宫成，世宗幸新宫，敕望之曰：‘新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也。’”所谓新宫，当即太宁宫。当时太宁宫中宫殿楼台已立，只是没有装饰陈设，故世宗对户部尚书曹望之有“宫中所须，毋取于民间”之语。《金史·百官志二》载：“少府监……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大定十五年（1175年）太宁宫土木工程既然大致已毕，十七年（1177年）张仅言调任管理皇室内库即为顺理成章之事。

太宁宫之西有西园，《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西园有瑶光台，又有琼华岛，又有瑶光楼。”琼华岛即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华岛，又称琼岛，瑶光台则为其南的今北海公园南门外西侧的团城，其处址既称西园，则太宁宫当在其东。又据元初郝经《琼华岛赋》云：“岁癸丑（1253年）夏，经入

于燕。五月初吉，由万宁故宫登琼华岛。”当时蒙古尚未以燕京为都，故郝经得以游于万宁宫，琼华岛。依郝经所述，万宁宫在琼华岛紧邻，当即在明清北京故宫一带。

太宁宫是一片包括宫殿园囿在内的宫殿区，因其中都城之东北，故又称北宫、北苑。太宁宫宫殿壮丽，依傍浩淼碧波，晨光暮色，引人入胜。金赵撝《早赴北宫》诗云：“苍龙双阙郁层云，湖水鳞鳞柳色新，绝似江行看清晓，不知身是趁朝人。”北宫的佳丽风光，竟使作者恍忽间忘记自己是去上朝。金世宗、章宗二帝经常游幸太宁宫，长期住在那里避暑，处理国政。太宁宫之于金中都城，犹如清代圆明园之于北京城。金世宗临终前，竟不顾礼制，舍大安殿而“遗诏移梓宫寿安宫（即太宁宫）”，如此钟情这里的青山秀水、渺渺碧波。章宗召集百官商议，曰：“朕日夜思之，舍正殿而奠于别宫，情有所不忍，且于礼未安。”于是仍殓于大安殿。章宗废于国政，耽于娱乐，为游太宁宫更是一切在所不计。明昌二年（1190年）正月辛酉，孝懿皇后（章宗之母）卒。章宗不顾母丧，同年四月仍幸太宁宫。谏议大夫张等人上疏请止其行，不允。同月“庚子，改寿安宫（太宁宫）为万宁宫；壬寅，如万宁宫。八月癸未，至自万宁宫”，一住就是4个月。太宁宫中有宫殿和楼台亭阁等建筑，雕梁画栋，极其崇丽。金赵秉文《扈跸万宁宫》诗云：“遥想熏风临水殿，五弦声里阜民财。”是以知太宁宫中有薰风殿、临水殿。《金史·章宗纪二》载：“明昌四年（1193年）四月庚戌，如万宁宫。辛亥，右丞相清臣率百官及耆艾等复请上尊号，学官刘玘亦率六学诸生赵楷等七百五十人诣紫宸门请上尊号，如唐元和故事，不许。八月甲辰，至自万宁宫。”章宗自四月至八月在太宁宫避暑，四月辛亥又为庚戌之次日，故学官刘玘等700余人所诣之紫宸门即在太宁宫内，紫宸门内又有紫宸殿。《金史·章宗纪二》载：“承安元年（1196年）七月庚辰，御紫宸殿，受诸王、百官贺。”即太宁宫紫宸殿。金章宗每年庆二次生日，一为其生日七月二十七，一为其自选定的九月初一，前引文字即述章宗在太宁宫紫宸殿庆生辰事。同《纪》又载：“承安二年（1197年）七月戊辰，天寿节，御紫宸殿受朝。”皆此之类。金世宗、章宗在太宁宫避暑，一住数月，其处理政务、召见大臣即在紫宸殿。《金史·高汝砺传》载：“承安元年（1196年）七月，入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时侍臣皆回避，上所御凉扇忽堕案下，汝砺以非职不敢取以进。奏事毕，上谓宰臣曰‘高汝砺不进扇，可谓知礼矣。’”从紫宸殿的命名、章宗屡御此殿贺生辰，以及在此召见臣属议事等迹象推测，紫宸殿极可能是太宁宫的正殿。

太宁宫以西的西园，即今北京北海公园的太液池、琼岛、团城一带。《辽史·地理志四》载：“燕山——中有瑶屿。”瑶屿即今北海公园团城，辽代时这里或许已有皇家建筑。海陵王营建中都时，这里可能也有兴建。今北海、中海上承城北积水潭，原是古高粱河河道。酈道元《水经·水注》云：“（高

《日下旧闻考》卷二十九引。

《中州集》卷九。

《金史》卷九十五《移刺履传》。

《金史》卷九十五《移刺履传》。

《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七。

梁)水出蓟城西北平地(今北京西郊紫竹院公园),泉流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即为此地。《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条载:西园有瑶光台、瑶光楼。瑶光台即今北海团城,据《故宫遗录》记载,直至明初,今北海团城四周仍为水域,不与陆地相连。瑶光台上有瑶光楼,为金主纳凉之所。元郝经《琼华岛赋》云:“瑶光楼起,金碧钩连,断霓饮海,颡地颡天。”霓即彩虹外环,在此喻指桥梁。颡为鸟自低高飞貌,颡为鸟自高低飞貌。瑶光楼所在的瑶光台正北即为高耸的琼华岛,据郝经所述,其间当有桥梁。瑶光台与琼华岛高低相错,正成颡颡之貌。瑶光楼金碧辉煌,飞檐重叠,斗拱交错,是太宁宫西园中著名的建筑。金章宗曾计划将之扩建为瑶光殿,后因故而罢。瑶光楼面对开阔浩淼的水面,金章宗常在此纳凉赏月。《中州集》卷四赵沔《中秋》诗,元好问注云:“道陵(章宗)中秋赏月瑶光楼,召赵沔文孺对御赋诗,以清字为韵。沔诗云:‘秋气平分月正明,蕊珠宫阙对蓬瀛。已驱急雨销残暑,不遣微云点太清。帘外轻风飘桂子,夜深凉露滴金茎。圣朝不奏霓裳曲,四海歌讴即乐声。’”蓬瀛当指琼华岛而言,既然“蕊珠宫阙对蓬瀛”,那瑶光台上还应有蕊珠殿。《金史·百官志二》内侍局有“蕊珠殿都监、同监”,当即管理该殿的近侍。琼华岛,金代又称寿乐山,堆砌着很多假山石,相传即海陵王营建中都时取自故北宋东京(今河南开封)的艮岳。宋艮岳山石采自太湖,玲珑剔透,千姿百态,既高雅,又纯系天成,至今尚保存在北海公园琼岛的山麓上。琼华岛山顶上有广寒殿,与正南的瑶光楼遥遥相对。太宁宫有宫墙,金赵秉文《北苑寓直》诗云:“柳外宫墙粉一围,飞尘障面卷斜晖。潇潇几点莲塘雨,曾上诗人下直衣。”但这只是指太宁宫宫殿区的宫墙。《金史·刑志》载: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监察御史陶钧以携妓游北苑,歌饮池岛间,迫近殿廷,提控官石玠闻而发之。……诏以钧耳目之官,携妓入禁苑,无上下之分,杖六十。”可见太宁宫西园水域(今北京北海、中海西岸),并没有宫墙,一般人也可以荡舟于湖水之中,只有当接近瑶光台和琼华岛时才被视为大不敬而受处罚。

金末,蒙古占据中都,太宁宫亦遭战火破坏。成吉思汗十九年(1224年)二月,道教首领丘处机归至中都,蒙古燕京行省石抹公和宣差割八以“北宫园池并其近地数十顷为献,且请为道院,师(丘处机)辞不受,请至于再,始受之”。次年(1225年)五月,丘处机登寿乐山(琼华岛)颠,四顾园林,若张翠幄,赋诗云:“地土临边塞,城池压古今。虽多坏宫阙,尚有好园林。绿树攒攒密,清风阵阵深。日游仙岛(指琼华岛)上,高视八紘吟。”可见当时金中都城和太宁宫的宫殿楼阁已被破坏殆尽。元好问《遗山集》卷九《出都》诗,自注云:“寿(万)宁宫有琼华岛,绝顶广寒殿,近为黄冠辈(指道士)所撤。”时在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二年(1243年),丘处机卒后16年。

(八) 金中都坊市和街道

海陵王营建金中都城时,已是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在宋朝,自北宋中叶以后,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诸大城市封闭的坊里制度已经

彻底崩溃。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称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的吴郡已是“近者坊市之名，多失标榜，民不复称”。可见古典的封闭的坊里制度在此前很久即已不存。至于作为北宋都城的东京（今河南开封），则更是如此。北宋末年的东京，商业活动已打破旧“市”制的约束，夜市通宵达旦，十分繁荣。旧的坊制被打破，改之以开放式的坊巷，市坊杂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追述开封坊巷云：“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又云：“新封丘门（外城北东门）大街两边民户铺席外，余诸班直军营相对，至门约十里余，其余坊巷院落，纵横万数，莫知纪极。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居民区与市场不再有严格界限，且多已杂处。金中都城既然仿照北宋东京制度营建，自然不再保持旧的坊里制度。考古勘察发现，金中都城的中心部位，其布局仍保持旧辽南京时的坊制格局，这是因为营建中都时对旧居民区不曾重建的缘故。但是在金中都城的西、南、东三面扩建部分，则完全采用开放式的坊巷制。金中都城西南部，经钻探发现，这里的东西方向街道大多是一些平行的等距离的胡同。另外，仍保留在今北京宣武区的故金中都城东部，即宣武门外大街及其东部的一些南北方向的胡同，如椿树胡同、陕西巷等，也是金中都街道的遗迹。这些平行的胡同都是以城市的主干道为轴线，在两旁排列的。《金史·海陵王纪》载：“贞元元年（1153年）五月乙卯，以京城隙地赐朝官及卫士。七月戊子朔，原赐朝官京城隙地，征钱有差。”这是海陵王刚至中都数月后之事。可见，中都城营建后，虽然宫室已就，城垣已立，但新圈进城内的空地还未利用，故海陵王将之分赐给随朝大小职官和护卫军士。新建的住宅、商铺当即在城西、南、东三面发现的平行胡同中。金中都的城市布局，混合着坊巷和坊两种新老格局，这是在当时中国南北城市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由封建社会中期向后期的过渡。

金中都虽不复存在封闭式的坊制，但在城市布局上仍以坊相称，只是这时的坊不再是四周有坊墙，中有十字街通四面坊门的坊，而是一段段的街道，故又称坊巷。金中都城内计有62坊，比辽南京时多36坊，这是由于城郭扩展后，居民区也相应扩大了缘故，其坊名如下：西开阳坊、东开阳坊、南开远坊、北开远坊、清平坊、美俗坊、广源坊、广乐坊、西曲河坊、东曲河坊、宜中坊、南永平坊、北永平坊、北揖楼坊、南揖楼坊、西县西坊、棠阴坊、蓟宾坊、永乐坊、西甘泉坊、东甘泉坊、衣锦坊、延庆坊、广阳坊、显忠坊、归厚坊、常宁坊、常清坊、西孝慈坊、东孝慈坊、玉田坊、定功坊、辛市坊、会仙坊、时和坊、奉先坊、富义坊、来远坊、通乐坊、亲仁坊、招商坊、余庆坊、郁邻坊、通和坊、咸宁坊、东县西坊、石幢前坊、铜马坊、南蓟宁坊、北蓟宁坊、啄木坊、康乐坊、齐礼坊、为美坊、南卢龙坊、北卢龙坊、安仁坊、铁牛坊、敬客坊、南春台坊、北春台坊、仙露坊。与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坊名比较，可知仙露坊、显忠坊、蓟（鬲）宾坊、开阳坊、铜马坊、棠阴坊、玉田坊、卢龙坊、时和坊、齐礼坊均为唐、辽时旧坊名。金中都的坊里面貌虽已改观，但这些旧坊的方位当无变化。《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载：今北京广安门外天宁寺，金代为天王寺，属延庆坊。

徐莘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变迁研究》第1辑。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七《京城总纪》引《元一统志》。

由此可知延庆坊当在今宣武区天宁寺一带。又据侯仁之先生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自今日北京丰台区凤凰咀村往北，依次为美俗坊、永乐坊、常清坊；今海淀区羊坊店路以东为广源坊；延庆坊南为东、西甘泉坊；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以北为嘉会坊；西城区闹市口街以西为衣锦坊；宣武区三庙前街一带为显忠坊；显忠坊南为开远坊。铁牛坊因有铁牛大力神庙而得名，《析津志》载：“（铁牛坊）有铁牛庙，因其庙而名其坊。”张江裁《燕京访古录》云：“彰义门（今广安门）内，白马寺坑，土内埋一铁牛神像半身……此地当是旧燕城铁牛庙基址。”白马寺坑，《宸垣识略·外城二》载：“白马寺在宣南坊悯忠寺（今法源寺）南……今寺已圯，其地名白马坑。”据此，铁牛坊当在今宣武区法源寺以南一带。于杰、于光度先生《金中都》和赵其昌先生《金中都城坊考》分别对中都坊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意见或同或异，兹综合二说，略述如下：会仙坊，在今西便门大街东、皈依寺北，与棠阴坊、时和坊相接。奉先坊，在今白云观南、天宁寺北，金代时是中都通玄门（正北门）内西侧。东甘泉坊、西甘泉坊，在今天宁寺以南，北接延庆坊。宜中坊，在今宣武区小马厂一带，在元代长春宫（今白云观西100米）以西一里。北开远坊，在今宣武区善果寺以东。北春台坊，在今西城区南闹市口以西，金中都东北隅。南春台坊，在今陶然亭北、窑台以西处，西北与东开阳坊相接。广阳坊，在今右安门外以西之菜户营一带，金中都丰宜门（正南门）内。富义坊，在今右安门外孟家桥之西，东邻广阳坊。

金中都城内坊与市虽然已无严格界限，但主要商业区仍在城北。这是因为各地商货自水路入中都，都要先运至中都城东的通州（今北京通县），然后由通州沿闸河入中都；而闸河正由中城北通过，所以百货卸放的码头即在城北，这里原有的商业经济在此有利条件下，其繁荣更倍于往日。金朝在中都设置中都都商税务司、都转运司、都曲使司、流泉务（官办质当铺）等，专掌贸易质典征榷之事。中都商货阜盛，商税是金朝大宗财政收入。金世宗大定年间，中都税使司岁获十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余贯；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已升至二十一万四千五百七十九贯。金代，盐、钱、酒、醋皆为官府专卖。金朝宗室贵族为牟取重利，纷酿私酒发卖，造成官酒滞销。地方官吏惧亏课夺俸，乃将税额强行摊派给中都酒户赔纳。中都酒户不堪其苛剥，纷纷逃亡。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实行官收曲课，听民酿造的政策，才使政府曲课（酿酒税）收入稳定下来。中都曲课，金世宗之世岁课钱三十六万一千五百贯，章宗承安元年（1196年）岁课钱四十万五千一百三十三贯，其数额皆超过商税收入。金宗室贵族和官僚也经商牟利。《金史·刘焕传》载：刘焕调任中都市令。“枢密使仆散忽土家有僚结工，牟利于市，不肯从市籍役，焕系之。忽土石焕，焕不往，暴工罪而笞之”。所谓僚结工，牟利于市，其实即是主人仆散忽土牟利于市。金帝以有妨体统而禁诸亲王货卖京师，但对一般官僚并不严禁。《金史·胥持国传》载：权臣胥持国死后，章宗问平章政事张万公，胥持国人品究竟如何。张万公答曰：“持国素行不纯谨，如货酒平乐楼一事，可知矣。”章宗竟不以为然，曰：“此亦非好利。如马琪位参政，私鬻省酿，乃为好利也。”在章宗看来，官属经商营利不为

《日下旧闻考》卷一百五十五《存疑》“铁牛庙”条按引《析津志》。

分见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30页；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首都博物馆国庆四十周年文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好利，只有贪卖公物才为好利，真是昏庸之极。

金与宋朝、西夏、高丽皆有使节往来。每年三国都遣使者至金中都贺正旦、生辰，其中西夏使者特许在驻馆处贸易。《金史·章宗纪一》载：“明昌二年（1191年）正月癸丑，谕有司，夏国使可令馆内贸易一日。尚书省言，故事许贸易三日，从之。”这种贸易活动又丰富了金中都的社会经济内容。

七、元大都城

(一) 元朝定都燕京，营建大都城

金末，蒙古加强对金中都的进攻，四年之间（1211—1214年）三次围困中都城。贞佑二年（1214年）五月，金宣宗于蒙古退兵之后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宣宗初留皇太子完颜守忠与右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本名完颜福兴）同守中都，七月复召皇太子赴南京，实际上已放弃中都。蒙古复围中都，次年（1215年）正月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今北京通县）降于元将石抹明安，中都粮道断绝，陷入危机。五月，石抹明安将攻中都，完颜承晖自杀，尚书左丞抹然尽忠弃皇家诸妃嫔不顾，乘夜自通玄门出奔。石抹明安率军入城，据有中都。金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事高霖皆死。

在蒙古屡次围攻中都过程中，战况十分激烈，砲碎承天门（应天门）鸱尾，诸宫室、民舍也在所难免。金人为保卫中都城，在蒙古军攻入中都外城后，又焚烧街道两旁民舍以阻止其前进；为充饥饿，据《南迁录》载，又“拆绛霄殿、翠霄殿、琼华阁，分给四城为薪”。加之，大安二年（1210年）中都连连地震，造成地层断裂，地下可燃气体逸出，火灾频繁。《金史·五行志》载：“大安二年（1210年）二月乙酉，地大震，有声殷殷然。六月、七月至九月晦，其震不一。十一月，京师民周修武宅前渠内火出，高二尺，焚其板桥。又旬日，大悲阁（在今北京宣武区白纸坊北）幡竿下石隙中火出，高二三尺，人近即灭，凡十余日。自是都城连夜燔爇二三十处。三年（1211年）三月戊午，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蒙古入据金中都城之时，其城在战火和自然灾害的破坏下已残破不堪，人多饿死。蒙古复改金中都为燕京，窝阔台汗三年（1241年）三月在此设行尚书省，以燕京留守兼行尚书省事。

原金中都城南的建春宫和城北的太宁宫，在蒙古军攻克中都城以前即被占领。《元史·石抹明安传》载：“乙亥（金贞佑三年，公元1215年）春正月，取通州，……遂驻军于京南建春宫。”又先后破金御史中丞李英、完颜合住援军，“尽俘其辎重，还屯建春宫。四月，攻万宁宫（即太宁宫），克之”。建春宫在此后即不见记载，或已完全破坏。元代，大都城南二十里有下马飞放泊，即今北京南苑附近，为蒙古皇室贵族纵鹰狩猎之地，当即建春宫遗址。万宁（太宁）宫虽保存下来，但宫殿建筑也大多残破，前已言及，兹不赘述。

成吉思汗于即位二十二年（1227年）七月卒，次年（1228年）幼子拖雷监国。拖雷监国之次年（1229年）八月，其兄窝阔台（成吉思汗之三子）以成吉思汗遗诏即大汗位，是为元太宗。其后三年（1232年），窝阔台汗毒杀拖雷。窝阔台汗于即位十三年（1241年）十一月卒，皇后乃马真称制。五年（1246年）七月，蒙古贵族立窝阔台汗之子贵由为大汗，是为元定宗。贵由汗在位三年即卒，皇后海迷失称制。海迷失称制三年（1251年），蒙古贵族推立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是为元宪宗。自此，汗位归于拖雷一系。蒙哥汗命其弟忽必烈（拖雷之四子）总漠南汉地军国庶民，次年（1252年）又徙窝阔台汗子孙及诸王于各边，赐海迷失皇后死，从而巩固了汗位。

忽必烈雄才大略，招揽藩府旧臣和四方文学之士，问以经国安民之道，并驻帐于桓州（今内蒙古多伦）和抚州（今内蒙古兴和）之间，丙辰岁（1256

年)“命僧子聪(即刘秉忠)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今内蒙古正兰旗境内),经营宫室”,以汉地财赋为依托,便于发展势力。蒙哥汗于即位八年(1258年)大举伐宋,次年(1259年)七月死于军中,其弟阿里不哥(拖雷之七子)在大漠纠集蒙古贵族势力欲即汗位。十一月,忽必烈在前线与宋贾似道议和,自鄂州(今湖北武昌)还军北上,争夺汗位。闰十一月乙丑,忽必烈至燕京,释放阿里不哥一党所括之兵,粉碎其征燕地锐卒以为己用的企图。是年冬,忽必烈即驻于燕京近郊。次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称大汗于开平,建元中统,是为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忽必烈命修燕京旧城,并命平章政事赵璧、左三部尚书怯烈门率蒙古、汉军驻燕京近郊、太行一带,东至平滦,西控关陕,应有险阻,于附近民内选谙武事者,修立堡垒守御。又选锐卒三千付史枢统领,屯驻于燕京近郊,以备阿里不哥来袭。同年十一月,大破阿里不哥来犯之军,并乘势北上追击。中统四年(1263年),忽必烈改开平为上都。次年(1264年)七月,阿里不哥降;八月,诏改燕京为中都,并改元至元。对于统治中原地区来说,上都开平显然过于偏北,交通不便,政令难以迅速下达;且上都开平的军事地位远不如中都燕京重要,这在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已充分表现出来。早在忽必烈即汗位以前,其心腹霸突鲁即奏曰:“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蹕之所,非燕不可。”即汗位之后,其谋士郝经亦以“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为由,劝忽必烈定都燕京。因此,忽必烈遂决意建都燕京。

中统五年(1264年)二月,元世祖忽必烈诏修原金太宁宫西园中的琼花(华)岛,并命疏通燕京以北的漕渠,以便运输。因为历经战火的金中都宫室已破坏殆尽,惟有城北旧太宁宫尚保留稍整,且有山水之秀,成吉思汗时期曾将之以为道院,可能也有一些维修,故忽必烈意欲定都燕京遂从修建琼华岛开始,原被道士拆毁的广寒殿也得以恢复。

但是,由于金中都城过于残破,且其规模狭促,也与蒙古汗国无敌天下的国势不相称;更重要的是,旧金中都城“土泉疏恶”,城西的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水源已难以为继,故又决定放弃旧燕京城而以其东北的依傍水源充足的高梁河水系的旧金太宁宫为中心,建筑新都,亦名中都,原金中都城则称南城、旧城。《马可·波罗游记》又称:“汗八里城(指金中都)在契丹省的一条大江之上,自古以来就以雄伟庄严而驰名遐迩。城名的含意是“帝都”(即燕京)。不过,皇帝陛下(忽必烈)根据星占学家的卜算,认为该城将来要发生叛乱。所以,他决定在江(指原金中都城北的闸河)的对岸另建新都。”蒙古贵族一般都迷信星占术,这或许也是忽必烈决定放弃燕京旧城,营建新都的原因之一。选择新都城址并进行整体规划的是太保刘秉忠,具体负责施工的是张柔、张弘略父子及行工部尚书段天佑等人。《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元史》卷一百十九《木华黎传》附霸突鲁传。

《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二《便宜新政》。

陆文圭:《墙东类稿》卷十二《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

部尚书段天佑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又命“凿金口，导卢沟水以漕西山木石”，供应新都修建宫室之需。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戊午，成立提点宫城所，为主持修建新都宫室的机构，正式开始修建新都城。在建城过程中，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纳刘秉忠之议，改国号为大元，次年（1272年）改中都（新都城）为大都；并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宋，完成南北统一，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从此完成了历史上的北京由军事重镇、局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向全国政治中心的过渡。这一过渡，分汉唐幽州蓟城、辽南京、金中都到元大都这样几个阶段，历时1400余年。

元大都城的兴建是首先从建筑宫室开始的，其皇宫即在旧金太宁宫遗址。元大都城始建于至元四年（1267年），史载明确，无需考辨。元大都建成年代，没有明确记载，学术界一般均以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资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为大都建成之标志，此说亦可成立。惟大都城郭的建成年代，一般以为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似值得商榷。说大都城郭建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皆据《元史·张弘略传》，传云：“至元三年（1266年），城大都，佐其父（张柔）为筑宫城总管。八年（1271年），援朝列大夫、同行工部事，兼领宿卫亲军、仪鸾等局。十三年（1276年）城成，赐内帑金、璫瑁卮，授中奉大夫，淮东道宣慰使。”张弘略之父为张柔，本传云：“至元三年（1266年），加荣禄大夫，判行工部事，城大都。”《元史·世祖纪三》载：“至元三年（1266年）十二月丁亥，诏安肃公张柔、行工部尚书段天佑等同行工部事，修筑宫城。”据此，张柔、张弘略《传》中所谓“至元三年（1266年）城大都”，实际是指修筑大都宫城而言，以其为建大都之始，故言“城大都”。《张弘略传》中所言“十三年（1276年）城成”，亦当是指宫城（确切地说，应是宫城、皇城及其内的宫室建筑）建成。在此之前，《元史·世祖纪三》又载：“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戊戌，宫城成。”此系纯指宫城城垣而言，因为在此之后《元史》中仍不断有关于修筑宫城的记载。如《元史·世祖纪》载：“至元七年（1270年）二月丁丑，以岁饥罢修筑宫城役夫。”“至元八年（1271年）二月丁酉，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平滦民二万八千余人筑宫城。”“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乙酉，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至元十年（1273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己卯，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四月癸丑，初建东宫。十一月，起阁南直大殿及东西殿。”至元十年（1273年）所建正殿、寝殿、香阁等建筑即宫城内以大明殿为主的外朝部分，至元十一年（1274年）建于大殿正北的崇阁即宫城内以延春阁为主的内廷部分。这两组建筑的竣工，可视为大都宫城建成的标志。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所建东宫，位于今北京北海公园以南的中海西岸，后元朝又改名隆福宫，其在宫城之外，皇城之内。东宫（即隆福宫）的西部在今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一线，其东有图样山胡同，是明、清北京兔儿山遗址，是宫苑的一部分，其前身即元大都东宫的西园。所谓“初建东宫”，是指始建年代。元朝在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十一月先后兴建东宫和宫城内的延春阁，其竣工最早也要到至元十二年（1275年）至十三年（1276年）之间。因此，笔者认为，《元史·张

弘略传》中“十三年（1276年）城成”一语，应指宫城、皇城及所属宫殿的竣工年代，非指大都城郭而言。

元大都皇宫建成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大都整体竣工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那么，元大都城郭究竟建成于何时？《元史·世祖纪九》载：“至元二十年（1283年）六月丙申，发军修完大都城。九月丙寅，徙旧城市肆局院、税务皆入大都，减税四十分之一。十一月戊辰，大都城门设门尉。”“修完”二字虽不能简单地作竣工解释（《元史》中修缮大都城垣亦称“完之”、“完大都城”），但从发军修完大都城、迁旧城市肆局院入大都、设大都城门尉等一系列举动判断，元大都城郭的最终竣工似应即在此年。特别是设城门尉一举，最能说明问题。此外，《元史》中有关大都城郭修复的记载也可作为佐证。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元朝前期，中国气候正处于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中第四温暖期后期。今北京地区当时也是暴雨常作，毁坏宫室民居。元大都城垣因系土筑，虽有一定的排水和以苇排被城的措施，年长日久仍不免被雨水破坏。元大都城垣被雨水破坏的最早记载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史·世祖纪十二》载：“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七月，雨坏都城，发兵、民各万人完之。”自此以后，连续数年都有大雨坏城和修城的记载，以后可能成为定制，故极少再有记载。从最早的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大雨坏城的记载分析，认为大都城郭竣工于至元二十年（1283年）也是适当的。元大都城郭此年建成后，苦心维护，略有小损，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终于出现大段坍塌，其间相距6年，从时间上不难解释。查考历史，金中都城建成于天德四年（1152年），初坏于贞元四年（1156年），其间只有4年，与元大都城郭情况相近。如果认为大都城郭建成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则其完好时间就会长达13年之久，如此坚固程度似乎并非土城所能及。

元大都城的主要设计者是刘秉忠。刘秉忠是河北邢台人，少年时曾出家为僧，法号子聪，后受高僧海云和尚引荐，为忽必烈的幕僚，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同议枢密院事，诏复其姓刘氏，赐名秉忠，官至太保。刘秉忠有经世致用之才，精通天文历法、地理和儒家经典。元上都开平，就是他选址并设计、建造的。《元史·刘秉忠传》载：“初，帝（忽必烈）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岗，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1267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1271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大都城名、元朝国号，皆出自刘秉忠。参与大都城选址和规划的还有行右三部事赵秉温。赵秉温受学于刘秉忠，至元初奉命与“太保刘公（秉忠）同相宅……图上山川形势、城郭经纬与夫祖社朝市之位，经营制作之方。帝（忽必烈）命有司稽图赴功”。大都城的设计者是刘秉忠和他的学生赵秉温，具体督其工役的除前述之张柔、张弘略父子、段天佑外，还有蒙古人野速不花、女真人高觭、色目人也黑迭儿等。元大都城自至元四年（1267年）动工，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基本竣工，历时19年。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十二《赵文昭公行状》。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二）元大都城郭和城门

《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条载：大都“城方六十里”。经考古勘测，周围约 28600 米，是一座南北略长的方城。元大都城垣，今北京郊区仍有明显遗存。元大都城的北垣在今北京安定门和德胜门外五里左右小关一带的北土城，至今残垣亘延，十分触目。其东西两侧城垣与明清北京城的東西两侧城垣位置一致。明成祖迁都北京，加筑北京城郭，使之雄厚，将元大都城的東西城垣包筑在内。近年在拆除北京東西城垣时，已发现被包在其中的元大都城垣。元大都的南垣在今北京正阳门一线以北。今北京建国门南侧的古观象台，经考古勘查证明即元大都城的东南角。这座古观象台基础部分仍为元大都城垣夯土，并与大都城东南两面城垣夯土相接。1964 年又在古观象台西侧、建国门内大街以南的鲤鱼胡同内发掘出元大都南城垣基础。因此，可以确定元大都城南垣即在今北京东西长安街南侧的自古观象台至鲤鱼胡同之东西一线。但是，元大都南垣与其他三面又有所不同，它并非东西通直，而是在西段一处略有凸出。这是因为当时在大都南垣经过处有一著名寺院庆寿寺，高僧海云法师和可菴法师墓塔即建于此。明《顺天府志》录《元一统志》载大德三年碑云：“海云、可菴皆葬于寺之西南隅。至元四年（1267 年）新作大都，二师之塔适当城基，势必迁徙，以遂其直。有旨勿迁，俾曲其城以避之。”又载：“国师宝塔，塔去寺西南可十武，本朝丁巳年（1257 年）四月四日国师海云示寂，建塔于此。初赠燕赵佑圣安国大禅师光天镇国大士。至元四年（1267 年），城京师，有司定基，正直师塔。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庆寿寺今已不存，其址在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元大都城南垣在此处向外展三十步，绕过庆寿寺后复直向西去。

元大都城垣全部是黄土夯筑。今北京西北部海淀区黄亭子立有清乾隆皇帝“蓟门烟树”碑的土城台，即元大都城西垣北段遗址。土城台西侧有一条水沟，当即故元大都城的西城壕。1969 年在拆除明清北京城的東西城垣时，在城垣中心部位发现被包筑在内的故元大都城垣，城基宽 24 米。《马可·波罗游记》称大都城，“墙底宽约十步，向上递减，顶宽不超过三步”。是以知顶宽当是城基宽度的三分之一，约为 8 米。底宽上狭的构筑形式，可以使城垣更加稳定。元大都城的城基很深，深入自然土层达 2 米左右，直达生土层。为了使城垣更加牢固，在墙体中还加设永定柱（立柱）和絳木（横柱），其作用与现代建筑构件中的钢筋相仿，以增强拉力，保持城垣的整体性。夯土非常坚实，每夯土层厚约 6—11 厘米；夯窝排列整齐，间距 2—3 厘米，采用梅花桩夯法。考古发掘表明，元大都城的施工质量是相当高的。

今北京地区气候特点之一是夏季降雨比较集中，大多在每年的 7、8 月份。雨水急剧地连续不断地冲刷，对黄土筑就的元大都城是极大威胁。元朝在筑大都城时也采取了一些防止雨水坏城的措施。如在城垣顶部铺设半圆形的排水瓦管；此外，在雨季以苇排遮盖城墙，以避免更多的雨水渗入墙体造成破坏。为此，元朝于大都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外设苇场储存芦苇。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 年第 1 期。

分见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 年第 6 期；尹世同：《北京古观象台的考察和研究》，《文物》1983 年第 8 期。

参考傅公铨：《明代北京城垣》，载《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 年。

元熊梦祥《析津志》载：“世祖（忽必烈）筑城已周。乃于文明门外向东五里，立苇场，收苇以葺城。每岁收百万，以苇排编，自下砌上，恐致摧塌，累朝因之。”但是，这些措施并未能真正防止雨水坏城。元文宗之世，天下动乱，元廷恐起义百姓燃苇焚城，遂止葺城之举，每岁役民修补，终于在元顺帝至正八年（1348年）五月又发生“大都霖雨，京城崩”的事件。《析津志》载：元初，海运万户府朱清、张瑄曾提出愿出家资，以砖石包敷内外城墙，但因朱、张系海盗出身，后受元朝招抚而专门从事海运，并不受信任，故“因时宰言，乃废”。拉施特《史集》又称：“合罕（忽必烈）在其晚年曾下令运来石头，并欲以石头加固该墙，但他去世了。”似乎在忽必烈晚年曾有欲以砖石敷城的计划。但实际情况是，直至元末，仍只是“西城角上亦略用砖而已”。

元末，元大都城各城门外又增筑瓮城。《元史·顺帝纪八》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十月庚申朔，诏京师十一门皆筑瓮城、造吊桥。”这是元廷在南方诸省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际，为保证大都安全而采取的措施。1969年，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被包筑在其内的元大都和义门（今北京西直门）瓮城。据门洞内元人题记，可知其建于至正十八年（1358年），是以知在元顺帝诏建各门瓮城之前，实际已经施工。瓮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瓮城墙体表面敷以小砖；城顶地面铺砖，原应有门楼，估计是明初筑城时毁去。瓮城顶部正中偏西有两个小型蓄水池，池上覆盖凿有五孔的石板，是向水池注水的入口。水池旁有一流水沟，分三个漏水孔，穿过瓮城顶部而向下到达木质城门扇之上，这是专门设计用来阻止敌人焚烧城门的灭火设施。其设计之精巧，构思之绝妙，令人惊叹不已。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过去还没有这方面的发现。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已被破坏，今已无存，只有北垣一线地面还残留着元大都北门的瓮城土台。

《元史·地理志一》大都路条载：元大都“十一门，正南曰丽正（今正阳门北）、南之右（西）曰顺承（今宣武门北）、南之左（东）曰文明（今崇文门北），北之东曰安贞（今安定门小关），北之西曰健德（今德胜门小关），正东曰崇仁（今东直门）、东之右（南）曰齐化（今朝阳门）、东之左（北）曰光熙（今北京东城区和平里东广熙门），正西曰和义（今西直门）、西之右（北）曰肃清（今北京海淀区学院南路西端小西门）、西之左（南）曰平则（今阜成门）”。东南西三面，每面各开三门，惟北面开二门。（见图六）元帝居大都，每年三、四月都要往上都开平避暑，健德门（北西门）则为其出入都城必经之地。《元史·兵志三》载：“车驾行幸上都，太仆卿以下皆从，先驱马出健德门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元史·祭祀志五》亦载：“若驾幸上都，三献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诣健德门外，皆具公服于香舆前北向立，异位重行。”元帝自上都归大都，亦入自健德门。《元史·张九思传》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与皇太子幸上都，留丞相阿合马守大都。阿合马平日作恶多端，益都千户王著等谋除之，“夜聚数百人为仪卫，称太子，入健德门，直趋东宫”，召阿合马至，遂杀之。王著等为使阿合马及其党徒相信确实是皇太子归来，故自健德门入大都。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占领大都城后，为便于防守，将北城垣南缩约五里至

《元史》卷四十一《顺帝纪四》。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因此，元大都北面的健德门、安贞门，以及东之北的光熙门和西之北的肃清门先后皆毁。明成祖永乐十七年（1419年）为营建北京宫室、迁都北京，又将元大都城南垣向南展拓约二里。因此，大都城南面的丽正、顺承、文明三门亦毁，齐化、崇仁、和义、平则四门则被包筑在明北京城东西城垣之中。考古勘查结果表明，元大都城门洞仍为唐宋时期的“过梁式”木制结构，即门洞顶部为粗大木梁，门洞呈方形。瓮城门洞因建于元末，工程技术水平已有较大发展，所以门洞结构是“砖券式”与明清北京城门洞大致相仿。但门洞顶部砌的四层砖券，只有一层半与左右支重墙衔接，说明当时技术还不够熟练。可以认为，元代正处于中国城市建筑史上由唐宋向明清的转变时期。

元大都城的四隅皆有角楼，今北京建国门南侧古观象台即为元大都城东南角楼遗址。经考古勘查，东南角楼夯土较深，一般深约2.5米；面积也较大，南北长约50米，这是因为此处土壤泥泞，故需深打基础的缘故。元大都东北角楼的基础，无论深度和面积都比东南角楼基础小些。角楼两侧还设有马道，以便上下。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到达元上都开平，此后在元廷任职，直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离开中国。马可·波罗归国后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一书，对元大都城郭有详尽的描述，虽然不够精确，但是亦有史书不及之处，兹摘录如下，作为本节的概括。其文云：“新都的整体是正方形，范围38公里，每边约长10公里。周围环绕着土建的城墙，墙底宽约十步，向上递减，顶宽不超过三步。所有的城垛都是白色。……四周的城门共12个（误，当为11）城门。每边3个。每个城门的上端以及两门相隔的中间，都有一个漂亮的建筑物，即箭楼，所以每边共有5座这样的箭楼。楼内有收藏守城士兵武器的大房间。”“元大都城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马可波罗自意大利威尼斯出发，从地中海东岸登陆后横跨亚洲大陆到达中国，因此有条件将元大都与沿途所见到的诸大城市相比较。从他对元大都的惊叹不止，我们也可以看到元大都城在当时欧亚各国城市中的地位。

（三）元大都皇城、宫城和宫室

元大都皇城位于城市南部正中，包括今故宫、景山公园、北海、中海一带地区。宫城在皇城内东侧，这是由于皇城西侧是太液池（今北京北海、中海）广阔水域的缘故。前已言之，辽南京皇城偏在城市西南隅，金中都皇城位于城市中部偏西，成为内外环围的重城式格局，但皇城与宫城仍为前后套院式格局。元大都则由外郭、皇城、宫城三重环围，成为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京师布局，并为其后明、清二代沿袭不改。

元陶宗仪《辍耕录》、明萧洵《故宫遗录》及《马可·波罗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史集》等西方著作对元大都皇宫多有详细记载。近年来对元大都的考古勘查也有很多发现。兹综采诸书并其他资料，略述元大都皇宫及其建筑布局如下。

蒋忠义：《北京观象台的考察》，《考古》1983年第6期。

元大都皇城四至：东垣在今北京东城区南北河沿大街（又称东安门南、北大街）西侧之南北一线。西垣在今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大街之南北一线。南垣在今北京故宫东、西华门大街稍南之东西一线。北垣在今北京地安门南之东西一线。《故宫遗录》称皇城“周回可二十里”，实际周长大约是18.7里，基本符合。皇城城垣称萧墙、禁墙，又称阑马墙，这与蒙古族的游牧生活习俗有关。皇城城垣亦为黄土夯筑，故间有坍塌。《元典章·刑法三》载：“捉获跳过太液池围子禁墙楚添儿。本人状招于六月二十四日带酒见倒讹土墙，望潭内有船采打莲蓬，跳过墙去，被捉到官。”其结果，楚添儿以“大不敬”罪被处罚“徒一年，杖五十七”。元代，因太液池已被圈入皇城，故管理比金太宁宫时更为严格。元大都皇城城垣既为土城，又间有坍塌，其规模远逊于明、清北京皇城。

皇城正南门曰灵星门，遍漆朱红，故民间又称皇城城垣为“红门阑马墙”。灵星门遗址在今北京故宫午门附近。灵星门向外，正南两侧是千步廊，千步廊的南端即为大都正南门丽正门。入灵星门，其北数十步（一记二十步）有金水河，由西向东流，河上架设三座白石桥，曰周桥，形制犹如今北京故宫太和门前的金水桥，亦成天汉、牵牛之象。周桥石质明莹如玉，栏板雕琢龙凤祥云图案。桥下雕凿4条盘龙，卧于水中，周桥北约二百步，即为宫城正南门崇天门，又称午门。崇天门有五门，东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崇天门左、右百余步又有两掖门，左（东）曰星拱，右（西）曰云从，皆东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门的形制为倒凹字形，犹如今北京故宫午门，左右两翼伸出为两观。崇天门、两观和两掖门上皆建崇楼，其中以崇天门上的楼阁最为壮丽，两观上各建三级十字顶角楼。除崇天门外，宫城东、西、北三面各有一门，东曰东华，三门，一正二偏，西曰西华，亦一正二偏，皆东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东、西华门遗址在今北京故宫北端正对今北海团城之东西一线上，建于至元九年（1272年）。《元史·世祖纪一》载：“至元九年（1272年）五月乙酉，宫城初建东西华、左右掖门。”左右掖门系指星拱、云从门。宫城北门曰厚载，东西八十七尺，深四十五尺，其遗址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四至：北垣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少年宫前之东西一线。南垣在今北京故宫太和殿之东西一线。东垣和西垣大致在今北京故宫东、西垣处。《辍耕录》载：“宫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故宫遗录》称六七里），东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经实测，元大都宫城东西740米，南北1000米，与《辍耕录》所记基本相符。元大都宫城是一座南北略长的封闭建筑，宫垣皆为砖筑，各宫门皆“金铺、朱户、丹楹、藻绘、彤壁、琉璃瓦饰檐脊”，比金中都宫门更为华丽。宫城四隅各有一座十字顶角楼，皆重檐三重，以琉璃瓦饰檐脊。宫城南面崇天门外是宿卫军士的居所，建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

入崇天门，向北数十步为大明门，一正两偏，即外朝门，犹如今北京故宫之太和门。大明门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上有重檐。大明门又有左右掖门，左（东）曰日精，右（西）曰月华，供百官上朝出入。大明门内即外朝正殿大明殿，坐落在高大殿基之上。大明门内左右沿殿庭环以长庑，其中间接大明殿丹墀之半。殿庭左右有文武二楼，各与庑廊相连。大明殿是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四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癸巳，大将军徐达遣指挥张焕计度元皇城，周围一千二十六丈”。此似为大都宫城。

元帝登基、贺正旦、贺寿及会朝大典之处，犹如金中都大安殿和今北京故宫太和殿。《元史·礼乐志一》载：元正受朝仪（即贺正旦仪）：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至日，侍仪使分别至皇帝寝殿、皇后宫，导引帝、后到大明殿，升御榻。百官公服，分别自日精、月华门入。朝贺毕，四品以上赐酒殿上；四品以下，赐酒日精、月华门下。天寿节（皇帝生辰）受贺仪、郊庙礼成受贺仪，皆同于元正受朝仪，亦在大明殿举行。皇帝即位受朝仪：前期三日，习仪于圣寿万安寺。前二日，陈设于殿庭。前一日，设宣诏位于阙前。至日，侍仪使至皇太子寝殿，引皇太子自崇天门入，升大明殿；引进使导皇太子妃自凤仪门入。礼毕，侍仪使、引进使分别导帝、后归寝殿，如来仪。此外，群臣上皇帝尊号礼成受贺仪、册立皇太后仪、册立皇太子仪、太皇太后上尊号进册宝仪，亦皆在大明殿举行。大明殿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规模宏伟。殿基高于地面十尺，陛分三层，每层四周皆绕以雕刻龙凤的白玉石栏，栏下有石鳌头伸出，是排泄雨水的出口，其形制与今北京故宫太和殿相仿。夹大明殿东西各有寝宫，殿后又有柱廊，长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柱廊北端即后寝宫（又称香阁），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俗呼弩头殿。明叶子奇《草木子》又载：“元世祖创业艰难，故所居之地青草植于大内丹墀之前，谓之誓俭草。”此事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可得到印证，文云：“在这个围场（宫城）内又套有另一个围场（大明殿周垣）。城墙极厚，高达七米六。城垛和矮墙全是白色。这样又构成了一个周长六公里半的方场。……各城墙之间种着许多美丽的树木，还有草场，饲养各种野兽，如大鹿、麝、小鹿、黄鹿和同一类的其他动物。每道城墙之间，如果没有其他建筑物，也按这种规划布置。这些草场牧草丰盛。草场上的道路高出地面九十厘米，路面经过铺砌，使得污泥雨水不致于淤积路面。相反的，而是向两旁流去，有助于滋润草木。在这六公里半的围场里，耸立着大汗巍峨的宫殿。”由此观之，元帝在大内植草畜兽，主要是想使宫殿生活带有草原气息，“誓俭草”之说纯属附会之辞。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元大都城的所有城垛都是白色，特别是皇宫内城垛和矮墙也是白色，这种现象反映了蒙古族的民族特点和审美意识。因为汉族按五行学说是以赤色为喜色，所以皇宫墙壁多覆以朱红色。但是蒙古族却不然，蒙古族尚白。至今蒙古族婚娶时，聘礼中最名贵的是白骆驼，称为“云驼”，新娘出嫁前也要由伴娘用木梳沾白马奶梳头，象征着纯洁。元大都皇宫内白色的城垛和朱红色的宫门殿壁正反映了元大都在建筑方面民族文化的交融。大明殿连同柱廊、前后寝宫，构成工字形格局，这也是元廷宫殿独有的形式。大明殿内正中设有山字形玲珑金红屏台，台上置金龙床（又称七宝云龙御榻），台下两侧重行列床。台前是计时的七宝灯漏，高一丈七尺，灯架纯用黄金制成。七宝灯漏以流水为动力，其梁两端饰以龙首，通过其张吻转目之速度，可以观察灯内平水流动之缓急。中梁上饰有戏珠二龙，随珠俯仰，据此可以观察准水是否流动均调。灯漏内分四层：上层环布四神；次为龙虎乌龟之象，依时辰跳跃；又次周分一百刻度，列十二手棒时辰牌之神象，届时捧牌以出，另一木偶手指刻度；再次为执钟、鼓、钲、铙四木偶人，依不同时辰发出不同音响。这件举世仅有的精密仪器和珍贵艺术品是元朝著名科学家郭守敬制造的。大明殿中还设置一座木质银裹漆瓮，

高一丈七尺，可贮酒五十余石，这是其他朝代宫殿中不曾有的陈设，反映蒙古族的生活习惯。冬季，大明殿以黄皮为壁幃，黑貂皮为座褥；寝宫则以银鼠皮为壁幃，黑貂皮为床褥。大明殿左右后三面又有宫殿：左曰文思殿，右曰紫檀殿，以紫檀香木构筑，镂刻精美图案，壁上间饰白玉。后曰宝云殿，东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

大明殿、文思殿、紫檀殿、宝云殿皆属外朝宫殿，四周有周庑 120 间，高三十五尺，四隅有角楼，形成封闭的宫殿区。外朝区除正南有大明门和左右掖门外，其东庑辟凤仪门，东西一百尺，深、高各六十尺，门南有钟楼，又称文楼；西庑辟麟瑞门，规制与凤仪门相同，门南有鼓楼，又称武楼。文、武二楼皆高七十五尺。宝云殿后即北庑辟二门，东曰嘉庆，西曰景福。

出嘉庆门或景福门，其北即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内廷区延春宫。延春宫正南门曰延春门，一正两偏，东西七十七尺，上有重檐。延春门又有左右掖门，左曰懿范，右曰嘉则。入延春门，正北即延春阁，其址在今北京景山公园主峰位置。延春阁东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重檐三层。延春阁亦建筑在高大的殿基上，门庑制度大致与大明殿相仿。阁的底层是延春堂，以用核桃磨过的浚州花板石铺地，光亮可鉴，正中设玉台床，床前亦置金制酒瓮，称金玉海，四周有金红小连床，是陪宴者的座位。延春堂内东隅有梯，循梯而上即为延春阁。延春阁是大内中最高的建筑，比大明殿还要高出十尺，其顶为拱形攒顶，中盘金龙，四周皆为金珠琐窗，窗外环以周廊，凭栏远眺，至为雄杰。夹延春阁左右各有寝宫，阁后为柱廊，广四十五尺，长一百四十尺，高五十尺；柱廊北接后寝宫，东西一百四十尺，深、高各七十五尺，亦成工字形格局。延春阁寝宫东有慈福殿，又称东暖殿，前后轩，东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西曰明仁殿，又称西暖殿，规制与慈福殿相同；后曰清宁宫，其内遍植芳草，间置假山。《故宫遗录》称“清宁宫后引抱长庑，远接延春宫，其中皆以处嬖幸也。”

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内廷区也是封闭的宫殿区，四周有周庑 172 间，四隅亦有角楼。除正南门延春门和左右掖门外，东庑辟景耀门，高三十尺，门南有钟楼；西庑辟清灏门，形制与景耀门相同，门南有鼓楼。钟、鼓楼各高七十五尺。

延春阁西庑清灏门外有玉德殿，东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饰以白玉，上雕龙云图案，地铺纹石。殿内正中设白玉金花山字屏台，上置玉床。玉德殿左右后三面亦有宫殿，东曰东香殿，西曰西香殿，北曰宸庆殿，宸庆殿东西一百三十尺，深、高各四十尺，内设御榻，前列朱栏，左右各有一座更衣殿。延春阁东庑外、宫城东华门内有皇后宫（称皇后斡耳朵）。《析津志·岁纪》载：每岁正月，僧人游皇城祈福，“自东华门内，经十一室皇后斡耳朵前，转首清宁殿后，出厚载门外”。故皇后宫应在东华门内稍北。皇后宫中有坤德殿。《元史·后妃传一》载：元顺帝伯颜忽都皇后，“居坤德殿，终日端坐，未尝妄踰户阈”。当时顺帝宠妃第二皇后奇氏居兴圣宫（在今北海公园西岸），此坤德殿当即大内皇后宫中宫殿。

延春阁周庑亦当有北门，但其名《辍耕录》、《故宫遗录》皆不载。延春阁北庑门之北即正对宫城北门厚载门。原载门上建崇阁，前有舞台。崇阁与舞台之间架设飞桥。元帝幸厚载门阁上，舞伎歌舞于台，在乐队导引下自舞台升于阁上，丝竹之声远闻市内，如同仙乐。舞台东百步有观星台（在今北京景山公园东北隅），台旁种植雪柳万株，风景幽雅。台西为内浴室，前

有小殿。由浴室可西出宫城，即太液池（又称海子，今北京北海、中海）东岸。

厚载门之北为禁苑，自太液池引水以供水碾和灌溉花木之用。其内有耕田八顷，殿五所，元帝在此举行藉田之礼以劝农事。

元大都大内宫殿基本是按照对称原则建造的，如大明殿左右的文思殿和紫檀殿对称，延春阁左右的慈福殿和明仁殿对称，外朝和内廷东西庑的钟鼓楼和鼓楼对称，等等。这种对称的建筑布局，易给人以庄严宏伟的感受，令人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元大都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今北京正阳门北），北过灵星门、崇天门、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殿、厚载门，直达中心阁（今北京鼓楼）。在这条中轴线上有大道，宽 28 米。大内主城门和主殿皆建在中轴线上，配殿和其他建筑则分列于中轴线两侧，从而突出元帝贵为天子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君权思想在建筑形式上的体现。元大都城事前经过精密规划，其中轴线亦为事前划定。《析津志》载：“世祖皇帝建都之时，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向以对，上制可，遂封为独树将军，赐以金牌。每元会圣节及元宵三夕，于树身悬挂诸色花灯于上，高低照耀，远望若火龙。”元大都中轴线的确定过程是否真如《析津志》所述，别无佐证，姑且不论。但刘秉忠在确定大都城中轴线时肯定经过精细测量，其或以一物为参照物亦未可知。《析津志》载：“至元四年（1267 年）二月己丑，始于燕京东北隅，辨方位，设邦建都，以为天下本。四月甲子，筑内皇城。位置公定（宇）方隅，始于新都凤池坊（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东北）北立中书省。”由此可知，设计大都城时，先是确定城市中轴线，然后再据此确定皇城位置，继由此而设定百官衙署方位。

宫城之西太液池广五六里，即今北京城内北海、中海，当时水域比现代更为广阔。元大都宫城西华门外即太液池东岸。金代，今北海、中海及其以北的积水潭统称白莲潭，以水中遍植莲花而得名，其内有瑶光台（今北海公园团城）、琼华岛。元代，瑶光台改称瀛洲（又称圆坻），其上有仪天殿，又称圆殿，高三十五尺，周七十尺，重檐圆顶，地铺纹石。殿内设御榻，四周为琐窗，东西各一门。瀛洲东西各有木桥飞架，通太液池东西两岸。东木桥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二尺，东抵西华门。西木桥长四百七十尺，宽亦二十二尺，西抵兴圣宫前，直西即皇城西门。明代，今北京北海公园团城以东的水域填平，宫城与今团城之间成为陆地，东木桥遂废。西木桥改为石桥。即今团城西的金鳌玉蝀桥。瀛洲仪天殿正北的旧金琼华岛，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 年）改称万岁山，又称万寿山。前已言之，在建大都城以前，中统五年（1264 年）二月已先行修复琼华岛宫殿以为元世祖驻蹕之所。但陶宗仪《辍耕录》“万岁山”、“宫阙制度”条均称琼华岛修复于中统三年（1262 年），或早在中统五年（1264 年）以前琼华岛就已动工修缮而《元史》失载。瀛洲北有白玉石桥与万岁山（琼华岛）相通，长二百余尺，桥北端有拱门。过拱门，分东西两道登万岁山。万岁山高数十丈，奇石叠壘，芳草翠绿，松桧隆郁。山南麓之半有仁智殿，高三十尺，今北海公园琼岛上之普安佛殿当即其遗址。仁智殿东北有介福殿，东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西北有延和殿，规制与介福殿相同。广寒殿在万岁山顶，东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纹石铺地，四面皆为线金朱红琐窗，殿内外 12 柱上皆绕刻云龙，涂以黄金。殿身左右后三面用数千万片香木做成祥云状，饰以黄金，拥结于顶，上盘金龙。广寒殿内，中有小玉殿，内设嵌玉金龙御榻，其前左

右分列金红连床，是侍宴大臣座位。御榻前架设黑玉酒瓮，其质黑白相间，随纹理而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可贮酒三十余石，即所谓读山大玉海。明万历中广寒殿倒塌后，读山大玉海流失于皇城内西华门外真武庙，清乾隆中始移置于今北海团城，至今尚在。广寒殿前东西两侧各有二亭：东曰金露亭，高二十四尺，九柱尖顶，其上置琉璃珠，系圆亭，其前为方壶亭，又称线珠亭；西曰玉虹亭，其规制与金露亭相同，其前有瀛洲亭。方壶亭前有荷叶殿，瀛洲亭前有温石浴室。温石浴室高二十三尺，方顶，上置涂金宝瓶。荷叶殿稍西有圆亭，又称胭脂亭，系妃嫔添妆之所。万岁山东有灵圃，内畜奇兽珍禽。《辍耕录》又云：“万岁山之东有石桥，长七十六尺，宽四十一尺，半为石渠，以载金水，而流于山后以汲于山顶也。”此石桥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东门内石桥之前身，当时是行人兼为石渠的两用桥。流入大内的金水半途被自东北引入石渠到达万岁山北，用机械汲上山顶达广寒殿后壁，自一石龙首流出，下注方池，复伏流至仁智殿后壁，自一昂首石龙首喷出，东西流入太液池。这实际是一组利用机械和地势的高度差而造成的人工喷泉装置，其想象之丰富，设计之绝妙，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元氏掖庭记》中曾记述至大二年（1309年）元武宗和众嫔妃于中秋之夜游太液池的情景。其夜“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绿荷含香，芳藻吐秀，游鱼浮鸟竞戏群集。”武宗命宫女装扮成军人，分乘两支船队，左队冠赤羽冠，建凤尾旗，执泥金画戟，号称凤队；右队冠漆朱帽，建鹤翼旗，执沥粉雕戈，号称鹤团，两军水击为戏，戟刺戈横，以为娱乐。湖面上还有用采帛装饰的采菱、采莲小舟，轻快便捷，往来如飞。武宗在这里开宴张乐，令宫女在前披罗曳，舞“八展舞”，唱“贺新凉”曲。酒至半酣，菱舟莲艇献上刚采摘的鲜嫩菱藕。于是，众唱“龙归洞”之歌，兴极而返。

从瀛洲（今北海公园团城）西木桥渡太液池，即达西岸隆福宫、兴圣宫。西木桥和东木桥不同，系吊桥。其中间缺一段桥梁，立柱架梁于二舟之上。每当元帝巡幸上都时，留守官即移舟断桥，以禁出入往来。西木桥西端正对兴圣宫外夹垣之东红门，直西即为皇城西门，其间有长街。隆福宫在长街南，兴圣宫在长街北。元隆福宫的经历与金中都东宫相仿。其处原为东宫，系元世祖皇太子真金居所，始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年）四月。元世祖忽必烈晚年，真金以奸臣谗言而忧死。至元三十年（1293年）六月，元世祖复立真金第三子铁穆尔为皇太子。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卒，铁穆耳即位，是为元成宗。同年四月，元成宗追尊其父真金为皇帝，尊其母元妃为皇太后，“五月己巳，改皇太后所居旧太子府为隆福宫”，原东宫衙署亦相应改称。由此，原为皇太子居所的东宫（太子府）即成为皇太后的居所隆福宫。

隆福宫四周以砖垣环围，南有三门，东西北各一门。隆福宫南门内即为光天门，高三十一尺，重檐，其左右掖门分别称崇华、膺福。入光天门，其北正中即隆福宫正殿光天殿，东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夹光天殿东西两侧有寝殿，其后柱廊长九十八尺，高五十尺，柱廊北端即后寝殿，东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其整体格局仍为工字形。光天殿内设樟木御榻，上雕饰金云龙。寝殿四壁敷以绢素，上画飞龙舞凤，极为明旷。光

《元氏掖庭记》，载陶宗仪：《说郛》卷一百十。

《元史》卷十八《成宗纪一》。

天殿左右后三面亦有宫殿，成品字格局，左曰寿昌殿，又称东暖阁、沉香殿；右曰嘉禧殿，又称西暖阁、宝殿，皆前后轩，重檐；后曰针线殿。以光天殿为主的这一宫殿区四周也有周庑环绕，计一百七十二间。周庑四隅各有角楼。东庑辟青阳门，门南有凤楼，西庑辟明晖门，门南有驂龙楼，皆高四十五尺。周庑之外仍有宫殿。西庑明晖门外有文德殿，纯系楠木构筑，又称楠木殿，系泰定元年（1324年）所建。西北角楼西（即文德殿后）有鹿顶殿，系延佑五年（1318年）建造。东庑外有睿安殿，其东北亦有鹿顶殿。《马可·波罗游记》述云：“在皇帝居住的宏伟皇宫对面，另有一座宫殿，它无论从哪一方面都和正宫一样，这是皇太子真金的住所。”其对隆福宫的概括是相当准确的。

隆福宫西有御苑，妃嫔多居于此。御苑西南有石假山（在今北京西城区西皇城根南街东之图样山胡同一带），高五十丈，山上怪石嶙峋，间植异木，杂以幽芳。山顶有香殿，殿后柱廊与龟头屋相接，亦成工字格局，碧瓦飞檐，气势非凡。山之北有两道红门，门外东西各有一座太子斡耳朵荷叶殿，分置于石假山两侧。山之南有圆殿，重檐碧瓦，顶置涂金宝珠。山与圆殿之间有流杯池。《元史·裕宗传》载：至元中，“东宫（即隆福宫）香殿成，工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太子（真金）曰：‘古有肉林酒池，尔欲吾效之耶！’不许。”真金死后，这座流杯池还是建造了。流杯池上有亭，中有白玉石床，皆临水散座。又刻石为水兽，涂以黄金，潜跃座旁。水中有水鸟形浮杯，在曲水中屈曲而行，以为劝饮之戏。流杯池东西各有一座流水圆亭，与圆殿之间有庑廊相接。《元史·英宗纪二》载：“至治二年（1322年）二月甲寅，以太庙役军造流杯池行殿。”所谓流杯池行殿或即指圆殿而言。圆殿之南是歇山殿，有柱廊二。歇山殿（又称新殿）之北有池。东、西水心亭（又称水晶殿）即建于池中，分置歇山殿左右。《元史·泰定帝纪一》载：“泰定元年（1324年）六月辛未，修黑牙蛮答哥佛事于水晶殿。”即在此处。水心亭（水晶殿）通体用玻璃装饰，日光辉映，宛如水宫。水心亭之北，又有二亭，亦分置东西，与二水心亭南北相直。石假山东有棕毛殿，以其用棕毛覆顶而得名。在众多金碧辉煌的宫殿中，棕毛殿显得情趣古朴，风格特异。

隆福宫之北隔长街为兴圣宫。马可·波罗称东宫（隆福宫）与正宫相同，只是言其与大内大明殿外朝区布局相同，而不是大内全体。真正在布局上与大内相同的应是兴圣宫，只是其建造时马可·波罗早已归国，其《游记》当然也就无从叙述。兴圣宫是无武宗为其母兴圣皇后答吉所建。答吉是顺宗（真金之第二子）之妻，生海山（即武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仁宗）二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真金之第三子）卒，宗室内乱。答吉携爱育黎拔力八达奔归大都，召集亲信右丞相哈剌哈孙等，诛成宗皇后党徒左丞相阿忽台、中政院使怯烈等，遣使迎海山为帝，是为武宗。武宗即位后，感念母恩，乃建兴圣宫。《元史·后妃传二》载：“至大元年（1308年）三月，帝为太后建兴圣宫，给钞五万锭、丝二万斤。三年（1310年）十月戊申，帝率皇太子诸王群臣朝兴圣宫，上皇太后尊号册宝曰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当时，督掌兴圣宫工程的主要是元知枢密院事憨刺合儿和内宰司照磨刘德温二人。武宗之世，母子、兄弟和睦，史称“三宫协和”。皇太后既居兴圣宫，武宗居大内，则当时作为皇太子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当居隆福宫。质言之，武宗之世，隆福宫可能又恢复为皇太子的居所。武宗卒，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历武宗、仁宗之世，兴圣宫一直是兴圣皇太后

的居所。延佑七年（1320年）正月，仁宗卒，其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英宗“尊（兴圣）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壬辰，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贺于兴圣宫”。当时，兴圣太皇太后仍居兴圣宫。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兴圣太皇太后卒，兴圣宫的地位遂有变化。至治三年（1323年）八月，英宗遇弑，显宗（真金之长子）之长子也孙铁木儿即位，是为泰定帝。泰定帝之母早卒，故其在位时兴圣宫遂成召见百官议事之所。《元史·明宗纪》载：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卒于上都，时御史大夫倒刺沙等谋立在上都的泰定帝幼子为帝。留守大都的金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不从，图谋举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兴圣宫，兵皆露刃，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缚平章乌伯都刺等下狱。“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固守内廷”，遣使迎立文宗（武宗之子）。燕铁木儿所以召百官集兴圣宫，即因泰定帝在世时此处即已成为常朝议事之处。泰定帝还常在此举行典礼，如《元史·泰定纪二》载：“致和元年（1328年）三月己卯，帝御兴圣殿受无量寿佛戒于帝师。”即属此类。文宗虽在燕铁木儿等蒙古贵族支持下击溃泰定帝一系势力，但其兄和世仍在北边，故虽已称帝仍复避虚帝位以待。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丙戌，和世即帝位于和林，是为明宗。明宗和世依兄弟继承旧例，立文宗为皇太子。文宗当时即居兴圣宫，因此直至同年八月明宗被文宗亲信燕铁木儿毒死以前，兴圣宫一度属于东宫皇太子居所。当时，文宗的许多活动都与兴圣宫有关。《元史·文宗纪一》载：天历元年（1328年）十月，以燕铁木儿拥立有功，“丙申，燕铁木儿入朝，赐宴兴圣殿。”同月辛丑，上都破，倒刺沙等奉皇帝宝以降，“庚戌，帝御兴圣殿，齐王月鲁帖木儿……奉上皇帝宝”。天历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又于兴圣殿西庑建奎章阁，招揽天下英才，为夺取帝位而加强自己的势力。《辍耕录》云：“天历初，建奎章阁于西宫兴圣殿之西廊，为屋三间，高明敞爽……初名奎章阁，阶正三品，隶东宫属官。后文宗复位（即明宗死后），乃升为奎章阁学士院，阶正二品，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元末，奎章阁改称宣文阁。宁宗之世，兴圣宫复为皇太后宫。《元史·宁宗纪》载：“至顺三年（1332年）十一月戊寅，奉玉册、玉宝尊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御兴圣殿受朝贺。”宁宗是明宗之子，其母八不沙皇后乃蛮真氏早卒于至顺元年（1330年），此皇太后乃文宗卜答失里皇后弘吉刺氏。卜答失里皇后秉文宗遗命，立明宗之子宁宗为帝，故被尊为皇太后，得居兴圣宫。顺帝以年幼登基，仍尊其为皇太后，后至元元年（1335年）复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起居兴圣宫不变。卜答失里太皇太后卒于后至元六年（1340年），其后兴圣宫则为顺帝宠妃第二皇后奇氏居所，直至元亡。简而言之，兴圣宫本为皇太后或太皇太后居所，但其间亦曾为皇太子居所、皇帝别宫，以及第二皇后的居所。

兴圣宫位于万岁山正西，隆福宫之北，大致即今北京北海公园西岸以西一带。兴圣宫四周亦围以砖垣，南辟红门三座，一正两偏，其他三面各辟一门。南门前夹垣内设省院台百司官侍直板房。入兴圣宫南红门，其北即为兴圣门，三门重檐，东西七十四尺，正门曰兴圣，东掖门曰明华，西掖门曰肃章。入兴圣门，其北正中即为兴圣宫正殿兴圣殿，东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夹兴圣殿左右亦有寝殿，后有柱廊长九十四尺，其后亦有寝殿，其尺度比大

内大明殿小一半左右，亦成工字格局。兴圣殿内，四面朱悬琐窗，纹石铺地，正中设御榻，两旁重列百官、宿卫官侍宴坐床。其殿，白玉石重阶，朱红栏杆，白瓷瓦覆顶，碧琉璃饰脊。东西各有一座配殿，东曰嘉德殿，西曰宝慈殿，规制相同。兴圣宫亦有周庑，东庑辟弘庆门，门南有凝晖楼；西庑辟宣则门，门南有延颢楼。兴圣殿之北垣辟红门一座，即北红门。前已言之，兴圣宫是具体而微的皇宫大内，大内大明殿之北有延春阁，兴圣殿之北则有延华阁。出兴圣殿北红门，其北为山字门，即延华阁正门。延华阁四周有红垣环绕，与兴圣殿相隔，系黄土板筑。《故宫遗录》赞叹延华阁之崇丽云：“东西翼为仙桥，四起雕窗，中抱彩楼（即延华阁），皆为凤翅飞檐，鹿顶层出，极尽巧奇。”延华阁前有东西配殿，阁后并列三座凉亭，中曰圆亭、东曰芳碧亭、西曰徽青亭。芳碧亭，重檐十字脊，青琉璃瓦覆顶，绿琉瓦饰脊，上置金宝瓶。徽青亭规制与芳碧亭相同。西配殿后，延华阁之西有畏吾儿殿，殿后有木香亭。与大内延春阁一样，延华阁东西垣外又别有宫殿：东垣外有东鹿顶殿，正殿5间，前轩3间，东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其后有柱廊长二十六尺，柱廊北端又有寝殿，全局亦成工字形。殿之旁，还有附设的庖室、妃嫔库房、缝纫女库房等建筑10余间。西垣外有西鹿顶殿，规制与东鹿顶殿相同。东西鹿顶殿之后各有一座妃嫔院。侍女室共计85间，半在东妃嫔院，半在西妃嫔院。奎章阁在兴圣殿西庑。虞集《奎章阁记》云：“其为阁也，因便殿之西庑，择高明而有容。不加饰乎采，不重劳于土木。不过启户牖以顺清燠，树度阁以栖图书而已。”可见其是就兴圣殿西庑廊房略为改建而成。元帝除在此与儒臣讨论儒家经典外，还与近臣商议国事，“宰辅有所奏请，宥密有所图回，诤臣有所绳纠，侍从有所献替，以次入对，从容密勿。”元末，顺帝“至正元年（1341年）六月戊辰，改奎章阁为宣文阁”。并迁宣文阁于大内大明殿西北，亦即延春阁西庑外之玉德殿附近。元汪克宽《宣文阁赋》云：“建杰阁乎中霄，屹大明之西北。揭宣文之嘉名，示弘摹于万亿。”元顺帝又以旧宫学在宫门外，房舍隘陋，诏迁宫学于宣文阁附近之玉德殿西室。元周伯琦《奉诏以玉德殿西室为宫学诗》云：“学校尊崇盛典扬，诏迁玉德殿西廊。”即指此事。其《宣文下直诗》又云：“亭亭翠柏倚朱栏，云母窗扉逼暮寒。玉德殿前红杏树，数花犹作去年看。”宣文阁和宫学并在一处。宣文阁既自兴圣宫迁入大内，原兴圣殿西庑宣文阁址即为闲置，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在此置端本堂，以为皇太子肄业之所。《元史·顺帝纪五》载：“至正九年（1349年）七月壬辰，诏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习学汉人文书，以李好友为谕德，归暘为赞善，张冲为文学。十月丁酉，命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自是日为始入端本堂肄业。命脱脱领端本堂事，司徒雅普化知端本堂事。端本堂虚中座，以俟至尊临幸，太子与师傅分东西向坐以授书，其下僚属以次列坐。”王祚《端本堂颂》云：“兴圣之宫，皇帝攸居。前殿后阁，东西万庐。有翼者堂，在殿西庑。厥堂何为？皇子来处。”端本堂实即兴圣殿西庑旧宣文阁亦即奎章阁之改名。

关于元大都皇城及大内宫殿，大约在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到达中

《元史》卷四十《顺帝纪三》。

汪克宽：《环谷集》。

周伯琦：《近光集》。

王祚：《王忠文公集》。

国、并在大都生活3年之久的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有生动的描述，其《鄂多立克东游录》述云：“大汗在这里（大都）有他的驻地，并有一座大宫殿，城墙周长约4英里。其中尚有很多其他的壮丽宫殿。（因为在大宫殿的墙内，有第二层围墙，其间的距离约为一箭之遥，而在两墙之间则有着他的库藏和他所有的奴隶；同时，大汗及他的家人住在内层，他们极多，有许多子女、女婿、孙儿孙女；以及众多的妻妾、参谋、书记和仆人，使4英里范围内的整个宫殿都住满了人。）大宫墙内，堆起一座小山（指万岁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此山遍植树，故此名为绿山。山旁凿有一池，方圆超过1英里，上跨一极美之桥（即仪天殿北之白石桥）。池上有无数野鹅、鸭子和天鹅，使人惊叹；所以君王想游乐时无需离家。宫墙内还有布满各种野兽的丛林；因之他能随意行猎，再不要离开该地。总之，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其殿基离地约两步，其内有24根金柱；墙上均悬挂着红色皮革，据称系世上最佳者。宫中央有一大瓮，两步多高，纯用一种叫做密尔答哈的宝石制成（而且是那样精美，以致我听说它的价值超过4座大城）。瓮的四周悉绕以金，每角有一龙，作凶猛搏击状。此瓮尚有下垂的以大珠缀成的网罽，宽为一拏。瓮里的酒是从宫廷用管子输送进去；瓮旁有很多金酒杯，随意饮用。宫殿中尚有很多金孔雀。当鞑靼人想使他们的君主高兴时，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去拍手；孔雀随之振翅，状若舞蹈。那么这必定系由魔法驱动，或在地下有机关。”这些记载对于了解元大都皇宫及元帝的生活非常珍贵，特别是其中有些记载并不见于中国史籍。

（四）元大都坛庙

元大都是元朝京师，元廷依照礼制在此设建宗庙、郊坛，以为祭祖和郊祀之所。

《元史·世祖纪四》载：“中统元年（1260年）四月戊戌朔，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其时，阿里不哥据和林（今蒙古共和国哈尔和林）与忽必烈争夺帝位，故中书省即设在燕京。同年七月丁丑，忽必烈设祖宗神位于中书省。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庚申朔，诏以燕京忽突花私宅为中书省署，原置于旧中书省的祖宗神主奉迁于燕京圣安寺（在悯忠寺西），藏于瑞象殿。其时，祭祀仪式仍在中书省举行，礼毕，复将神主奉归圣安寺。中统四年（1263年）三月癸卯，诏建太庙于燕京，即旧金中都城内。至元元年（1264年）十月，燕京太庙告成，乃自圣安寺奉迁神主于太庙。燕京太庙初为七室，至元三年（1266年）复改为八室。至元四年（1267年）正月，忽必烈弃燕京旧城，择其东北建大都城。中国古代王都的典型布局是“左祖右社，面朝后市”。至元十三年（1276年）大都皇城宫室基本建成以后，太庙的位置也就可以据以确定。次年（1277年）“八月乙丑，诏建太庙于大都”，至元十七年（1280年）十二月初步建成。元大都太庙方位与金中都太庙不同，不在皇城内东侧，而是在皇城以东的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大街之北，其门南向，门外驰道抵齐化门大街。大都新庙建成，即遣使奉迁旧金中都城（又称南城、旧城）太庙神主，并拆毁旧庙。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三月丁卯，大都太庙正殿建成，乃奉安神主于其中。大都太庙

《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三》“宗庙上”。

前庙后寝，前庙正殿东西 7 间，南北宽 5 间，内分 7 室。阶三道，中曰泰阶，东曰阼阶，西曰西阶。寝殿东西 5 间，南北宽 3 间。庙、寝四周围以宫城，四隅各有角楼。宫城南、东、西三面各辟神门。每面神门皆有五门，一正，左右各二偏门。正殿前为十字街，方砖铺地；东西向曰横街，两端与东、西神门相对；南向曰通街，直对南神门。通街两旁各有一井，上建亭以覆之。宫城外，又有一道崇垣，即太庙外垣。外垣亦南、东、西三面辟门。每面三门，一正两偏，曰棂星门。南棂星门外驰道，即南抵齐化门内大街。在太庙外垣与宫城之间，还有一些建筑：南神门外之东有饌幕殿（即祭前放置祭品处）。宫城东南有齐班厅。东神门外稍北有省饌殿（即祭前太常卿审视祭品处）。宫城之东、东棂星门内稍北有初献斋室，其西又有各礼官斋室。雅乐库在宫城西南，法物库、仪鸾库在宫城东北。宫城之东还有一处院落，院门西向，此即神厨院，宰杀牺牲之处，内有神厨局、井亭、酒库、祠祭局。神厨院南是百官厨。南神门与南棂星门之间复有一门与之南北相对，左右有排房 60 余间，东至齐班厅，西至雅乐库，此即诸执事斋房。元英宗之世，曾对太庙有较大改建。至治元年（1321 年）正月，命于太庙外垣内西北建大次殿，以为元帝亲祀太庙时止息之所。二年（1322 年），始于原太庙正殿前别建大殿 15 间，以原正殿为寝殿，次年（1323 年）七月竣工。新殿建于旧殿之南，估计宫城亦应相应南展，凡属南神门附近建筑亦应南徙。

元大都太庙内没有如金中都衍庆宫那样的专门供奉历朝帝王御容的宫殿。元代，供奉先帝、母后御容的建筑称神御殿，又称影堂，分别附设在大都各著名寺院内。所奉祖宗御容，皆由大都纹绮局工匠织造。据《元史·祭祀志四》记载：元世祖帝、后影堂和其子裕宗（真金）帝、后影堂皆建于大圣寿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顺宗帝、后影堂和仁宗帝、后影堂皆建于大普庆寺（今北京西城区宝产胡同东口以南）。成宗帝、后影堂建于大天寿万宁寺（今北京鼓楼东侧）。武宗和二后影堂建于大崇恩福元寺（不详）。明宗帝、后影堂建于大天源延圣寺（在今北京西山八大处）。英宗帝、后影堂建于大永福寺（在今北京白塔寺西）。也可皇后（即世祖顺圣皇后）影堂建于大护国仁王寺（今北京西直门外高粱河畔）。诸帝、后影堂皆有名号，如世祖影堂曰元寿，裕宗影堂曰明寿，成宗影堂曰广寿，等等。元帝赐给这些寺院大量土地、钱钞以为供养。如《元史·泰定帝纪》载：“泰定二年（1325 年）正月甲辰，奉安显宗（泰定帝之父）像于永福寺，给祭田百顷。三年（1326 年）二月丙申，建显宗神御殿于卢师寺，赐额曰大天源延圣寺。十月庚辰，奉安显宗御容于大天源延圣寺。壬午，赐大天源延圣寺钞二万锭，吉安、临江二路田千顷。”元帝这种淫祀之风严重损害国家财政，为此，中书省奏言：“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赐永业，当时已号虚费。而成宗复构天寿万宁寺，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华普庆，租榷所入，益又甚焉。……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孙当其惜之，臣恐兹后藉为口实，妄兴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泰定帝虽口头嘉许，但其行不改。

元大都太庙在城东齐化门（今北京朝阳门）内，按照“左祖右社”之制，社稷坛即建在大都城西和义门（今北京西直门）内稍南。《元史·世祖纪十四》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七月壬申，建社稷和义门内，坛各方五丈，高五尺，白石为主，饰以五方色土。……悉仿古制，别为斋庐，门庑 33 楹。”社稷坛占地四十亩，四周围以砖垣二重，社稷二坛在内垣正中偏南，社坛在东，稷坛在西。社坛上以青赤白黑四色土依方位填筑，中间为黄土。

坛四面正中各有一条陛道，广一丈，亦依不同方向而颜色不同。稷坛和社坛制度相同，只是纯用黄土，不取五色土填筑。此外，社坛有石主，在坛南，一半埋在土中；稷坛无石主。内围垣高五丈，广三十丈，四面各辟一座棂星门。外围垣只有南北二棂星门。在内外围垣之间，又有望祀堂（遇风雨时则在此望祭）、齐班厅、献官幕、院官斋所、祠祭局、仪鸾库、法物库、都监库、雅乐库、百官厨、太乐署、乐工房、饌幕殿、神厨院、酒库、牺牲亭、执事官廊房等建筑。

元大都先农、先蚕二坛在藉田中，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建。《元史·河渠志一》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凿大都通惠河以利漕运，其中“藉东闸二，在都城东南王家庄”。藉东闸，即以其在藉田之东而得名。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藉东闸改名庆丰”。《析津志》载“庆丰闸二，在藉田东”。庆丰闸在今北京东便门外朝阳区厂坡村。据此，元大都藉田当在今北京东便门与厂坡村之间，亦即大都城东南，此即元大都先农、先蚕二坛处址。先农、先蚕二坛规制与社稷二坛相同，只是因建于藉田中，恐妨耕作，故不设围垣。

元大都的天地坛与金中都不同，不是分设在城市南北，而是合祭天地于南郊坛一处。质言之，即将地坛并于天坛。《元史·祭祀志一》载：“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以受尊号，遣使预告天地……于国阳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设昊天上帝、皇地祇位二，行一献礼。”此即元大都南郊坛之滥觞。元大都南郊坛建成于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元史·成宗纪四》载：“大德九年（1305年）七月辛亥，筑郊坛于丽正（今北京正阳门北）、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之南丙位，设郊祀署，令、丞各一员……”丙位，即东南位，是以知南郊坛在大都城东南，亦即元世祖建祭台之处。南郊坛外有周垣。其内，坛之四周有围垣二重（即内外坛）。内围垣距坛二十五步，外围垣距内围垣五十四步，均严格按照礼制要求而设计。内外围垣四面各有门，皆为一正两偏，称坛门。外周垣只辟南东西三面门，称棂星门。内外围垣之间设燎坛，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周围亦围以砖垣。外围垣南门外，西有香殿，东有饌幕殿；正南则对中神门，门两翼为执事官斋房，再向左右延伸则有墙和南郊坛外周垣相接。外围垣东门外稍北有省饌殿；东南为神厨院，院南垣外为献官斋房，斋房之西为齐班厅。外围垣之外、周垣之内，还有仪鸾局、法物库、都监库、雅乐库、演乐堂、献官厨、牺牲房等建筑。

元大都南郊坛虽合祭天地，但其制却完全采用天坛形式，而且一般也通称天坛。坛为圆形，昊天上帝位在坛之正中偏北，皇地祇位在其东北，皆南向。坛分三层，每一层台高八尺一寸，上层台方五丈，中层台方十丈，最底层台方十五丈。坛之四面正中各有一条陛道，十二级。

元世祖至元初年，无风雨雷师坛之制，只是春季祭风师于大都东北郊，夏季祭雨雷师于大都西南郊。元仁宗延佑五年（1318年），乃在大都东北郊和西南郊分建风师坛和雨、雷师坛。

此外，元大都与金中都一样，还设有宣圣庙（即孔庙），又称文宣王庙，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建，其址在今北京首都博物馆。宣圣庙之西即为元朝最高学府国子学，其址在今北京首都图书馆。武成王庙在枢密院之西。

（五）元大都坊市和街道

元大都因系择址新建，城市规划不受旧格局约束，所以其居民区与金中

都新旧坊制混合形式不同，全部为开放形式的街巷。按照方位，元廷将大都街道分为 50 坊：福田坊，在西白塔寺，即今北京白塔寺一带。阜财坊，在顺承门内金玉局巷口，即今北京民族文化宫以北。金城坊，在平则门内，即今北京阜成门内大街以南之大水车胡同一带。玉铉坊，在中书省前相近，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保大坊，在枢密院北，即今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带。灵椿坊，在大都路总管府北，即今北京安定门内大街之西灵光胡同一带。丹桂坊，在灵椿坊北。明时坊，在太史院东，即今北京建国门内观象台一带。凤池坊，在斜街北，地近海子，即今北京鼓楼西大街以北。安富坊，在顺承门羊角市，即今西皇城根南街以西、甘石桥东北。怀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太平坊，有大承华普庆寺，在今北京西直门内宝产胡同一带。大同坊、文德坊，以其取义，或在元大都国子学和宣圣庙，即今北京国子监一带。金台坊，有齐政楼，即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一带。穆清坊，地近太庙，在今北京朝阳门内以北。五福坊，坊在中地，或在中心阁附近，即今北京鼓楼一带。泰亨坊，地在大都城东北。八政坊，地近万斯仓、八作司。时雍坊，有庆寿寺，即今北京电报大楼西侧一带。乾宁坊，在大都城西北。咸宁坊、同乐坊、寿域坊、宜民坊、析津坊、地近海子，即今北京积水潭东北、鼓楼西大街一带。康衢坊、进贤坊、嘉会坊，在大都城南部。平在坊，在大都城北部。和宁坊、智乐坊、邻德坊、有庆坊、清远坊，在大都城西北隅。日中坊，在今地安门西北。寅宾坊，在大都城东部。西城坊，在大都城西部。由义坊，在今北京阜成门内北三里。居仁坊，在大都城东市。睦亲坊，地近诸王府。仁寿坊，地近御药院，在今北京隆福寺一带。万宝坊，大内前右千步廊之西，在今北京故宫午门以西。豫顺坊，有福寿兴元观，即今北京西直门内桦皮厂胡同一带。五云坊，大内前左千步廊之东，即今北京故宫午门以东。湛露坊，近官酒库，在大都城东部。乐善坊，地近诸王府，与睦亲坊相近。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在今北京米市大街甘雨胡同一带。元大都的坊皆以街道为界线，虽有坊门，但无坊墙，坊门只不过是标志而已。《析津志》称元大都有 50 坊，但《日下旧闻考》引《元一统志》只列 49 坊，或有遗漏。《析津志》又载有里仁坊、发祥坊、善利坊、乐道坊、好德坊、招贤坊、善俗坊、昭回坊、居贤坊、鸣玉坊、展亲坊、惠文坊、请茶坊、训礼坊、咸宜坊、思诚坊、东皇华坊、明照坊、蓬莱坊、南薰坊、迁善坊、可封坊、丰储坊等坊名，均为《元一统志》所不载。《析津志》著于元末，其所记坊名当即旧坊所改，或元末所增设。

元大都的街道，规划整齐，经纬分明，相对的城门之间一般都有大道相通。《马可·波罗游记》述云：“全城的设计都用直线规划。大体上，所有街道全是笔直走向，直达城根。一个人若登城站在城门上，朝正前方远望，便可看见对面城墙的城门。城内公共街道两侧，有各种各样的商店和货摊……整个城市按四方形布置，如同一块棋盘。”虽然大都城南面三门、北面二门，但从丽正门北穿皇城正中的崇天门及大明门、大明殿、延春门、延春阁、清宁宫、厚载门，直抵中心阁的中轴线上，亦有一条宽阔的御道。经勘查，近年在今北京景山公园（延春阁、厚载门遗址）之北发现的御道遗迹，宽达 28 米。《析津志》载：元大都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其著名街道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经勘查发现，“元大都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在南北向的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

宽约 25 米，胡同宽约 6~7 米”。元大都内的胡同，其规划是以相邻两城门区间为一区域。近年在元大都光熙门（东北门）至大都城东北隅进行勘查，计发现东西向胡同 22 条。值得注意的是，今北京东直门（元崇仁门）至朝阳门（元齐化门）之间现仍保存的东西向胡同也是平列的 22 条。可见，相邻两城门区间内平列 22 条胡同，当是元大都城规划的统一格式。今北京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街道，因同在元大都和明北平（北京）城内，所以改动不大，至今仍多保留元大都时期的格局。元大都城街道的布局，奠定了今日北京城市的基本格局。

元大都城有中心台，是城市东西南北的中心，这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尚属首创。实际情况是，中心台距元大都南北城垣相等，但距城东垣比西垣略近些。中心台占地一亩，其旁有中心阁。《析津志》载：“中心台在中心阁西十五步。”在中心台正南有石碑，刻“中心之台”四字。中心阁在中心台之东，正位于大都城的中轴线上。《析津志》又载“齐政楼，都城之丽譙也。东中心阁。”齐政楼即元大都城的鼓楼，其在中心阁西，亦即大都中轴线西，位于今北京旧鼓楼大街。明代，始将鼓楼和其北的钟楼向东移至今北京鼓楼、钟楼位置，亦即城市中轴线上。元大都鼓楼上置有壶漏、鼓角等计时、报时工具；钟楼上置有阁楼，飞檐三重，内置大钟，声响洪亮，全城遍闻。钟、鼓楼是元朝统治者控制大都的工具之一。《马可·波罗游记》述云：“新都的中央，耸立着一座高楼，上面悬着一口大钟，每夜鸣钟报时。第三次钟响后，任何人都不得在街上行走。除非遇有紧急事务，如孕妇分娩或有人生病，非出外请医生不可者可以例外。但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外出的人必须提灯。”“夜间，有三四十人一队的巡逻兵，在街头不断巡逻，随时查看有没有人在宵禁时间——即第三次钟响后——离家外出。被查获者立即逮捕监禁。”

元朝统治疆域十分广阔，作为京师的元大都城，因是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所以人烟辐辏，商业经济十分繁荣。仅《析津志》所载，元大都城内外的商业行市即达 30 余种。其中，米市、面市、缎子市、皮帽市、帽子市、穷汉市、鹅鸭市、珠子市、沙刺市（即珍宝市）、柴炭市、铁器市，皆在今北京积水潭北的钟、鼓楼一带，这是因为南方来的漕运船只皆停泊在积水潭上的缘故。《析津志》描述其地盛况云：“钟楼之东南转角街市俱是针铺。西斜街（今北京积水潭东北）临海子，率多歌台酒馆，有望湖亭，昔日皆贵官游赏之地。楼之左右俱有果木饼面柴炭器用之属。”又云：“钟楼……本朝富庶殷实莫盛于此。”大都钟、鼓楼一带是元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因这里沿积水潭北岸是一条斜街（今北京鼓楼西大街），所以又称斜街市。顺承门内羊角市也是大都城内繁华之地，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驴骡市、穷汉市，买卖奴隶的人市也在此处，其址大约在今北京西城区甘石桥至西四一带。此外，和义门、顺承门、安贞门外各有果市，中书省前（今北京南河沿大街以东）有文籍市、纸札市，翰林院东（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东北）有靴市，丽正门外三桥、文明门丁字街、和义门外各有菜市，等等。市场上出售的商品，除一些日常生活用品为当地产品外，很多商品来自全国各地。当时，海运大开，河运通畅，“川陕豪商，吴楚大贾，飞帆一苇，径抵辇下”，为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 年第 1 期。

徐莘芳：《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环境变迁研究》第 1 辑。

《日下旧闻考》卷六《形胜》引李洵孙《大都赋》。

大都城提供了丰富商品。当然，这些商品中，更多的是供达官显贵享用的麀毳貂貉等珍贵皮毛，珠璣香犀等奇珍异宝，锦纨罗氎等高贵纺织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在大都市场上做生意的不但有中国境内南北的豪商巨贾，而且还有远自中亚、南亚的商人，“凡世界上最为稀奇珍贵的东西，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特别是印度的商品，如宝石、珍珠、药材和香料”。“根据登记表明，用马车和驮马载运生丝到京城的，每日不下一千辆次。”元大都城和境内外其他地区的这种经济关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作为封建社会都城的经济特点。

八、明代的北京城

(一) 明北京城郭和城门

犹如金中都是在辽南京城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一样，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明北京城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周长四十五里，外城东西南三面计二十八里。内城即今北京内城：东至东直门、朝阳门一线，西至西直门、阜成门一线，南至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北至德胜门、安定门一线。外城区在北京内城以南，即自内城南垣宣武门、正阳门、崇文门一线南至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一线，东至广渠门（又称大通桥门、沙窝门）、东便门一线，西至广安门、西便门一线。孙承泽《天府广记》云：“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庚午，徐中山达取元都。丁丑，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高三丈五尺五寸。至永乐十八年（1420年），遣营缮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重修，益加宏壮。……正统二年（1437年），命内臣阮安重修。安，交趾人，一名阿留，刻有营缮记。至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工成。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碑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四涯悉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十年（1445年），又以城垣内面用土恐易颓毁，乃命成国公朱勇甃之，与外面等。”据其所述，明北京内城城郭工程先后计有4次：首在洪武元年（1368年），次在明成祖迁都北京前一年的永乐十八年（1420年），又次则先后在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和十年（1445年）。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率军25万北伐。次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是为明太祖。同年七月，元顺帝和蒙古贵族弃大都而退走开平；八月，明军攻占大都，随即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元大都城即为北平府治所，称北平城。明初，以应天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并定都南京。徐达占领北平后，为防止蒙古军卷土重来，从军事角度对城市进行改建。徐达因故元大都城北部比较空旷，且自积水潭有一条渠水东流，横贯全城，战时不便于运兵，故将故元大都城北垣南移五里至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一线，构筑新北城垣。《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丁丑，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原自积水潭东去的渠水，便成为新筑北城垣的城壕。《寰宇通志》又载：“洪武初，改大都路为北平府，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九门俱仍旧。”当时只填塞光熙、肃清二门，其正北的原健德门、安贞门并未废，是以知新北城垣筑起之后旧元大都北城垣并未立即拆除，而成为明北平城的外罗城。英宗正统时曾加以修缮以备敌。明朝在新筑的北城垣上，正对其北的旧元大都健德、安贞门，仍辟二门。旧元大都周围六十里，明初将北城垣南缩五里之后周围四十里。据《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记载：明朝还“创包砖甃，……其东南西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北面高四

丈有奇，阔五丈。濠池各深阔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阔至十八丈有奇。”前已言之，元大都外城垣城基宽 24 米，顶宽 8 米，高约 16 米。明初北京城垣“东西南三面各高三丈有余，上阔二丈”，与之相比并无明显变化，可见其即元大都城垣旧物。北城垣因系明军新建，故高、宽比旧城垣都有增加，高度多一丈有余，顶宽多出三丈。此外，将四城城垣外壁皆以砖包砌。这座新筑的北城垣在经过积水潭之北时，因受高粱河入积水潭水道的影响，略偏西南而成一斜角，并在清代沿袭不改。

明朝改建北平北城垣时，战事还没有结束，故工程进行得十分匆忙。拆除这面城垣时发现，夯土中有大量被拆毁的砖瓦、梁木等物；甚至还有没来得及拆除的房屋，被挑去屋顶，填入夯土，整座被埋在墙体之中。如在今北京雍和宫以北发现的元代居住遗址，其北房和东西厢房即在北城垣城基之下，出土瓷器、铁器、玉带饰等物。在今北京西直门内西北的桦皮厂、后英房，后桃园胡同附近的明北城垣西端斜角城基下，亦发现多座元代居住遗址。桦皮厂胡同北口稍东的北城垣城基下，发现元代福寿兴元观遗址，其夹杆石和大殿前的“圣旨白话碑”仍完好立于原处。在后英房胡同西北的城基下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大量珍贵瓷器、漆器、琉璃器，部分墙壁和地面铺砖仍保存完好。在后桃园胡同附近的城基下，亦发现元代居住遗址，出土各种瓷器、石砚、石龟趺、石杵、石臼、滑石高足盘等物。在今北京旧鼓楼大街以西的西绦胡同以北的城基下，从元代居住遗址中发现大量龙泉窑、磁州窑、钧窑瓷器，以及镞、釜、钁等铁器。砚、笔山等石制品和漆器。从这些遗址状况分析，当时居民离开此地非常仓促，以至许多生活用品和珍贵瓷器、装饰品都没有来得及带走。同时，明军筑城也很匆忙，凡在城基定线之内的住宅大多没来得及彻底平毁。元大都城垣均深掘城基至生土层，而明北平北城垣却是平地而起，未掘基槽。但是，明北平北城垣虽事工仓促，其在保证城垣牢固方面仍采取了一定措施。在墙体 2 米以下夯土层中发现大量按东西方向分上下层排放的木料。在今北京德胜门、安定门左右侧和东北隅的城墙夯土中，除横、顺放置为方格形的木料外，还在上下方格之间加置立柱，亦成方格形。这些有意放入的有次序排列的木料，其作用与今日建筑构件的钢筋相同，且形状更加近似，其技术比元大都城垣夯土中的永定柱和絳木又进一步。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

也有人认为，此处正位于北京车公庄地层断裂带上，故城角屡建屡震塌，明人遂将此处城垣南移，成一斜角。不过笔者认为，对于地震破坏来说，远离断裂带几十米并不可能减轻破坏力，此说似有不妥。另外，按五行之说，西北方为乾位，有“天门”之谓。明武宗正德八年（公元 1513 年）将位于皇宫西北的太平仓（今北京平安里太平仓胡同）改为镇国府，以处宣府官军，即遭到工部的反对，其理由是：祖宗旧法，设官建府都有定规，且太平仓在皇宫西北属乾位，地当“天门”，在此设府有碍天运通达。北京城西北角为斜角或即象征“天门”？不过笔者认为，即使当时有此说法，大半也是人们面对既成事实的一种附会，而并非营造者最初的考虑。中国古都的城郭受河道影响而曲折者所在多有，北京城西北角受高粱河水道影响而成斜角亦不为怪。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 年第 1 期。

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 年第 6 期。

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 年第 5 期。

傅公铨：《明代北京的城垣》，载《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 年。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太祖第四子）发动“靖难之役”，废其侄建文帝，夺取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以北平系其承运兴王之地，诏升北平为北京，并以北平府为顺天府。明成祖在即帝位之初就有意迁都北京，为此，陆续有营造北京城池宫殿之举。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壬戌，“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永乐七年（1409年）三月，明成祖至北京，“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山（今北京昌平区十三陵）”，其将迁都北京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此后，明成祖不但经常巡幸北京，而且疏凿会通河，便通对北京的漕运。永乐十年（1412年）三月，“升顺天府为正三品，官制视应天府。升知府张贯为府尹、同知严节为府丞、通判王勉为治中。其大兴、宛平二县，俱升正六品”。把北平地方官的级别都提升同于京师官的级别。永乐十四年（1416年）诏作北京西宫；十月复至北京，“十一月壬寅，诏文武群臣集议营建北京”从此，大规模展开营建北京工程。明成祖营建北京，将北京东西两面城垣加高、加厚，使与北城垣相齐。在拆除北京东、西城垣时发现，其中心部分均为元代土城，高度约为明城垣的

$\frac{9}{10}$ ；元代土城的内外和顶部即为明代增筑的夯土层和堆积夯层。城垣外侧

敷砌元代小砖，平均厚度为1.3米左右。参加督建北京城池宫殿的有行在（当时，以南京为京师，北京称行在）后军都督薛禄、清吏司郎中蔡信、太监阮安等人。《明史·阮安传》云：“阮安有巧思，奉成祖命营北京城池、宫殿及百官府廡，日量意营，悉中规划，工部奉行而已。”明代，宦官权重，史传难免有溢美不实之辞，但阮安亲身参加永乐、正统二次修建北京工程，且负董督之责，其功亦不可没。明北京皇宫即在今北京故宫位置，为有足够空间建筑皇城，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一月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至此，北京内城周围遂成四十五里。明北京城的南、北城垣长度相近，北城垣既为一千八百余丈，则拓南城垣所修建的二千七百余丈中当包括东、西城垣随之向南伸展的部分。今北京建国门观象台是元大都城的东南隅，其下城基已发现元大都东城垣与明代向南延伸部分的结合部。观象台南侧登城马道的北端的基础，敷有元代晚期碑石和明代早期城砖，证明此处即展筑南城垣的始点。在基石下有一过渡咬合段，明城垣深入元代基础约20米左右。由于北京城南垣横断古高粱河河道，所以自今崇文门至宣武门一段有几处城基建在流沙层上。为防止城垣坍塌，明人在深达5米的流沙层中横竖排列15层原木，构成长、宽6米—8米，高3米左右的方木台，作为城垣基础，这在当时是先进的建筑技术。在当时，董督增修北京城垣工役的即蔡信。明朝在新筑的北京南城垣上，正对着其北的故元大都顺承、丽正、文明三门，仍

《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明史》卷六《成祖纪二》。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六。

《明史》卷七《成祖纪三》。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十八。

尹世同：《北京古观象台的考察与分析》，《文物》1983年第8期。

傅公铨：《明代北京的城垣》，载《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年。

辟三座城门，其名不改。建筑北京南城垣的工程直至第二年（1420年）底仍没有彻底完工。公元1420年12月14日，即明永乐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波斯王沙哈鲁的使者盖耶速丁到达北京。其《沙哈鲁遣使中国记》述云：“他们起了个早，天还没有亮时抵达北京城。北京是一座雄伟的城市。……在城池周围由于实际上仍在兴建，有用几十万根各长五十腕尺的竹竿搭成的架子。因为天尚早，城门还没打开，使臣被允许从正在兴建的城楼入城，并在皇城门前停留。”既然盖耶速丁一行入城即面对皇城门，其所入的城楼自应是南城门上的城楼。

永乐十八年（1420年）九月丁亥，明成祖“诏自明年（1421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十一月戊辰，复“以迁都北京诏告天下”。十二月癸亥，“北京郊庙宫殿成”。但是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之当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全部被大火烧尽。因此，虽然北京城池还没有完备，也只好停止下来。明杨士奇《纪略》云：“太宗（成祖）皇帝，肇建北京，既立郊庙宫殿，将及城池，会有事未遐及也。”北京城池经过这次营建，史称“益加宏壮”，其实这只是相对于故元大都城郭而言。当时的北京城池实际上仍很简陋，城垣外侧敷砌元代小砖，凹凸不平，内侧仍为土墙；虽然各门皆有瓮城，但诸门城楼低矮。明成祖营建北京与元世祖营建大都一样，其施工顺序都是先营皇城、大内而后及城郭。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以后，以财力不继，同时也是出于对天意示儆垂戒的惧祸心理，在奉天等三大殿焚毁后，不再有经营北京城池之举。

明仁宗、宣宗之世，一度欲还都南京，并诏以南京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卒。其子朱祁镇即位，改元正统，是为明英宗。明英宗遵循成祖之制，于正统六年（1441年）诏命“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明英宗即位之初便注意经营北京城池宫殿，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命太监阮安督掌其事，并于次年（1437年）调用在京会操士卒一万人动工。《明英宗实录》载：“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辛卯，命太监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书吴中，率军夫数万人，修筑京师九门城楼。初，京师因元旧，永乐中虽略加修葺，然月城（即瓮城）楼铺之制多未备，至是始命修之。”次年（1437年）正月动工，“丙午，遣少保兼工部尚书吴中、右侍郎邵旻祭告平则、西直等门及城壕之神，以城楼、城壕圯坏，欲改作修治也。庚申，以修葺京师城楼，命旗军助工者月增米一斗、军匠增三斗，民匠月给米五斗余、丁匠给五斗，俱月给盐一斤”。这次北京城池工程是永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也可以说是明成祖营建北京的延续，至正统四年（1439年）始告工成。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四年（1439年）四月丙午，修造京师门楼、城壕、桥闸完。正阳门正楼一，月城中左、右楼各一。崇文、宣武、朝阳、阜成、东直、西直、安定、德胜八门，各正楼一，月城楼一。各门外立牌楼。城四隅立角楼。又深其壕，两涯甃以砖石。九门旧有木桥，今悉撤之，易以石。两桥之间各有水闸，濠水自城西北隅（今积水潭附近）

《明史》卷七《成祖纪三》。

《明史》卷七《成祖三》。

《明史》卷十《英宗前纪》。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六。

环城而东，历九桥九闸，从城东南隅（今东便门附近）流出大通桥而去。正统二年（1437年）正月兴工，至是始毕”。经过这次修建以后，北京城池气象非凡，雄伟壮丽。杨士奇《纪略》赞云：“崇台直宇，巍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如镜，焕然一新。”即为写实，并非夸张。其后，明朝又以北京城外壁虽敷砌元代小砖，但内壁尚为土墙，故又动工兴修。《明英宗正统实录》载：“正统十年（1445年）六月戊辰，京师城垣其外旧固以砖石，内惟土筑，遇雨辄颓毁，至是命太监阮安、成国公朱勇……侍郎王佑督工修甃之。”这次工程其实并不只是敷砌城垣内壁，城垣外壁也又加砌一层大城砖。前已言之，明成祖营建北京时曾用元代小砖敷砌内城垣外壁。在拆除北京城垣时发现，北京城垣内、外壁包砖结构有所不同。城垣外壁包砖分里、外两层，里层是分两次砌筑的元代小砖，厚处达1.4米，薄处达1.1米；其外，自上至下敷砌明大城砖。城垣内壁则只有一层明代大城砖，平均厚1米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内外壁表皮的明大城砖层，无论砌筑方法还是用料都相同，当属同时砌筑。因此，可以判断里层小砖是永乐时所砌，内外壁表皮之明大城砖正是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年）时所增修。北京内城城垣经过这次修筑以后，历明清400余年再没有大规模的兴修。

明北京外城城郭筑于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明成祖以后，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日趋紧张。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因正统十四年为己巳，故又称己巳之变），明英宗亲征蒙古失败，被蒙古瓦剌部俘于怀来县土木堡。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部复兵临北京城下，肆意饱掠之后从容而退，史称“庚戌（嘉靖二十九年为庚戌年）之变”。在北边纷扰，边警日急的形势之下，明朝有识之士纷纷倡议加筑北京城外郭，环围北京内城。早在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年），定西侯蒋琬即以己巳之变为鉴，倡议利用北京北部故元大都城垣，兴修外郭。其云：“太祖肇建南京，京城外复筑土城以卫居民，诚万世之业。今北京但有内城，己巳之变，敌骑长驱直薄城下，可以为鉴。今西北隅故址犹存，亟行劝募之令，济以工罚，成功不难。”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掌都察院事毛伯温以边关数有警，“请筑京师外城。帝已报可，给事中刘养直言：庙工方兴，物力难继。乃命暂止”。庚戌之变以后，京师防务已成燃眉之急，几经周折，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终于决定增筑北京外城。兵部尚书聂豹会同掌锦衣卫都督陆炳、总督京营戎政平江伯陈圭进行规划，画图进呈。计划“自正阳门外东道口起，经天坛南墙外及李兴、王金箔等园地至荫水庵墙东止，约计九里；转北经神木厂、獐鹿房、小窑口等处斜接土城旧广禧门（即元大都光熙门，今朝阳区广熙门）基址，约计一十八里；广禧门起转北而西至土城小西门旧址，约计一十九里；自小西门起经三虎桥村东、马家庙等处接土城旧基，包过彰义门，至西南直对新堡北墙止，约计一十五里。自西南旧土城（指金中都故城垣）转东，由新堡及黑窑厂经神祇坛南墙外，至正阳门外西马道口，约计九里。大约南一面计一十八里；东一面计一十七里；北一面势如椅屏（因利用的是元大都故北城墙），计一十八里；西一面计一十七里，周围共计七十余里。内有旧址堪因者约二十二里，无旧

《明英宗实录》卷五十四。

《明史》卷一百五十五《蒋贵传》附蒋琬传。

《明史》卷一百九十八《毛伯温传》。

址应新筑者约四十八里。……外城墙基应厚二丈，收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上用砖为腰，墙垛口五尺，共高二丈三尺。城外取土筑城，因以为壕。……约用银六十万两”。该计划得到世宗同意，“得旨，俱允行”。但是实际施工中遇到困难，外城西南因是故河道且泉水丰富，“土脉流沙，稍难用工”，挖筑城基十分艰难，“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朝臣议论纷纷，或主张且筑且看，或主张“先作南面，待财力都裕时再因地计度以成四面之计”。世宗命宰臣严嵩会同平江伯陈圭商议定夺。四月，严嵩议覆云：“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卫护。今民夫既集，版筑方兴，必取善土坚筑，务可持久。筑竣一面，总挈支经多寡，其余三面可以类推。前此度地画图，原为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阔凡二十里。今既止筑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庶不虚费财力。今拟将见筑正南一面城基，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即今东便门处）；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并力坚筑，可以尅完。其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该建议得到世宗应允，“报可”，于是增筑北京城四周外廓的计划就改成了只修建包筑南城外城墙，由此便形成北京城廓呈“凸”字形的平面格局。增筑外城工程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闰三月，竣工于同年十月。“嘉靖三十二年十月辛丑，新筑京师外城成。上命正阳门外门名永定，崇文门外门名左安，宣武门外门名右安，大通桥门名广渠，彰义街门名广宁。”次年（1554年）四月，又“以京师城外垣，遣成国公朱希忠告太庙”，并嘉奖有关官员，内官监右少监郭挥弟侄一人为锦衣卫百户，平江伯陈圭进为太子太傅。外城平面呈“凸”形，实际总长二十八里。外城比内城规制略为简单，墙体用黄土和杂土分层夯筑；内外壁均只敷砌大砖，外壁砖层厚约1米，内壁砖层厚约0.7米。而且，外城垣高为二丈，比内城垣少一丈五尺；城基厚二丈，比内城垣少四丈二尺；顶宽一丈四尺，比内城垣少三丈六尺。明朝修筑外城之所以首先从南面动工，并在经费短绌情况下决定只筑南面外城，这是因为嘉靖七年（1528年）修复的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西端码头即在今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故北京城南部在元大都文明门、丽正门外诸市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人口稠密，百货山积，需要加以卫护。同时，明北京的山川坛和天坛也在城南，这恐怕也是明廷重视南面外城的重要因素。

《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明北京内城有九门：“正南曰丽正，正统初改曰正阳，南之左（东）曰文明，后曰崇文；南之右（西）曰顺承，后曰宣武；东之南曰齐化，后曰朝阳；东之北曰东直；西之南曰平则，后曰阜成；西之北曰和义，后曰西直；北之东曰安定；北之西曰德胜。”以上九门中，东西城垣上的东直、朝阳、西直、阜成四门起初是沿用故元大都城门，其后虽有改建，但位置仍旧。明北京内城南北城垣皆为新筑，因此南北城门皆为新址，但其仍与故元大都城门南北相对。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九十六。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七。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九。

《天府广记》卷四《城池》。

《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引《工部志》。又，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载：实测外城基厚41~47尺，顶宽34~36尺。但即使这样，外城垣也比内城垣尺寸为小。

前已述之，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军占领元大都后将北城垣南缩五里。在新的北城垣建起之前，同年九月，徐达“改故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洪武中北京城北部故元大都城垣被放弃之后，“德胜”“安定”用来命名其以南新筑北城垣上与旧门相对的二门，即今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北京南城垣向南扩展二里以后，所辟三门也仍沿用故元大都城门旧称。故明成祖之世，北京内城九门分别为：南曰丽正（正南门）、文明（南东门）、顺承（南西门），东曰齐化（东南门）、东直（东北门），西曰平则（西南门）、西直（西北门），北曰安定（北东门）、德胜（北西门）。南面三门位置虽已南移，但其名不改。东直门、西直门即故元大都崇仁门、和义门，位置未移，但改其名。明刘崧《燕城杂诗》云：“东蓟直通齐化外，南城更在顺承西。”刘崧卒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所述即为元末明初北京城的情景。南城，指在故元大都城西南的旧金中都城。东蓟，当指北京城东部而言。因此，疑“东直”或即“东蓟”之讹音，以故元大都崇仁门地近“东蓟”而改称“东直”。和义门以其与东直门相对而改称“西直”。还有一种可能，即明北京九门中只有东、西面的两座城门是对称设置的，但靠南面的齐化门（今朝阳门）和平则门（今阜成门）之间有皇城相隔，只有东直门和西直门之间是从皇城北墙外穿过，中间没有障碍，可谓“通直畅达”，这或许即是其城门得名的原因。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北京内城九门城楼改建完毕，又改丽正曰正阳、顺承曰宣武、文明曰崇文、齐化曰朝阳、平则曰阜成。从此，北京九门名称即为正阳、崇文、宣武、安定、德胜、东直、西直、朝阳、阜成。清代沿袭，后世不改。

嘉靖三十二年（1543年）北京外城廓修建以后，计辟七门，其中南面三门，东西各一门，在东北、西北与内城相接之转角处又各辟一门。《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正南曰永定，南之左（东）曰左安，南之右（西）曰右安；东曰广渠，东之北曰东便；西曰广宁，西之北曰西便。”其中永定门仍位于北京中轴线上，与内城正阳门南北相对，广宁门则和广渠门东西相对，东便门、西便门分别在内外城结合部之转角处，面北。今其址皆在，无需赘述。

（二）明北京宫室和西苑、南海子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封诸皇子为王。其第四子朱棣（即明成祖）为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朱棣在北平的王府是利用的故元大都皇城旧殿，史有明载。《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三年（1370年）七月辛卯，诏建诸王府。工部尚书张允言：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请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殿……。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营之。”在此之前，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丁卯，明太祖因湖广行省参政赵耀曾随大将军徐达克大都，熟悉北平风土民情，于是改授北平行省参政，“俾使护（燕）王府宫室……耀因进工部尚书张允所取北平宫室图。上览之，令依元皇城基，改造王府。耀受命，即日辞行”。但是，燕王府究竟利用的是元皇城何处旧

《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四。

《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七。

殿，后世却存在两说。朱僊先生《明清两代宫苑建置沿革图考》以萧洵《故宫遗录》为依据，认为明初元大都大内宫殿已毁，因此燕王府当在元大内以西的苑囿中隆福宫（今北海公园以南中海西岸）亦即明北京皇宫西苑内。王剑英先生《燕王府即元故宫旧内考》，根据明太祖、太宗两朝实录，剖析辨驳，认为燕王府址即为元大都宫城大内。笔者综考史籍记载，认为当以后说为是。因为根据《明太宗实录》的记载，燕王府称王城，开四门，东曰体仁，西曰导义，南曰端礼，北曰广智，在王城外又有周廓，也开四门，这不符合隆福宫的制度，只能是元大都皇城、宫城的格局。其二，朱棣即帝位后，初升北平为北京，后又迁都北京。《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丁亥，作西宫。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乃命工部作西宫，为视朝之所。”次年（1417年）四月西宫成。其制：“中为奉天殿，殿之侧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南为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之南为午门，午门之南为承天门。奉天殿之北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凡为屋千六百三十余楹。”从以上记载中可以得知，西宫是明成祖新建宫殿，旧宫即指过去的燕王府。那么西宫又在何处呢？《明会典》“工部”条下有关西宫的文字与《实录》相同，但其下注云：“（西宫）今在西城，各殿门俱更别名。”“西城”显然是“西苑”之误。由此可以得知，位于元隆福宫旧址即明北京皇宫西苑的不是燕王府，而是朱棣即帝位10余年后所建的西宫。从西宫的命名，可以证明将撤而新之的旧宫亦即燕王府当在其东，其地只能是元大都宫城大内。其三，从“初，上至北京仍御旧宫，及是将撤而新之”一语，可知明北京宫城是建在原燕王府旧基上的。近年经考古勘查证明，今故宫（即明、清北京宫城）地下即是元大都宫城旧基。这就更进一步证明燕王府亦即将撤而新之的旧宫是利用的元大都宫城大内旧殿，而不是其以西苑囿内的故元隆福宫。

明北京宫殿始建于何时？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闰七月壬戌，文武群臣、淇国公丘福等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遂遣工部尚书宋礼诣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诣湖广，户部左侍郎古朴诣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诣浙江，右佥都御史仲成诣山西，督军民采木。……命泰宁侯陈珪、北京刑部侍郎张思恭督军民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于明年五月俱赴北京。所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给米五斗”。学者或以为明北京宫殿始建于此，其实不确。实际上，这个计划并没有真正施行。《明太宗实录》中永乐五年（1407年）有关北京的记载仅见以下几条：“五月丁卯，北京行部言：自西湖景（今颐和园）至流通（当为通流，闸名，在今通县）凡七闸，河道淤塞。自昌平县东南白浮村至西湖景东流水河口一

见北京史研究会：《北京史论文集》第2辑。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七。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七。

《明会典》（万历本）卷一百八十一。

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百里，宜增置十二闸，请以民丁二十万，官给费用修置。（谕），命运粮军士浚通，其置闸俟更议。戊寅，工部言：北京文明河（即通惠河）至通州五闸，每闸合设船二十艘，乞于龙江告用闸户十一户；水脚夫四百六十人，于湖广、江西河点充。从之。六月戊子，修治北京祀典神祇坛宇及作祭器、乐器。八月甲辰，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言：北平并永平、山海、保定城垣及关寨口为霖雨所坏。京城及临边关隘宜即兼用兵民修理，余俟农隙。从之。九月甲寅，修顺天府西湖景堤三百七十九丈”。从以上记载中，完全不见征用天下民夫、工匠营建北京的迹象。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决心营建北京，第二年却没有如期兴动大役，其原因有二：其一，明成祖出于巩固帝位的考虑，急于将首都迁到自己势力最雄厚的北京，但刚登基不久，又恐疲耗民力，招致天下骚动，对他的统治更为不利。权衡利弊，显然争取民心更为重要，于是取消了征调天下民夫、工匠的计划。其二，当时南北大运河的中段因受黄河侵害，并没有通航，因此即使征调天下民夫、工匠到北京，也难以保证数百万民工的粮食供应。更何况不能利用运河，大量的建筑材料的运输也势必十分困难。但是，没有征调天下民夫、工匠，却也并不是说营建北京的工程就根本没有进行。《明太宗实录》又载：“永乐六年（1408年）六月庚辰，诏谕北京诸司文武群臣曰：北京军民……比以营建北京，国之大计，有不得已也。……自今北京诸不急之务及诸买办，悉行停止。……又敕泰宁侯陈珪及北京刑部：方今盛暑，军民赴工者，宜厚加抚恤。”可见当时工程仍在进行，只不过从役的是北京当地的诸卫官军和百姓，而且工程也只限于整治，不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明成祖又命“营山陵于昌平县。时仁孝皇后（成祖后，徐达长女）未葬，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今昌平县十三陵）。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这也是营建北京的一项重要内容。另一方面，遣诸大臣分赴四川、湖广等地督民采木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永乐九年（1411年）南北大运河的咽喉——会通河重新疏凿畅通。次年（1412年）十二月，“复命工部尚书宋礼采木四川”。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壬寅，明成祖“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先是，车驾至北京，工部奏请择日兴工。上以营建事重，恐民力不堪，乃命文武群臣复议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官上疏曰：臣等切惟北京河山巩固，水甘土厚，民俗淳朴，物产丰富，诚天府之国、帝国之都也。……比年……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丰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指南京），天下军民乐于趋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六十八。

《明太宗实录》卷六十七、六十八。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七十一。

《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七十一。

《明太宗实录》卷八十。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二。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载：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一月壬寅，诸衙门尚书、都御史等官上疏云：“陛下即位之初，尝升为北京而宫殿未建，文武群臣合词奏请，已蒙俞允，所司抡材川广，官民乐于趋事，良材大木不劳而集……然陛下重于劳民，延缓至今。”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五。

书、都御史等官复上疏曰：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指明成祖即帝位前为燕王，驻北京），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胜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诚帝王万世之都也。……今漕运已通，储备充溢，材用具备……伏乞早赐圣断，敕所司择日兴工。从之”。至此，明成祖营建北京的计划才最终确定下来。至于征调天下丁匠，实际上早在此前3个月就已进行。“永乐十四年（1416年）八月丁丑，诏天下军民预北京营造者，分番赴工。所在有司，人给钞五锭为道里费。”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平江伯陈瑄督率漕船“运木赴北京”。这些木材主要用于修建西宫，在北京宫殿建成以前，明成祖即在西宫视朝。明北京营建工程始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竣工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历时3年有余。《明太宗实录》载：“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复于皇城东南建皇太孙宫，东安门外东南建十王邸（今北京王府井即得名于此），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兴工，至是成。”参与督掌工程的官员和从役的工匠头目都得到提升，清吏司郎中蔡信为工部右侍郎、营缮所副吴福庆等7人为所正、所丞杨青等6人为所副、木瓦匠金珩等23人为营缮所丞，并赐督工文武官员和军民夫匠钞、胡椒、苏木。至此，明北京宫城、皇城和宫殿等建筑才告完备。同年，明廷宣布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以迁都诏告天下。永乐十九年（1421年）正式迁都北京。

明北京皇宫是在元大都旧皇城基础上又稍向南移而新建，所以宫城、皇城的南垣都在元大都旧皇城南垣以南。宫城南门午门在元大都皇城南门灵星门附近，承天门在今天安门（清代改称），皇城南门大明门在今天安门广场南部。

《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北京皇城“周一十八里有奇。”孙承泽《天府广记》称“皇城外围墙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比《明史·地理志一》所记稍广。皇城辟六门：正南曰大明门，东曰东安门，西曰西安门，北曰北安门（今地安门），俗称厚载门，沿袭元大都时旧称。自大明门往北，正中为御道，其北端有一横街与御道成丁字形。横街（又称天街）东端对长安左门，西端对长安右门，亦属皇城门。皇城大明门之南，正对北京内城正阳门和外城永定门。皇城四至：北至今北京地安门东西一线，南至今北京天安门广场南部之东西一线，东至今北京东皇城根之南北一线，西至今北京西皇城根之南北一线。清代相沿不改。实际上，明初北京皇城东垣在今北京东皇城根之南北一线稍西。当时，东安门外即元代通惠河自文明门（今北京崇文门北）至积水潭行经的河道（今北京东城区南、北河沿大街）。宣德七年（1432年），以“东华门外逼近民居，喧嚣之声至彻禁禦”，始扩展皇城东垣至河东，即今北京东皇城根南北一线。大明门内东西两侧为千步廊，每年霜降以后吏部等衙门在此朝审刑部重犯；其北即承天门。大明门与承天门之间为宫廷广场。四周以宫墙封闭，千步廊、御道、天街皆在其中。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二。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九。

《明史》卷七《成祖纪三》。

《明太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二。

《天府广记》卷五《宫殿》。

明北京宫城又称紫禁城。《明史·地理志一》顺天府条载：“宫城周六里一十六步。”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称“紫禁城内墙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合计一千七十八丈三尺，亦比《明史·地理志一》所记稍广。明北京宫城，清代相沿未改，即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址。宫城计有四门：南曰午门，东曰东华门，西曰西华门，北曰玄武门。午门往南，穿端门、承天门，与大明门相对。清代相沿未改，今皆在其址。

孙承泽《天府广记》云：明北京皇宫“悉如金陵（南京）之制而宏敞过之”。因此，明北京皇城和大内不仅布局如南京之制，且城门、宫殿命名亦大致相同。入承天门，其东有庙街门，通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西有社街门，通社稷坛（今北京中山公园）。承天门之北为端门，端门之北为午门。端门和午门之间的御道两侧为庑廊，即六科值房所在。左右庑廊各辟一门，东曰阙左门，通太庙；西曰阙右门，通社稷坛。午门格局为倒凹字形。两翼向前伸出，称为两观。门上有楼，俗称五凤楼。午门东西又各有左右掖门。午门前有钟鼓、旗杆。进入午门，其北为自西向东流之金水河，上架白玉石桥，过石桥，其北即外朝门奉天门。午门和奉天门之间，其东西庑廊上各辟一门，东曰左顺门，西曰右顺门。奉天门又有东西角门，皆面南。奉天门内，其北居中即外朝正殿奉天殿。奉天殿之北为华盖殿，华盖殿之北为谨身殿。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重修被火焚毁的三大殿后改奉天殿曰皇极殿、华盖殿曰中极殿、谨身殿曰建极殿。奉天门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改称大朝门，四十一年（1562年）亦随之改称皇极门。其东西角门，分别改称宏政门、宣治门。奉天门外之左右顺门亦分别改称会极门、归极门。奉天（皇极）殿左右庑廊各建一楼，东曰文楼，西曰武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改文楼为文昭楼，武楼为武成楼。奉天殿两旁各有门，东曰中左门，西曰中右门。出中左门或中右门，其北即华盖（中极）殿。明北京外朝三殿同故元大都外朝区一样，也是封闭的宫殿区，四周有庑廊环绕。外朝最北之建极殿后有三门，中曰云台门（又称平台门），东曰后左门，西曰后右门，明帝常在此召见大臣。明末崇祯二年（1629年）后全军奇袭北京，崇祯帝召见驰援京师的蓟辽督师袁崇焕于平台，即为此地。出云台门，其北正对内廷正南门乾清门。云台门与乾清门之间亦为一广场，左右各辟一门，东曰景运门，西曰隆宗门，分通大内东西两路宫殿。入乾清门，其北为内廷正殿乾清宫。乾清宫有东西暖阁，皆在东西斜廊之后，东曰弘德殿，西曰肃雝殿。万历十一年（1583年）改弘德殿为昭仁殿，肃雝殿为弘德殿。乾清宫东西庑廊各辟一门，东曰日精门，西曰月华门。日精门之北有端凝殿，月华门之北有懋勤殿，东西相向。东西庑廊上还辟两小门，东曰龙光，西曰凤彩。乾清宫后还有两座建筑，东曰思政轩，西曰养德斋。乾清宫正北为交泰殿，渗金圆顶，与外朝中极殿相似。交泰殿之北即为内廷最北的宫殿坤宁宫，系皇后居所。坤宁宫东有贞德斋、清暇居，西有养正轩，北庑廊有游艺斋，皆为崇祯时命名。乾清宫后，左右庑廊各辟一门，东曰景和，西曰龙德（《春明梦余录》为隆福），正与交泰殿东西相对。景和门北有永祥门，龙德门北有增瑞门，东西相对，万历时命名。再北，则东有基化门，西有端则门。自端则门或基

《春明梦余录》云：“左曰端则门，右曰基化门。”《明宫史》亦云：“左曰端则门，右曰基华门。”但又云：内廷西路“广和右门（北），向东与端则门相对者，曰大成右门”。如此，端则门则应在西。清《国朝宫史》云：“坤宁宫东暖殿之东为永祥门，稍北为基化门，俱东出；西暖殿之西为增瑞门，稍北为

化门旁出而北，即为大内御苑——琼苑之西、东门。内廷三殿亦为一封闭区，有庑廊环绕。坤宁宫后即内廷正北门，曰广运门，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坤宁门。坤宁门外为琼苑。

琼苑内，奇花异卉，春花秋月，风景绮丽。正北有钦安殿，供奉玄天上帝之所，前有天一之门。苑内还有万春亭、千秋亭、对育轩、清望阁、金香亭、玉翠亭、乐志斋、曲流馆、四神祠、观花殿。有假山曰堆秀，上建凉亭曰御景亭。东西各有鱼池，上建亭，东曰浮碧亭，西曰澄瑞亭。琼苑南垣东西各有一门，东曰琼苑东门，西曰琼苑西门。琼苑北门原称坤宁门，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为顺贞门，其外即宫城北门玄武门。

以上即明北京皇宫中路建筑。外朝三殿和内廷三殿皆坐落在自北京外城永定门，北经内城正阳门、皇城大明门、承天门、端门、宫城午门和奉天（皇极）门、乾清门、坤宁门、玄武门、北安门，再北至钟鼓楼的全城中轴线上，从而更加突出明帝“天下至尊”的统治地位。

内廷除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等中路的建筑外，还有东西两路。东路：出日精门，东入崇仁门，门内稍南有内东裕库，稍北有奉慈殿、崇光殿（一作崇先）。万历中，改内东裕库为弘孝殿，崇光殿为神霄殿。由此往东则有奉先殿，即内太庙。奉先殿之东有仁寿宫，内有啜鸾宫、啮凤宫，为宫妃养老之处。从日精门外向北有顺德左门（原景明门）。过顺德左门，其北为南北方向通道，即所谓东一长街，将内廷中路三殿与东路六宫区分开。东六宫区中间又有一条通道，纵穿南北，与东一长街平行，称东二长街，其南有麟趾门，北有千婴门。东六宫分列在东二长街两侧：东侧，从南往北依次为延祺（一为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西侧依次为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刘若愚《明宫史》云：崇祯时，东宫娘娘居承乾宫，皇太子居钟粹宫，并改称兴龙宫。西路：出月华门，其西有遵义门（又称膳厨门）。过遵义门，北有养心殿，其前东西配殿曰履仁斋、一德轩；后殿曰涵春宫，东有隆禧馆，西有臻祥馆。养心殿南为祥宁宫、无梁殿、隆道阁（原皇极阁、道心阁）、仁德堂。养心殿西为慈宁宫。万历时，孝定李皇后（穆宗后，神宗生母）曾居此处。光宗泰昌中（1620年），神宗恭恪皇贵妃郑氏亦居此。天启、崇祯时，神宗昭妃刘氏居此。慈宁宫先后为皇太后、皇太妃居所。慈宁宫之北、西六宫之西有隆德殿，崇祯六年（1633年）改称中正殿，即原玄极宝殿。隆德殿东西配殿曰春仁、秋义。隆德殿西北为英华殿（原隆禧殿），供奉西番菩萨像之所；正西为咸安宫（原咸熙宫）。自月华门往北有顺德右门。顺德右门外也有一条南北方向通道，即所谓西一长街，将内廷中路三殿与西六宫隔开。西六宫区中间也有一条与西一长街平行的南北通道，称西二长街，其南有螽斯门，北有百子门。西六宫分列在西二长街两侧：东侧，由南往北依次为毓德宫（原长乐、永寿宫）、翊坤宫（原万安宫）、储秀宫（原寿昌宫）。西侧，依次为启祥宫（原未央宫）、长春宫（一度更名永宁，天启时复）、咸福宫（原寿安宫）。

外朝除奉天（皇极）殿、华盖（中极）殿、谨身（建极）殿等中路建筑外，亦分东西两路。东路：出左顺（会极）门，东南曰内阁，辅臣封进官员奏本及草拟诏令之处。内阁东有佑国殿，内供玄帝像。佑国殿之东有内承运库，贮藏钱粮之所。又东，过小石桥有香库，内府供用库贮钱粮之所。香库

之北为古今通集库，西向，内藏古今君臣画像、符券、典籍。再北则为宫城东华门。左顺（会极）门外东北为文华殿，翰林经筵进讲之所。文华殿之侧有九五斋、临保室、精一堂、恭默室；殿之后有玉食馆、端敬殿理办房。文华殿北，过小门，西北有省愆居，架筑于木架上，四壁不触地亦不与别处相连，明帝遇天变灾眚修省之所。文华殿之东曰神祠，内有井，每年祭司井之神于此。神祠之北为刻漏房，宫内掌时辰之所。文华殿东北为圣济殿，内供三皇历代名医，制作御服药饵之处。文华殿及神祠、刻漏房之东有徽音门，门内正北有麟趾门，与内廷东二长街南门同名。入麟趾门，其内即慈庆宫，万历时仁圣皇太后（穆宗后，神宗嫡母）居此。慈庆宫内有奉宸、勳勤、承华、昭俭四宫；还有花园，内有撷芳殿，荐香亭。麟趾门东有关雎左门，内为掌印、秉笔值房；西有关雎右门。自关雎右门再西，转角西向为元辉殿，其内有正殿和南北配殿，诸皇子妃选中后即居于此，以待吉礼。元辉殿之北为御马监，再北则为御用等监库房。慈庆宫北即内廷东路之仁寿宫。西路：出右顺（归极）门，西南为南薰殿，凡遇上尊号册封大典，阁臣率中书在此篆写金宝玉册。南薰殿之西为御用里监，把总等官居住处。右顺（归极）门西北即武英殿，每逢皇后生辰，命妇朝贺皇后于此。其西太庖厨、尚膳监。武英殿后垣东有思善门。出思善门，其西北为仁智殿，俗称白虎殿，明皇帝或皇后死后梓宫即停放于此。《明史·成祖纪三》载：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征蒙古阿鲁台部，七月辛卯卒于军中，“壬子，及郊，皇太子迎入仁智殿，加殓纳梓宫”，即为此处。仁智殿西南为御酒房；西北为马房，监官典簿奉旨拷打违禁太监之处。自仁智殿过宝宁门而北即为内廷西路之慈宁宫。

明北京大内西苑，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中南海及其东西一带，是在故元大都万岁山（今北京北海公园琼岛）、瀛洲（今北京北海公园团城）和隆福宫、兴圣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年）曾在此建西宫。明代，故元万岁山又称琼华岛，山上广寒殿、仁智殿，介福殿、延和殿与金露、瀛洲、玉虹、方壶四亭等建筑一仍元旧。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对琼华岛重加修葺。杨士奇《赐游西苑诗序》云：“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上以在廷文臣日勤职事，不遑暇逸，特敕公侯伯师傅六卿文学侍从游观西苑，……自西安门入，循太液池（今北京北海中海、南海）之东而南，观新作之圆殿，改作之清暑殿。……降而登万岁山，至广寒殿，而仁智、介福、延和三殿及瀛洲、方壶、玉虹、金露之亭咸得遍游。”圆殿即故元大都瀛洲仪天殿旧址，明代改建承光殿，又称圆殿。实际上，这次修葺的不只是承光殿、清暑殿。明宣宗《御制广寒殿记》云：“比登兹山（万岁山），顾视殿宇，岁久而陲，遂命工修葺。”广寒殿及琼华岛万岁山上诸殿也均加以重修。明万历中，广寒殿以年久失修坍塌，此后不再修复。承光殿建在崇台之上，四周围以瓮城，又称圆城，东西各辟一门。每年元夕，明帝常在此观灯。承光殿东面旧为水域，明代时用土填平，直与大内相接。承光殿西面，元代旧有木吊桥与太液池西岸相通，明代一仍其旧。韩雍《赐游西苑记》云：“天顺三年（1459年）四月，赐公卿大臣以次游西苑……北行至圆殿（承光殿），观灯之所也。历阶而登，殿之基与睥睨平。古松数株，其高参天。其西以舟

《明史》卷一百六《沈一贯传》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命营慈庆宫居皇长子。”是其初为皇长子宫。

作浮桥，横亘池面，北则万岁山琼岛在焉。”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改建石桥，东西有两华表，东曰玉，西曰金鳌，故此桥称金鳌玉桥，又称御河桥、金海桥。承光殿北至琼华岛万岁山，元代已有石桥，明代加以改建，其南北有两华表，南曰积翠，北曰堆云，故此桥称积翠堆云桥。

金鳌玉桥西岸之北为玉熙宫（今北京图书馆一带）。循太液池西岸，玉熙宫之北为迎翠殿，东对琼华岛，天顺四年（1460年）建，后改名承华殿。在迎翠殿以西、以北有宝月亭、芙蓉亭、清馥殿、丹馨殿、锦芳亭、翠芬亭、澄碧亭、腾波亭、飞霭亭、腾禧殿。太液池西北有太素殿（在今北京北海公园五龙亭西北），亦天顺四年（1460年）建，以草覆顶，饰以白垩，殊有特色。武宗正德十年（1515年）重修太素殿，去其垩饰茅覆，务求华丽，用银二十余万两。太素殿前有溥惠门，左右又有素左门，素右门。世宗嘉靖中，又改太素殿为寿源殿，其东有正心斋、持敬斋。太素殿后有草亭，上画松竹梅，名岁寒亭。太素殿溥惠门东有临水轩、会景亭，后改建五亭，自岸突出水中，曲桥相接，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改名五龙亭，其中为龙泽亭，东西自近及远分别为澄祥、滋香亭和涌瑞、浮翠亭。五龙亭北，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建乾德殿，其高八丈一尺，广十七丈，其殿有如城阙龙宫。其地俗称北台。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又改乾德殿为乾德阁。乾德阁极其崇丽，大内宫殿反在其下。当其初建时，御史林道楠即上书奏云：“三殿两宫不过十二丈，今（乾德殿）台高八丈一尺，加以殿宇又复数丈，其势反出宫殿之上，禁中岂宜有此？”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十一月，以钦天监言其于风水不利，奉旨拆毁。天启四年（1624年）五月，在乾德阁遗址建嘉乐殿，其门曰延景，有二座牌坊，南曰福渚，北曰寿岳。嘉乐殿西为亲军内教场，南有彘（音引）祥桥。自嘉乐殿过太液池北岸（今北京北海北岸），其东有北闸口（今北海公园后门），即太液池入水口。其处有亭，嘉靖十三年（1534年）定名涌玉亭，二十二年（1543年）更名汇玉渚。北闸口南有雷霆洪应殿，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建，内有坛城、轰雷轩、啸风室、嘘雪室、灵雨室、耀电室、清一斋、宝渊门、灵安堂、精馨堂、驭仙次、辅国堂、演妙堂、八圣居等，为祈雨之所。循太液池东岸（今北京北海东岸）往南，有二座船屋（又称水殿），冬季藏龙舟、凤舸之处。其处有金海神祠，嘉靖十五年（1536年）建，以祀水府、司舟之神。二十二年（1543年），改称宏济神祠。再南则有凝和殿，与五龙亭之太素殿、西岸之迎翠殿同建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世宗二十三年（1544年）改称惠熙殿，四十三年（1564年）改称元熙殿。凝和殿左有拥翠亭，右有飞香亭（后改称元润亭），皆天顺四年（1460年）建。凝和殿再南则为陟山门，即今北京北海公园东门，门西有石桥，可通琼华岛万岁山。

金鳌玉桥东岸之南有五雷殿，又称椒园、蕉园，与今中海西岸之紫光阁东西对峙，是明朝历代修撰先朝实录后焚销草稿之处。由此再往南则为西苑门，东与大内西华门相对。李贤《赐游西苑记》云：“天顺己卯（1459年）首夏月，上命中贵人引贤与吏部尚书王翱数人游西苑。入（西）苑门即太液池（今北京中海）……循池东岸北行，花香袭人。行百步许，至椒园，中有圆殿，金碧掩映，四面豁敞，曰崇智。南有小池，金鱼游戏其中。西有小亭临水，芳木匝之，曰玩芳。”据此可知，其附近还有崇智殿、玩芳亭。据《明宫史》记载，该处还有迎祥馆、集瑞馆、太玄亭、问法所、临漪亭、水云榭。过西苑门而南半里有乐成殿，后改为无逸殿、豳风亭。乐成殿附近有石磨、

水碓、水田。每岁秋收，明帝在此观“打稻”之戏，太监分扮农夫、农妇、税吏等，行征租、交纳、词讼等事，以示不忘稼穡艰难之意。自乐成殿度小石桥而西有昭和殿，殿前有澄渊亭，南有村舍水田。昭和殿再南则有一小岛，即趵台坡（今北京南海瀛台），又称南台。

金鳌玉 桥西岸之南有蚕池，即内先蚕坛，世宗嘉靖十年（1531年）建。坛高二尺六寸，四出陛道，广六尺四寸，其东又有采桑坛。先蚕坛左右植桑树，东为具服殿，北为蚕室，又有蚕妇居住之从室和蚕官衙署。蚕池之东为永寿宫。嘉靖四十年（1561年）永寿宫火灾，次年重建并改名万寿宫。万寿宫内正殿东西分别有永春、万春宫。万春宫西又有大光明殿，系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建。大光明殿门曰丰登。入丰登门，前有圆殿，高数十尺，如天坛之制，题曰大光明殿，其后为太极殿，再后为香阁。殿内设七宝云龙神牌位，以祀上帝。大光明殿之南为兔园山（又称兔儿山），即故元大都隆福宫西苑之山。明代，此处又称赛蓬莱。李贤《赐游西苑记》云：“又西南有小山，至则有殿倚山，山下有洞，洞上有岩，横列密孔，泉出进流而下曰水帘，水声泠泠然潜入石池，龙昂其首，口中喷出，复潜绕殿前为流觞曲水，左右危石，盘折为径。山畔有殿翼然，至其顶一室正中，四面帘栊，栏槛之外，奇峰回互，下转山前一殿，深静高爽。殿前石桥极精巧，左右有沼，沼中有台。”其宫殿亭阁大多元代旧物。其顶为清虚殿，每逢重阳节，明帝或登万岁山（今北京景山）或登兔儿山清虚殿。兔儿山在清康熙时尚存，乾隆时废毁，其遗址在今北京西皇城根南街以东之图样山胡同。图样山即兔园山之谐音。

明北京宫室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成后屡遭火灾，成为北京城建史上颇为引人注目的问题。《明史·成祖纪三》载：“永乐十九年（1421年）四月庚子，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灾。”“二十年（1422年）闰十二月戊寅，乾清宫灾。”明成祖以武力夺取建文帝位，本就心有未安，迁都不到两年“三殿二宫”就俱焚为废墟，更心怀畏惧，认为是上天示儆，所以终永乐之世再未重建，只御奉天门视朝。此后18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五年（1440年）三月戊申，建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是日兴工。”共征用工匠、官军7万人，使用的是永乐年间营建北京储积的建筑材料。工程历时一年有余，“正统六年（1441年）九月甲午朔，奉天、华盖、谨身三殿，乾清、坤宁二宫成”。十一月甲午朔，英宗御奉天殿，临群臣，以三殿二宫成而颁诏大赦天下。此后70余年，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乾清宫复遭火灾。《明武宗实录》载：“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庚辰，乾清宫火。上自即位以来，每岁张灯为乐，所费以数万计……及是，宁王宸濠别为奇巧以献，遂令所遣人入宫悬挂，传闻皆着柱壁，辉煌如昼。上复于宫廷中依檐设毯幙而贮火药于中，偶弗戒，遂延烧宫殿，自二鼓至明，俱烬。“当火势正大时，明武宗却戏谓左右曰：是好一棚大烟火也。”把火灾比做过节的烟火，其竟荒唐至此。乾清、坤宁二宫的重建工程前后历时8年，至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一月即武宗卒后8个月，才告竣工。世宗已即帝位，此时自文华殿入居乾清宫。又过36年，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外朝三

《明英宗实录》卷六十五。

《明英宗实录》卷八十三。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八。

殿又被雷火焚毁。《明世宗实录》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火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大火起于被雷电击中的外朝最高建筑奉天殿，由此延及紧邻的华盖、谨身二殿及文、武二楼。当时可能适逢北风，故火势一直向南蔓延，连午门外六科廊一并烧毁。这次大火将外朝中路殿、门全部烧毁，比永乐十九年（1421年）火灾更为严重。火灾后，明世宗首先急于恢复奉天门，以为视朝之所。《万历野获编》“门工”条载：“嘉靖丁巳（1557年），三殿及朝门俱灾，时上（世宗）急于门工，谓朝会之地，观瞻不雅，急欲先立奉天门楼。时长工部者为赵文华，惶窘无计，支词以对，上怒逐之，而门工迄无建期。”后以杉木代替楠木，于同年八月兴工，次年（1558年）八月重建奉天等门。世宗认为“奉天”二字非门额所宜用，改奉天门曰大朝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动工重建外朝三殿，四十一年（1562年）成。《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九月壬午，以三殿工成，命……分告南、北郊、太庙、社稷。甲申，更名奉天殿曰皇极、华盖殿曰中极、谨身殿曰建极。文楼曰文昭阁，武楼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奉天门曰皇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嘉靖之世，重建外朝宫殿、朝门前后历时5年，主持其事的是著名匠官徐杲。这次重建是明代规模最大的一次，耗费浩繁，但明北京宫殿也因此而比较完备。在此34年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三月乙亥，……火发坤宁宫，延及乾清宫，一时俱烬”。次年（1597年）“六月戊寅，三殿灾。……火起归极门，延至皇极等殿，文昭、武成二阁，周围廊房，一时俱烬。”两场大火相继使内宫外殿化为焦土，要想重新恢复确非易事。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两宫灾后，神宗初居西六宫之毓德（永寿）宫，后移居其西之启祥（未央）宫。《明史·神宗纪二》载：“万历三十一年（1552年）十二月丙戌，召见皇太子于启祥宫。”《明史·沈一贯传》又载万历三十年（1551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暖阁。”其时启祥宫即神宗居所。万历三十年（1551年）二月，经过筹集工料，神宗首先动工重建乾清宫。“万历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甲子，乾清宫成。”神宗由启祥宫入居乾清宫。其后，万历四十三年（1564年）闰八月又兴外朝三殿之役，四十五年（1566年）神宗卒，其工未果。神宗以后，其子光宗即位不过一月而卒。熹宗（光宗长子）即位后，继续三殿工程，自天启五年（1625年）兴工，“六年（1626年）九月甲午，皇极殿成，上御殿，百官行庆贺礼。”“七年（1627年）八月乙未，中极殿、建极殿插剑悬牌，遣工部尚书薛凤翔行礼。”至此，外朝三殿终告恢复，历时2年有余。同月，熹宗卒。此后明北京宫殿未再遭毁灭性的火灾，直至明亡。

《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四十六。

《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十三。

《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五。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十一。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九十四。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六。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七。

以上所述，仅为明北京宫室火灾最为惨重数事，其实际发生火灾的次数，远远不止于此。《明史·五行志》中北京宫室火灾的记录比比皆是，举凡承天门、乾清宫门、大明门内千步廊、仁寿宫、慈宁宫及西苑无逸殿、昭和殿、万寿宫、大光明殿等建筑都曾发生过火灾。京师东直门、正阳门也曾发生过火灾。明北京宫室多火灾的原因至今不明，笔者推测其原因大致有三：其一，与雷电有关。从《元史》中可以发现，元帝常在大都诸宫殿内举行法会，以求“避雷”，可见当时雷电对于突兀平地的宫殿已是严重威胁。明北京宫室比元大都宫殿更加壮丽高敞，《明史·五行志》中关于雷震北京宫殿兽吻、鸱尾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因此，除明确记载为雷击起火的事件外，其他火灾中雷击起火当亦不在少数。其二，与气候有关。明朝大部分时期处于干旱少雨期，特别是明末又发生遍及全国的大干旱。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自然容易发生火灾。其三，明北京宫室普遍用木炭和煤取暖，烟道与墙内木结构过于接近，恐怕也是引起重大火灾的原因。综观明北京宫室火灾多发生在夏季和冬季，可以推测雷电和取暖不慎大概是屡屡起火的主要原因。不过，有些火灾也可能是宦官为掩盖偷盗劣迹而故意纵火引起的。明代北京大内中也有一定防火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金水河。金水河北自玄武门（宫城北门）之西地沟进入紫禁城，西流南转，复东流经仁智殿前、武英殿前、归极门北、皇极门前、会极门北、文华殿西；复北流东转，自慈庆殿徽音门外，东流经东华门里古今通集库南，从地沟流出紫禁城，汇于护城河。《明宫史》称大内金水河“非故为曲折，以耗物料，盖恐有意外火灾，则此水赖焉。天启四年（1624年）六科廊灾，六年（1626年）武英殿西油漆作灾，皆得此水之济”。尽管金水河本意是用来象征天汉，但在实际上对宫中灭火有重要作用，这或许是古人寓现实生活于神话的一种手段。尽管如此，由于缺少灭火工具，一旦高十余丈的宫殿起火，肩挑手提的一桶桶河水亦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

明北京郊外最大的苑囿是南海子，其址在今北京大兴县南苑，即金建春宫遗址，元代为下马飞放泊，是帝王、贵族狩猎、游娱之地。因北京人习惯上称城内积水潭为北海子，故这里便称南海子。明成祖永乐十二年（1414年）在元代下马飞放泊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围以崇垣，广一百二十里，内有海子（湖泊）5处，芦苇丛生，沟渠交错，鹿、獐、雉、兔繁息其中。南海子围垣东西南北各开一门，称红门，其内有行殿，殿旁有晾鹰台。明朝置海户千家在此守视，每逢会猎，则命海户前驱合围。明英宗、宣宗之世，曾屡次修缮海子红桥，并常去游幸，其后疏于管理，渐至颓废。《帝京景物略》载：“隆庆二年（1568年）三月，（上穆宗）幸海子。先是，左右盛称海子，大学士徐阶等奏止，不听。驾至，榛莽沮洳，宫幄不治，上悔之，遽命还蹕矣。”可见明穆宗之世，由于明历朝皇帝偏重于开发北京皇城内的园囿，对于远处于城外二十里的南海子不再重视，因此南海子已趋于荒废。另外，南海子处于永定河下游，经常遭到洪水泛滥之害，这也是南海子没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明北京坛庙、山陵

明代的北京已是成熟的封建社会都城，坛、庙之制非常完备。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二月北京宫殿坛庙建成，当时已有太庙、奉先殿（内太庙）、社稷坛、祈谷坛（天坛）、山川坛、文庙（孔庙）、都城隍庙等坛庙。成祖

以后，又增建朝日、夕月、先蚕、方泽（池坛）、高禘等坛。

前已言之，明北京太庙在皇城內、宫城之东，即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社稷坛在宫城西，即今北京中山公园，皆永乐十八年（1420）仿南京之制而建。其初，明先帝神主同堂异室，嘉靖十四年（1535年）尽撤，改于太庙南之东西两侧各建庙。十五年（1536年）十二月新庙成，各庙名为都宫，前殿后寝，乃奉安诸先帝神主于新庙。嘉靖二十年（1541年）四月，太庙火灾，坏成祖、仁宗二庙，乃命恢复同堂异室旧制，重建太庙。二十四年（1545年）七月太庙成，正殿九间，置有两庑，其南为戟门。戟门东为神庑，南为神厨，再南则为庙门。庙门外东南为宰牲亭，正南为神宫监，其西为庙街门，通承天门内。正殿后为寝殿，奉安诸先帝神主，再后为祧庙，藏明帝祖宗神主。明北京社稷坛与故元大都、金中都社稷坛不同，社稷共为一坛。嘉靖九年（1530年）又建土谷坛于西苑豳风亭之西（今北京南海瀛台之北），东为帝社，西为帝稷，后改名帝社稷坛。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

明北京外城，东有天坛（又称圜丘、祈谷坛），西有山川坛，皆永乐十八年（1420年）仿南京之制而建，其址即今北京天坛、先农坛处。天坛内的主建筑为大祀殿，其初合祭天地于此，嘉靖九年（1530年）命分祀天地，于大祀殿之南建圜丘，于安定门外另建方泽坛（地坛）。圜丘围垣两重，各有4门，其外围垣北门正对泰神殿，正殿藏上帝、明太祖神主，配殿藏从祀诸神主。嘉靖十七年（1538年）改泰神殿为皇穹宇，并撤毁大祀殿。二十四年（1545年）于故大祀殿址（今北京天坛祈年殿）又建大享殿。北京安定门外方泽坛，坛面俱用黄琉璃砖铺砌。围垣两重，各辟四门；其外又有周垣，有坛门。山川坛周四六里，正殿设七坛，两庑设六坛，各祭太岁、风云雷雨、五岳、四镇、四渎、四海、钟山之神、天寿山之神、京畿山川、夏冬季月将、春秋季月将、都城隍等神。嘉靖十年（1531年），别于山川坛内南部建太岁坛，正殿曰太岁殿，东庑为春秋月将二坛，西庑为夏冬月将二坛。嘉靖十一年（1532年）改山川坛曰天神地祇坛。十七年（1538年）又于山川坛外围垣东南建天神、地祇二坛，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太岁坛西南有先农坛，永乐中建，其内东南为具服殿，殿前为观耕台，台南为藉田。每年春季，明帝在此举行耕藉田之仪，以为劝农。

先蚕坛在北京安定门外，嘉靖九年（1530年）建。每年春季，明皇后在此举行亲蚕之仪，以劝桑事。先蚕坛内坛台东西北三面遍植桑树，还有蚕官令署、采桑台、织堂等建筑。其后，因路途遥远，遂改筑先蚕坛于大内西苑，即金鳌玉桥西端偏南之蚕池。

朝日坛在北京朝阳门外，西向，即今北京日坛；夕月坛在北京阜成门外，东向，即今北京月坛，均建于嘉靖九年（1530年）。朝日坛以红琉璃砖铺砌坛面，内围垣辟四门，外围垣只辟西、北二门。每年春分，明帝在此祭大明之神。夕月坛以白琉璃砖铺砌坛面，内围垣辟四门，外围垣只辟东、北二门。每年秋分，明帝在此祭夜明之神。

封建帝王为求子息，又筑高禘坛。金明昌六年（1195年），章宗因无子曾筑高禘坛于中都景风门（南东门）外东南。明代，世宗嘉靖中亦筑高禘坛于皇城东、永安门北。其坛全系木制，祭前，坛前陈放弓矢、弓衣；祭毕，女官引导皇后、妃、嫔至坛前，跪取弓矢授皇后、妃、嫔，后、妃、嫔受而将其纳入弓衣。

《明史·礼志四》载，京师所祭者有九庙。真武庙，永乐十三年（1415

年)建,以祭北极佑圣真君,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改为灵明显佑宫,在今北京地安门桥东。东岳泰山庙,在朝阳门外,祭东岳之神,一般称东岳庙,始自元代。都城隍庙,在今北京城方街。关帝庙,建于永乐年间,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年)奉旨改建于宛平县之东。太仓神庙,在太仓。司马、马祖、先牧神庙,永乐十三年(1415年)建于莲花池。宋文丞相祠,永乐六年(1408年)建于顺天府学之西,即今北京东城区府学胡同内。洪恩灵济宫,在今北京西城区灵境胡同,建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祭道教徐知证,徐知谔二真君。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废。明成祖谋士姚广孝原从祀太庙,嘉靖九年(1530年)移祀大兴隆寺,后改祀崇国寺(今北京护国寺)。除此之外,明北京内城还有历代帝王庙(今白塔寺东北京159中学),祭历代帝王15人、名臣32人。嘉靖九年(1530年)兴工,十一年(1532年)庙成,费时三年之久。庙内有景德崇圣殿,东西两庑,后为祭器库,前为景德门,其南则为庙门。文庙(孔庙)在今北京首都博物馆,即故元大都孔庙旧址,其西为太学(今北京首都图书馆),即故元大都国子监旧址。旗纛庙在北京山川坛内,太岁坛之东,永乐时建,祭诸旗神。

明北京皇家山陵在今北京昌平县十三陵。其地为山坳,前面开阔,背依青山,树木葱绿,风景优美。《明史·成祖纪二》载:“永乐七年(1409年)五月己卯,营山陵于昌平,封其山曰天寿。”此即明北京营构山陵之始。除景泰帝以外,在此埋葬明成祖以下13位皇帝,即明成祖之长陵、仁宗之献陵、宣宗之景陵、英宗之裕陵、宪宗之茂陵、孝宗之泰陵、武宗之康陵、世宗之永陵、穆宗之昭陵、神宗之定陵、光宗之庆陵、熹宗之德陵、思宗之思陵。明朝诸帝山陵规制不一,明成祖长陵规模最大,自仁宗以后规制渐减。但从世宗永陵开始追求奢华,明神宗定陵竟花费白银800余万两,这和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社会上下的侈靡之风有密切关系。1956年,考古学者发掘了明神宗定陵,其地面建筑有稜恩殿门、稜恩殿、明楼、宝城等;地下玄宫有墓道、金刚墙、石券门、前殿、中殿、后殿、左配殿、右配殿。今北京十三陵仍保存完好,成为一处著名游览区。

(四)明北京坊巷和市

前已言之,故元大都有50坊。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将北城垣南移,缩其城之北五里,城区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二。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京城总纪》记载,当时只有23坊,城东部属大兴县,西部属宛平县:“五云坊、保大坊、南薰坊、澄清坊、皇华坊、贤良坊、明时坊、仁寿坊、思诚坊、明照坊、蓬莱坊、湛露坊、昭回坊、靖恭坊、金台坊、灵椿坊、教忠(坊)、居贤坊、寅宾坊、崇教坊,以上二十坊属大兴县。万宝坊、时雍坊、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安富坊、鸣玉坊、太平坊、丰储坊、发祥坊、日中坊、西城坊、(积庆坊),以上十三坊属宛平县。”这些坊名和区划大多沿袭故元大都旧名、旧地。明成祖改建北京,将南城垣向外推展二里,城区经调整后计有28坊。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筑北京外城,其内划分8坊。由此明北京内外城计有36坊,规模更加扩大。据明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嘉靖时中城计有9坊,其中皇城东有:南薰坊(今北京台基厂一带)、澄清坊(今北京王府井大街、金鱼胡同一带)、明照坊(今北京东四西大街南之报房胡同、大小鹁鸽胡同一带)、保大坊(今北京五四大街南北之翠花

胡同、大小取灯胡同一带)、仁寿坊(今北京隆福寺、钱粮胡同一带)。皇城西有:时雍坊(今北京正阳门内西侧自西交民巷西至西单牛肉湾一带)、小时雍坊(今北京电报大楼北至灵境胡同一带)、安富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东北之酱坊胡同一带)、积庆坊(今北京西四红罗厂北至护国寺一带)。东城计有5坊,沿北京东城垣由南往北排列,依次为:明时坊(今北京崇文门内以东之船板胡同、盔甲厂胡同一带)、黄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东西之遂安伯胡同、芳嘉园胡同一带)、思城坊(今北京朝阳门南小街北之礼士胡同北至月芽胡同一带)、南居贤坊(今北京朝阳门北小街西侧板桥胡同、北新仓胡同一带)、北居贤坊(今北京东直门手帕胡同北至柏林寺一带)。西城计有7坊,沿北京西城垣由南向北排列,依次为:阜财坊(今北京宣武门象来街至西单甘石桥西南一带)、咸宜坊(今北京西单甘石桥西北至西四羊肉胡同一带)、鸣玉坊(今北京西四西北至新街口一带)、日中坊(今北京新街口至西直门桃园胡同一带)、金城坊(今北京阜成门大水车胡同至长途电话大楼一带)、河漕西坊(今北京白塔寺至西直门大街南一带)、朝天宫西坊(今北京阜城门宫门口至西直门北城角一带)。北城计有7坊,包括今北京地安门至德胜门、安定门地区:教忠坊(今北京张自忠路北至土儿胡同一带)、崇教坊(今北京交道口东大街至安定门顺城街一带)、昭回靖恭坊(今北京地安门东大街北之炒豆胡同至寿比胡同一带)、灵春坊(今北京鼓楼东之经厂胡同至安定门大街一带)、金台坊(今北京鼓楼至安定门西大街一带)、日忠坊(今北京后海南岸之官房胡同至德胜门大街一带)、发祥坊(今北京护国寺至正觉胡同一带)。明北京外城区属南城,计有8坊,包括今北京宣武区、崇文区大部分地区:正东坊(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至天坛东一带)、正西坊(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至琉璃厂东一带)、正南坊(今北京先农坛至珠市口西大街以北)、崇北坊(今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南北一带)、崇南坊(今北京崇文门至左安门之间)、宣北坊(今北京琉璃厂至广安门一带)、宣南坊(今北京骡马市大街至右安门一带)、白纸坊(今北京广安门至右安门之间)。明朝统治者在各坊按居民多少设置若干铺。每铺立铺头,有火夫三五人,隶属总甲,专掌地方捕盗等事。如南薰坊有8铺,澄清坊有9铺,日忠坊有22铺等,每铺负责若干条胡同。

明北京内城街道基本沿袭故元大都格局,各坊均为开放式街道,排列有序。但是,与故元大都城一样,由于皇城位于城市南部正中,东西交通非常不便,需要从城市南部或北部绕行。外城修建以后,自正阳门至永定门、宣武门至右安门、崇文门至左安门皆有南北直道。这些南北干道之间穿插着东西向的横街,所以外城东西方向交通比内城便利。外城西半部自今北京宣武区虎坊桥以西,原属故金中都城的东部,因此街道布局大致经纬分明,排列规整。外城东半部因系在城郊自然发展起来的居民点,大多事先未经规划,所以街道不够规整,特别是正阳门外东部原有许多河道,居民往往夹河而居,待河枯成为陆地后,便形成一条条曲曲弯弯的斜街。

明代商品经济非常发达,特别是自嘉靖、万历以后更是蓬勃发展。在北京经商的商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明王士性《广志绎》云:“京师百姓鲜工商胥吏之业……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由此可知外省人在明北京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故元大都一样,明北京也是天下商货汇聚之地。万历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达北京,其《札记》云:“从水路进北京城或出北京城都要经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

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明北京的商业实际上是在全国商业经济的培育下发展起来的。清查慎行《人海记》云：“永乐初，北京四门、钟鼓楼等处，各盖铺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总谓之廊房。”在外城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明又在外城建廊房，今北京正阳门外廊房胡同即其遗迹。万历时，宛平县有廊房 801 间半，其中店房 16 间半，召商居货。据明沈榜《宛署杂记》记载：万历十年（1582 年）“宛平、大兴二县原编一百三十二行”。其中本多利厚如典当行、布行、杂粮行等计 100 行，本小利微如网边行、杂菜行、豆腐行、裁缝行等计 32 行。其他还有众多肩挑手卖的卖饼、卖菜等商贩。发展的商业经济不但促成众多商业铺行的形成，而且也使北京内外城产生繁华的集市和专业市场。明北京内城的商业市场多属日期、地点固定的集市。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北京内城著名的商业区有大明门前之朝前市、东华门外灯市、城隍庙市、土地庙市。城隍庙市，列肆三里，出售古今图书、商周铜器、秦汉铜镜、唐宋书画和珠宝、象牙、美玉、绫锦，还有来自海外的各种商品。在这里进行贸易的不但有来自全国南北的豪商巨贾，还有外国商人。黄景昉《城隍庙市》诗云：“黄金百如意，但向燕市趋。燕市何所有？燕市何所无！大寮青琅玕，中使锦氍毹。呵声填道路，竞过波斯胡。波斯坐上头，呼使碧眼奴。木客来秦地，鲛人出海隅。”市上商品的价格都很昂贵，并非一般人所敢问津。诗人感叹云：“终日空摩挲，为彼所挪揄。归为自怨怒，自悔身为儒。”东华门外灯市，延亘二里，“市之日，省直之商旅，夷蛮闽貉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物，皆集。衢三行，市四列，所谓九市开场，货随队分，人不得顾，车不能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也。市楼南北相向，朱扉，绣栋，素壁，绿绮疏，其设氍毹帘幙者，勋家、戚家、宦家、豪右家眷属也。”这种繁华情景又有过于故元大都之钟鼓楼市。《天府广记》又称：“玄武门外，每月逢四则开市，听商贸易，谓之‘内市’。各种奇珍异宝和御造铜、瓷、漆器均在内市交易。明代北京人口增长很快，嘉靖、万历时期已接近百万。贵族、官吏、士人居内城，外城成为一般商人、手工业者的聚居之地。在商业经济刺激下，北京外城最接近运河码头的崇文门、正阳门外地区很快发展为巨大的商业区。明代北京的商业中心由故元大都的钟鼓楼一带，转移到外城。北京外城市场与内城的城隍庙市、灯市、内市不同，贸易的对象不是挥金如土的达官显贵，而是一般百姓。当时在正阳门外桥上有穷汉市，是贫苦市民交易的晚市。由于同行业商人聚集在一起经商，所以外城形成大量专业市场，如猪市（今北京珠市口）、揽杆市、骡马市、煤市、柴市、米市、蒜市，等等。明北京繁荣的外城区为清代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九、清代的北京城

(一) 清北京宫室和西苑、南苑

清代的北京城，与明代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修缮，城郭城门仍旧。皇城和宫城最大的变化是乾隆十九年（1754年）扩建了天安门（原承天门）前的宫廷广场。《国朝宫史·宫殿一》载：天安门外，“东为长安左门，西为长安右门，重建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至二十五年（1760年）工竣，又增筑长安左门外围墙一百五十五丈，长安右门外围墙一百六十七丈五尺一寸。各设三座门。”即在长安左、右门外分别加筑一道围墙，从而将门外街道也括入天安门前广场之内。除此之外，皇城、宫城大多承袭明代旧制，只是个别城门名称有所改易，如承天门改称天安门，玄武门改称神武门，大明门改称大清门，北安门改称地安门，等等。由于明末李自成起义军撤离北京时放火焚烧了宫室，所以清朝定都北京后需一一重建。也有一些增建的宫殿，但数量不多。

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占领北京并决定在此建都后，立即着手修复北京宫室。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即决定迁都后一个月，命重建内廷皇帝居室乾清宫。次年（1645年）五月，乾清宫成。清朝又续建原皇极殿、皇极门、中极殿和位育宫等建筑。同年，又改皇极门曰太和门、皇极殿曰太和殿、中极殿曰中和殿、建极殿曰保和殿。顺治三年（1644年）十月，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位育宫、体仁阁（明文昭阁）、弘义阁（明武成阁）、太和门、昭德门（明宏政门）、贞度门（明宣治门）、协和门（明会极门）、雍和门（明归极门，乾隆元年改曰熙和门）落成。这样，外朝三殿区基本完备，余下的工程并非急务，可以从容营建了。顺治四年（1647年）午门上之五凤楼建成。八年（1651年）九月，重建承天门并改曰天安门。九年（1652年）七月，修皇城北安门并改曰地安门。十年（1653年），重建慈宁宫。以为皇太后居所。十三年（1656年）闰五月，内廷三殿和东西六宫中靠近中路的景仁、承乾、钟粹东三宫和永寿、翊坤、储秀西三宫整体建成，皆沿用明代旧称。由此，清北京内廷区也较完备。十四年（1657年）十月，大内昭事殿、奉先殿建成。奉先殿在清朝仍为内太庙。

康熙之世，清朝对北京宫室续加经营。康熙六年（1667年）重建午门和天安门之间的端门，其制与天安门同。又因太和殿、乾清宫分别是外朝、内廷正殿，所以康熙八年（1669年）重建太和殿，乾清宫；并且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再次重建太和殿，可谓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内廷西路西二长街之西的启祥、长春、咸福三宫，二十五年（1686年）又重建内廷东路东二长街之东的延禧、永和、景阳三宫。至此，内廷东西十二宫完备。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又重建坤宁宫东西暖殿和乾清宫两旁之昭仁、弘德殿。至此，清北京大内外朝、内廷宫殿基本恢复明代旧观。外朝中路有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内廷中路有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三殿，东西两路各有六宫。康熙时，还在奉先殿之西建毓庆宫，为皇太子居所；又在明仁寿宫旧址建宁寿宫，为皇太后居所。

重建过程大致是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兴工修太和殿，康熙皇帝御乾清门听政。康熙八年（1669年）正月又修乾清宫，康熙皇帝复移御武英殿听政。同年十一月，太和殿、乾清宫成。

清北京皇宫在顺治、康熙两朝虽尚属恢复阶段，但其宏伟壮丽在世界上已堪称一流。罗马尼亚人尼·斯·米列斯库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并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入京觐见康熙皇帝，其《漫记》述云：“（北京）皇城之瑰丽与雄伟，使欧洲所有皇宫都相形见拙。……（皇宫）里有豪华的宫殿，宽阔的御花园、参天的树木、小溪、假山……皇宮里有许多汉白玉石狮，做工精巧细致，还有许多亭台楼阁、精妙的小桥，以及其他工艺品，令人赏心悦目，赞叹不已。宫中所有的建筑均用黄色——皇帝的标志——琉璃瓦盖成。木制品都是镏金的，或髹以别的色彩，表面再涂一层中国漆。宫殿的建筑结构与欧洲不同：一般为砖墙，木制天花板支撑在高大的圆柱上，柱上有精巧的浮雕，并以镏金粉饰，大梁上有五彩缤纷的绘画。……总之，中华帝国一切稀世珍宝，皇城里无不应有尽有。另外，国外进贡的所有珍宝也都收藏在这里。所以，整个皇城犹如一座宝山，拥有的珍宝璀璨夺目，举世无双。”元世祖之世到达中国的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称元大都宫殿“宏伟壮丽，气势轩昂”，“其宽广的程度，前所未闻”；又称元大都城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如果把马可·波罗和尼·斯·米列斯库的描述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北京作为一座伟大的城市，在元朝至清前期的400余年间，其宏伟壮丽始终在世界上占据首位。

清北京宫室真正发展并达到顶峰是在乾隆之世。乾隆皇帝即位后，改其过去居住过的乾西二所为重华宫，其址在内廷西二长街之北。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载：“重华宫，旧为乾西二所，高宗（乾隆皇帝）潜邸也。当赐居时，成大婚礼于此。登极后，升为宫。屡经缮治，耀以璫题。”重华宫内有崇敬殿、乐善堂、重华宫、芝兰室、葆中殿、古香斋、浴德殿、抑斋、漱芳斋等建筑。自乾隆以来，“岁时酬节，锡宴联吟，开笔书福，皆在此宫”。乾隆五年（1740年）建大内建福宫，其址在内廷西路咸福宫之西。乾隆皇帝自述其建此宫缘由云：“昔皇考大事（即丧事），常居养心殿，二十七月后始居御园，宫内凡经两夏。彼时年力正壮，虽烦暑不甚觉也。后葺建福宫，以其地较养心殿稍觉清凉，构为邃宇，以备慈寿万年之后居此寄制，然亦不忍宣之于口。”实际上，皇太后死后乾隆皇帝也没有居此守制，而是“不得已而从王大臣之请”居御园守制。因此，只好自责：“缺礼实已多，永言志吾愧”。《养吉斋丛录》载：建福宫“后为惠风亭，又北为静怡轩，盖寝宫也。轩西室曰四美具，轩后为慧曜楼，西为吉云楼，楼西为敬胜斋，斋西室曰德日新，斋中亭曰风雅存，西为碧琳馆，馆南为妙莲花室，室南为凝晖堂，堂南室曰三友轩，堂之前为延春阁。阁前叠石为山，岩洞磴道，间以古树丛篁。山上亭曰积翠。山左右列奇石曰飞来、曰玉玲珑、曰鹫峰。南有静室曰玉壶冰。其间幽邃静丽，各极其胜。花竹树石，布列远近，其规制与内宫殊不同也。”从而给格局肃穆但又有些呆板的宫殿区带来一些新鲜的变化。乾隆十六年（1751年）以皇太后圣寿节之故，又分别重修和建筑了内廷西路之慈宁宫、寿康宫、寿安宫。寿康宫在慈宁宫西。寿安宫在寿康宫北，本明代咸安宫，至此改建为寿安宫。寿安宫内有春禧殿、寿安宫、暖阁等建筑。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为准备禅位后养老之所，又重加增葺康熙

尼·斯·米列斯库：《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页。

《日下旧闻考》卷十六《国朝宫室》。

时所建的宁寿宫，四十一年（1776年）落成。乾隆皇帝《御制宁寿宫铭》云：“兹新葺宁寿宫，待予归政后居处则为太上皇临御之所，宜有前殿受贺。因题额曰皇极殿，制用重檐。而宁寿宫之榜，则移于后殿云。”宁寿宫宫垣南北一百二十七丈，东西三十六丈。其内分前后两部分，南为皇极殿、宁寿宫，北为养性殿、乐寿堂、颐和堂、遂初室等建筑。大概是因为乾隆皇帝禅位后将居于此，故宁寿宫仿照大内外朝、内廷之制而建筑。乾隆皇帝退位以后，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交泰殿被火焚毁，次年（1798年）十月建成。其时乾隆皇帝尚在世，亦当身与其事。此外，外朝东路的文华殿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建，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文华殿之北创建文渊阁，以贮存四库书籍36000册。经过乾隆皇帝60余年的经营，清北京宫室达到极盛。明北京大内除中路外，东西两路宫室比较稀疏，特别是东北隅更为空旷。清朝在慈宁宫西建寿康宫，乾西二所建重华宫，咸福宫西建建福宫，东北隅建宁寿宫，使宫殿布局更加丰富。

清代，除于皇城内的宫城有所建筑外，景山、西苑两处也有所增益。

景山即明代万岁山，又称煤山，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六月改称景山。乾隆十四年（1749年）扩建景山，改建寿皇殿于景山中峰以北。十五年（1750年）寿皇殿绮望楼建成。明代时景山诸峰只有磴道，别无亭阁，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于景山并峙五峰之上各建一亭：正中主峰上建万春亭，规模最大，三重檐，四角，黄琉璃瓦铺顶。靠近主峰的东峰上建观妙亭，与之对称的西峰上建辑芳亭、都是重檐，八角，绿琉璃瓦铺顶。最外侧的两小山峰，东峰上建周赏亭，西峰上建富览亭，都是重檐，圆形，蓝琉璃瓦铺顶。主峰上的万寿亭是北京中轴线上的最高点。

清代北京西苑即明西苑旧址。太液池琼华岛山顶的广寒殿，在明神宗万历七年（1579年）早已塌坏，清顺治八年（1651年）六月，为了加强北京城内警备，即于广寒殿旧址建白塔，设信炮。白塔（即今北海公园白塔）是当时北京城内的最高点。乾隆六年（1741年）至十六年（1751年）又重修琼华岛，乾隆皇帝御书“琼岛春荫”碑立于岛上东侧。乾隆十一年（1746年）建阐福寺于太液池西北角的五龙亭以北，寺内有高佛殿，塑有高大佛像，镶嵌无数珠宝，1900年义和团事件中被八国联军劫掠一空。二十二年（1757年）于太液池东岸建画舫斋及濠濮涧，并以山石堆砌太液池三海沿岸。二十三年（1758年）于南海南岸建宝月楼，即今中南海南门新华门。三十五年（1770年）乾隆皇帝为贺其母八十大寿，于太液池北岸极乐界之北建万佛楼，楼七楹三层，有一万个大小佛洞，每个洞里都有一个金色无量寿佛，在义和团事件中也全部被八国联军盗走。琼华岛正南隔水相对的团城，明代时上有承光殿，康熙八年（1669年）倒塌，次年（1670年）修复，乾隆十一年（1746年）复加改建，极为精致。承光殿后面东侧有古籟堂和朵云亭，西侧有余清斋、心香亭和镜澜亭。团城东西两边各有一门，东曰昭景门，西曰衍祥门。元朝至元二年（1265年）制造的巨大玉石酒瓮“渎山大玉海”原置于琼华岛广寒殿，明代广寒殿倒塌后，玉瓮流落于西华门内真武庙内，道人用作菜缸，清乾隆十年（1745年）寻回置于团城。

南海子，清代又称南苑。明代辟为四门，清代增辟为九门：正南曰南红门（今北京大兴县南大红门），东南曰迴城门（今北京大兴县大回城），西南曰黄村门（今北京大兴县黄村），正北曰大红门（今北京丰台区大红门），稍东曰小红门（今北京朝阳区小红门）正东曰东红门（今北京通县海户屯西

南），东北曰双桥门（今北京大兴县双桥），正西曰西红门（今北京大兴县西红门），西北曰镇国寺门（今北京丰台区镇国寺）。大红门内有更衣殿，二道门，大殿三间，乾隆三年（1738年）建。其南为地藏庵，东为小龙王庙。从小红门内稍西有元灵宫，顺治十四年（1675年）建，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修。其外为山门，内为朝元门，门内为元极殿，圆殿重檐，奉玉皇上帝。殿后为元佑门，门内为凝始殿，供奉三清四皇像。凝始殿东有翊真殿，供奉九天真女梓潼像；西有祇元殿，供奉三官像。据说是仿照大内西苑大光明殿而建。小红门西南有旧衙门行宫（今北京大兴县旧宫），建自明代，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重加修建。有宫门，门内前、中、后殿三重。后殿有荫榆书屋，清帝在南苑读书之所。旧衙门行宫西有永慕寺，康熙三十年（1691年）建，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东有德寿寺，顺治十五年（1658年）建，后毁于火灾，乾隆二十年（1755年）重加修建。德寿寺西南一里左右有关帝庙，创自明嘉靖年间，清乾隆三年（1738年）重修；东南二里左右有永佑庙，康熙十七年（1678年）建。南红门内一里左右有南宫，又称南红门行宫，宫门二重，内有前殿、后殿，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建。南宫西北即晾鹰台，高六丈，周长一百二十七丈，清帝在此举行阅兵大典。《养吉斋丛录》载：“南苑举行大阅之典，世祖（顺治）二次，圣祖（康熙）十二次，世宗（雍正）二次，高宗（乾隆）四次，仁宗（嘉庆）二次。”届时，满、蒙、汉八旗兵皆至，以阅兵大臣统领其事。此外，春猎时在晾鹰台还有杀虎之典。晾鹰台北六里左右有宁佑庙，雍正八年（1730年）建，内有殿二重，大殿供奉南苑安禧司土神像。镇国寺门内约五里有新衙门行宫，在南苑西北隅，建自明代。宫门前有二座铁狮子，是元代延佑元年（1314年）旧物。宫门一道，宫殿二重。黄村门内东六里左右有团河行宫，以行宫内有团泊而得名。团泊旧南北宽六十余丈，东西五十余丈。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加以疏浚，复拓宽数十丈。其水南流出苑墙外为团河，又东入凤河，东南流，与永定河会合。在疏浚河道的同时，又于团泊之旁构筑行宫。团河行宫有宫门一道，其内前殿曰璇源堂，后殿曰涵道斋。此外，还有鉴止书屋、东西配殿、六方亭、过河亭、云随亭、水榭、龙王庙等建筑。团河行宫是南苑内最大的一处行宫。

南苑与大内西苑、西郊畅春、圆明等园略有不同，清帝除在此避暑纳凉外，主要还于此狩猎、习武、阅兵。清王士禛《居易录》云：“国制每岁五月临幸南海子，观八旗走马，上御晾鹰台，自六十里外万骑争驰，齐至台下，以先至者为最，赏内府采缎至数十匹，以下赏各有差。”这是说的清初的情况。康熙以后，因有畅春园，继又拓广圆明园，清帝遂不常至南苑。

（二）清北京西郊园林

北京西郊地处永定河（古称水）冲积扇下缘，水泉丰富，低洼地往往流结成湖。从至今仍沿用的万泉庄、玉泉山、海淀等名称，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泉流旺盛，湖泊宽阔，草木繁茂的自然景观。

前已言之，金代在香山、玉泉山建有行宫。元代，海淀因风景秀丽而成为文人吟诗唱和之所，并称丹陵泚。明代，因为这里湖水浩淼而称为海淀。明蒋一葵《长安客话》云：“西湖（今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近为南人兴水田之利，尽决诸洼，筑堤列塍，为菑为畜，菱芡连菰，靡不毕备，竹篱傍水，

家鹭睡波，宛然江南风气，而长波茫白似少减矣。”当时南方农民不但在今北京昆明湖一带开垦水田，而且也连及海淀，故至明末海淀水面已一分为二，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虽然如此，这里的水域仍十分广阔。成书于明崇祯八年（1635年）的《帝京景物略》云：“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巴沟自青龙桥，东南入于淀。淀南五里，丹陵汊，汊南，陂者六，达白石桥，与高粱水并。”当时海淀水面可南达今首都体育馆，并入高粱河，与今紫竹院公园湖泊连成一片。丹陵汊之西也是一片湖泊，明武清侯李皇亲在此筑园，称李园。李园方圆十里，内有挹海堂、清雅亭，奇花异草，数以亿万计。园中水程十数里，皆可通舟；山水之间，高楼耸起，平看香山，俯视玉泉。李园之东即明代名士、太仆米万钟的勺园（今北京大学西门内。）勺园占地百亩，水中遍植莲花、堂楼亭榭，数可八九，也是著名园林。因此，当时人称：“李园壮丽，米园曲折。米园不俗，李园不酸。”明沈榜（宛署杂记）云：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赐地。”因此，明代北京西郊私人园林决非李园、勺园二处。

清代，自康熙皇帝起，开始在北京西郊大规模营建皇家园林，主要地点在海淀圆明三园、万寿山和西山三处。

大约康熙前期，清廷于明李园旧址建畅春园（今北京大学西门西南），康熙皇帝常幸此园观稻。乾隆之世，畅春园为皇太后常年居住之地。畅春园之西又有西花园，亦康熙时建。乾隆每至畅春园向皇太后问安之日，便以西花园为听政之所。玉泉山旧有澄心园，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改名静明园，乾隆时又兴工修葺，计有十六景：廓然大公、芙蓉晴照、玉泉趵突、竹炉山房、圣因综绘、绣壁诗态、溪田课耕、清凉禅窟、采香云径、峡雪琴音、玉峰塔影、风篁清听、镜影涵虚、裂帛湖光、云外钟声、翠云嘉荫。其后又增十六景：清音斋、华滋馆、冠峰亭、观音洞、赏遇楼、飞云、试墨泉、分鉴曲、写琴廊、延绿厅、犁云亭、罗浮洞、如如室、层明宇、进珠泉、心远阁。乾隆十年（1745年），又于香山就旧日行宫基址建静宜园（今北京香山公园）。静宜园计有二十八景：勤政殿、丽瞩楼、绿云舫、虚明斋、瓔珞岩、翠微亭、青未了、驯鹿坡、蟾蜍峰、栖霞楼、知乐濠、香山寺、听法松、来青轩、唳霜皋、香岩室、霞标磴、玉乳泉、绚秋林、雨香馆、晞阳阿、芙蓉坪、香雾窟、栖霞崖、重翠崦、玉华岫、森玉笏、隔云钟。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楼堂亭阁、书屋、山房数十处。

在清北京西郊园林中，规模最大，达到中国园林建筑艺术最高峰的是圆明三园。圆明园在畅春园东北，原是雍正皇帝即位前的藩邸赐园，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建。乾隆十四年（1749年）又在圆明园之东建长春园，十六年（1751年）竣工。在圆明园和长春园之间的南部又有绮春园（后改万春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一个倒“品”字格局，统称圆明三园，周围约二十里，占地约五千余亩。

圆明园宫苑自康熙创建以后，几乎年年续有增置，直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圆明三园才算基本竣工，其建筑之辉煌、布局之奇巧，堪称东方建筑艺术中的瑰宝。据法国人格罗西记述：“这个巨大宫苑的全部园地，布置着人工造的小山和丘陵，有高到两丈，甚至五、六丈的。这些小山的分布，都是按照计划来经营的。……清澈的泉水来自宫苑外的高山（即玉泉山），灌溉山谷的底部后，即行分散，最后又汇成大大小小的湖泊。……在小山的斜坡上，花卉树木布满其间，这些花卉树木在中国很普遍。园中有很多小道，

称为‘羊肠小路’确很恰当，有的通过山谷，有的临近河流，也有的通过丛密的森林，忽而转折而行，忽而贯通大路。这些道路都铺上细小的碎石。……在每一座山谷里，都有依其特有的计划而构造的宫殿。建筑的正面是圆柱和窗牖，涂以金色，再加上彩色的髹漆；墙垣是用灰砖建成，再雕镂花纹；屋顶覆以彩色的琉璃瓦，红、黄、蓝、紫掺杂配合。变化万千，形成极其美观而悦目的境界。仅仅那些为了装饰而建的亭阁，它的宽大程度就足够帝王和他的随从作为住所之用，真是令人不敢置信。仅一座宫殿就需要花费库金四百余万法郎，而其他家俱等物并不计算在内。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宫苑圆明园中，大约有二百多座宫殿，并附有护卫和太监的住所，这些宫殿之间的距离，大约相隔数米，都有墙垣或林木相隔。……宫殿有的建在岩石的高处，可以登高下望，景色奇绝，变化万千。可以看到用作点缀的桥梁和空谷兰花，绿荫里闪现着金碧辉煌的高大宫殿，庭院中陈列着繁花异卉，小山上的泉水瀑布徐徐流下，这样美妙无比的景致，真迷人心目，令人有置身仙界之感。……黑夜的降临，也并不能减低它的美丽。每到夜里，各处宫殿点燃灯火，全园立刻明亮起来。并经常点放花火，这是中国人最擅长的工艺品，制造极为精良，这时整个宫苑的空中、地面、水上都照耀得辉煌明亮起来”。由于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诸帝不仅在圆明园中长期居住，而且在此设朝署值衙，处理政务，所以其地位不同于一般离宫，而几乎与城内宫城相埒。这种特点反映到建筑风格上，就使圆明园兼有宫廷和园囿的情趣，于庄严中渗透出清幽，于山光水色之中又不时显露出威严。

圆明园的正南门称大宫门，大宫门前左右两侧有东西朝房，是六部和各中枢机构的衙署，东侧是宗人府、内阁、吏部、礼部、兵部、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銮仪卫、东四旗各衙门值房；西侧是户部、刑部、工部、钦天监、内务府、光禄寺、通政司、大理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御书处、上驷院、武备院、西四旗各衙门值房。东四旗值房东夹道为银库，又东北为南书房，东南为档案房。西四旗值房西夹道之西南为造办处，又南为药房。入大宫门，有三座金水桥并架于形如曲月的河上。度金水桥，再过贤良门（俗称二宫门），正北就是正大光明殿，这里是皇帝上朝听政的处所，东西两侧置有文武官员的朝房。正大光明殿有七楹，东西配殿各五楹。正殿后有寿山殿，东为洞明堂。正大光明殿之东是勤政亲贤殿（简称勤政殿），五楹，殿东是飞云轩、静鉴阁，其北为怀清芬，又北为秀木佳荫和生秋庭。飞云轩、静鉴阁之东是芳碧丛，这里秀竹成林，盛夏季节是最好的避暑处所。芳碧丛之北是保合太和殿，三楹，再北是富春楼，楼东是竹林清响。芳碧丛东北，靠近圆明园东墙是如意馆。如意馆西南是洞天深处，这里是诸皇子的居所，东西有二街，南北有一街。由此再往西，是诸皇子肄业之所，前为垂天观，中为中天景物，东为斯文在兹，北为后天不老。正大光明殿西北是长春仙馆，正殿五楹，后为绿荫轩，西廊后是丽景轩。长春仙馆之西是含碧堂，五楹，北为林虚桂静，左为古香斋。古香斋之东有阁，名抑斋、墨池云，北有随安室。长春仙馆西南门以西，有藻园，内有旷然堂，五楹。旷然堂北是贮清书屋，其东池上是夕佳书屋，稍北是镜澜榭，东南是凝眺楼、怀新馆，西北是湛碧轩，西南是湛清华。正大光明殿之北有一片湖泊，称前湖。再往北，是由九个小岛团团围绕的后湖。环绕后湖的每个小岛上都

建有华丽的宫殿，彼此之间有桥相通，其中以前、后湖之间的那个岛屿面积最大，上建圆明园殿。

圆明园的中轴线南从大宫门开始，向北穿过正大光明殿、前湖、圆明园殿、后湖，直至园的北端。

圆明园中最著名有 40 景，计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洲清宴、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鸿慈永祐、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淡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安澜园）、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涵虚朗鉴（雷峰夕照）、廓然大公（双鹤斋）、坐石临流、院风荷、洞天深处。以后，又续增八景，计有藻园、文源阁、菱荷香、舍卫城、三潭印月、紫碧山房、断桥残雪、观澜堂。这样，圆明园中最著名的风景区总计 48 处。当然，这 48 处并不是圆明园的全部风貌。实际上，除此以外圆明园中还有更多的风景秀美的处所，如柳浪闻莺、南屏晚钟、天宇空明、秀清村、秀木佳荫、芳碧丛、一碧万顷、湖山在望，等等。这些优美的风景区有很多是依照南方著名园林建造的，海宁的安澜园、江宁的瞻园、苏州的狮子林、惠山的秦园、宁波的天一阁、西湖的苏堤和 院等，都一一模仿在园中建造，有些建造起来后仍使用旧称。

环绕后湖的九个小岛，又称九洲，共有九景。正中的大岛南岸建有圆明园殿，五楹；其北是奉三无私殿，七楹；又北是九洲清晏殿，七楹。九洲清晏殿东是天地一家春，西有乐安和楼；又西有清晖阁，阁前是露香斋，其左为茹古堂、松云楼，右为涵德书屋。自该岛按顺时针方向，其西侧小岛上有茹古涵今殿，五楹，南向，其后有韶景轩方殿，四面各五楹，轩东是茂育斋，西是竹香斋，又北是静通斋。由西转北的小岛上有坦坦荡荡殿，三楹，前有素心堂，后有光风霁月堂，东北是知鱼亭，又东北是萃景斋，西北是双佳斋。再东北的小岛上有杏花春馆，西北有春雨轩，轩西是杏花村，村南是涧壑余清。春雨轩后，东是镜水斋，西北是抑斋，又西是翠微堂。由北转东的小岛上临湖有楼，上下各三楹，名上下天光。楼的左右各有六方亭，后为平安院。由此复东的小岛上南临后湖有慈云普护殿，三楹，是供奉欢喜佛之处。其北有楼，三楹，上奉观音佛，下奉关帝。东边是龙王殿，祀圆明园昭福龙王。再东的小岛上，山阜旋绕，内有碧桐书院，前宇正殿、后照殿，各五楹，其西岩石上有云岑亭书院。由东转南的小岛上有天然图画楼，登高望远，九洲风光尽收眼底。其北是朗吟阁，又北有楼，东边是五福堂，堂后有竹深荷净殿、五楹，殿东南是静知春事佳。由此岛东渡河是苏堤春晓。再南的小岛上有御兰芬楼，纪恩堂、镂月开云（原名牡丹台）。纪恩堂后有池。该岛西邻即前述之建有九洲清晏殿的大岛，此即为后湖一周的建筑和景色。

后湖以北的景色可大致分为西、中、东三路。其西路：在后湖西侧坦坦荡荡殿以西是山高水长楼，正殿九楹，西向，后拥连岗，前带流水，地势平旷，有数顷之多。乾隆时定制，每年上元节（俗称元宵节）前后五日，在楼前与宗室、外藩、文武大臣及外国使官共赏烟火。山高水长楼东北是万方安和，建于水中，造形非常奇特，成卅字形，具有佛教意义。其南有十字亭一座，名文昌阁。由山高水长楼西北度桥，入山口则是月地云居。这是一处清静的古寺形式的建筑，情趣与山高水长等豪华处所绝然不同，正殿五楹，前

殿呈方式，四面各五楹，殿后有楼，上下各七楹，东有法源楼，又东是静室，这里是园中的梵刹之区。由此西度桥，折而北，有刘猛将军庙。刘猛将军是古代传说中可以驱逐蝗虫的神人。月地云居西北，度小桥，循山径而行，前有魁星阁，阁北则是安佑宫，宫西则是圆明园的西北门。安佑宫是清室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大殿，为园中少有的宏大建筑，其形制与皇城内太庙相仿。安佑宫前有三座牌坊，面南，左右共有两对华表，现一对在北京大学，一对在北京图书馆。自此向北，有一座琉璃牌坊，面南，上书“鸿慈永祐”四字。再向北，东西两侧各有朝房五楹，井亭各一，前方有一条月河，上架白石桥三座，名月河桥，过桥则是安佑门、也称宫门。入安佑门，庭院正中就是安佑宫，正殿重檐九楹，座落在宽大汉白玉基石上，殿内正中供奉康熙皇帝画像，左侧是雍正皇帝画像，右侧是乾隆皇帝画像。殿前左右燎亭各一，碑亭各一。正殿东西又各有配殿五楹。在安佑宫门前的三座牌坊东南，又有政孚殿。安佑宫后墙西北是紫碧山房，正面有三进大殿，分别称紫碧山房、横云堂、乐在人和，另外还有配殿。东岩洞中有石帆室，东南有丰乐轩，北有霁华楼，楼东又有景晖楼。横云堂西池上有澄素楼，西北有引溪亭，亭、楼相对，蔚然成趣。紫碧山房东墙外，过三道山丘，度桥而东则是汇芳书院，内有抒藻轩，后为涵远斋。涵远斋前西墙内有翠照楼，东墙内有倬云楼，又东是眉月轩。倬云楼南稍东有随安室，又东有敞宇三楹，为问津，逾溪桥不远处有石坊，上题断桥残雪。汇芳书院南是日天琳宇和瑞应宫，这里是供奉佛、道二教神象的地方，内有正殿，又有中前楼、中后楼、西前楼、西后楼，均上下各七楹。中前楼南有天桥与楼相接，天桥和楼之南，又有一重檐八方顶的灯亭。西前楼南有东转角楼，又西稍南有西转角楼。中前楼的东墙内有一八方亭，名楞严坛。楞严坛又东别院是瑞应宫，有三进大殿，前为仁应殿，中为和感殿，后为晏安殿。瑞应宫之东是汇万总春之庙，是祀花神之所，正殿名蕃育群芳，东北有香远益清楼，楼西是乐天、味真书屋等建筑。由此又西，有一风景区名池水共星月同明。汇万总春之庙北是濂溪乐处，环池带河，风景优美。濂溪乐处北是云香清胜，东是菱荷深处，俱为佳景。由此折而东北是香雪廊，廊东有云霞舒卷楼、临泉亭。汇万总春之庙南是武陵春色，这是一个面积颇大的湖心岛，中有池，北有壶中日月长，东有天然佳妙，南有洞天日月多佳景。武陵春色之西是全璧堂，东南有小隐栖迟亭。由全璧堂后山口入，东有清秀亭，西有清会亭，北有桃花坞，坞西有清水濯纓室。由此又西稍北，有桃源深处。桃花坞东有绾春轩，东北有品诗堂。武陵春色湖心岛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各有小桥，分别与汇万总春之庙、法源楼、万方安和相通。其中路：在后湖九洲东北碧桐书屋之北是天神坛，天神坛之北是淡泊宁静，该处稻田弥望，河水周环，有四门，中为田字式殿。东、北两方皆有楼，正楼（北楼）名淡泊宁静，东楼名曙光。田字式殿东门外有翠扶楼，西门外稍北，过一长堤，别有一院，名多稼轩。多稼轩七楹，其东临稻田有一组建筑，前为观稼轩，后为怡情悦目、稻香亭。由此又东稍北，有溪山不尽、兰溪隐玉二景。多稼轩西池南是水精域，西边是静香室、招鹤磴池。池东北又有三景，东北是寸碧，西北是引胜，正北是互妙楼。淡泊宁静度河桥而西是映水兰香，这里有美丽的花圃，内植名贵的奇花异草。映水兰香东南是钓鱼矶，北边是印月池，又北是知耕织、濯鳞沼，西南是祭祀蚕神的贵织山堂。映水兰香西北是柳浪闻莺，这里垂柳林立，轻风扬拂，与湖光水色相映，实为杭州西湖景色的重现。柳浪闻莺之东是水木明瑟，主要殿宇临水而

立，殿前有一大水池。这里最为奇特的是有一运用水力推动的风扇，系西方传教士为乾隆皇帝所造。乾隆皇帝云：“用泰西水法引入宫中以转飞扇，冷冷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每至盛夏季节，这里又是园中消暑胜景。由此往北稍西是文源阁藏书楼，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专为收藏四库全书而建，上下各六楹。其东路：在九洲碧桐书院正东是院风荷，也是依照杭州西湖著名风景建筑的，面积甚大，包括南部的一个湖泊。湖中东西方向架有一座九孔石拱桥，样式与今颐和园十七孔桥相似，东西桥头各有一石牌坊，东曰玉，西曰金鳌。金鳌石坊西南有园，名四圃佳丽；玉石坊东有亭，名饮练长虹。又东南度桥，折而北，有城关名宁和镇。院风荷之西有佛楼，名洛伽胜境。宁和镇之北是同乐园，这里是圆明园中最大的一处娱乐场所，每年正月皇帝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典礼，宗室王公和外藩使节都到同乐园中欢聚观剧。同乐园中有大戏台名清音阁，三层舞台象征着阴世（下层）、人世（中层）和人间仙界（上层），下设机械，可以表演各种特技。舞台对面有观戏殿，五楹，名永日堂。同乐园之西有坐石临流，此景和它西边不远的淡泊宁静，都是充满幽远情趣的风景区。同乐园中有南北长街，街西有抱朴草堂。

从长街北，渡双桥，就是圆明园中著名的佛殿城——舍卫城。舍卫城为印度佛教的发源地，所以圆明园中这一佛殿城也以此命名。自康熙以后，全国各地所进奉的佛象，都送到舍卫城大殿上供奉，据说共有数十万尊以上（一说十万余尊）。舍卫城是圆明园中规模最大的建筑之一，有殿宇、游廊三百二十六间，城前立有三个石坊牌楼，城南是多宝阁。舍卫城内正殿匾额书“寿国寿民”后殿名仁慈殿，再后名普福宫，各有配殿，最北的一进名最胜阁。舍卫城之北是西峰秀色，正殿十五楹，也是依照杭州西湖同名风景建造的。乾隆时每年七夕（农历七月初七），后宫在此设宴，称为巧宴，张灯结彩，十分热闹。西峰秀色西南临河，河东西各有建筑，河西是小匡庐，河东是含韵斋，又东是一堂和气，又东南是自得轩。西峰秀色后墙东是岚镜航，西是花港观鱼。西峰秀色之北，先后过两石桥，是鱼跃鸢飞，平面为正方形，四面各有一门，并有游廊，正中有一楼，三层，全部建筑在水池中，虽是富丽堂皇的宫殿，仍兼有楼台水榭之趣。鱼跃鸢飞附近，东有畅观轩，西南有铺翠环流，南有传妙室，又南出山口有多子亭。鱼跃鸢飞之东，隔河相望，香稻遍野，有依照农居村市的一片建筑，名北远山村。这里是一个田园式的风景区，水田棋布，沟渠纵横，因为主要的建筑是课农轩，所以该处又以课农轩命名。北远山村北岸有一道石墙，西有兰野花圃，后有绘雨精舍，西南有水村图一景。由此又西，有二楼前后相属，前为皆春阁，后为稻凉楼。再西则有涉趣楼，楼右是湛虚书屋。东北度桥，折而西，有湛虚翠轩，又西有耕云堂、若帆之阁。北远山村之北是圆明园大北门。

在后湖东北方向，是圆明园中最大的湖泊福海。福海的面积略小于今北京颐和园昆明湖，周围三、四里，数个彼此相连的小岛环绕四周。湖中心有三个小岛，彼此有桥相连，这就是著名的蓬岛瑶台。法国人格罗西曾这样描述过福海，他说：“有一个巨大的湖，人们称它为海。这一片汪洋的大水，位于园苑的中心，它的直径约一哩半地，海的中心还矗立着岩石的小岛（按，实际上应是岛上堆砌着很多山石，格罗西隔水远望，所以误解），上面建有

宫殿（即蓬岛瑶台），结构极为精美。这小海的海岸，参差不齐，很有风趣，时而深藏为海湾，或伸出为海峡或半岛，有的海岸是石块砌成的，有的是形象狰狞的岩石堆成的，也有翠绿如茵的细草，织成天然的斜坡，通向海边。大道和小路的终点，修成各样的阶梯（即码头）便于攀登游船。我所看到的游船，都是装饰得非常华丽的，大小不一，形式也各有不同，最大的船有长到六丈六或八丈四的。”根据这段描述，我们大致也可以想象出福海的迷人景色。福海的形状内方外圆，略呈正方形。环福海周边正南居中的大岛上，自东至西顺序为南屏晚钟、广育宫（内有凝祥殿）、夹镜鸣琴等景。自该岛按顺时针方向，西边小岛上是湖山在望，有佳山水、洞里长春诸景。由西转北的小岛上有澡身浴德殿，前突水中，构思别致，这是澄虚榭的正殿，南有含清晖，北有涵妙识，西有静香馆，又西有解愠书屋，西南有旷然阁。再北的小岛上有延真院，又称望瀛洲，其北有深柳读书堂和溪月松风，再北则有廓然大公，因为主要的建筑是双鹤斋，所以此景又以双鹤斋命名。其西有环秀山房，西北有规月桥、临湖楼，东北有绮吟堂，又北是采芝径，经岩洞而西，有峭菴居，其西有披云径、启秀亭、韵石淙、芰荷深处。廓然大公北墙门外有天真可佳楼，西墙外有影山楼。由北转东的小岛上是平湖秋月，这也是仿照杭州西湖同名景色建造的风景区，处于福海的西北角。平湖秋月正宇西有流水音；东北出山口，临河处又有花屿兰皋。平湖秋月之北，过一小桥，有大船坞东西各二，船坞西北是安澜园。安澜园的正殿名四宜书屋，所以此景也称四宜书屋，是模仿浙东海宁著名的陈氏安澜园建造的。该景附近，东南有蕙经馆，又东南是采芳洲，其后是飞睇亭，东北是绿帷舫，西南是无边风月之阁，又西南是涵秋堂，北边是烟月清真楼，楼西南是远秀山房，自楼北度曲桥，又有一楼，名染霞楼。船坞之东有三潭印月，这也是模仿杭州西湖同名景色建造的风景区。三潭印月之东是著名的方壶胜景，前临湖湾，正殿有汉白玉石座，平面呈山字形，前伸水中。石座分三层，每层都围以精美的汉白玉石栏，上建啁鸾殿、琼华楼，啁鸾殿前还有两座石碑坊。方壶胜境之东有蕊珠宫，其名取自道教经曲蕊珠经，这里风景奇绝，独处于福海东北角的一个封闭水湾之中，自成一局，是其他风景区所不能比及的。方壶胜境之北是天宇空明，这里也是圆明园的东北角，背依红墙，前临水池，是一处封闭的园林，后有澄景堂，东有清旷楼，西有华照楼。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平湖秋月。平湖秋月以东的小岛上有两峰插云，东南是山水乐，北是君子轩、藏密楼。由东转南的小岛上是雷峰夕照，临湖而建，也是依照杭州西湖同名景物，正殿名涵虚朗鉴，其北稍西是惠如春，又东北是寻云榭，又北是贻兰亭、会心不远，南是临众芳、云锦墅、菊秀松蕤、万景天全。该岛正中东墙辟有明春门，过此门可至东邻的长春园。再南有一狭长岛屿，自北而南有接秀山房、观鱼跃二景，也都是临湖而建。接秀山房正殿后有琴趣轩，北有一座方楼，东南有澄练楼。澄练楼后是怡然书屋，稍东又有一佛室名安隐钟，还有一亭，名揽翠亭。由南转西是别有洞天，中间隔水池分为南北两部分，中有石桥相连。别有洞天依山临河，西有纳翠楼，西南有水木清华之阁，稍北有时赏斋。此外，还有西山入画、山容水态二景。别有洞天南半部的东南，也是圆明园的东南角，又有一个小风景区，名秀清村，其北有绿油门，可通至长春园。别有洞天之西就是开始时介绍的南屏晚钟所在的岛屿，此为福海

一周的景色。福海正中有三个人工湖心岛，正中的大岛略呈方形，其西北、东南各有一小岛，彼此相连，岛上都有宫殿建筑，这就是著名的蓬岛瑶台。蓬岛瑶台的正殿建在正中的大岛上，殿前有台，即所谓瑶台，该景就是由此得名。瑶台东有畅襟楼，西有神州三岛。神州三岛东又有随安室，西有日日平安报好音。自瑶台西北度桥可至北岛，东南度桥可至东岛，东岛有瀛海仙山亭。三座湖心岛象征着古代神话中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在岛上放眼四望，目光所及是一片浩淼的湖水和远处点缀在绿树丛中的红墙碧瓦，宛如身处仙境。

圆明园之东是长春园，有著名风景区大约三十处，园名取自圆明园四十八景之一的长春仙馆，具有浓厚的道家色彩，这里原是乾隆皇帝准备退位后养老的地方。长春园建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竣工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其兴建在圆明园之后。长春园中有很大的湖泊，湖心有六个小岛，上面有很多建筑，长春园的主体建筑淳化轩就在湖中心最大的岛上。淳化轩有左右两廊，每廊有十二间，每间内嵌有六块古代法帖的刻石，与今北海公园琼华岛西侧阅古楼所藏三希堂法帖刻石的形式相同。据说这座建筑竣工时，正值“淳化阁帖”镌刻完毕，于是便以淳化轩命名。淳化轩前有含经堂，后有蕴真斋，这三座建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宫殿区。长春园东北角，临近湖岸有狮子林十六景，完全是依照乾隆南巡时曾游过的江苏狮子林园景建造的。淳化阁之西是一组矗立在湖中的宫殿，名海岳开襟。宫殿建造在一圆形台基上，东西南北四方分别有方台向前突出，造型奇特。台基分二层，全部围以汉白玉石栏，上建得全阁，前后有三大殿，金碧辉煌，从远处望去犹如海市蜃楼一般。与此相似的还有淳化轩之东的玉玲珑馆，在三岛环围之下，也是风景绝佳的建筑。长春园中最具有特点的是位于北部的西洋楼，这是一个兼有东、西方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动工于乾隆十年（1745年），毕工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西洋楼包括谐奇趣、养雀笼、方外观、远瀛观、海晏堂、蓄水楼、黄花阵、线法山等建筑，是意大利传教士、著名画家郎世宁和法国传教士蒋友仁、王致诚等人主持设计和建造的。西洋楼全部以巨大汉白玉石块砌成，复加以精美的雕刻，其风格兼收中西的优点，有独特的创造。例如谐奇趣的楼房，全部用汉白玉石柱，柱身、柱头的样式都是仿照罗马式，并雕有生动的花纹，充分表现出欧洲古典建筑的宏伟典雅风格，但是墙身所嵌五色琉璃瓦或抹以粉红色，以及庑殿式并覆以紫色琉璃瓦的楼顶，又都充分体现了传统的中国宫殿风格，特别是在谐奇趣大殿的两侧，又各有一座纯粹中国风格的五色琉璃八角亭。这样的布局和风格，使得西方建筑艺术带有一层东方色彩，而被乾隆皇帝所接受。这里最为奇特的是主楼前的大水法（喷泉），是蒋友仁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建造的。法国人格罗西述云：“神父蒋友仁施展才能，制造抽水机关，即为点缀此等宫殿及其邻近之地面。……藉蒋氏指导，制成之无数喷水机关中，吾人可见象‘兽战’之形者，林中猎狗逐鹿之情景及水制之时钟。……中国一日为十二时辰，双倍我国之小时，华人并以十二种不同之动物表现之。神父蒋友仁异想天开，思欲聚此十二动物于一欧式宫殿之前，位于一广阔三角池之两边，形成一继续不断之时钟……此等兽类，轮流值班，口中喷水两小时，表现全日时间之区分。此喷出之水，按抛物线式，复注入池之中心。”

在圆明园和长春园之间南部的是绮春园，同治十二年（1873年）改名万春园。此园自道光朝始，通常是皇太后的居处。该园始建年代不详，据考至迟应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前。嘉庆之世，又将其西部的庄敬和硕公主之含辉园、西爽村成邸寓园及傅（恒福）康安公子赐园也一并括入，大事修建，构成园内的西路，俗称小南园。绮春园内有著名风景区30处，所以通常认为圆明三园共计有著名风景区100余处。绮春园的主要风景区大部分在东路，如天地一家春、蔚藻堂、凤麟洲、涵秋馆、庄严法界、春泽斋、四宜书屋、澄心堂、正觉寺、镜绿亭等；西路则有消夏堂、含晖楼、流杯亭、绿满轩、畅和堂等建筑。绮春园风景流于自然天成，与圆明园，长春园相比，别是一番情趣。

圆明园是皇家禁苑，所以外人不得随意进出，即使朝廷高官也莫能外。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九月，李鸿章自颐和园入朝议事后回城，乘兴游圆明园，尽管这时圆明园经英法联军焚毁30余年后早已残破不堪，但仍被有司奏劾，先议革职，后“得旨：加恩改为罚俸一年，不准抵销”。

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诏以圆明园为春、夏、秋临御听政之所，从此以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诸帝皆常年居圆明园视朝听政。清北京政治中心向西郊的转移，使海淀地区民居、街道、商业得到发展的机会，昔日风光秀丽的游览地遂出现喧闹的市镇。

以圆明园三园为中心，其东、南、西三面还分布着熙春园、近春园、朗润园、镜春园、鸣鹤园、淑春园、澄怀园、蔚秀园、一亩园、承泽园、自得园、清漪园等园林。其中规模最大，而且在清末其地位取代了圆明园的就是清漪园。

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其地有山有水，山在湖泊之北，本是西山的一支余脉。金代，海陵王完颜亮曾在此处建造金山行宫，章宗时山称金山，水称金海。元代，相传有人在山上挖出一只石瓮，以为神物，故改称瓮山，水也改称瓮山泊。据地质学家考察，这个湖泊已存在4000余年了。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开凿通惠河以便通元大都漕运，自玉泉山、昌平白浮泉等处引水入瓮山泊，湖面更加扩大。明代，弘治七年（1494年）在瓮山南山脚下修建圆静寺（旧址在今排云殿）和行宫别墅、望湖亭等，称好山园。又因其在京城以西，又称西湖、西湖景。当时，除园林外，四周多是稻田，宛然江南水乡景象。清朝继续在此营造，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为给太后祝寿，在圆静寺旧址建大报恩延寿寺，改瓮山为万寿山、瓮山泊为昆明湖，并将此处园林命名清漪园。大事兴建宫殿楼阁，达到兴盛时期。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清漪园与圆明园同遭野蛮破坏。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复清漪园，并改名颐和园。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颐和园复遭八国联军野蛮破坏，宫殿被焚，文物珍宝也被洗劫一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慈禧太后返回北京后，动用巨款修复颐和园。这样，颐和园就成为清末皇室在北京的最大园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每年都有部分时间住在园内处理政务。

现在颐和园公园的正门原称东宫门，入东宫门，其西有仁寿门，两门之

以上参考王威：《圆明园》；黄凯钧：《圆明园记》；钵提：《记圆明园》；《日下旧闻考》卷八十一、八十七《国朝苑囿》；《养吉斋丛录》卷十八。

《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百九十五。

间是南北九卿房。入仁寿门，正中是仁寿殿，座西朝东，建造在高大台基上，这里是处理朝政之处。仁寿殿前南北两侧还有配殿。从仁寿殿东南角西去，经过一段曲岸径幽巷，豁然开朗，眼前是一片浩淼的湖水，这就是昆明湖。昆明湖东岸有知春亭、铜牛、廓如亭、十七孔桥。度十七孔桥，可自东岸到一湖心小岛，上有鉴远堂、月波楼、涵虚堂、广润灵雨祠（龙王庙）。该岛之南有凤凰墩，这是乾隆时开凿昆明湖，加筑东堤（即今昆明湖东岸），拦蓄玉泉山东流之水，有意在湖心保存的一个小岛，仿照无锡惠山下黄埠墩加以修造，岛上原建有凤凰楼，现在只有残迹，不被一般游人所注意。与东堤遥遥相对的是西堤，堤上自南往北建有六座石桥，风格各异，分别称柳桥、练桥、镜桥、玉带桥、豳风桥、界湖桥。颐和园最主要的建筑在万寿山的南麓（又称前山）一带。在万寿山南麓脚下，临昆明湖北岸有一排瑰丽的牌坊，自此以北是排云门，入门后正中就是排云殿，沿山道而上有德晖殿，再上则是用巨石垒筑的石台，高达38米，上面屹立着仿武昌黄鹤楼而建的佛香阁，佛香阁之上是完全砖石结构的智慧海，这里是万寿山的顶峰，极目远眺，西郊园林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万寿山西麓有五方阁、宝云阁（因全部用铜件构筑，所以俗称铜亭）、画中游、听鹧馆，西南山脚下有清晏舫（俗称石舫）；东麓有转轮藏、景福阁、涵远堂、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其中谐趣园最为著名，素有园中之园之称，据说是仿照江南无锡寄畅园建造的，园内正中是一方池水，正北有殿，殿前有突出水面之上的钓台，环池东、西、南三面则有游廊、石桥。万寿山北麓，也就是后山，不象前山那样富丽堂皇，别有一番情趣。山脚下的小河两岸依照江南风格建造了许多店铺茶楼，命名为苏州河、苏州街，原是园中一处非常喧闹的处所，后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焚毁，只剩下破屋颓垣。近年来北京旅游业大为发展，该处景观始得恢复。万寿山前山脚下与昆明湖之间是著名的长廊，以排云殿为中心，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长700余米。长廊内上部两侧顶檐有很多以花卉和神话、历史故事为题材的彩绘，引人入胜。万寿山前山自下而上的排云殿、含晖殿、佛香阁、智慧海等气势恢宏的高大建筑物，可说是园中的主体建筑。如果我们将这依托青山的一组建筑视为一尊巨大的佛象的话，那么位于山前的长廊则恰似这尊佛象胸前的一串佛珠。

清代北京西郊以圆明园三园为中心的园林，在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遭到惨重破坏。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以换约为借口，自天津大沽口登陆，10月5日占领海淀，10月6日占领圆明园并放火焚烧，当夜在北京城内即可看到“西北火光烛天”。10月7日，又“闯入清漪园东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多有伤损，小件尽行抢去”。10月8日，又“陆续闯入静明园（玉泉山）宫门，将各殿陈设抢掠，大件伤损，小件多经抢去”。10月18日，侵略者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大肆洗劫之后，放火焚烧西郊清皇家园林。据英随军牧师莫·格赫自供云：“我因为职务的羁绊，当这件焚毁工作开始的头一天我不能到场观看，有一两师军队散在乡间，放火燃烧，四个皇家花园中的一切宫殿，从圆明园开始，其次，转向西边的万寿山、静明园（玉泉山），最后轮到香山（静宜园）。次日清晨八点钟，我到达圆明园。从园内带着芬纳和普罗宾的马匹……到香山去。……一条石砌的道路，环绕着一座高墙，我从墙隅的地方转弯过去，就有一片浓密的烟雾

弥漫在我的前面，而且威风赫赫的烈火，在烟雾的顶上，发出熊熊的火焰，简直高出树梢好几尺。一座庙宇，这并不是一所房子，却包括着一群分列的建筑物，环绕着一个大的神龛，也正熊熊地燃烧着。火焰散开去，焚烧掉里面和环绕着的高可参天的树木。这些树木……差不多有好几百年了。庙内描金的栋梁和五光十色的琉璃瓦……一切，一切，都被这吞灭所有东西的烈火毁坏了。”“那天我们所走到的最辽远的地点，且为皇家花园的尽头……军队暂停此处，约一小时左右，各师队伍接受米启耳将军的号令……命令发下之后，不久就看到重重烟雾，由树木中蜿蜒曲折，日光之下，光芒闪烁。鳞鳞屋瓦，构造奇异的形状，只有中国人的想象力才能构思出来的。顷刻功夫，几十处地方，都冒出一缕一缕的浓烟密雾来。……不久，这一缕一缕的烟，聚成一团一团的烟，又集合为弥天乌黑的一大团，万万千千的火焰，往外爆发出来，烟青云黑，云蔽天日。所有庙宇、宫殿、古远建筑，轮奂辉煌，举国仰为神圣庄严之物，和其中历代收藏……都一齐付之一炬，化为劫灰了。……从今以往，数千百年为人所爱慕的崇构杰制，不复触到人类的眼帘了。这些建筑都足以表彰往日的技术和风格，独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和它们比拟。……当我们回来的时候，芬纳带着一两队骑兵，绕行一周，将我们进行时忽略过去的那些外面的建筑，也都一齐架火燃烧。我们回到圆明园以后，才知道第六十队的来福枪士兵和旁遮普士兵，已经将他的时间利用得极其巧妙，所焚烧的区域宽阔而且遥远……自那座正大光明殿，以迄大门中间，所有建筑尚屹然存在，未付焚如。因为军队驻扎其中，故迟迟有待。时已三点钟，我们应须整队开回北京，乃发布命令，一并焚毁。刹那之间……这座正大光明殿熊熊燃烧起来。庄严华贵之区，且曾为高贵朝觐之殿，经此吞灭一切的火焰，都化为云烟了。”在外国侵略者肆行烧掠时，一些地痞流氓也乘火打劫，伙同侵略者一起抢掠，例如10月7日闯入清漪园抢掠的即有“夷人二百余名，并土匪不计其数”。又据瑞常等奏折：“夷人于八月间，扰及园庭，附近土匪，乘间抢夺……圆明园、三山等处，所有收存物件，被夷人搜取者固多，而土匪乘势抢掠……亦复不少。”同治十二年（1873年）九月曾下令重修圆明园，因工费浩大，财政支绌，动工不到一年便停止下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英美法日俄意德奥）侵入北京，圆明园、颐和园复遭洗劫。清人胡思敬时避居昌平，经常骑驴进城探听消息，其诗云：“曲槛临湖面面开，内官惊看骆驼来。琳琅百货都输尽，不抵澄杯一炬灾。”自注云：“太后之归政也，退居颐和园。园在西直门外三十里，宫殿亭台，备极土木之盛。历朝宝物皆贮其中，至是敌人踞之，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累月不尽。”而随着清朝统治的衰落，地方恶势力和太监内外勾结，拆盗园中残存的石材。清朝灭亡以后，北方军阀，豪富和地痞流氓更加明目张胆盗取圆明等园石材、梁木，持续20年之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云：“二十年来，圆明园故址，文础雕槛，暨于山石（中有艮岳之遗），为豪强攫取略尽。瞿兑之常言，京城道上，常见大车曳宫殿木材花石而过，不知所往。”就这样，圆明园这一世界园林建筑艺术中的瑰宝，首遭外国侵略者的

《西书中关于焚毁圆明园纪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清咸丰十年英法兵入京焚毁圆明园案》，《第二次鸦片战争》（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驴背集》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浩劫，继又遭国内恶势力的破坏，终于变成了一片荒凉的废墟。

北京西郊海淀至西山一带在清代出现大规模的皇家园林并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有比城内更为丰富的水源可供皇家园林之用。这里又处于西山脚下，地势高敞平坦，宜于修建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同时，这里又有金、元、明以来遗留下来的官、私园林可以利用。清西郊园林营建起来以后，雍正至道光诸帝皆常年住在圆明园处理朝政，清末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则常年住在颐和园中，因此无形中北京西郊成为清朝的实际统治中心，而城内皇宫反而有些形同虚设的意味。这虽然不是北京城址的迁移，但从政治重心的转移来说，其与城址迁移具有相同的意义。而这一重要变化，如上所述，又和北京西郊丰富的水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三）清北京坊巷和市

清朝定都北京，城市实行兵民分居政策。八旗官兵居内城，汉族居民住外城。因此，顺治元年（1644年）凡原居住在北京内城的汉族官民商贾皆迁居到外城。明北京街道和元大都一样，都是开放的街巷胡同，各坊只不过是街道行政区的名称。清代，北京外城分为中东西南北五城，实际已演变为以各城为区，以街道胡同为主的新形式。其划分中东西南北五城的方法，正与今日北京城分为东城区、西城区相同。内城则居住满、蒙、汉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统归八旗管辖。

据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载：顺治元年（1644年），八旗官兵居北京内城，环绕皇城分为里外两层。外层为八旗前锋参领、侍卫前锋校、前锋等：镶黄、正黄旗以地安门为界，正白、镶白旗以东安门为界，正红、镶红旗以西安门为界，正蓝、镶蓝旗以天安门为界。其里层为八旗满洲五参领、蒙古二参领下护军参领、护军校、护军等；城东部：镶黄旗自地安门东至草厂胡同之西。正白旗自草厂胡同南至东厂胡同之西。镶白旗自东厂胡同循皇城而南至口袋胡同之西。正蓝旗自口袋胡同南而西至长安门金水桥。城西部：正黄旗自地安门西至皇城西北角。正红旗自皇城西北角循皇城而南至西安门南。镶红旗自西安门南循皇城而南至灰厂（今北京府右街北段）东。镶蓝旗自灰厂东而东至长安门金水桥。内外八旗官兵驻防的位置并不对应。雍正三年（1725年），重议八旗界址，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驻防之地。在每一旗驻防区内，最靠近城市中心的为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次之，最外层为汉军八旗。镶黄旗驻地西至地安门大街、旧鼓楼大街一线，东至东城垣，北至北城垣，南至宽街、府学胡同、东直门大街，在北京城东北隅。其南与正白旗接界。正白旗驻地自府学胡同南，南至报房胡同（今北京王府井大街北端路东）之东，西至皇城（今北京东皇城根北段），东至东城垣。其南与镶白旗接界。镶白旗驻地自报房胡同南，南至头条胡同（今北京东单大街北侧），东至东城垣，西至皇城。其南与正蓝旗接界。正蓝旗驻地自头条胡同南至南城垣，东至东城垣，西至金水桥，在北京城东南隅。正黄旗驻地自旧鼓楼大街西至新街口大街（今北京新街口大街），再自四条胡同（今北京新街口四条）西至西城垣，南至马状元胡同（今北京护国寺南群力胡同），北至北城垣，在北京城西北隅。其南与正红旗接界。正红旗驻地自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东至皇城，西至西城垣。其南与镶红旗接界。镶红旗驻地自羊肉胡同（今北京西四）南，南至白庙胡同（今北京复兴门大街北），东至

皇城，西至西城垣。其南与镶蓝旗交界。镶蓝旗驻地自白庙胡同南至南城垣，东至金水桥，西至西城垣，在北京城西南隅。《京师坊巷志稿》又云：“北京内城八旗驻防地”后颇有改并，近（光绪时）则齿生日繁，多错处矣”。另外，由于北京外城是京师繁华之地，酒楼林立，自清朝中后期不断有旗人私自迁居外城，屡禁不绝。

北京外城自东向西排列，依次为东城、南城、中城、北城、西城五区。外城之东城，东至外城东城垣，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西至崇文门外大街。其西与南城交界。南城，自崇文门外大街西至三里河街，北至内城南垣，南至天坛。其西与中城交界。中城，自正阳门外南至永定门，东至三里河，西至石头胡同（今北京大栅栏西街西口）。其西与北城交界。北城，自宣武门外大街东至石头胡同，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其西与西城交界。西城，自宣武门外大街西至外城西城垣，北至内城南城垣，南至外城南城垣。

北京内城由八旗兵驻防，外城则置铺，以掌巡查、捕盗之事。如外城之中城东西各置3铺，东城置7铺（光绪时减为4铺），南城置6铺，西城置7铺，北城置9铺。

清代北京内城街道格局一仍明旧，没有多大改变。惟一比较突出的变化是内外城门附近建有许多兵营。另外，还建有许多宽阔宏敞的王公贵族府第。雍正、乾隆以后，清帝常年住西郊圆明园，王公贵族为上朝方便，多在西城建宅；同时，东城因接近商业区和通惠河码头，清晚期富商大贾多居于此，从而形成清晚期北京所谓“西贵东富”的城市社会结构。

清代，北京外城商业区进一步发展，各种同乡、同行业性质的商业行会比较发展。道光十八年（1838年）《颜料行会馆碑记》云“京师称天下首善地，货行会馆之多，不啻什百倍于天下各外省；且正阳、崇文、宣武三门外，货行会馆之多，又不啻什百倍于京师各门外。”该会馆乾隆六年（1741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又云：“我行先辈，立足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可见外城区商市之繁盛，亦可见北京商业会馆历史之悠久。据清吴长元《宸垣识略》记载，清北京外城东部各地会馆最著名的有82所，西部有100所。这些会馆中大部分是本土人到北京投考时寓居之所，但也有不少由同乡商人出资筹建的商业会馆。如：仙城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王皮胡同）为广州商人会馆。临襄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油盐酱醋粮业商人会馆。晋翼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小江胡同）为布业商人会馆。潞安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珠市口西大街）为铜锡烟袋商人会馆。河东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南）为烟业商人会馆。太平会馆（在今北京宣武区南堂子胡同）为山西太平县商人会馆。临汾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打磨厂）为山西临汾县纸张、颜料、干果、烟行、杂货五行商人会馆。孟县会馆（在今北京宣武门外椿树上二条）为山西孟县翟翟行商人会馆。东元宁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长巷下三条）为南京绸商会馆。浙慈会馆（在今北京崇文区晓市大街）为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这些同乡商人会馆同时也是同业商人会馆，带有较强的地域性和封建性。另外，也有一些不限地域的行业会馆，如玉行商人的长春会馆（在今北京和平门外沙土园），典当业商人的当商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西柳树井），

南北糕点业商人的糖饼行公所（在今北京广渠门内栖流所），染坊业、蓝靛业商人的靛行会馆（在今北京正阳门外珠市口）。这些行业会馆地域色彩比较淡薄，应该说比前述同乡商人行会更为进步。同乡同业商人通过行会保护自己的利益，反抗官府和牙行的盘剥。同时，通过行会组织调整本行业的经济活动，避免由于同行竞争而引起利润下跌。由于商业行会的封建性，其在保护商人利益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限制了商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十、北京古代城址变迁的启示

三千年来，从西周的燕国都城到明清的北京城，北京的城址曾有过数次迁移。如前所述，周初燕国都城遗址在今北京西南的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村，东周至两汉时蓟城遗址大约在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一带，东汉以后至金代时的蓟城（辽南京、金中都）遗址在今北京广安门内外一带，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即在今址。从城址迁移的路线上看，经历了从西向东，复从东返西，又从西返东的“之”字形（见图七）。北京古代城址所以要这样迁移，与当时水源的布局 and 变化有直接关系。周初燕都所依赖的是发源于今房山区以北山区的圣水（今大石河、琉璃河）和圣水的支流防水（今丁家洼河），但圣水水系因发源于附近山中，涨落非常剧烈，不利于城市安全，所以东周时以蓟为都以后则迁至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一带，直至东汉。这是因为东汉以前，北京地区最大的一条河流——水（今永定河）正在此东北不远处流过，其故道即今积水潭、北海、中海、龙潭湖一线，也就是后来的高梁河水道。东周时燕国所以放弃位于圣水水系的旧都，别于其东北的今北京宣武门至和平门一线以南建新都，目的就是避开涨落无常且水量较小的圣水而东就水量充沛、平流稳定的水。但是，事实上水河道存在自东北向东南摆动的趋势，这种摆动的结果在东汉末年破坏了蓟城东部。所以东汉以后，蓟城位置复西缩至今北京广安门内外一带，改依城市西部的西湖（今北京广安门外莲花池）水系。当时水已经改道，从新筑蓟城的西南流过。西湖水及其下流洗马沟河虽小于水，但胜于圣水，而且比水、圣水安全，这是选择该处作为城址的主要理由。从西部山区的圣水水系到东北部的水，复退至西湖水系，这反映了北京古代先民在选择城址方面的重要尝试。他们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个既能为城市提供充分的用水，又不会危害城市安全的合理的水源。应该说，依傍西湖的今广安门内外一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城址，所以自东汉以后直至金亡，其间 1000 余年再没有迁移过。即使元朝建造大都城以后，其作为旧南城也仍然不废。元朝建大都城，主要是因为原金中都城西部的西湖水量衰微，不足应用，所以改依东北的高梁河水系。实际上，元大都所依赖的也不仅仅是高梁河水，还包括北自昌平白浮神山泉、北沙河、东沙河、西自玉泉山、西山的诸多水源。金初和元末，又曾先后开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均未成功。明清时期，北京主要依靠玉泉山、西山诸泉，水源问题已感困难，虽然没有到必须再次迁移城址的程度，但清代西郊园林的大规模兴建，康熙以下诸帝常年住在圆明园中听政，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反映了北京布局和政治重心受水资源的影响而向西部地区转移。

1949 年以后，北京城的水源始终也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为此，五六十年代开辟了永定河引水渠和京密引水渠，从北京西部引永定河、东北部引潮白河来解决北京城市用水。永定河引水渠的引水口在石景山三家店，在这里筑了一条 243 米长的拦河坝，引水东去，穿过模式口山，凿有一条长 685 米的隧洞。从三家店到双槐树村一段是新凿河道，自双槐树以下到北京西便门是利用原南旱河下游河道。但是永定河流量变化很大，每逢雨季时河水暴涨，偶遇天旱则干涸见底。也就是说，北京不需要水时，它汹涌而来；当北京需要水时，它也干涸待泽，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虽然在永定河上游修有官厅水官，调节水量，但也深受永定河泥沙淤垫之害。况且近

年来永定河上游地区气候干旱，降水较少，永定河对北京的实际价值也就更成问题。因此今日北京实际上主要倚重的是东部潮白河水系。侯仁之先生1955年发表的《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一文，在论述元代郭守敬的白浮瓮山引水渠时指出：北京“今后的引水，还不应当仅以白浮诸泉为限，凡是北京湾（北京三面环山，故称北京湾）周边山麓的水流，无论巨细，都应当考虑在引水计划之中，其上源可以远达潮白河，同时还须结合水土保持工作，考虑在北京湾的北山与西山山麓，利用一切可能的地形，修筑水坝，拦蓄山洪，不仅为了保护引水渠道，同时也可以接济泉流。”“关于昆明湖的修筑，前已指明这是北京历史地理上所出现的第一个人工水库……昆明湖的进一步扩大以增加蓄水量是十分必要的，何况将来还要考虑从北京湾的北部继续引水，如果沙河与清河河谷无法迳直跨越，那么昆明湖仍然是引水必经之路，它的扩大就更加必要。如果以上考虑得以逐步实现，今日昆明湖也必将大为改观，它引水的来源西自永定河、东北自潮白河、中途包括北京湾西北部的一切泉流，总汇为一，这就足以保证未来首都地上水的来源，永无匮乏。”此后，密云水库、怀柔水库、京密引水渠相继竣工，从潮白河引水供给北京成为现实。京密引水渠自昌平县以下，大致就是元代郭守敬白浮瓮山引水渠旧线。京密引水渠的建成，对于北京城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北京城市所依赖的主要水源实质上已不再是西部的高粱河水系，而转为东部的潮白河水系，城址虽没有迁移，但所依靠的水源却发生了根本的转移。因此，如果说京密引水渠的出现与元建大都城的意义相同，那也不算过分夸张，城市所依赖的水源的转移和城址的迁移在意义上是一样的。近年来，随着气候的干旱和北京城市居民的增加，特别是农业和工业用水量的大幅度增长，水资源的问题又再次突出起来。面对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我们必须面对今日北京赖以生存的水源是在东部潮白河水系的现实，作出相应的对策。如果是在古代，按照3000年来北京古代城址趋于合理水源的迁移规律，今北京城就应迁到东部的通县、朝阳区一带。这里地势平坦，潮白河、温榆河都流经此地。《清世祖章皇帝实录》载：“顺治六年（1649年）五月癸亥，摄政王多尔袞以京城水苦，人多疾病，欲于京东神木厂创建新城移居，因估计浩繁，止之。”《日下旧闻考》载：“神木厂在广渠门外二里。”其地今属朝阳区。由于清廷顾虑建城工费浩大，多尔袞的计划未能实行。次年（1650年）七月，多尔袞复提出折衷办法，云：“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仍前代造建大城，恐糜费钱粮……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从而改别建都城之议为在塞外修建避暑小城（今承德市郊喀喇城旧址）。多尔袞当初议在北京以东别筑新城，其原因之一恐怕也是在于看到了京东水源对北京的意义。当然，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合理的规划使我们可以避免象古代那样为追逐合理水源而屡迁其城。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制约，城市必须有充足的水源才能生存仍是最基本的事实。今日北京虽有京密引水渠，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北京城

见《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四。

《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十九。

缺水的问题。因此，在今天的状况下，北京城址虽尚谈不上迁移，但北京今后的布局应该向潮白河主河道所通过的通县、朝阳区一带发展，似乎应是必然趋势。即便我们不考虑北京城市人口的压力、交通的拥挤、住房的紧张等因素，仅仅从水资源方面考虑也应如此。笔者认为，这就是 3000 年来北京古代城址变迁规律对今日北京人的启示。

